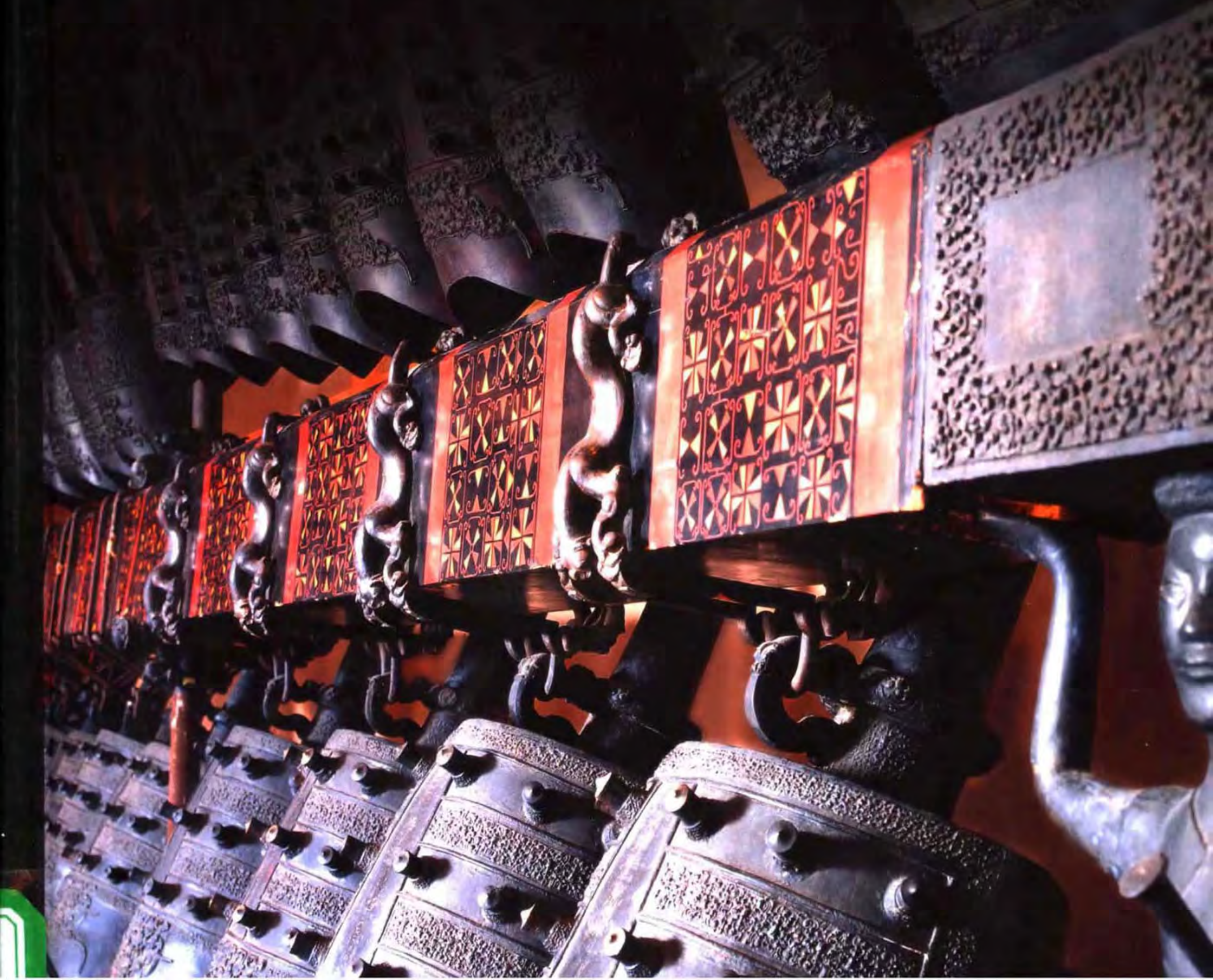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中国史

3

春秋战国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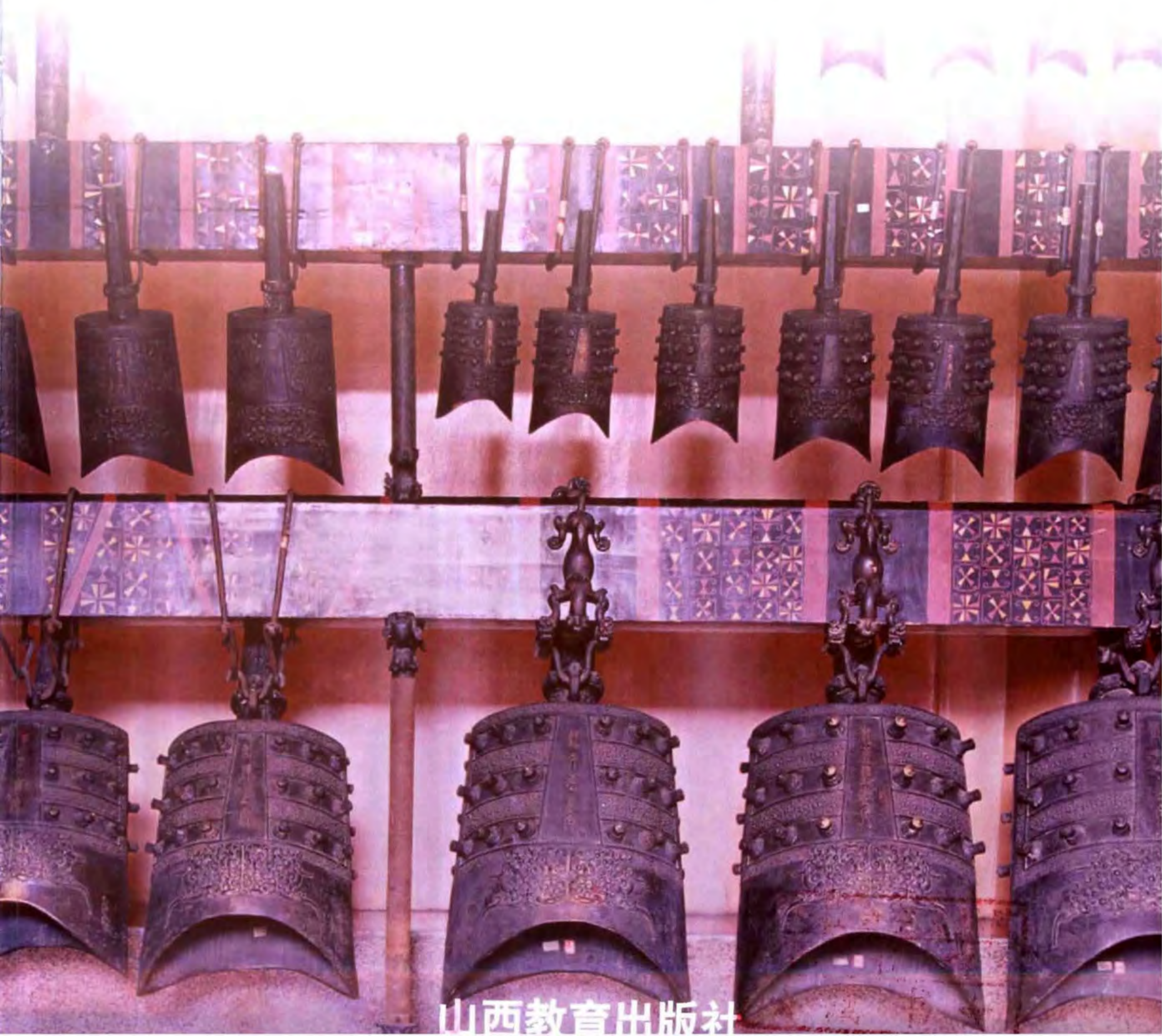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中国史

3

春秋战国时代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中国史·春秋战国时代 /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12

ISBN 7-5440-2647-7

I. 文... II. 中... III. ① 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代—普及读物

② 文物—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图录 IV. ① k209 ② k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4446号

《文物中国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

文物中国史·春秋战国时代

编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

出版发行: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迎泽园小区2号楼)

总责编: 王宇鸿 张金柱

责任编辑: 王玉成

助理编辑: 郭志强

复审: 刘立平

终审: 张金柱

装帧设计: 孟 孟(香港)

排版制作: 陈先英(香港) 李秋云(香港)

责任印制: 林佳年(香港)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万福工业区)

版次: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全套定价: 800.00元

前言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所以阅读这部《文物中国史》，要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生动，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深刻、更切近真实，因而也更适合青年人阅读。这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原因。

二、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工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三、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

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四、作为一部带有一定通史性质的著作，尽管是以文物为主述线索，仍需要有自己的科学的体系，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确定这部著作体例时十分注意的。要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一个首要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本书没有采取以往较常用的以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经济社会形态名称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这首先是因为这种较传统的划分方式，固然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成分，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应是由各段社会形态特点的差异来决定的，仅以经济形态的一些变化来划分并以这些名称来概括也是不完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时间处于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中，其发展在总体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鉴于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尤其是其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广阔的地理分布，与在世界文明史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无疑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所以，关于中国古代史科学的分阶段、分期间题应该从这一高度做更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分卷的形式，每卷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段。虽然并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做上述意义的分期，而只是从本书编撰方便出发设计的，分卷亦即分时段仍尽可能吸收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以若干王朝相聚合为一历史时段，与纯粹的王朝体系是不同的。被归为同一时段亦即同一卷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均大致有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特点。

五、本书虽带有一定的通史性质，但是是以典型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的，文字也要求简练。这样就不可能在每一卷中都像通史著作那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及事件、人物等都叙述得那么系统、详备；而是要突出时代特色，在叙述清楚各时段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本阶段中那些最能体现社会进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史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展开叙述，并不要求面面俱到。希望通过这样的编撰方法，使读者能够在熟悉文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内容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

六、作为以文物为线索来展述历史的著作，最理想的是所要叙述的每个重要史实，皆有典型文物来体现。本书虽致力于此，但显然难以完全做到。所以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凡史实能与文物结合、有典型文物表现的，即多着笔墨，以合乎本书之主旨；而无文物可表现之重要史实，则出于上述通史体例要求而必有所交代，但行文则略为简练。

说明了以上几点，相信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专家、学者们一般都有体会，写稍普及的著作其实更难，既要专业知识用较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又要准确、深刻，所谓深入浅出，实非易事。本书各卷作者致力于此，为能使读者满意，已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不尽理想之处与疏误仍在所难免，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与作者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朱鳳瀚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五日

目 录



总 说 2

第一章 政治形势 4

第一节 五霸迭兴 4

第二节 七国争雄 30

第二章 经济发展 42

第一节 农业 42

第二节 手工业 49

第三节 商业 76

第四节 城市与交通 84

第三章 制度变革 96

第一节 从世族世官到军功爵禄 96

第二节 从封邑到郡县 99

第三节 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的变化 100



第四章 民族大融合	110
第一节 中国、华夏和蛮夷戎狄	110
第二节 华夏国家周边的少数民族	111
第三节 华夷民族的大融合	129
第四节 大一统观念对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舆论先导作用	135

第五章 学术思想	138
第一节 士阶层的产生和诸子百家的分类	139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儒墨显学	140
第三节 战国诸子和百家争鸣	143

第六章 文化艺术	160
第一节 文字	160
第二节 文学	168
第三节 艺术	179
第四节 史学	195

第七章 科技探索	200
第一节 天文观测和历法	201
第二节 地理学	203
第三节 数学、力学、光学	206
第四节 采矿和冶炼技术	210
第五节 医学和养生	219

参考书目	223
------	-----



文物中国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

总 说

周幽王在位，昏庸暴虐，宠爱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宜臼，被申侯联合缯和犬戎攻杀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前770年，太子宜臼在申侯、鲁侯等的拥戴下立为“天子”，这就是后来的周平王。前76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等的护卫下迁都到成周雒邑（今河南洛阳）。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时期。

“西周”、“东周”是后代史学家为区分周代前后两个阶段而起的名字（当时的“西周”、“东周”并不是这样的概念）。它根据两周都邑的方位来称名：西周的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在雒邑以西，故后代史学家把武王到幽王十二王二百七十五年的这一段历史称作“西周”；雒邑在镐京以东，故后代史学家把平王至赧王二十五王五百一十四年的这一段历史称作“东周”。后代史学家有以都邑的方位来区分前朝前后阶段的习惯，如

西汉、东汉，西晋、东晋，北宋、南宋等，都是以都邑的方位来命名的。

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春秋”是后代史学家根据鲁国史书《春秋》来命名的：《春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记录了东周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故史学家把这一段时间的历史称为“春秋”。“战国”一词，原是指各国征战不休的意思。用这个词指代战国时代，始自西汉末年刘向纂集的《战国策》。刘向《〈战国策〉书录》说：“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故俾争权，盖为战国。”这是从当时列国争强、战争频繁的特点来给一个时代命名。战国的起讫年代，旧史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赵、魏三家分晋与秦、楚、齐、燕并列为诸侯起，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



221) 统一中国止。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则把周元王元年(前475)作为战国的开始。现在为了记述方便,一般把周平王继位的前770年作为春秋的开始,把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6)作为春秋的结束;把周元王元年(前475)作为战国的开始,把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统一中国作为战国时代的结束。

这样,春秋战国的起讫年代就是:周平王元年(前770)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共历时五百五十年。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大融合的时代。周自平王东迁,局促于今河南西部一隅之地,王室衰微,诸侯争霸,频仍连绵的战争和动荡中的建设对西周以来的宗法封建制度给予了致命的冲击,诸侯各国围绕争霸战争而进行的变法和改革,促进了宗法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地主封建制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诸侯各国的兼并和外交联合,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统一和生产经济的发展;中原华夏族与四周戎、狄、蛮、夷的交流和融合,渐渐泯灭了夷夏界限而形成了以中原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战国以后,随着激烈的兼并战争的发展,秦、韩、赵、魏、燕、齐、楚几个大国通过变法先后确立了地主封建的生产关系,原来的宗法贵族、官僚、军功阶层、商人迅速向地主阶级转化;各地区政治、经济不平衡性的减少和彼此联系的加强,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和思想文化的百家争鸣。在这种形势下,崛起于西方的秦,凭借它强大的军事优势和正确

【春秋】

(一) 平王宜臼——(二) 桓王林——(三) 庄王佗——(四) 釐王
(前770—前720) (前719—前697) (前696—前682) (前681—前
胡齐——(五) 惠王阍——(六) 襄王郑——(七) 顷王壬臣——
677) (前676—前652) (前651—前619) (前618—前613)
(八) 匡王班——(九) 定王瑜——(十) 简王夷——(十一) 灵
(前612—前607) (前606—前586) (前585—前572) (前571—前
王泄心——(十二) 景王贵——(十三) 悼王猛——(十四) 敬王匄
545) (前544—前520) (前520) (前519—前476)

【战国】

(十五) 元王仁——(十六) 贞定王介——(十七) 哀王去疾——
(前475—前469) (前468—前441) (前441—前441)
(十八) 思王叔——(十九) 考王嵬——(二十) 威烈王午——(二
(前441—前441) (前440—前426) (前425—前402) (前
一) 安王骄——(二二) 烈王喜——(二三) 显王扁——(二四)
401—前376) (前375—前369) (前368—前321) (前320—
慎靓王定——(二五) 赧王延
前315) (前314—前256)

前256年,周赧王死,周“天子”不复存在,但东周王城还盘踞着一定的王室势力。秦庄襄王元年(前249),秦灭东周君,周彻底灭亡。

的军事、外交策略,先后攻灭韩、赵、燕、魏、楚、齐而结束诸侯割据的局面,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王朝。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的地主封建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世系



第一章

政治形势

第一节 五霸迭兴

周平王被迫迁都雒邑，标志着周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周王朝虽然在名义上还被诸侯尊为“天下共主”，但却已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实力和威权。号令天下的威权，实际上掌握在先后涌现出来的大国霸主手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诸侯国内的政权也逐渐下移。“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部族，乘王室衰微不断侵扰中原，与华夏民族抗衡、争锋、融合。这是春秋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

一、王纲解纽·威权跌落

周平王是在西周灭亡的形势下借助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等诸侯的力量完成东迁

的，所以东周政权从一开始就带有依附诸侯的色彩。其后，随着诸侯力量逐渐增强，周王室越来越成为诸侯的附庸。《史记》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其实，周王朝的危机自西周末年就开始了。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使卫巫“监谤”，杀戮议论国事的人，结果被“国人”（住在国都及近郊的下层贵族、士和平民）暴动赶到彘（今山西霍州），这是西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犯上作乱的大事。其后，周宣王虽号称“中兴”，但实际上并没有积蓄多大的力量，他军事上连续败于姜氏之戎，“丧南国之师”，已经没有实力再去控制和抵御周边少数民族部族的入侵。周幽王时，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他任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相，废长立幼，引发了申后母家申侯联合缯与犬戎对西周的进攻，加上当时严重的地震



春秋大国争霸形势图

等自然灾害，“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王位继承问题就像一根导火索，把国内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烈火点燃，终于把“赫赫宗周”烧掉了。

幽王被杀，西周灭亡，但周的王位继承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幽王被杀以后，申侯在鲁侯、许文公等支持下，立其外孙太子宜臼于申（今河南南阳），这就是周平王。不久，虢公翰为了抵制平王，又立幽王庶子余臣于携（后世称携王）。二王并立，衰败的周处于分裂状态，面临着新的危机。前760年，晋文侯仇执杀携王，周王室重告统一。不过，此时周已没有力量去驱逐犬戎等强悍部族，镐京又十分残破，于是只好放弃旧都，在秦襄

公、晋文侯、郑武公等的护卫下从丰镐东徙维（今陕西周至）。

“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周平王是借助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等诸侯的力量才完成东迁的，所以东周政权从一开始就带有依附诸侯的色彩，与拥有赫赫威权的西周不可同日而语。所幸当时诸侯各国尚未十分强大，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对诸侯尚能起一定的约束作用，所以春秋初期周虽然有西部和北部的戎、狄之患，但因为周围有晋、郑、虞、虢、申、吕等诸侯屏卫，政权还比较稳固，与诸侯也没有太大的矛盾。

周桓王以后，周与原来最亲近的诸侯国郑国反目，繻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之战，郑

国军队把王室军队打得大败，周从此一蹶不振。后来王室又连续发生由王位纷争引起的内乱，力量越来越衰弱。之后，随着诸侯各国逐渐强大和争霸战争的加剧，周逐渐沦为诸侯大国的附庸。

（一）版图日渐狭小

西周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国”直接控制的土地从今陕西中部一直到今河南中部。西周灭亡时，宗周故地被犬戎占领。东迁以后，周平王为了报答秦、晋等国勤王的功劳，把关中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秦襄公，把黄河以西的土地赐给晋文侯等。这样，周东迁以后“王国”实际控制的土地不过今洛阳周围数百里。

春秋中期前后，强大起来的诸侯不断以各种借口索要王室的土地，使王室实际控制的疆域日渐狭小。如：前673年，郑厉公和虢公帮助周惠王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分别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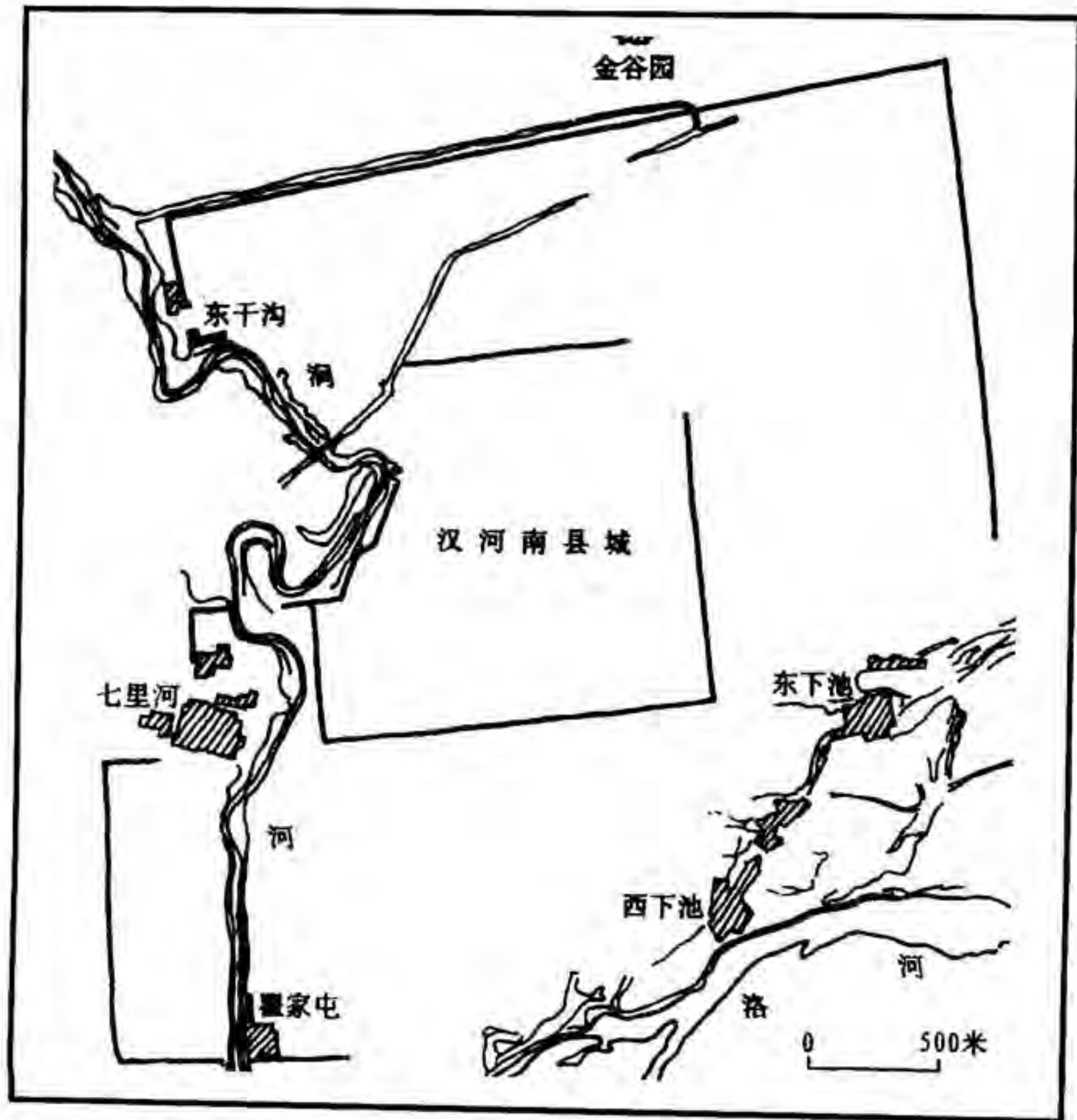
周惠王索要了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东和酒泉（今陕西以东）的土地。前635年，晋文公帮助周襄王平定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把畿内的阳樊（今河南济源东南）、温（今河南温县西）、原（今河南济源北）、欒茅（今河南修武北）等邑赐给晋文公。诸侯大国不断吞并王室周围的近畿小国，如：郑吞并了东虢，晋吞并了北虢，楚灭掉了申和吕。东虢、北虢是周西边的屏障，申、吕是周南方的护卫，诸侯灭掉了这些小国，就等于把周孤立在今河南西部的一隅之地，使其不得发展。除此之外，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像扬拒、泉皋、伊洛之戎）也不断南迁到周王室境内。一些诸侯大国为了开拓领土，也把临近的少数民族部落往武装力量薄弱的王室领地赶，像秦国和晋国就把秦晋交界的陆渾之戎赶到王室的领地伊川（今河南嵩县、伊川一带）。这样一来，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到春秋中期，截长补短，南北不过一二百里。这时的周王，名曰“天子”，实际上控制的土地仅相当于一个三等诸侯。而且王室的权力大都掌握在做卿士的诸侯手里，王室的矛盾，要借助诸侯的力量才能解决。

1954年至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洛阳东周王城进行了全面勘探。王城城址略呈正方形，南临洛河，西跨涧河，除东南部因地势低洼未见城墙遗迹外，其余部分基本完整，北墙长2890米，城外有护城壕；西墙南北两端相距3200米；南墙、东墙各残留1000米。王城的西南部为宫殿区，南部为粮仓窖穴和手工业区，东北部为墓葬区。在城内还发现居民住址、排水设施等。

据考古工作者判断，洛阳东周王城遗址的城墙均建在春秋中期以前。从规模上说，它应当是西周和春秋早期一座很大的具有政治、军事中心性质的古城。不过，和春秋中

东周王城雒邑遗址图

东周王城雒邑遗址是东周时代周王朝的都城遗址，位于今河南洛阳市涧河和洛河的交汇处。西周灭亡时，宗周为犬戎占领，平王迁都于此。自此至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为秦所灭，周以此为王都近五百年。





期以前建设的诸侯国都城相比，它的规模就有些逊色了。据考古发掘，建于春秋中期以前的新郑郑韩故城、凤翔秦都雍城、曲阜鲁国故城面积都在10平方公里以上，已等于或超过了洛阳东周王城的规模。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周王室确实已经衰微，诸侯的僭礼已经是普遍的事实。

（二）财政窘迫不堪

周王室版图越来越狭小，控制的人口越来越少，赋税收入锐减，财政也因此捉襟见肘，日渐穷困。

按照周礼，诸侯应该定期向周天子纳贡，畿内“王田”的收入也完全归王室所有。东周以后，诸侯的贡纳基本上停止了，直接控制土地版图的缩小使赋税收入大大减少，因此王室财政入不敷出，非常窘迫。无奈之下，周王只好不断派臣子向诸侯国去“求赙”、“求金”——收取丧葬赞助费和日常经费。如：周平王死，周桓王无力置办丧事，派使者到鲁国去求赙。鲁隐公六年（前717），京师饥荒，周王无力解决，派使者到鲁国告

饥，由鲁国调剂宋、卫、齐、郑的粮食来救急。甚至周襄王没有车乘，也派使者到鲁国求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王室财政的拮据。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求赙、求金事例都出于鲁国史书《春秋》，“周礼尽在鲁”，鲁国史书记载这么多周王腆着脸向诸侯求赙、求金的事，当时周王在经济上的尴尬境地可以想见。

（三）天子威权跌落

版图缩小，财政拮据，加上政治上的威权跌落，使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徒具虚名。

周礼规定：周天子要定期“巡狩”天下，考核诸侯的政绩。而诸侯对天子应该“比年（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定期向周王汇报诸侯国内的情况。入东周以后，天子“巡狩”没有可能真正进行了。《春秋》等文献虽记有不少“天王狩于河阳”之类的话，但这并不是周天子去巡狩某地，而是史官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真实情况是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举行会盟，

成周城垣遗址

列鼎

春秋晚期

1988年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赵卿墓出土

通高26.5厘米至45厘米，口径25.5厘米至45厘米

鼎为牛头龙纹升鼎，大小相次，共七件。均为覆盆式盖，上有三个环形钮。附耳外撇，唇沿内敛。深鼓腹。平底。兽蹄形足。盖饰凤纹带和牛头双身龙纹带，腹部饰牛头双身龙纹带，下腹部饰凤纹带。周代有一套严密的礼乐制度，列鼎制度是其中之一。列鼎制度以升鼎为中心，规定“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赵卿是上大夫，按宗法礼乐制度，只能用五鼎。但他的墓中升鼎有三组之多，分别为七鼎、六鼎和五鼎，这说明赵卿僭越了诸侯之礼。



召见周王，周王不得不去。诸侯“朝觐”天子更是成了虚语。据文献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与周关系最好的鲁国朝王仅三次，派使者问候周王仅四次。相反，为了与霸主周旋，鲁朝见齐国达十一次，朝见晋国达二十次；派使者聘问齐国十六次，聘问晋国二十四次。与周关系最好的鲁尚且如此，其他诸侯国与周的关系可以想见。

诸侯不仅不朝王、不聘问，原来最受周王信任的诸侯还经常因为争夺控制王室的权力与周王发生矛盾，甚至以武力压制和欺凌“天子”，使“天子”的宗主地位一落千丈。

最早与周发生矛盾的是郑国。郑的始祖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封地在郑（今陕西华县），幽王时为司寇。郑桓公在犬戎攻杀幽王时被杀，其子郑武公即位。郑武公辅佐平王东迁有功，受平王倚重，被改封到东方的新郑（今河南新郑），本人则在王室做卿士。后来，郑武公的儿子郑庄公袭继父职做卿士，势力非常强大。周平王担心郑庄公篡权，就采取一些分权的办法来削弱郑庄公的力量，引起郑庄公不满，对周王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之后，事态发展到双方各派自己的儿子到对方做人质来重申信任的地步。这样，周和郑原来的君臣主从关系就完全降到了国与国的并列关系，这在历史上称为“周

郑交质”。前720年，平王死，继位的周桓王打算让虢公执政，以防止郑庄公专权。郑庄公恼恨之极，就派人抢周人即将收割的麦子，秋季又派人偷割周成熟的庄稼，双方为此结下仇恨，史称“周郑交恶”。前707年（鲁桓公五年），周桓王罢免了郑庄公卿士的职位，郑庄公出于报复，不去朝见周王，桓王便率蔡、卫、陈三国之师伐郑问罪，与郑军战于繻葛（今河南长葛东北），结果被郑军打得大败。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了桓王的肩膀，使“天子”威风扫地。后来，虽然有不少霸主打着“尊王”的旗号称霸，但目的都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真想恢复周王的威权。

周天子威权跌落的另一个表现是宗法秩序的破坏。

宗法是周代贵族的血缘组织法，它规定嫡长子绝对的优先继承权和政治上的大宗地位，并以血缘等级规定政治等级，使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层层臣属，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各不僭越。这也就是所谓的“礼”。

随着王室的衰微和诸侯的强大，诸侯、卿大夫僭礼、违反宗法秩序的事情越来越多，而其中最大的僭礼，莫过于诸侯和卿大夫觐觐王权、僭越天子之礼。在这方面最有



编钟

春秋晚期

1988年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晋赵卿墓出土

编钟大小相次成列，共16件。其中夔龙凤纹钟2件，蟠蛇纹编钟14件。

赵卿是上大夫，使用如此大型的编钟随葬，是僭礼的行为。



代表性的事件是楚庄王“问鼎中原”。前606年，楚庄王北上伐陆浑之戎，把军队开到周的边界耀武扬威，并向周王派来慰问他的使者大夫王孙满询问周鼎的大小和轻重。周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问鼎之轻重，赤裸裸地表露出他欲取周室而代之的意图。春秋时王室内以庶夺嫡的内乱经常发生，像周惠王时的王子颓之乱、周襄王时的王子带之

乱，都是以庶夺嫡，企图谋取王位的内乱，王室靠诸侯的力量才制止了这些内乱，而各诸侯国内兄弟相残、争夺君位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据统计，春秋时代，周王室曾有三个“天子”被迫流亡，有几十个诸侯国君被杀或被迫逃往他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古人说东周以后宗法制度的衰败有

鸟尊

1988年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晋赵卿墓出土。通高15.3厘米，长32厘米。全器为一昂首挺立的鸛鸟。凤冠尖喙，双目圆睁，细长颈。全身羽毛丰满，羽纹清晰。鸟背上置虎形提梁，并设弧形盖，与鸟身羽毛衔接，浑然一体，是晋国春秋晚期青铜工艺的杰作。



临淄齐国故城排水道口

在齐故城西北。排水道口建筑在40米宽的城墙下，长43米，宽7米，由石灰石砌成。有15个孔，分3层。排水道口构筑科学巧妙，既可排水，又可御敌，是古代城市排水系统建筑的一个罕见工程。由此可以窥见齐故城规模的宏大。



如“王纲解纽”，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出土文物证实了春秋诸侯僭越礼制的普遍性。按照周礼，天子殉葬用九鼎，诸侯用七鼎，但目前发现的春秋中期以后的诸侯墓葬不少都用九鼎，卿大夫用七鼎。其典型者，像河南辉县琉璃阁春秋卫国公室墓地，60号

墓墓主是诸侯一级的贵族，殉葬用九鼎，还有编钟、编钟、编磬等金石之乐；80号和55号墓主为公子，地位与卿同级，却用七鼎随葬，还有编钟和专门的车马坑。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晋墓，墓主赵卿属于上大夫一级，随葬也用七鼎，还有编钟、编磬。这都是违反宗法的僭礼行为。田野发掘证明：西周考古，发现的多为王室、王臣的器用。而春秋考古发现的大型青铜器和精美玉器等，则大多是各国诸侯器用，王室的器用不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春秋以后王室衰微，每况愈下，和西周的盛世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大国争霸·逐鹿中原

与周天子的日趋衰落成反比，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活动却是风雷激荡，愈演愈烈。

大国争霸的战争，实质上是争霸强国在王权衰落的情况下争夺号令诸侯权利的战争。春秋以后，一些诸侯国，像东方的齐，靠近中原的晋、郑，北部、西部、南部边陲的燕、秦、楚等，经济、军事都强大起来。这

些诸侯国强大起来之后，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开始通过战争和盟会的手段吞并或奴役一些弱小的国家和部族，扩张领土，掠夺财富，并强迫其他诸侯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这就是所谓的诸侯称霸。

春秋初期，国境内诸侯国有一百四十多个，主要集中在今黄河中、下游和江汉地区：今河南、山东有周、郑、卫、齐、鲁、宋、杞、陈、蔡、曹、滕等国，今山西、陕西有秦、晋、虞、虢、梁、芮等国，今湖北、安徽及四川的东部有楚、随、申、息、邓、徐、郢、州、蓼、巴等国，今江苏、浙江有吴、越等国。其中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是鲁、齐、晋、秦、楚、宋、郑、燕、吴、越等国。

鲁：在今山东西南，都曲阜（今山东曲阜），东北与齐相邻，西边与卫相接，西南与宋交界。

齐：在今山东半岛中、东部，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北与燕国相接，西面与鲁为邻。

晋：在今山西中、南部，初封绛（今山西翼城），后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其地在汾水、浍水之间，与戎狄杂错相交，西面与秦交界，南部靠近周，东面是卫国。

秦：原来居住在犬丘（今甘肃东部礼县

一带），平王东迁后，居岐西之地，都雍（今陕西凤翔），东与晋交界，西与诸戎为邻。

郑：在今河南中部，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北边靠近卫国，南边紧连陈、蔡，东与宋国相接。

宋：在今河南东部，都商丘（今河南商丘），西与郑为邻，北与鲁相接。

燕：在今河北北部，都蓟（今北京），北面、东面与山戎等少数民族接壤。

楚：在今河南南部，湖北、湖南北部。祖居丹阳（今河南淅川丹江口水库附近），后沿汉水南下，都郢（今湖北江陵），又都陈（今河南淮阳），又都寿春，南与百蛮相邻。

吴：在楚之东今江苏苏南之地，都吴（今江苏苏州）。

越：在吴之南今浙江东部，都会稽（今浙江绍兴）。

争霸战争是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拉开序幕的。春秋初年，西方诸戎（犬戎、骊戎、允姓之戎、陆浑之戎、扬拒、泉皋、伊洛之戎、蛮氏之戎等）、北方诸狄（赤狄、白狄、山戎、无终等）和东方诸夷（淮夷、群舒、莱、根牟等）不断侵掠中原，给华夏民族带来很大的祸患。在这种情况下，势力强大的齐、晋

桓公台

临淄齐国故城内





临淄齐国故城殉马坑

在今山东淄博齐故城东北。此地已探出大、中型墓葬30多座。其中的一座石椁大墓东、西、北三面有相连的曲尺形殉马坑。

等国以“攘夷”为号召，高举“尊王”大旗，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争霸战争。

（一）齐桓公首霸

齐是周初在东夷薄姑基础上封建的国家，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其后胡公迁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至齐献公又复迁临淄。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对今山东临淄北的齐国故城进行了勘察和发掘，发现齐故城由大小两座城构成。大城呈斜长方形，东墙长5209米，南墙长2821米，西墙长2812米，北墙长3316米。小城在大城西南角外，东墙长2195米，南墙长1402米，西墙长2274米，北墙长1404米。大城发现城门6处，小城发现城门5处。宫殿区在小城北部桓公台一带。桓公台为一座椭圆形夯土台，南北长86米，高14米，周围有很多建筑基址。小城南部分发现有冶铜和铸造刀币的遗址，西部则发现有

冶铁遗址。大城范围内手工业作坊遗迹很多，小城范围内发现了很多纹饰精美的瓦当，使人想见当年齐国都城宫殿的壮丽。

春秋初齐釐公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他的儿子齐襄公继位后，吞灭了同姓的纪国，使齐的地域有所扩大。但齐襄公荒淫不听国政，随意诛杀大臣，引起朝野的不满。他的几个弟弟害怕大祸临头，纷纷逃亡别国：公子纠在管仲的辅佐下逃到鲁国，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辅佐下逃到莒国。前685年，齐国发生内乱，公孙无知杀齐襄公自立，后被齐大夫雍廪杀死。在国家无主的情况下，齐国贵族暗召公子小白回齐继位。鲁国知道了消息，急忙发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同时派管仲带兵在路上伏击公子小白。管仲射中公子小白的带钩，公子小白装死逃脱。鲁国以为大事已定，按礼仪送公子纠回国。哪知公子小白早已抢先入齐，被贵族拥立即位，这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威逼鲁国杀死公子纠，命令管仲回齐受戮。管仲被押解回齐，鲍叔牙极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在贵族国、高二氏的支持下，齐桓公抛弃前嫌，赦免了管仲，任命他为相，在齐国进行内政改革。

管仲改革的主要措施是：

1、改革国家的行政机构，“叁其国（贵族和平民居住的城邑）而伍其鄙（“国”外的郊野）”，即把“国”分成三部分，分别让工、商、士（士是有资格参加军队的阶层，是军队的后备力量）居住，使其各有定居，不得杂处，也不得随便迁徙。把郊野分为五个行政层次，分别派官管理。

2、实行军政合一，“作内政而寄军令”——寓军令于行政编制之中，施行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的制度。一遇军事，每家出一人，一轨出五人，一里

出五十人，一连出二百人，一乡出二千人。一万人为一军，全国有三军，使国家兵源既有保障，又减少了养兵负担。战士们同乡同里，夜间作战容易互相辨认，危险情况下又不惮互相救援，便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3、“相地而衰征”，即按土地肥瘠程度等差征税，促进农业发展。

4、由官府铸钱，调剂物价，减免关税，鼓励鱼盐输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管仲的改革，很快收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效果，使齐国国力日益强盛。它连续吞灭了谭（今山东济南附近）、遂（今山东宁阳）等小国，并联合宋、陈、蔡、卫等制服了鲁、郑等春秋初期的强国，多次以盟主的身份主持盟会，成为春秋霸坛上第一个声名显赫的霸主。

当时，北方的山戎和狄族经常袭扰燕、邢（姬姓国家，在今河北邢台）、卫（姬姓国家，在今河南淇县）等国。齐桓公以“攘夷”为号召，联合燕、宋、莒等国伐山戎，“剿令支（在今河北迁安西），斩孤竹（在今河北卢龙南）”以救燕；又率齐、宋、曹三国联军帮助在狄人打击下已经溃败的邢人迁居夷仪（在今山东聊城西南），在卫国被狄灭亡之后率领诸侯军队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建立新城而重立卫君，使“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邢国人像回老家那样迁居到夷仪，卫国重立后好像没有被灭亡过。这些有力地保证了中原地区的安定和发展。

从前656年（齐桓公三十年）到前643年（齐桓公四十三年），齐国高举“尊王”大旗，南下兴兵，迫使楚国与之结盟，阻止楚国北进；并多次率领诸侯军队平定王室内乱和戎狄之难，甚至征集军队帮助周王戍守成周，受到周王的高度表彰。前651年（鲁僖公九年），齐桓公以霸主身份召集宋、卫、郑、许、

曹等诸侯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会盟，周王室的代表周公以周襄王的名义向齐桓公颁赐胙肉以示感谢，并特许齐桓公接受胙肉时不下拜，这是周王以“天子”的身份对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承认。它标志着齐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

齐桓公的霸业维持了几十年。前643年（鲁僖公十七年），桓公死。由于他生前内宠太多，诸子争立，造成了内讧局面，齐国的力量开始衰弱，但仍以大国的威权雄视着春秋霸业。

（二）宋襄公图霸

宋是商的后裔。周初，武王封商纣王的庶母弟微子于商丘（今河南商丘），称宋。宋是个小国，西周时并不强大，春秋初有了一定的发展。齐桓公称霸时，宋一直是齐国忠实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因此齐桓公临终时把公子昭托孤给宋襄公。前650年（鲁僖公十



镶嵌绿松石几何纹铜镜

1963年山东临淄城南商王村
齐国故城出土

直径29.8厘米

镜面平整，背饰四组几何云纹，云纹上嵌金丝。地镶嵌绿松石。镜心四区和边缘嵌银质乳钉九枚。有三个钮等距离地布置在镜的边缘。该镜面、背分别铸造，形体硕大，镶嵌精细。色彩绚丽，为罕见铜镜珍品。



新钟

1870年山西荣河出土
高66厘米，口长44厘米，口
宽34.8厘米

器上有铭文173字，记载鲍的
祖父鲍叔有功于齐，齐侯赏
赐鲍叔封邑。人民等，鲍以此
为荣勉励自己，并用来祭祀自
己的母亲。铭文中的鲍叔，
即鲍叔牙。

年)，宋襄公即位，齐国诸子争立。宋襄公不负重托，联合卫、曹、邾的军队伐齐，把公子昭送回齐国，立为齐君（齐孝公），宋襄公因此一时声名鹊起。

前639年（鲁僖公二十一年），宋国与齐、楚在鹿上（今安徽阜阳南）会谈，约定秋天以宋国为盟主在孟（今河南睢县）会盟，楚国答应了宋的要求。秋天，楚、陈、蔡、郑、许、曹、宋等在孟会盟，楚乘宋襄公不备劫持了他，以此要挟宋国，多亏鲁僖公出面调停，楚才把宋襄公放回国。

前638年（鲁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率卫、许、滕国的军队伐郑，表示对郑倒向楚国的惩罚。楚国以救郑的名义伐宋，与宋军相遇于泓水（河南柘城北）。楚军渡河时，宋

国的司马子鱼建议宋襄公趁楚军渡河混乱时发起攻击，宋襄公不许。楚军渡河后布阵，子鱼又劝宋襄公趁楚军立足未稳时发动攻击，宋襄公还是不答应。等楚军排好了阵势，宋襄公才下令交战。结果，宋军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重伤。事后，宋军埋怨宋襄公不听司马子鱼的建议而导致战争失败，宋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意思是说，君子不能再次伤害已遭重创的敌兵，不能擒获鬓发斑白的老年士兵。古代行军作战，不能在险要之地趁人之危阻击对方。我虽然是被灭亡了的商人的后代，对方没有排好阵势，我是不会击鼓进军的。

宋襄公以小国的力量，图谋霸业，已属不自量力，又食古不化地在与大国的残酷战争中妄图以“仁义之师”的形象称霸，自然不会成功，只能传为笑柄。

（三）晋文公称雄中原

晋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的封地，原称唐。周平王时，晋文侯仇因为护送平王东迁有功，改都翼（又称絳，在今山西翼城南），其弟成师也被封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称曲沃桓叔。前679年（鲁庄公十五年），曲沃武公攻杀晋侯缙，用宝器贿赂周釐王，使周釐王承认曲沃武公为晋的合法君主，封他为晋侯。这是宗法制度下以旁支代替宗主的一个特例。

武公子晋献公是个有作为的君主。他在国内实行集权政治，重用有军功的异姓卿大夫，“尽杀群公子”，尽量减少同姓宗族的扩张，以防止再出现旁支代替宗主的局面。在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他积极向外扩张，先后灭掉了霍（今山西霍州）、耿（今山西河津附近）、魏（今山西芮城）、虢（今河南陕县），



宋公栾戈

春秋 兵器

全长22.3厘米

有铭文6字，为错金鸟篆体。

宋公栾即宋国国君宋景公。

虞（今山西平陆）等小国，战胜了骊戎，打败了北狄，把领地扩展到黄河的西岸和南岸，成为占据崤（崤山）、函（函谷关）两大天险的北方强国。

晋献公晚年发生了“骊姬之乱”。骊姬是献公伐骊戎时得到的一个女子，她为了使亲生儿子奚齐能当上太子，设计害死了太子申生，并使公子重耳和夷吾出国逃亡。晋献公死，诸子争立，晋统治集团内部陷入了长期的争权夺利斗争，直到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重耳回国即位（晋文公）才告结束。

晋文公出亡十九年，回国即位时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流亡期间，他辗转八个国家，备尝艰难险阻，对诸侯各国的政治情况和老百姓的真实情况了解甚多，所以他一即位，即命跟随他流亡的重臣狐偃、赵衰等整顿内政，进行政治、经济改革：

1、经济上，“弃责薄敛”，“救乏振滞”，“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即减轻赋税，救济

贫弱，奖励农业，发展商业。

2、在人才选拔上，既“尊贵宠”，“昭旧族”，又“明贤良”，“赏功劳”，即把旧贵族的地位抬得很高，同时提拔有能力、有功劳的异姓官员，弥补贵族政治世卿世禄的不足。通过权力的分配，使各级贵族尊卑有序，各得其所。

这些改革结束了晋国多年的动荡局面，使长期内乱的晋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振兴起来。

晋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勾结狄人攻进王城，迫使周襄王流亡到郑国。这时，狐偃给晋文公出主意说：“求诸侯莫如勤王！”狐偃认为争取诸侯的拥护，没有比保卫周王更好的措施了。于是，晋文公发左右两军，兼程倍道，击退狄人，杀王子带，护送周襄王回成周。周襄王为了报答晋国安定王室的功劳，把阳樊、温、原、欒茅四邑赐给晋文公。

晋文公既捞到了勤王的政治资本，其国土也越过太行山，扩展到黄河北岸，这是晋文公称霸迈出的第一步。

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晋与虎视眈眈欲北上称雄的楚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当时，一度依附楚国的宋国，摆脱楚的控制投靠晋国。楚为保住在中原取得的利益，联合陈、蔡诸国出兵伐宋。晋则在宋、齐、秦等国的声援下向楚的与国曹、卫开战。楚军北上救曹、卫，与晋军对阵于城濮（今河南范县临濮集）。决战开始前，晋军以报答

楚过去曾给予晋文公礼遇为名，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决战开始以后，晋军先冲溃楚联军薄弱的陈、蔡右翼，又后退诱敌，全歼楚军左翼，使楚军首尾不能相顾。晋军上下团结，楚军将帅不和，最后晋军大获全胜，楚军全线溃败。

城濮之战的胜利，对晋在中原立威定霸有决定性的意义。它遏止了楚北上称雄的锋芒，使许多中原小国摆脱楚的控制而依附于晋国。城濮之战的第二年（前631）五月，晋文公与齐、鲁、宋、蔡、郑、卫等诸侯会盟

铜方壶

春秋 盛酒或盛水器

1961年山西侯马出土

高84.5厘米

侯马一带春秋时为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所在地，遗址于1952年发现。



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周襄王亲临慰劳晋文公,正式册封晋文公为“侯伯”(霸主)。冬天,晋文公又大会齐、秦、宋、鲁、郑、陈、蔡、莒等诸侯于温(今河南温县),周襄王也被召赴会。这标志着晋文公的霸业已进入辉煌的时期。

(四) 秦穆公崛起西戎

秦在西周初期是一个附庸小国,居犬丘(今甘肃礼县一带),以后逐渐向东发展。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护送有功,被封为诸侯,平王把岐(今陕西岐山)以西的地方赐给他作为封地。以后秦不断消灭和并吞戎狄部落,扩大领土,并逐步向东发展。它先后在“汧渭之会”(今陕西郿县境内)、平阳(今陕西宝鸡东)和雍(今陕西凤翔)建都。到秦穆

公时,秦国的力量已相当雄厚。陕西凤翔规模宏大的秦公大墓、雍城遗址庞大的陵园建筑和精美豪华的建筑构件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秦公大墓面积约5300余平方米,1980年至1982年发掘。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墓道在墓室的東西两侧,作斜坡状,长270米,宽7米,墓底距地表24米。主椁室呈长方形,长15米,宽6米,深3米,面积90多平方米。主椁三层,用巨型方木套接而成,最上层有56根方木,每根长6米余,重400多公斤。椁室四周填木炭,最厚处3米。椁室两侧各斜立一根硕大的圆木,即文献记载安放灵柩时用的“四脖(绳)二碑”。椁木均为高级松木,横放者两端伸出长约20厘米至24厘米的榫状木心。椁木凡有结处,均掏去木结,灌以



秦公簋

1921年甘肃礼县出土
高198厘米,口径18厘米
器内有铭文123字,记述秦的祖先在华夏建都已有十二代。秦景公表示一定要继承前辈的事业,永保四方的领土。



金属。主椁室上部及四周埋有男女殉葬人182个。该墓曾多次被盗,但仍出土文物2000余件,其中包括20多件石磬,上刻大篆铭文190多字,还有大量金器、玉器等。

秦穆公是秦国有名的国君。他继位之初,就志在东进与诸侯争锋,因此非常注重搜求和选拔人才。他知人善任,不拘一格,任用了很多出身低贱的客卿人才。像百里奚出身奴隶,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从楚换来,聘为大夫;由余甯身西戎多年,对戎狄的情况了如指掌,秦穆公聘他做谋士对付西戎。这些人为秦穆公称霸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秦东进最大的障碍是晋国。秦穆公初年,对晋国采取守势,既与晋通婚,也干预晋的政事,甚至帮助晋国平定内乱,双方偶尔也发生战争。前627年(鲁僖公三十二年),晋文公死,秦乘晋国国丧,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率兵偷袭郑国,以图插足中原。秦国的军队行进到滑(今河南巩义境内),遇上了要去周做生意的郑国商人弦高。弦高知道秦军是来偷袭郑国的,就假说自己是奉命劳军的使者,一面热情地犒劳秦军,一面急派专人从小道回国报信。孟明视等以为郑国

已经知道了秦军的企图,灭掉滑国后回师。晋国认为这是消灭秦有生力量的好机会,联合姜戎在秦军回师的必经之路崤山(今河南洛宁西北)设下了埋伏。秦军没有准备,一入崤山便进入晋军的包围圈,遭到晋和姜戎奇兵的截击,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也被俘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崤之战。

崤之战后,秦治政养民,实力增强。但东进的道路被晋堵塞,南边的强楚也是不可逾越的劲敌,只好转而集中精力向西发展。秦穆公任用在戎人中生活多年的由余为谋士,利用戎人不相统属的矛盾,逐一灭掉十二个戎人建立的国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五) 楚庄王问鼎中原

晋霸业中衰的时候,南方的楚发展起来。它先后灭掉江(在今河南息县西南)、六(在今安徽六安)、蓼(在今河南固始东北)等小国,占领了淮南等地,趁晋无暇东顾时开始了争霸中原的战争。

楚庄王是楚国有名的君主。他即位之初,国内发生贵族叛乱,国外群舒、百濮也乘机骚动。庄王任用平民出身的孙叔敖为令尹,整顿内政,协调贵族之间的关系;修建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发展农业生产;迅速平定叛乱,进而征服百濮、群舒,为楚国的霸业奠定了基础。

前608年(鲁宣公元年),楚庄王北上伐陈、宋,晋国派兵救援,被楚军打败。第二年,楚国指使郑国攻打宋国,晋率宋、卫、陈的联军伐郑,楚陈兵于郑以待晋军,晋军不敢出。楚军屡胜晋军,遂趁势直驱北上中原。

前606年(鲁宣公三年),楚庄王伐陆渾(今河南嵩县北)之戎,一直打到洛水边,肆无忌惮地“观兵于周疆”,在周的边界检阅部

楚章华台遗址

1984年湖北潜江龙湾发现遗址由水章台、华家台、楚王放鹰台、打鼓台等十余个夯土台组成。1987年对放鹰台遗址进行试掘,发现它是一座保存较好,有层台建筑的宫殿遗址。残存的两层台基约高3米,并发现了高2米、厚0.7米、长约30米的红砖墙,宽1.3米的侧门和一条长10米、宽1米的贝壳路。遗址出土的各种板瓦、筒瓦、瓦当,都与江陵纪南城的同类器物风格一致。综合文献记载和地理位置来看,它可能就是楚国著名的“层台累榭”的宫殿建筑——章华台的一部分。





队示威。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师，楚庄王竟目中无人地向王孙满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鼎是王权的象征，庄王问周鼎之大小、轻重，言下流露出取而代之的意思。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楚觊觎中原的野心暴露无遗。

楚北上称霸中原，必须首先征服郑国和宋国。前598年，楚围郑，迫使郑国投降求和。晋援兵南下救郑，与楚军战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楚军士气高涨，同仇敌忾。晋军将帅不和，指挥失当，结果被打得大败，溃军渡河时乱成一团，中军和下军为争船互相砍杀，船里被砍下的手指不计其数。

邲之战的胜利，增强了楚北上争雄的信

心。前594年（鲁宣公十四年），楚伐宋，围困宋都达九个月之久，宋弹尽粮绝，“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向晋告急，晋国畏楚，不敢出兵。最后还是宋国大夫华元夜间出城摸到楚营劫持了楚军主帅子反，楚才答应退兵，订立盟约，接受了宋的降服。这标志着楚国的霸业已经得到诸侯的承认。

楚庄王死，共王即位。前589年（鲁成公二年），楚召集鲁、齐、宋、卫、郑、陈、秦、曹、邾、薛、蔡、许等十二国在蜀（今山东泰安附近）会盟，中原大国承认了楚的霸主地位，楚国的霸业达到了顶点。

（六）晋厉公、悼公复霸

邲之战后，晋景公发奋图强，集中力量

王子午鼎

1979年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

高67厘米，口径66厘米

同出一组7件，此为最大的一件。鼎长耳外撇，盖微隆，束腰平底，蹄形足。口沿旁边脚有六条龙凤怪兽，作探水状。为失蜡法制造。器身满饰浮雕夔龙纹、窃曲纹和云纹。腹盖内有鸟篆铭文84字。该鼎出土时，鼎内尚存牛骨多块。鼎盖上有舀肉的铜匕一把。王子午即文献记载的楚庄王之子子庚。楚共王时为司马，曾率师大败吴军。楚康王时为令尹。该鼎铭文也是研究楚文化的宝贵资料。



“兵辟太岁”铜戈

湖北荆门出土
长31.9厘米，宽6.5厘米
铜戈两面铸有相同的神像，
神人头部装饰卷羽，耳装饰
卷蛇，腰部缠绕蛇，两手分
别操龙和两头兽，双腿分
踞，足踏日月，胯下有一条
龙。铜戈两面各有两字铭
文，连读为“兵辟太岁”。

灭掉经常侵扰晋国的长狄和赤狄，解除后顾之忧，开始东进，谋求霸业的复兴。

前589年（鲁成公二年），与楚结好的齐加兵鲁、卫。鲁、卫向晋国乞师，晋派郤克率大军救援，与齐大战于鞍（今山东济南西南）。齐顷公骄横不可一世，以为吃顿饭的工夫就可以打败晋军，没给马披甲就上阵，结果被团结而互相激励的晋军打得大败。晋军的战车绕着华不注山追赶齐顷公，齐顷公慌忙逃命，马车被树干挂住，差一点被俘虏。在失败的情况下，齐不得不与晋讲和，归还所侵占的鲁、卫土地。

晋景公东进与齐争锋的同时，为了遏制南方强国楚的北上，采用楚亡臣申公巫臣的建议，南联吴国以牵制楚。晋让吴国不断侵扰楚国，使楚国的军队不停地在吴楚战场上奔命。楚无力北上与晋抗衡，不得已与晋结盟，表示以后两国不再兵戎相见。

前581年（鲁成公十年），秦国指使狄人攻晋，晋邀集齐、鲁、卫、宋、郑、曹、邾、滕等诸侯朝见周王，以王命大张旗鼓西征伐秦，把秦军打得大败。

前575年（鲁成公十六年），郑国在楚的胁迫下倒向楚，晋厉公派栾书率大军伐郑，楚共王也亲率大军救郑，两军激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战争打得非常艰苦，晋厉公的车陷在泥沼里，楚共王被晋将射伤了眼睛。战斗从早晨打到晚上，一直持续到双方疲惫不堪才休战。入夜，双方厉兵秣马，研究敌情，楚共王命人叫主将子反商议军务，子反却酩酊大醉。楚共王认为这是天意要使楚失败，遂趁夜撤军，晋军不战而胜。

鄢陵之战后，晋国发生内乱。晋悼公即位后，整顿内政，任命贤能，减轻赋税，使一度紊乱的政治走上正轨。在对外的策略上，他采纳魏绛的和戎政策，用怀柔的办法

稳定与少数民族部族的关系，安定边疆；对楚，则采纳荀偃的建议，把晋和同盟诸侯国的精锐部队分成三部分，轮换对付楚军，使楚军疲劳不堪，自己却可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以逸待劳。

由于晋悼公实行这些政策，国力大为增强。八年之中，晋九次以盟主的身份会合诸侯，所以文献记载说“晋悼复霸”。

其后，晋平公即位，连续出兵打败楚国和齐国。前552年，晋平公与齐庄公及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诸侯会于澶渊（今河南濮阳西北），诸侯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晋国的霸业达到顶峰。

晋楚争霸前后八十余年，其间经历过四次大的战争：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湛阪之战。四次战争中，晋三胜，楚一胜，因此晋霸中原的时间最长。

（七）弭兵活动

“弭兵”，就是停止战争。春秋中期，大国争霸出现了势均力敌的局面。当时争霸的主力是晋国和楚国，双方又有各自的属国和同盟国。他们竭力为争夺霸权而战，但几至精疲力尽，双方也很难做到一下子消灭对方。长期的争霸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尤其是那些处于大国夹缝间的小国更是饱受兵祸之苦。他们惟强是从，每次战役都要被迫贡献很多的粮草、人力和马匹，因此各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另一方面，争霸战争也激化了诸侯各国的内部矛盾和新旧势力的斗争，大国诸侯此时都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他顾。因此，出现了晋、楚两个争霸大国之间的弭兵活动。

弭兵活动有两次。

第一次在前579年（鲁成公十二年），由宋国大夫华元倡导。华元与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和楚国的令尹子重关系都很好，所以由

他来斡旋。

当时，晋国卿大夫之间的兼并斗争正在加剧，无暇他顾。楚国的申公巫臣因为内部矛盾出走晋，唆使晋国联吴制楚，并亲自到吴国帮助吴军训练车战、陆战技术，鼓动吴军连年伐楚，使楚不得安宁。在这种情况下，晋、楚两国都作出姿态，主动释放俘虏，以求修好。前579年，在华元的撮合下，晋与楚的代表在宋都（今河南商丘）西门外订立弭兵和约，解除战争。但这次和约仅维持了三年，就被楚国出兵讨伐晋盟国郑、卫的战火替代。不久又爆发了鄢陵之战。

三十年后，宋国大夫向戌又倡导了第二次弭兵活动。

那时，晋国公室与卿大夫及卿大夫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激烈，楚康王的几个弟弟也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王位，时刻都会引发重大的政治危机。两国的最高统治者感到当前国家的内忧大于外患，惟恐祸起萧墙，所以都把精力投入到国内的事务上。同时，吴国频繁地与中原诸侯结盟，也引起了楚的高度警惕。追随晋、楚的那些中、小国家，长期疲于奔命，无时不希望和平，于是促成了向戌弭兵的成功。

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夏，在向戌的调停下，晋、楚和鲁、蔡、卫、陈、郑、许、曹等十四个国家的执政大臣，在宋都结盟休战。盟约规定，原来晋和楚的属国，弭兵后同时变成晋、楚双方共同的归附国，对两国尽相同的义务。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弭兵，实际上是大国通过牺牲中小国家的利益来瓜分霸权，形成均势，并不是真的要停止兼并战争。

向戌弭兵后，四十余年内诸侯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以后，随着各国之间尖锐矛盾的减弱，中原各国私家势力与公室势力的

斗争成为历史发展的主线。争霸斗争的战场，则由中原转向了东南地区的楚、吴、越之间。

（八）吴越争霸

弭兵使晋、楚之间的矛盾缓和，但楚与东南地区新崛起的吴的矛盾却尖锐起来。

吴相传是周太王的儿子太伯、虞仲在南方建立的国家。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比较深。1954年江苏丹徒发现了宜侯矢簋，有人认为宜侯矢簋记载的虞即是吴，虞，吴古文字通用。按照这个说法，吴是周康王时封建的国家，其地在今江苏丹徒，建都姑苏是后来的事。

关于吴的文献记载很少。前584年（鲁成公七年），楚亡臣申公巫臣为晋推行联吴制楚的政策，由晋出使吴，教吴人射御、车战、战阵等军事技术，以加强吴从陆路与楚抗衡的能力。吴军事力量增强之后，连续伐楚、巢、徐、州来，蚕食楚国的边邑，给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前576年（鲁成公十五年），晋国约吴王寿梦参加诸侯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的盟会，这是吴与中原正式沟通的开始。诸樊即

越王允常墓

位于越国国都会稽（今浙江绍兴）西南13公里的印山之颠。四周有规整的隍壕，构成面积约8.5万平方米的印山越王陵园。隍壕总长888米，宽16米至29米，深2.1米至2.9米，四面正中有60米的通道。整个隍壕共计有土方4万立方米。墓上封土堆东西长72米，南北宽36米。



位后，迁都姑苏（今江苏吴县），加强了与楚的争锋。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吴王诸樊在与楚交战中战死，吴王余祭立。他趁楚国内乱，大败楚军于豫章（今安徽合肥西），吞灭楚的州来（下蔡，今安徽凤台）。之后，又在鸡父（今河南固始南）大败楚军。吴楚的战争日见激烈。

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吴国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闾。阖闾重用楚国亡臣伍子胥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又任用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派大军轮番袭扰楚国边境，使楚国时时不得安宁。前506年（鲁定公四年），吴乘楚连年作战、极度疲惫之机，联合蔡、唐等国，由水路进军，大举攻楚。大军越过大别山，于柏举（今湖北麻城）大败楚军，又乘胜追击，一直攻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

柏举之战对楚的打击很大。后来吴国内

部发生了贵族争权夺利的斗争，越国趁机攻吴。秦国怕吴成为南方的劲敌，也出兵救楚。在秦楚联军的攻击下，吴被迫撤军。但撤军的第二年，吴国又连败楚国的水师和陆军，迫使楚迁都郢（今湖北宜城东南）。至此，吴国的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越是百越族的一个分支，与中原文化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史记·越世家》说越的始祖是夏少康的庶子无余，无余传二十余世到允常，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允常在《春秋》有记载，现在浙江绍兴已发现了允常的墓葬。

前6世纪中叶，越还是楚的属国。楚为了对付吴国，经常鼓动越攻打吴国。柏举之战，吴攻入楚郢都，越趁机入侵吴国，迫使吴从楚撤军，两国构怨甚深。

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越王允常死，句践继位。吴王阖闾乘越有丧事，大举伐越。

吴王光鉴

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高39厘米，口径57厘米，腹径59厘米，底径33厘米。大口，平底，器侧有两个兽形耳，各套环一个。器身遍布较细的羽翅纹，腹内有铭文8行52字。记载这是吴王光嫁女于蔡的媵（陪嫁）器。



两军战于槁李（今浙江嘉兴南），吴军大败。阖闾受伤，在回师途中死去。前494年（鲁定公十五年），吴王夫差率大军攻越，大败越军于夫椒（今江苏吴县）。句践只剩下了甲楯五千人，退保会稽。后来听从谋臣文种的意见，卑辞向吴乞和，归附称臣。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劝告，答应了句践求和的请求。

句践在吴国作为臣隶驾车养马，三年后被赦免回国。回国后，他听从范蠡、文种等谋臣的建议，垦殖土地，繁殖人口，充实府库；对外亲楚、结齐、附晋，在复苏越国经济的同时争取大国的支援。他卧薪尝胆，激励自己时刻不忘雪耻复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他趁夫差北上会盟、国内空虚的机会，分两路出兵攻吴：一路由海路入淮河，切断吴军归路；一路从陆路北上，直袭吴都姑苏。当时，夫差正大会诸侯于黄池（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做盟主。盟会还未开始，便传来越军入吴的消息，夫差仓促与晋结盟，急速回军与越请和。越考虑还不能一举灭吴，于是答应了吴的请求，但并没有放松灭吴的准备。

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越趁吴遭受饥荒之机，举兵伐吴。前473年，越军攻破姑苏，夫差求和不得，自杀。越占领了整个吴国。

灭吴之后，句践北渡江淮，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同时致贡周元王，表示对周的拱卫之忧。周元王赐命句践为诸侯之长，东方诸侯都来朝贺。这是越发展的顶点。

争霸战争是诸侯强国为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掠夺土地、人口和财富而进行的战争。大国争霸最早打出的口号是“尊王攘夷”，然而他们争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日益衰败的宗法封建制度，而是为了取得只有周王才

能有的统驭诸侯的权力，因此所谓尊王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争霸战争给各国尤其是小国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据《春秋》记载，春秋242年间，列国进行的战争共483次，朝聘盟会450次。这些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大多是以大国对小国的压榨或剥削而告结束的。无穷无尽的兵役、劳役、贡纳、赋税转嫁到各国尤其是小国人民的身上，造成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极端穷困。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春秋无义战”。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大国争霸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的进步。

首先，诸侯各国的兼并和外交联合，促进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和生产经济的发展，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春秋初，大小诸侯国有一百四十余，经过三百年的兼并和战争，到春秋末只剩下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大国、强国。今山东地区的诸小国和部族被齐兼并，河北、山西地区的诸小国和部族被晋兼并，江淮、汉水流域的诸小国和部族被楚兼并，西北地区的诸小国和部族被秦兼并。这就形成了东方以齐为中心，西方以秦为中心，北方以晋、燕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的四个文化区域。这种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以后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其次，争霸战争加速了新旧势力的交替进程。大国争霸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削弱了宗法封建势力，为封建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春秋后期尤其如此。

再次，中原周边蛮、夷、戎、狄民族的内迁，各族之间互通婚姻和中原国家的“和戎”，促进了民族的大迁徙、大交流，为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简而言之，争霸战争打破了西周以来王



吴王夫差矛

湖北江陵马山5号楚墓出土。全长29.5厘米，宽3厘米。矛中间起脊，有血槽。骹内中空，存残竹柄。器身两面中脊和骹部有黑色米字形暗花。矛身近骹处有错金铭文两行八字：“吴王夫差自作用矛”。吴王夫差是吴王阖闾之子，前495年即位。这件矛与越王句践剑都在楚国首都郢都地区出土，说明越灭吴及楚灭越之后，吴、越两国王室的贵重兵器都被送到楚国。

越王句践剑

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
 全长55.6厘米，剑身長45.6厘米，剑格宽5厘米
 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线缠缚，剑首铸极其精细的十一道同心圆圈。剑身一面近格处有两行鸟篆铭文“越王自乍（作）用钺（剑）”。该剑制作精良，虽经两千余年，出土时犹如新铸，寒光凛凛。据鉴定，该剑剑刃、剑身为铜锡合金，含锡16%至17%，熔铸时通过精炼去除了铅、铁杂质，硬度极高而又有延展性。



室与列国的分野，泯灭了各族之间的界限，促使华夷各族共同走上了地主封建制的道路。

三、公室衰落·卿族专权

大国争霸，导致了西周以来的宗法封建制度的衰落。这种宗法制度的衰落，不仅表现为天子威权跌落，“政由方伯”，同时也表现为诸侯公室的威权跌落，大夫的权力日益强大。春秋中叶以前，诸侯国内的斗争就非常激烈，不过由于当时争霸战争异常剧烈，诸侯国内的矛盾尚未凸显。向戌弭兵后，争霸战争的中心由中原转移到了东南的楚、吴、越，中原各国的内部矛盾于是一下子凸

显出来。可以这样说，向戌弭兵是春秋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转折点：春秋前期，兼并主要在各诸侯国之间进行；春秋后期，兼并则主要在各国卿大夫之间进行。各国公族、公室和卿大夫兼并的结果，使各国的政权不断下移，土地、财产、人口和权力的再分配，也不断拉动社会改革的序幕，这是春秋后期政治上突出的特点。

(一) 三桓专鲁

三桓专鲁是春秋后期卿大夫专权的一个典型。

鲁是诸侯中贯彻周礼最彻底的国家（文献说“周礼尽在鲁”），从西周到春秋，鲁国一直由公族执政。公族是国君的同族。分封制度下，嫡长子继承君位，其余诸子做大夫。国君的大家庭称公室。大夫及其子弟是公室的同族近亲，所以称公族。

春秋初年，鲁国因为继承问题发生内乱，庆父、叔牙、季友几个兄弟为争夺君位而互相残杀，使公室的力量遭到削弱。

鲁庄公是鲁桓公的长子。鲁庄公晚年，想改变鲁“一继一及”（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轮换进行）的传统继承法，不把君位传给弟弟庆父而传给自己的儿子公子斑，遭到庆父和叔牙的反对。鲁庄公死，季友假托君命毒死叔牙，奉公子斑即位。庆父不甘心，派人刺杀了公子斑。鲁人立鲁庄公庶子启方，是为鲁闵公。不久，庆父又派人害死鲁闵公，自己逃亡莒国。后来，季友另立鲁庄公庶子公子申，是为鲁僖公。鲁僖公即位后，以重金贿赂莒国把庆父送回鲁国治罪。庆父自知死罪难逃而自杀，鲁的内乱至此才得以平息。

内乱平息后，季友掌政，鲁僖公把汶阳（今山东泰安西南）之田和费（今山东费县）赏赐给他；又根据季友的意见让公孙敖继承庆父的家业，称孟孙氏，以郕（今山东宁阳东

北)为封邑;立叔牙三子公孙兹为叔孙氏,以郕(今山东东平东南)为封邑。因为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后人称之为“三桓”。

前609年,鲁文公死,公室又发生了杀嫡立庶的政变,文公庶子鲁宣公即位。这时庆父、叔牙、季友的后人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乘机以各种手段收买人心,招徕人才,在各自的封地内修筑城邑,扩张势力,并以此为根据地控制鲁国的政权,势力越来越大。尤其季孙氏的季文子,从宣公即位起即当政,后来完全掌握了鲁国的军政大权。

鲁襄公十一年(前562),鲁国“作三军,(三桓)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即把国家军队改编成三军,季孙、叔孙、孟孙各统辖一军,三桓完全掌握了国家的军权。鲁昭公五年(前537),三桓又进一步瓜分军权,把三军改为二军,但分成四股,实行“四分公室”:季孙氏分两股,独掌一军,并控制着鲁国大权;叔孙氏、孟孙氏各得一股,合掌一军。军赋由三家征收,但征收的军赋只是象征性地向公室缴纳一点,其余由三桓按四股分。这

样,鲁国的土地、人口、军队就完全被三桓瓜分了,公室在经济上只能依靠三家的贡纳来维持,鲁君成了徒具虚名的宗主。

后来,鲁昭公受不了季桓子的欺凌,联合一些贵族袭击季孙氏,结果三桓联合起来把他赶出国都,由季孙氏代行君政,鲁昭公到死也未能回国。鲁哀公也想借助国外的力量除去三桓,结果也被三桓赶走。进入战国时期,到鲁悼公时,“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三桓已经完全控制了鲁国。

三桓内部也发生过多家家臣叛乱夺权的事件。随着三桓专权的发展,陪臣(大夫家里的家臣)也像三桓专鲁那样瓜分大夫的权力。像季孙氏的家臣南蒯、阳虎,叔孙氏的家臣竖牛,孟孙氏的家臣公敛处父等都相继在季孙、叔孙、孟孙家族中专权,甚至发生叛乱。这就是所谓的“陪臣执国命”。这是当时宗法制度被破坏和政权不断下移的结果。

(二) 三家分晋

晋国是宗族兴衰最为剧烈的国家。

春秋前期,晋国的公室势力基本上已退



鲁伯大父簋

春秋 盛食器

1970年山东历城北草沟出土
高25.4厘米,口径20.1厘米
此簋底有铭文18字,是鲁伯大父为季姬媼所做媵(陪嫁)器。

出历史舞台，活跃在晋国政治舞台上的多是势力强大的异姓贵族，所以异姓贵族与公室和卿族的斗争是春秋中、后期晋国卿族斗争的特点。

春秋初，晋国公室内部发生了争夺君权的武装残杀。前679年（鲁庄公十五年），曲沃武公起兵伐晋，杀晋侯缙。周釐王正式册封曲沃武公为晋侯，承认属于支庶地位的曲沃武公的合法地位，这是对晋国封建宗法的一次大破坏。

前677年（鲁庄公十七年），晋献公立。他鉴于当时公族势力的强大，害怕这些人重新走曲沃武公以支夺嫡的老路，于是采用大夫士蒍的计策，让他们自相残杀，以各种借口“尽杀群公子”，使君权得到了巩固。晋献

公晚年，在立储问题上发生了“骊姬之乱”。骊姬为了让亲生的儿子继位，把献公的儿子们逐杀殆尽，“自是晋无公族”，晋国的公族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晋文公重耳即位后，吸取历史教训，不再分封和重用公室宗族子弟，而是重用随他出亡和策应他回国的异姓贵族，使他们成为晋国统治的核心。晋成公继位后，则进一步拔擢异姓卿族的嫡长子，赐以封地，把他们培养成异姓公族。异姓卿族执政，排除了公室宗族参与军政大事的机会，对消弭公室宗族矛盾、稳定君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控制了公室大权，却又刺激了异姓卿族与公室贵族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晋灵公与执政卿赵盾的矛盾

栾书缶

高48.8厘米，口径16.5厘米
器颈至肩有错金铭文5行40字，系栾书的后人为纪念先祖所作。栾书是晋国栾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在晋执政十四年，曾将中军，担任晋国军队的主帅。



斗争。赵盾执政，权倾朝野，引起晋灵公的不满。灵公不行君道，赵盾屡谏，灵公不听，反而两次派人刺杀赵盾。最后赵盾的弟弟赵穿袭杀灵公，以卿弑君，矛盾以公室失败而告结束。从此，晋国异姓卿族的力量更加强大。

春秋时晋国执政的异姓卿大夫先后有魏氏、赵氏、狐氏、胥氏、先氏、栾氏、郤氏、韩氏、智氏、荀氏（中行氏）、士氏（范氏）等。狐氏、胥氏、先氏是一些旧族，灭亡较早。力量强大而长时间左右晋国朝政的主要是魏氏、赵氏、韩氏、智氏、荀氏（中行氏）、士氏（范氏）等强族。他们在晋国图霸的过程中轮番掌握兵权，控制朝政，成为晋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文献说晋国“政出多门”，互相争斗，主要是指这些卿族。

魏氏：魏的祖先是毕万。前661年（鲁闵公元年），晋献公灭耿（在今山西河津）、霍（在今山西霍州）、魏（在今山西芮城）三个小国，把魏赐给大夫毕万，毕万的后人遂以国为氏。晋献公晚年，魏犇跟随公子重耳出亡，重耳即位后封魏犇为大夫，逐渐强大起来。

赵氏：赵是一个古老的族氏。西周末，赵的先人叔带从周到晋，建赵氏于晋国。前661年，晋灭耿，把耿赐给叔带的五世孙赵夙。晋公子重耳出亡，赵衰随侍。重耳即位，赵衰受到重用，赵氏随之强大。前621年（鲁文公六年），晋襄公以赵衰子赵盾为中军元帅，掌理国政。襄公死，赵盾铲除劲敌狐氏势力，立晋灵公，专权晋国。后赵穿弑灵公，立成公，赵氏势力愈加强大。

韩氏：韩为姬姓别族，其先人事晋，被封于韩原，后世即以韩为氏。前573年（成公十八年），韩厥执政，韩氏开始强大。一直到春秋后期，韩都是强族。



郤氏：继赵氏而起的是郤氏。前601年（鲁宣公八年），郤缺代赵盾为政，之后郤克也参与中枢，郤氏力量渐强，到晋厉公时发展到顶点。厉公时栾氏、中行氏、郤氏专权，郤氏一家三卿，“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炙手可热。后因与其他卿族结怨太多，郤氏在晋厉公铲除群大夫势力的斗争中被灭族。

栾氏：栾氏也是晋国的老贵族。城濮之战，栾枝辅佐晋文公为下军主将，功劳卓著。后晋厉公灭郤氏，栾书、荀偃（中行氏）刺杀厉公，迎立悼公，专权一时。到范氏（士匄）执政，驱逐、攻杀栾盈，尽除栾氏之党，栾氏势力溃败。

范氏：士匄灭栾氏后，居功骄横，不久即为赵武取代。赵武、韩起、魏舒相继执政。

到春秋晚期，栾氏、郤氏、胥氏、原氏、狐氏、续氏、庆氏、伯氏等贵族灭亡，其子弟沦为平民、奴隶，晋国大族只剩下了韩、魏、赵、范、智、中行氏六家，后世称“六卿”。六卿拥有政权和广阔的土地，他们凭借

侯马盟书

1965年至1970年山西侯马秦村盟誓遗址出土。盟誓遗址长70米，宽55米。盟书出土于遗址西北部的竖坑中。从盟书出土坑位和盟书内容的连续性看，这些盟誓曾在短时期内举行过多次。据研究，这批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贵族赵鞅与邯郸赵氏宗族、中行寅、范吉射等盟誓的文书。1980年至1982年河南温县张村盟誓遗址也出土过类似的盟书。温县盟书形状为薄片石片、石圭、石简等，毛笔书写，内容多是申明参加盟誓的人一定要忠心服侍君主，不然就要灭亡其族氏。温县盟书主持人为战国初年晋六卿之一的韩氏。这些盟书是当时晋国贵族争权夺利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着强大的宗族势力，把私邑作为争夺政权的根据地，轮番执政，互相兼并，互相倾轧，成为晋国政治斗争的焦点。

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赵鞅与镇守邯郸的赵午发生冲突，赵午家族据邯郸以叛。中行氏、范氏趁火打劫，起兵响应邯郸。他们联合起来攻打赵鞅，迫使赵鞅流亡晋阳。范氏、中行氏围晋阳，不料范氏族人内讧，反联合智、韩、魏三家打着晋侯的名义起兵攻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遂亡。

范氏、中行氏灭亡后，智、赵、韩、魏四家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地盘，把晋君赶跑，共同把持国政。前475年（鲁哀公二十年），智瑶代赵鞅为政，他凭借氏族强大，向赵、韩、魏索要土地，企图独占原来范氏、中

行氏的地盘。前471年，赵与韩、魏合力灭掉智氏，三家共分晋政。

随着韩、赵、魏的强大，晋公室的势力越来越小。到晋幽公时，公室只剩下了两个邑——国都绛和宗邑曲沃。这时，晋幽公不但不能要求韩、赵、魏定期朝见自己，他自己还要不时朝见韩、赵、魏，说明晋国公室已经名存实亡。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王室正式册封韩、赵、魏为诸侯，晋国灭亡，韩、赵、魏成了三个国家。

1965年至1966年，山西侯马春秋末期晋国盟誓遗址出土了数千件盟书。盟书中有一部分记载了赵鞅打击邯郸赵午宗族的经过，还有一些是赵鞅与范氏、中行氏订立的约盟文书。根据《周礼》、《左传》等记载，古人盟誓时要在地面上掘坎，杀牲取血后埋入坎内，并把盟辞放在牲畜之上。出土盟书的竖坑，实际上就是这种坎。据发掘者报道，遗址西北部的坎，绝大多数为长方形，最大的长1.6米，宽0.6米，最小的长0.5米，宽0.25米，深度在0.4米至6米之间，方向大多为正南北向。多数坑北壁有壁龛，龛内有璧、璋等玉器。坑底有家畜骨骼，大坑多系牛、马，小坑为羊，填土中或有鸡骨。盟书系用玉石片写成，形状有圭、璋、璜等，也有不太规则的石片。文字多数用毛笔朱书，少数为墨书。该遗址出土盟书约5000余件，内容有“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诸种。

（三）田氏代齐

春秋时齐国强族较少。齐国大夫兼并的结果，没有像晋那样分成三个国家，而是异姓卿族崛起，最后取代姜氏统治齐国。

齐国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国的公族，春秋初期执政的主要是国氏、高氏两

田子孟姜壶

高221厘米，口径134厘米。颈部内壁有铭文142字，是齐侯为田垣子的父亲做的祭器。田垣子即田桓子或田无宇。其妻孟姜是齐侯之女。齐景公时，田垣子参与铲除政敌栾氏、高氏，受到齐景公母亲孟姬的表彰。



个世家大族。这两个大族是齐始封君太公望之后，对齐国政治有相当大的影响。1956年山东临淄齐故城南尧王村出土的铸有“国子”铭文的鼎，就是国氏家族的遗物。春秋中期以后，高、国两个大族的势力有所衰弱，受惠公宠信的崔氏势力渐渐发展起来，齐国卿族争权的斗争开始表面化。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崔杼杀掉他自己拥立的齐庄公，另立齐景公，自任为相，专擅国政。两年后，庆氏乘崔氏家族内乱，攻杀崔氏，独自当国。前545年（鲁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内的强族陈氏、鲍氏（鲍叔牙后人）联合栾氏、高氏共同灭亡庆氏，由栾氏、高氏执政。栾氏、高氏执政期间，擅杀大臣，驱逐群公子，民愤很大，不久为陈氏、鲍氏所灭，权力渐渐掌握在陈桓子手中。陈桓子的名字叫陈无宇，古代陈、田读音完全相同，所以文献有时记作田桓子或田无宇。

陈氏是陈国贵族公子完的后人。公子完在本国嫡庶争立的政治斗争中失败，逃到齐国，受到齐桓公的重用。陈桓子是公子完的五世孙。灭掉栾氏、高氏后，他把栾氏、高氏所有土地、财产全部上交齐景公，把被栾氏、高氏驱逐的群公子从各国召回，归还他们的封邑，增加他们的俸禄，使这些公族子弟对他感激涕零。齐景公母亲孟姬对陈氏的做法非常满意，为了表彰他，特把高唐（今山东高唐东）赏赐给他。陈氏的力量更加强大。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陈氏在齐景公重刑厚敛政策的背景下，施惠于民，以争取民心。遇到灾年，他用大斗借粮给农民，收粮时却用小斗；山里出产的木料，运到市场上，他不加价，还按山里的价钱卖；海上出产的海产，运到市场上，价钱和海上一样便宜，运费不让老百姓负担。当时齐国的老百姓十分



困难，他的这些做法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认为陈氏是最关心他们疾苦的人，纷纷逃到他的门下做佃农，“归之如流水”。

齐景公死，国氏、高氏立公子荼为君（晏孺子），迫使群公子出奔流亡。前489年（鲁哀公六年），陈乞联合鲍氏及其他大夫武装进入晏孺子宫，杀高昭子，迫使国惠子逃亡，国氏、高氏遂灭。不久，陈乞立公子阳生为君（齐悼公），自己为相，专齐政。齐简公立，任用亲信监止为右相，而让陈乞的儿子陈常（田常、田成子）为左相，企图削弱陈氏的权力。陈常采取祖父田桓子的老办法，大斗出，小斗进，笼络人心，扩大自己的势力。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陈常发动武装政变，杀监止和齐简公，尽灭鲍、晏、监止等世袭强族，而立齐平公，自己为相专断国政。这标志着陈常已实际上夺取了姜齐的政权。当时陈常的私邑比齐平公的食邑还要大，他已经成了齐国实际上的君主。前368年，陈常的

子禾子铜釜

传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

高38.5厘米，口径22.3厘米，实测容积20460毫升

该釜腹部有刻铭9行，记载子禾子颁布容量标准，大意是：子禾子命人告知陈得：左关釜的容量以仓廩之釜为标准，关钟以廩判为标准。如关人舞弊，应予制止。如制止不住，视情节轻重施以刑罚。子禾子是战国初年齐国国君田和做大夫时的称呼。田和在周安王十六年（前386）被列为诸侯，此器是田和未立诸侯时所作，其年代当在前404年至前385年之间。

儿子陈和被周室立为齐侯，重新纪年，最后完成了姜齐向陈（田）齐的转变。

郑国、宋国、卫国等在春秋时期也都是卿族专权。春秋初期郑国公族多次发生内乱，郑襄公以后，郑穆公诸子子罕、子驷、子丰、子游、子印、子国、子良几个强族基本上控制了郑国政权，后人称之为“七穆”。七穆更相执政，纷争不已，一直到子产执政，加强改革，郑才得以安宁。宋、卫春秋中期以后，权力也渐渐掌握在公族大夫手中。周王室一直以王族骨干为卿士，周敬王以后，权力落在单氏、刘氏两个卿大夫家族手中，一直到战国时期。

秦、楚、吴、越与中原的情况差异较大。这些国家王室的力量很强，虽也有卿族争权的斗争，但没有发生政权下移的情况。

第二节 七国争雄

一、列国并立·图强变法

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韩、赵、魏为侯，三家大夫变成了韩、赵、魏三国。前386年，周天子又“立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正式册命陈和为齐侯，姜齐变成了陈（田）齐，这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司马光《资治通鉴》把周威烈王正式册命韩虔为韩侯、赵籍为赵侯、魏斯为魏侯这一年作为战国的开始。现行的说法采用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的说法，把周元王元年即前475年作为战国的开始）。

战国时期是地区性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相互兼并和全国统一性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时期。与春秋时期相比，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春秋到战国最剧烈的变化是国家数量和各国疆域的变化。春秋初一百四十余国，经过三百余年大规模的兼并，到战国初年，国家仅存二十余，其中力量最强的是秦、齐、楚、燕、韩、赵、魏七雄。其疆域和都城大致如次。

秦地自今甘肃东南部沿渭河到今陕西关中地区，东以黄河和函谷关为界与三晋为邻，南与巴蜀和楚相接，西与诸戎为邻。先后都雍（今陕西凤翔）、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栌阳（今陕西富平东南）、咸阳（今陕西咸阳）。

齐占有今山东大部 and 河北东南部，东滨大海，南与鲁、莒等为邻，西与赵相接，北与燕接壤。都临淄（今山东淄博西临淄北）。

楚占有今湖北全部，湖南、江西、安徽北部，江苏北部、中部，河南南部及陕西东南部，于七雄之中疆域最大。北与韩、魏、齐相接，西与巴为邻，南边为百越。都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后迁陈（今河南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

燕占有今河北北部、山西东北部、辽宁西南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东有东胡，西和西南与赵、中山交界，东南与齐国为邻。都薊（今北京广安门一带），又建下都于武阳（今河北易县南）。

韩在今山西东南和河南中部，在七雄之中地域最小。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后迁宜阳（今河南宜阳）、阳翟（今河南禹县）、郑（今河南新郑）。

赵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东南部，河北中部、西南部及内蒙古的一部分。东与中山和齐为邻，南以漳河与韩、魏为界，北与燕、东胡相接。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后迁中牟（今河南鹤壁）、邯郸（今河北邯郸）。

魏在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

河北的部分地区。东与齐、卫为邻，西与秦相接，西南邻韩，北与赵接壤。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后迁大梁（今河南开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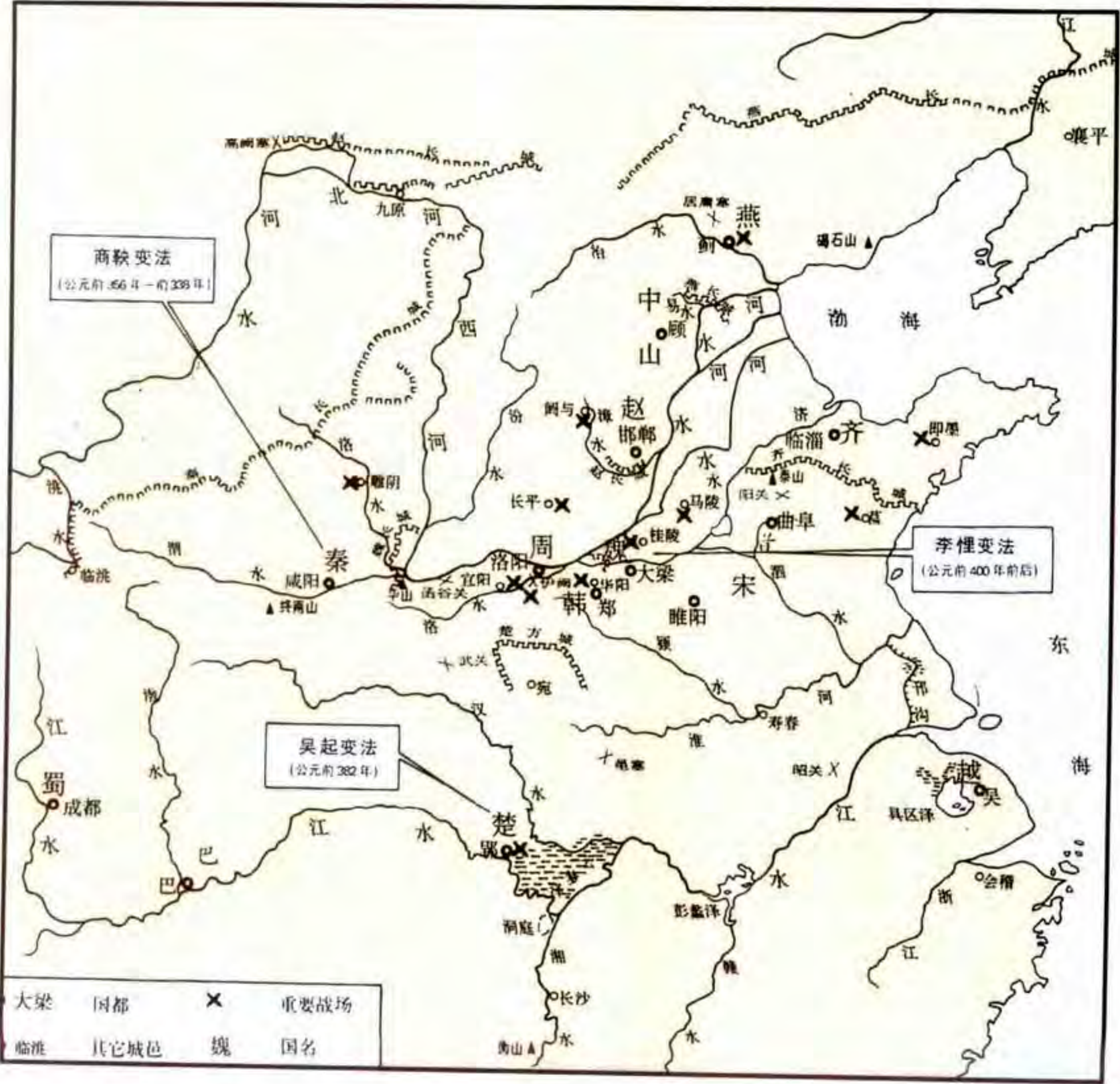
中原和楚北地区还分布着一些小国，其中主要有宋、鲁、郑、卫、中山、曾、蔡。周也属于附属小国之一，当时的周王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共主。另外，七雄周围地区，还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部族：北和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义渠，东南有百越，西南有巴、蜀。

其次，战国时期既是一个战争频仍的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列国诸侯为了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改革井田制度，实行履亩而税；废除世卿世禄，建立起新兴的官僚制度；废除封邦建国

制度，建立郡县制度，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越来越适应新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各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和各族人民的融合，也为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魏李悝变法

改革变法是战国初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战国初期，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国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富国强兵，先后对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改革的重点，一方面是革除旧势力的积弊、束缚和干扰，为新政策的贯彻打通道路；另一方面是要积蓄与强国争锋的实力，制定适应大规模兼并战争需要的制度、政策和策略，同时也为即将出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画一个蓝图。



战国形势图

最先进行变法的是魏国。

战国初年，魏国的国君魏文侯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师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先后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令，礼贤下士，开战国养士之风，为战国的人才培养做出了榜样。

魏国变法主要是在李悝（克）任魏相时推行的。李悝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他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打破世卿世禄的束缚，选贤举能，根据功劳和才能任用官吏。

第二，发展农业生产，以政权的力量鼓励农民勤谨耕种，“尽地力之教”，充分发挥土地的效能和潜力，增加国家收入。

第三，由政府平衡粮价，实行“平籴”。丰年，国家以平价购进余粮储备起来。到灾年，政府以平价出售给灾民，保持粮价平衡，制止粮价暴涨暴跌。这样，既鼓励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还可防止灾年人民的生活受影响而破产逃亡，同时也保障了国家的收入。

第四，著《法经》，建立法律制度。《法经》分《盗经》、《贼经》、《囚经》、《捕经》、《杂经》、《具经》六篇，分别对盗窃、杀人、犯上作乱、追捕犯人、断狱、惩罚、加刑减刑等作了各种具体规定，是中国春秋以来第一部集大成性质的法典。《法经》有一些限制贵族特权的条文，不过其内容主要是为了保护私有制，镇压和防止平民反抗，因此它实质上是一部保护地主阶级权利的法典。

李悝变法保障了国家的稳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很快成为战国初年的第一强国，“威行四邻”。

（二）楚吴起变法

吴起是卫国人，著名的军事家。魏文侯时，吴起在魏国任西河郡守，抵御秦军，成

绩卓著。魏文侯死后，政局动荡，群臣互相怀疑，吴起惧谣言致祸，遂离魏入楚，任宛郡郡守。

楚国是个幅员广阔、物产丰饶的“蛮夷”国家，国内旧宗族的势力强大，社会矛盾尖锐，商业不发达，在战国初年实力较弱。当时，它经常遭受三晋的侵伐，西北的秦国对它的威胁也很大。

楚悼王即位后，为了改变这种贫国弱兵的局面，决心对内政进行改革。他任命吴起为令尹，让他主持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废除贵族特权，改变世袭的分封制度。为了打击旧贵族的势力，他下令把旧贵族从城市迁到荒凉的地区，既使他们无法再“上逼主而下虐民”，又有利于荒地的开发。

第二，整顿吏治，大量淘汰冗官，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养兵。革新政治，严禁私门请托，重用、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要求官吏做到私不害公，为国效力而不计毁誉。

吴起变法主要是针对旧贵族、旧势力的。变法推行后，楚国很快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可是，由于楚国旧贵族的势力非常强大，变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楚之贵戚皆欲害吴起”。变法第二年，楚悼王死，旧贵族趁机作乱，攻杀吴起于悼王丧所，变法失败。

1958年，安徽寿县发现了楚怀王时的封君鄂君启的水陆运输通行证——鄂君启节，节上详细记有政府对封君车船大小、载重数量、货物品种、运行路线的种种限制，反映出吴起变法对楚国政治、经济的影响。

（三）齐邹忌改革

齐国的改革主要是在齐威王时期。

齐国有召纳贤才的传统。田桓公时，齐在国都临淄东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各国的

学者贤人著书立说。到齐威王时，稷下学宫各种人才云集，议论风发，已成为列国的学术文化中心。

邹忌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他为了改变齐国“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向威王陈述“治国家弭人民”的策略，受到威王的赏识和重用。在邹忌的协助下，齐威王大刀阔斧、赏罚分明地整顿吏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即墨大夫清正廉洁，治下良田开辟很多，人民富庶安宁，但朝中却有不少大臣攻击他；阿大夫管理的地区田地荒芜，人民穷困，边界不断遭到外国军队的骚扰，但朝中对他却交口称赞。原来，阿大夫专门贿赂朝臣，博得好名声。齐威王了解实情后，把全国的县令召至朝廷，重赏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受贿赞誉阿大夫的官员，使“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

齐威王接受邹忌的建议，广开言路，以求革新。他曾下令：凡能指出他执政的缺点和错误的人，可根据提意见的形式分别给予奖赏。这种开明的政治风气，使齐国不长即

走上了富强的道路。

（四）韩申不害改革

战国初，韩国政治混乱，国力贫弱。韩昭侯即位后，任用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申不害原是郑国人，出身微贱。他是个讲究“术”的法家，理论上本于黄老学派，著有《申子》六篇。

申不害重“术”，主张通过中央集权树立国君的绝对权威，推崇君主用统治术驾驭群臣。申不害说的“术”，指的是君主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一切办法，包括权术和阴谋诡计。他认为，国君任用臣下，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看他们是否称职，是否名副其实；检查他们对君主是否忠诚，是否言行一致，并根据考察的结果对他们进行赏罚。

申不害认为，国君不能相信任何人，而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耳朵去听，亲自去处理政事。他认为国君应该少说话，这样才不至于让臣下揣摩出自己的真实



错金铜舟

战国 韩 酒具

1965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
高8厘米，口长17.1厘米，宽
12.3厘米

此铜舟器身饰错金夔纹，颈
与圈足饰错金斜角云纹，制
作精巧，造型优美。

想法，使臣下不敢向国君隐瞒一切事情，事事听从国君的指示。

申不害的改革，强化了国君的权威，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使官吏尽心为国君效力，韩国一时国治兵强，外国不敢来犯。

但申不害的“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国君可以用权术来统驭群臣，臣下也可以用权术来对付国君，容易引起彼此间的嫉恨和争夺。相比之下，韩的改革较魏、秦等以“法”为指导思想的改革逊色。

（五）秦商鞅变法

秦的宗族势力非常强大，进入战国时，它还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秦献公时曾进行过一些改革，如废除人殉制度、推广县制，使社会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并迁都栎阳，使秦的国力逐渐增强。

秦孝公即位后，奋发图强，以高官厚禄召纳贤才，任用商鞅，两次变法，使秦国成为当时“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商鞅，姓公孙，卫国人，后被封于商，称商鞅。他“少好刑名之学”，先在魏国求仕，因为得不到信任而入秦，以王霸之道说服秦孝公，受到秦孝公的信任和重用。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开阡陌封疆”，把原来村社井田一百步一亩改为二百四十步一亩，扩大亩的面积，并重新设置田地的界限，以法律保护个人对土地的占有权。

第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努力农耕，收获粮食布匹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经营工商破产或因懒惰而贫困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没入官府为奴。

第三，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禁止私斗，凡私斗者一律按轻重判刑。为了奖励军功，商鞅对秦国原来的爵制进行了改革，设置了二十等爵，规定有军功的人可以按照军功爵位的等级享受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军功是秦人获得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国君宗族没有军功不能列入公族的簿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第四，颁布连坐法。在什伍户籍编制的基础上，建立互相告发和同罪连坐制度，加强对基层的控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有奸情告密的奖励，不告密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连坐。

第五，统一度量衡，由政府颁发标准度量衡器，作为检验和校正各地度量衡器的标准。

第六，推行县制，分全国为三十一县，由国君直接派令、丞管理，代替原来的分封采邑制度。

第七，革除戎狄旧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用华夏族的风尚教化秦人。

第八，焚烧诗书，打击儒家复古思潮，确立法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商鞅变法涉及秦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非常彻底的变法。秦国朝臣对变法与否的争论非常激烈。有人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则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并以严刑处理知法犯法的太子傅，使新法得以推行。

商鞅变法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所以旧贵族对他非常仇恨。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即位，旧贵族诬告商鞅谋反，将他车裂。但

商鞅方升

战国 秦 量器

通长18.7厘米，内口长17.47厘米，宽6.9厘米，深2.32厘米

此器是秦孝公十八年（前344）商鞅变法时督造的一升量器。一端有柄，前端和右壁外刻34字，说明秦定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经实测，秦制一升容量为202.15立方厘米，一立方寸为12.478立方厘米。由此折算，秦一寸合今2.32厘米，一尺合今23.2厘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度量衡，亦以此器为标准升量。故器底加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商鞅虽死，“秦法未败”，他建立的新法被继任者继承贯彻，终于导致了秦国的富强居于六国之首。

（六）赵、燕改革

赵国和燕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

赵国的改革主要在赵烈侯时期。赵烈侯重用公仲连，让他推荐贤者，以“仁义”和“王道”教育人民，并把干练有能力和节财俭用作为选拔贤才和考核官员的标准，促进了赵国的发展。前307年，赵武灵王出于国防战争的需要，以坚毅的决心改制：改变赵人“褒衣博带”的华夏装束而穿用短衣、紧袖、窄裤的“胡服”，以发展“骑射”，使赵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改制之前，赵北面的游牧部族林胡、楼烦经常侵扰赵国。“变俗胡服，习骑射”之后，赵连克林胡、楼烦，灭中山，开拓疆土，“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成为东方与秦抗衡的最强敌手。

燕国的改革最晚。燕王哙任用子之为相，想进行一些富国强兵的改革，但他不切实际地效法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把君位让给子之，结果酿成内乱：燕国贵族不服，太子平以兵攻子之，市被又率众攻太子平。齐国和中山等乘机伐燕，燕几至亡国。燕昭王即位后，谦恭下士，召纳贤才，励精图治，才使燕走上国富兵强的道路。

二、七国争雄·走向统一

战国初期，魏、齐、秦等先后实行改革，逐渐强大起来。不过，由于秦被三晋所阻，不能东进；楚在春秋后期与晋争霸失败，国力尚弱，一时尚不足构成对中原诸侯的威胁。所以，当时中原兼并战争的主角是魏、齐两国，他们进行的战争主要是争夺附近小国的



武士斗兽纹铜镜

战国 秦 照面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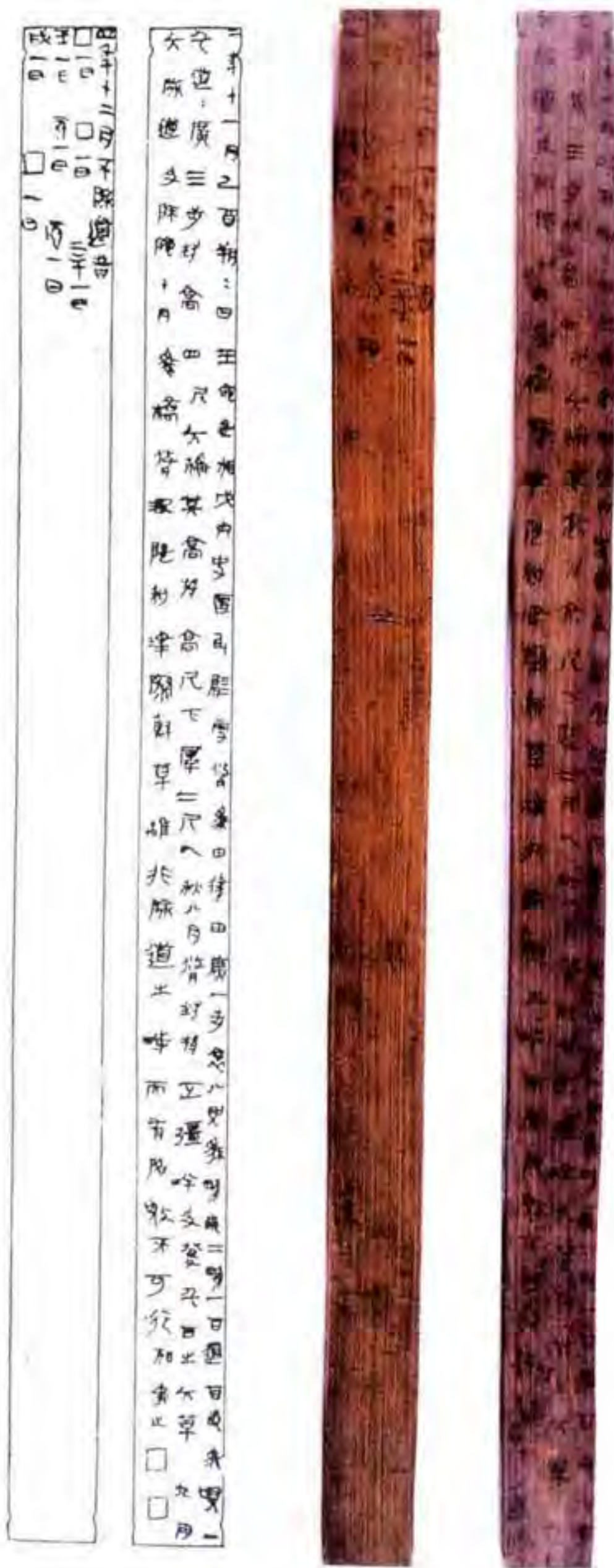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

直径10.4厘米

铜镜为双重方纽。背面花纹以细线勾连纹作地，上有两个勇猛的武士，左手持盾，右手握剑，与两只豹搏斗。其形态逼真，刻画细腻，表现出了秦人尚武的精神。

青川木牍

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共两件。一件长46厘米，宽3.5厘米，厚0.5厘米，背面不平，文字漫漶不清，大概是封缄之用；一件长46厘米，宽2.5厘米，厚0.4厘米，两面墨书。正面是秦王以诏令形式颁布的《为田律》，后面是与法律有关的记事。牍文记载，秦武王二年（前309），秦王命丞相甘茂修订《为田律》，详细规定农田和田间道路的形式、制度，并要求每年于指定的时间修整。律文规定，秦田每亩宽三步（六尺），长二百四十步。一亩田里有两条畛道，一条陌道，百亩为一顷，每顷有一条阡道。木牍背面还记有秦武王四年十二月有十二天不能修道路的日子。木牍为我们研究秦国的政治史、土地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战争。

（一）魏国之强

魏占有原晋国南部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基础较好，而且又扼守黄河险要，便于守卫和发展。魏文侯时，经过李悝变法，建立集权政治，发展生产，很快强大起来。它连续攻占了秦的河西（今陕西韩城、大荔、澄城一带）和郑（今陕西华县），灭中山（今河北平山，后中山又复国），之后又联合韩、赵等国伐齐，一直打到齐国的长城，并夺取了楚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榆关（在今河南开封西南），疆域扩展到黄河以南很大地区，扼制了秦东进和楚北上的道路。

魏惠王时，为了便于控制东方，与齐争锋，迁都到大梁。此时，齐威王为恢复齐的霸业，任用邹忌进行改革，国力增强，时刻准备西进。因此，齐、魏便成为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前354年，魏联合宋、卫等国伐赵，长驱直入，一直攻入赵的首都邯郸。赵求救于齐，齐派田忌、孙臏率师救援，孙臏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佯攻平陵，迷惑魏军，待魏军疲惫，轻车急驰攻打大梁。魏主帅庞涓弃辎重急忙回军，被孙臏在桂陵（今河南长垣）截击，魏军大败，庞涓被生擒。

桂陵之战后，魏惠王连年发动战争以扭转战局。他联合韩国打败齐、宋、卫联军，迫使齐、赵跟他讲和。秦国乘魏连年与齐、赵作战，夺取了魏之河西，并一度攻入魏的旧都安邑。魏与齐、赵讲和后，回师西向反攻秦国，不但完全收复失地，还一度围困秦之定阳（今陕西宜川），迫使秦孝公讲和。前344年，魏惠王召集宋、卫、邹、鲁、秦等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盟会。会后，又驱使秦、赵等十二国诸侯至孟津朝见周天子。这标志着魏的霸业达到了顶峰。

前342年，魏以韩没有参加逢泽之会为由攻打韩国。韩求救于齐，齐威王命田忌、孙臏等率师攻魏救韩，魏派将军庞涓率十万大军迎战。孙臏知魏强悍而轻敌，避开正面交锋，而采用退兵减灶的办法迷惑魏军，诱敌深入。庞涓率轻锐部队昼夜追赶齐军，结果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崎岖的山道上被孙臏伏击，十万大军被歼，庞涓自杀。

马陵之战消灭了魏军主力。从此以后，魏再没有能力与强大的诸侯争锋。前341年，魏在齐、秦、赵三面夹击的进攻中溃败，次年又败于秦。在这种形势下，魏惠王采用惠施的建议，对齐妥协，到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威王，尊齐为王；齐威王也尊



魏为王，史称“徐州相王”或“齐魏相王”。

从此，两国和解。

“徐州相王”标志着魏霸业的衰落和齐、魏均势的形成。以后，“合纵”、“连横”替代了大国争霸，兼并战争向更激烈的方向发展。

（二）齐秦称帝

“徐州相王”后，齐国成为中原公认的强国。这时，经过商鞅变法迅速发展起来的秦国，不断东进扩张。于是，东西两个强国向外扩张和争取与国的斗争成为这一阶段兼并战争的主线。

编磬

战国 魏 礼乐器

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共10件，其长、宽度依次为72.9厘米、17.7厘米、66厘米、16厘米、48.7厘米、14.5厘米、48.1厘米、15.5厘米、48厘米、15.2厘米、41厘米、13.5厘米、38厘米、12.5厘米、32.6厘米、11.25厘米、30.6厘米、11.1厘米、29厘米、10.3厘米

编磬是成组悬挂在磬架上按谱敲击的成套乐器。陕县后川2040号墓形制阔大，出土文物中仅大件铜器即有80余件。从这组编磬可以推见该墓主人地位之高。

错金银马首形铜马轅饰

战国 魏 车马具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高8.8厘米，长13.7厘米，管径4.8厘米

这件铜轅饰呈马首型，其头、颈错金饰卷毛纹、鳞纹，制作精美，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辉县固围村大墓是形制规模很大的“中”字形墓，周围有陵园，类似诸侯陵墓的规格。出土的车轅饰异常精美。



《孙臆兵法》残简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

《孙臆兵法》是用隶书抄写于西汉前期的久已失传的战国兵家名著。已清理出残简223枚，计5985字，包括“陈忌问垒”、“禽庞涓”、“客主人分”、“将败”、“月战”、“将义”、“五共”、“五名”等十六篇。



秦在商鞅变法后，不断对魏发动战争，向东扩张领土。从前330年开始，它先后夺取了魏的河西、皮氏（今山西河津西）、汾阴（今山西万荣北）、曲沃（今山西曲沃）、蒲阳（今山西永济），又通过说士张仪说服魏向秦献出上郡十五县和河西重镇少梁（今陕西韩城南），控制了黄河天险，打通了东进的道路。

在秦不断东进和齐、楚不断向中原逼近的形势下，各国的辩客说士开始了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合纵”，简单说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即几个弱小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强国；“连横”，简单说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即依靠一个强国攻打那些弱小国家。前323年，公孙衍约合韩、赵、魏、燕、中山五国合纵抵御齐、秦、楚，秦则利用魏与齐、楚的矛盾，派张仪拉拢魏连横攻齐、楚。前318年，公孙衍约韩、赵、魏、燕、楚五国，以楚怀王为纵约长，联合攻秦，结果

被秦打败。这是合纵诸国联合对付秦国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

齐战胜魏以后，因燕王哙让位于子之，燕国发生内乱。齐宣王以为燕国平叛为名，命匡章率兵攻燕，五十天便攻下燕下都，并一度灭亡了燕国。齐的暴行引起燕人的强烈反抗，齐后来不得不又恢复燕国。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鼎和传世的陈璋壶都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

前316年，秦国灭蜀、巴，控制了今四川大部，接着又兼并了义渠的土地，版图向西和西南有了很大的扩充。

在秦、齐对峙的局面下，地处中原的魏、韩两国成了两家争夺的对象，而南方的楚则成为两家争取的首要目标。秦想笼络楚以破坏齐、楚纵约，齐则要争取楚而破坏秦、楚联盟。

为了破坏齐、楚的纵约，秦让张仪劝楚与齐绝交，答应绝交之后献给楚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图小利而与齐绝交，但张仪却否认有给楚商於之地六百里的约定。楚怀王大怒，大举攻秦，秦于丹阳（今河南淅川）大败楚军，并侵占了楚的汉中，使关中与巴蜀连成一片。之后，楚倾全国之兵攻秦，秦与齐联军大败楚军于蓝田（今湖北钟祥西北），从此楚一蹶不振。

前301年，齐国孟尝君联合韩、魏伐楚，在垂沙（今河南唐河境内）大败楚军，夺取了楚的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等地。前298年，齐、韩、魏联军伐秦，攻入函谷关，逼迫秦求和。之后，三国联军又伐燕，大胜燕军于权（今河北顺平西北），齐国势力大振。

前294年，秦将白起重创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歼敌二十四万，紧接着又攻占韩之宛、邓（今河南孟县），逼迫



陈璋壶

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

通高24厘米，口径12.8厘米。壶束颈宽肩，腹渐收，圈足，饰错金、错银云纹，外套铜丝网套，由梅花钉和卷曲的龙交错套扣而成，中部一筛，上铸四组兽首衔环和兽形耳。口沿内侧有铭文11字，圈足外有铭文29字。记载该壶原为燕人所作的容量单位。齐宣王五年，齐国以为燕国平定子之之乱为名派陈璋攻燕，获得了这件铜器。

韩，魏割地求和。

一系列的合纵、连横战争，使齐、秦成为称霸中原的两强。为了显示他们的强大，前288年，秦、齐同时称“帝”，以示他们的地位至尊，在“王”之上。这是兼并战争中合纵、连横进一步加强的表现。

（三）齐赵削弱

齐，秦称帝后，苏秦从燕至齐，替燕昭王活动。他力劝齐取消帝号以争取天下诸侯，并怂恿齐伐宋。他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想使齐四面受敌，以减轻齐对燕的压力。齐缙王中了苏秦的计策，去帝号，并于前286年灭宋，结果引发了秦昭王约合五国伐齐的战争。前284年，苏秦约合齐、赵、韩、魏、燕五国伐秦，秦被迫取消帝号，但齐的力量损耗也很大。

前284年，燕昭王乘齐连年战争疲惫之机，联合秦、楚、三晋大举攻齐。燕将乐毅攻入齐都临淄，接着长驱直入，攻下除莒和即墨以外的七十余城，齐国几乎灭亡。后燕昭王死，惠王即位，他猜忌乐毅，改用骑劫为统帅。骑劫残暴无能，引起齐人的坚决抵抗。齐即墨守将田单以火牛阵大败燕军，收复失地，迎接齐襄王入临淄。不过，田单虽复国，但齐实力大损，已无力与秦抗衡。

齐力量衰弱之后，与秦抗衡的中原国家只剩下赵国。赵武灵王于前307年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成为一时之强。赵惠文王即位后，任用乐毅、廉颇、蔺相如、赵奢等，整顿赋税，加强外交，折服强秦，使赵成为东方的强国。前270年，秦攻赵之阬与（今山西和顺），赵奢趁秦军不备以奇计大破

秦军。

前266年，秦昭王任用范雎为相，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把兼并的重点放在三晋。前262年，秦夺取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使韩上党郡与本土隔绝。韩原想把上党献给秦求和，但上党郡守却投降了赵国。秦和赵为争夺上党而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

赵派名将廉颇屯兵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秦派王翦攻打长平，廉颇坚壁不出战三年，意在以逸待劳，消耗秦军力量。秦军进攻不得，施反间计说廉颇将要降秦，还说秦最害怕让赵奢的儿子赵括统兵抗秦。急于取胜的赵孝成王中计，派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赵括一改廉颇坚守不出战的策略

为冒险出击。白起分兵两路把赵军吸引到秦军壁垒前包围，断绝其粮道。赵军筑垒坚守，被围困四十六天，因弹尽粮绝被秦歼灭，投降的四十多万赵卒全部被坑杀。

前258年，秦军包围赵的首都邯郸，诸侯援军畏秦不敢前进。后来，魏公子信陵君盗窃了魏王调兵的虎符，假传王命，魏军才解了邯郸之围。但赵国军事主力已被彻底摧毁，再也没有了竞争之力。

南方的楚此时也每况愈下。前278年，白起攻占楚都郢，楚顷襄王被迫迁都陈，后来又迁都寿春，已没有能力再去和别人争锋了。

中山王方壶

1977年河北平山三汲乡出土，高60.8厘米，宽35.2厘米。壶鼓腹缩颈，盖上有四个云形钮，肩部饰四条透雕夔龙形饰件，腹部有一对衔环铺首，四周契刻铭文40行445字，记载中山王卬十四年，命相邦卿用燕国精铜铸造彝壶，“以飨上帝，以祀先王”，并表示要继承先王遗训，传之子孙。铭文记载伐燕取得成功，受到周天子和中山王的奖赏及诸侯的祝贺，并说燕王哙让位于子之“上逆天，下不顺于人”，告诫后世子孙万万不可效法燕王哙。



（四）秦并六国

长平之战后，秦与山东六国形成了对峙局面。秦越来越强，六国越来越弱，兼并六国只是个时间问题。

秦昭王至秦庄襄王时期，秦灭亡了鲁、卫、东周，迫使韩、魏成为其附庸，在南方控制了巴蜀、汉中，黔中、巫郡，幅员已相当辽阔。

前247年，庄襄王死，秦王政即位。前237年，秦王政执政，任用法家李斯、尉缭等制定各个击破的策略，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战争。

前230年，派内史腾灭韩，在韩属地建立颍川郡。

前229年，派王翦破赵邯郸，建立邯郸郡。赵公子嘉逃跑到代（今河北蔚县）。前222年灭代，建立代郡。

前229年，派王翦攻燕，次年攻下燕都蓟，燕王喜迁都辽东。前222年，派王贲攻辽东，俘虏燕王喜，建立辽东郡。后又在燕地建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上谷郡、广阳郡。

前225年，派王贲攻魏，魏亡，在魏东部建立杨郡，在魏旧地建立泗水郡。

前224年，派王翦率大军破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前222年，平定楚江南地，建立会稽郡，楚亡。灭楚后，又建立九江郡、长沙郡。

前221年，派王贲率军破临淄，俘虏齐王建，齐亡，建立齐郡和琅邪郡。

到前221年，秦先后灭亡了韩、赵、燕、魏、楚、齐，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秦灭亡六国后，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秦王政更号为始皇帝，“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起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

长23.2厘米至27.8厘米，宽0.5厘米至0.8厘米

共53支。分上下两栏，逐年记载了秦昭王元年（前306）至始皇帝三十年（前217）间秦国的大事，同时记一个名叫“喜”（推测即睡虎地11号墓墓主）的人的生平。《编年记》所载秦国史事，大多数同《史记》记载一致，有一些简文记事比《史记》详尽，还有一些简文内容史籍失载，对研究秦的历史有很重要的作用。

秦统一中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饱受战争灾难的各国人民的需要。诸侯各国的变法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规划了蓝图，春秋战国以来各族人民的融合也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民族基础。

秦与其他六国相比，王位纷争较少，国家比较稳定。它历史上没有实行过严格的宗法封建制度，因此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然而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却远远超过山东六国。秦国奖励耕织、奖励军功的政策，很快使国富民足，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大提高。加上秦地理位置独特，便于攻守，在对外政策上，秦善于利用对方的矛盾和弱点，扬长避短，克敌制胜。所以，秦统一中国，不是侥幸，而是势之必然。

第二章

经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政治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也是社会经济大转变、大发展的时期。西周以来宗法秩序的破坏，王室对诸侯统驭的失控，为大国争霸和各国土地兼并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而兼并战争的加剧和发展，又推动了各国经济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一节 农业

一、铁器的发明和推广

生产工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铁器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转变，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先民很早就对铁的性质有所认识。

1972年和1977年，河北藁城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遗址中分别出土了嵌铸技术很高的陨铁锻制铁刃铜钺。虽然陨铁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但它毕竟使人类认识了铁的性质。

中国铁器的使用大概不会晚于西周春秋之交。《诗经·秦风·驺虞》中有“驺虞孔阜，六轡在手”的句子。驺是铁灰色的马，轡即“铁”字。马色如铁称驺，这说明铁在当时已是大家熟知的东西。《秦风·驺虞》是秦襄公时的诗。秦襄公在位当西周春秋之交，这说明至迟在西周春秋之交铁已是寻常之物。1978年和1990年，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早期秦墓和河南三门峡春秋早期虢国贵族墓曾分别出土铜柄铁剑，陕西凤翔雍城秦公大墓也出土了春秋早期的铁镢，可以证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春秋早期使用的铁都是锻铁，但《国语·齐语》记载管仲的话说：“美



铜柄铁剑

1957年甘肃灵台景家庄出土此剑柄、鐔相连，皆用青铜铸成，两面有对称纹饰。剑叶铁质，残长9厘米，宽3厘米，厚0.3厘米，焊接于铜鐔上。铁剑叶全部锈蚀，从铁锈上可以清楚看出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这是中国迄今发掘出土的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证明至迟在春秋早期，中国已经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

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钁、夷、斤、鬲，试诸壤土。”“美金”指青铜，“恶金”指用来制造硬度很高的农业工具的铸铁。如果这个记载可靠，春秋早期也应该有铸铁。

古代文献中有一些关于春秋冶炼铸铁的记载。如《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吴国用三百童女童男“鼓橐装炭，金铁刀濡”，即用皮制的风囊鼓风，用炭火熔化铁溶液铸造宝剑。《老子》中也用炼铁的鼓风设备“橐籥”来比喻天地之间的“道”。这说明春秋晚期吴楚各地已比较广泛地采用了铸铁冶炼技术。不过当时铁器的主要用途是兵器和手工业生产工具，农具并不占主要地位。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证明这一点：春秋晚期和战国

早期墓葬中发现的铁器主要是剑一类的兵器和铁铲、铁锤、铁凿、铁铤等手工业工具，锸一类的铁农具虽有发现，但数量很少。

战国中期以后，铁器的使用得到广泛的发展。《管子·海王》：“（齐国）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铤。”这说明家庭妇女裁剪、纺织，农民种地，都离不开铁制工具。《孟子》中也说当时的人们基本上都是“以釜甑爨，以铁耕”，这说明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在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已普遍地发挥着重要作用。田野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的铁器，绝大多数是战国中后期的墓葬或遗址中所出，出土范围遍及当时的秦、韩、赵、魏、

金鐔金首铁剑

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长38.7厘米

此剑剑身为铁质，已经锈蚀。剑鐔及剑首为金质。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少数春秋时期铁器之一。在铁剑上附以金质剑鐔和剑首，说明当时以铁作剑尚较为稀少珍贵，因而受到特别的重视。



战国铁器出土地点分布图



双镰范

战国 燕

1953年河北兴隆古洞沟出土
长32厘米，宽11.3厘米

此范系单范，背后有弓形把手，一次可铸两镰。

楚、齐、燕七国境内，北方的胡貉、南方的百越地区也有发现。各地出土铁器数量已超过千件，而且多是成批量地发现，器类包括农具、手工业工具、兵器和杂器，但以农具、手工业工具为大宗，种类有犁、铧、镢、铲、

锄、镰、鋤、耙、掐刀、削、凿、铍、斧、刀等。其中著名者，如燕下都22号遗址1964年发掘出铁器64件，44号墓1965年发掘出铁器79件，均以铁农具为主；辽宁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出土铁农具80余件；河南辉县5座战国魏墓填土中发现铁农具58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北兴隆古洞沟燕国冶铁遗址出土的一批制作农具和工具、车马件的铁范，计51副87件，其中铁农具范28副51件，占全部铁范的60%。这批铁范铸作精工，设计合理，令人惊叹。以铁双镰范为例，该范长32厘米，宽11.3厘米，背后有弓形把手，一次可以铸两把镰刀。这批范都标有“右廩”的字样，说明这里是燕国官方的一座铸作铁范的作坊，“右廩”是铸范工官的名称。而铁器





战国时期的铁农具

上左，铁锛

1950年河南辉县出土

上右，铁锄

1950年河南辉县出土

下左，铁镰刀

1958年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

下右，铁铧

1958年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

由官方普及推广，表明当时铁制工具已经成为生产工具的主导。

恩格斯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提高了开垦荒地的能力，便于深耕细作，推动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很快使石制、木制生产工具退出历史舞台，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一个大飞跃。

二、牛耕技术和兴修水利的发展

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带动了牛耕技术的发展，也为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

牛耕大概在春秋中期已经出现，但耕牛只有和铁犁配合使用，才能发挥出它的效

能，所以牛耕的普及和发展可能在春秋后期。古代文献中有一些反映牛耕发展的记载。如，《论语》中称耕牛为“犁牛”；《史记》记载孔子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国语·晋语》也有“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的话，说大贵族没落后，原来用来做宗庙牺牲的牛，现在变成了耕田的畜力，这反映出当时的牛耕已经很普遍。尤其《论语》把耕牛称为“犁牛”，说明牛耕的发展是和犁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是和铁器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古代人口稀少，荒地很多。牛耕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许多荒地得以开发。《左传》记载，春秋初郑国东迁时，蓬蒿满地，还是一片荒野，到春秋中期，原来的荒野已经变成繁华的商业中心；晋国南部边界，春秋初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荒

无人烟之处，后来得到开垦，变成了肥田沃土。这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真实写照。

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兴修水利的发展。

官方兴修水利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春秋时各国会盟的誓约中常有“无障谷”、“无壅泉”、“无曲防”（不要阻塞河谷，不要壅堵泉流，不要破坏堤防）等协调各国水利的条文，其目的是为了保障河流畅通，不使江河流经的国家遭受水旱之灾。春秋时各国都很重视水利灌溉，修建了不少著名的水利工程。像楚国令尹孙叔敖在今安徽寿县修建的芍陂蓄水工程，能灌溉稻田一万多顷；吴国从邗（今江苏扬州）至末口（今江苏淮安北）修建邗沟运河，沟通江淮的粮食运输，对发展当地的经济起了重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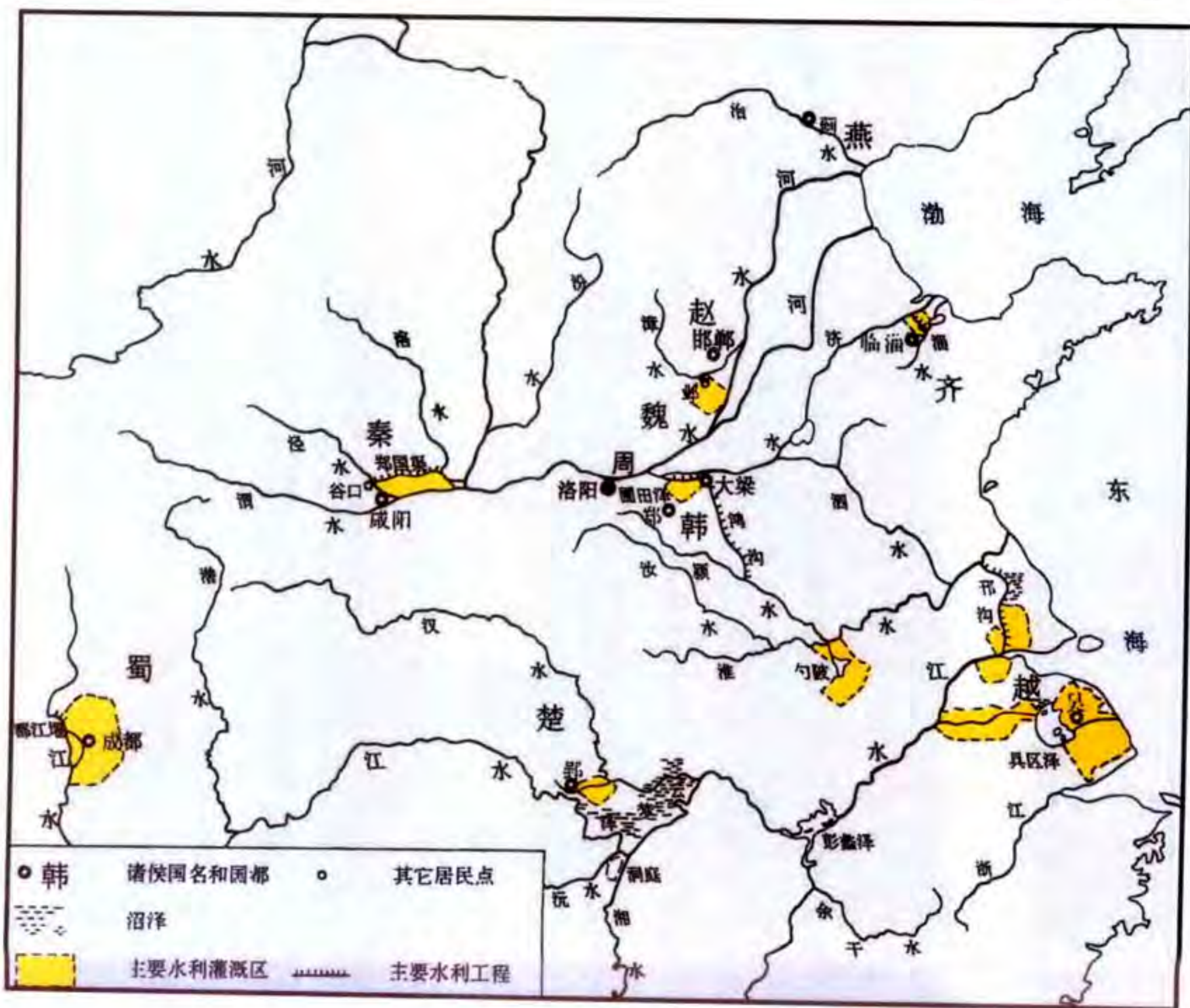
战国的水利工程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时期各国主要的水利工程有：

1、魏西门豹“引漳溉邺”工程。魏文侯

时，西门豹为邺（今河北临漳）令，主持治理漳水。他揭穿河伯娶妇的鬼话，打击“三老”、“大巫”、“廷掾”等邪恶势力，开渠十二条，引漳水灌田，既根除了水患，又把盐碱地改良成适宜种植的土地。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2、秦蜀守李冰父子主持修筑的岷江水利工程都江堰。这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岷江上游水流湍急，进入灌县后，地势突然转为低平，水势减缓，岷江挟带的大量泥沙沉积下来，淤塞河道，常常泛滥成灾。前256年至前251年，李冰父子采取引水灌田、分洪减灾的办法，凿开灌县西面的离堆，“中流作堰”，在离堆上游修筑分水堤和滚水坝，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滚水坝调节内、外江的水量，使内江流量保持稳定，专供灌溉；外江排泄洪流，免除水患。这样，都江堰就成了一个具有防洪、排灌、航运多种功能的综合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

战国水利工程分布图





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施工中李冰大量采取民间治水经验，就地取材，用竹笼装载石块，排列于易受水流冲击的堰边，保证堤堰的牢固；又于适当位置凿三个石人作为测量水位的标尺，随时测量水位，使水位保持在不低于石人脚、不高于石人肩的位置。此后，当地人民坚持李冰“深掏滩，低作堰”的管理原则，不断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它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

用。

3、秦修筑的郑国渠。郑国是韩国人，他受韩派遣到秦兴修水利，本来的目的是借此消耗秦的人力物力，减轻秦对韩的压力，结果却给秦造就了一大福利。郑国渠工程浩大，从仲山（今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水至瓠口，再从瓠口开凿运河，经今三原、富平、蒲城注入洛水，全长三百多里，是关中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可以灌溉关中平原四万多顷

都江堰

战国时期秦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的水利灌溉工程，位于四川灌县。这个工程有效地控制了岷江激流，变水害为水利，是古代有名的水利工程。



郑国渠

战国时期韩国水工郑国帮助秦国建的引泾水灌溉的水利工程。该渠灌溉关中大量田地，使关中避免了干旱，“收皆亩一钟（六石四斗）”。人们为了纪念郑国给他们带来的福泽，称这条渠为郑国渠。

土地。

春秋时期出现的提水用的桔槔，战国后期使用已很普遍。这种汲水器具减少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明。

三、井田制的演变

铁器的广泛使用、牛耕技术的推广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促使西周以来的井田制度发生了变化。

井田制是农村公社性质的经济制度。井田制度下，“公田”是由村社农民集体耕种的田，农民通过在公田上的集体劳动，以劳役地租的形式完成给国家的租税。而“私田”则是村社农民借以养家糊口的份地，由贵族定期重新分配，农民对它只有使用权而无占有权。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进步，诸侯各国之间的“隙田”和荒地得到开发，私田的面积逐步扩大。农民种植私田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而在公田上的劳动越来越不卖力，使得“公田不治”，荒草连绵，贵族收入减少，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最早改变剥削方式来增加国家收入的是齐国的管仲。他打破村社公田、私田的界限，

不再以集体劳动的办法让农民去耕种公田，也不再分给农民养家糊口的份地——私田，而是“相地而衰征”，按农民耕种土地肥瘠程度收取不同的贡税。后来有人把它总结为“履亩而税”，即按农民耕种土地的亩数收税。其具体办法是不再划分公田和私田，而是把贵族的全部土地按“一夫百亩”的数量分给农民去种，按农民实际耕种土地的亩数收取一成的实物地租，包括粮食、饲草、布帛等，还要服一定的劳役，以保障贵族的实际收入。这种剥削方式保障了贵族的利益，因而各国都先后采纳，像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前548年楚国的“书土田”、“量入修赋”，前408年秦国的“初租禾”，虽名称不同，但都是“履亩而税”性质的改革。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经济政策上的重大变化。

与“履亩而税”相关联的土地制度的变化，是“三年一换土易居”变成“自爱其处”。所谓“三年一换土易居”，是井田制下为保证每个劳力份地即私田肥瘠的平均，每三年要交换一次份地，同时居住的房屋也要随份地变化而搬迁。“自爱其处”以后，农民耕种的土地固定下来，以土地的数量来弥补土地的贫瘠：土质肥沃的地方每个男劳力分“一夫百亩”；土地贫瘠的地方，因为土地要休耕，每个男劳力分二百亩；更贫瘠的地方，每个男劳力分三百亩。这样，以土地的数量弥补土地的贫瘠，就能保证每个正常劳动力收成总量大体相同，同时也便于农民耕种和贵族管理。——这也是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当时为了加强对农民的管理，曾出现了名字叫“书社”的组织。书社把当地农民的户口、土地写在木版上，到时按版上登记的田亩数字收取粮食、布帛、饲草，规定服劳役、兵役的时间，这实际上是后来什伍组织的雏形。

铁犁头

1950年河南辉县出土



取消公田，村社农民的耕地相对固定，是对古代土地共有制度的猛烈冲击，引发了土地私人占有的欲望。随着各国贵族权利、财产再分配的加剧，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望越来越强烈。春秋末期，卿族专权，士大夫之间“分公室”、“夺室”、“分室”、“夺田”、“争田”的斗争愈演愈烈，原来诸侯国君的土地逐渐转移到势力强大的士大夫手中。各国当权者为了兼并战争的需要，也往往把土地随爵位封赐臣下，于是出现了大土地占有制。商鞅变法以后，承认土地买卖的合法性，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大土地占有较以前更加剧烈。

战国大土地私人占有主要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宗法贵族在新形势下的转化。他们把侵吞或“夺田”的土地据为己有，转化为地主阶级。一种是军功爵禄，“依军功而行田宅”，通过建立战功得到封爵而成为大地主。这是战国变法以后才出现的。《史记》记载，公叔痤为魏将，因为有军功，魏王赏赐他田地一百四十万亩。经公叔痤推荐，还赏赐给吴起后人田地二十万亩。这都是军功爵禄的实例。再一种是通过土地买卖而成的大地主。春秋以后，“田里不鬻”的礼法被打破，旧贵族、新官僚、大工商业主竞相买进土地。像赵国的赵括，把赵王赐给他的黄金、丝帛放在老家，一发现有便宜的田宅就买下来。一些工商大富，也以“末（末业，即商业）”致富，以“本（本业，农业）”守之，买大量的田地以为产业。这些人都成为战国时期地主阶级统治的骨干力量。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也占有少量的土地，他们的土地大多数是从井田制的演变中得到的。他们中有一部分因为开垦私田而成为地主，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因为天灾人祸变成无地农民，甚至“无置锥之地”立足，

只好依附地主，成为佃农，或沦为雇农，这是农民阶层的最下层。

第二节 手工业

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春秋战国手工业的发展，使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越来越扩大。

“工商食官”即由国家设置职官管理和经营手工业是商周以来的手工业传统。春秋初期还保持着这个传统，盐铁、兵器和贵族需要的各种工艺品如礼器、车马器、丝绸、服饰等，都由各级工官管理的工匠或工奴制作。春秋中期以后，官府手工业继续发展，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开始出现。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以生产人们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车工、陶工、皮工、木工、冶金工等），他们在自己家里或市场的作坊店铺里从事生产，自产自销，一般规模较小。文献记载中以技巧闻名的公输般（鲁班）就是这样一个独立手工业者的典型。

战国以后，国家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个体手工业都很发达。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大多在各国国都或大的工商业城市。官营手工业产品一般铸刻有监造者（一般为手工业管理机构的主官）、主造者（具体制作部门的职官）、制造者（技术工匠或工奴）的名字，以供检查。

大规模的民营手工业多是“豪民”即在社会上有很大势力的大富豪经营的盐铁、丹砂等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工矿部门，工人大部分是流亡的贫苦农民或被雇佣的工匠和工奴。由于民营手工业较之官营有更多的主动性，劳动者较之官营也有较多的人身自由，所以战国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很快超过了

官营手工业。

一、青铜器铸造

青铜器铸造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青铜器的鼎盛时代是商周，但到了春秋，其造型和工艺水平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商周青铜器分为食器、酒器、乐器、兵器、杂器等种类。食器、酒器一般称礼器，礼乐器主要用于祭祀，是贵族身份的象征，所以考古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多是王室或王室大

臣的重器。商代青铜器厚重、雄浑，纹饰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和商人的神权政治有关，“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代强调礼治，常常在礼器上铸造长篇颂扬祖先和作器者功业的铭文，风格亦趋向洗练、典雅、端庄，这是理性文化发展的表现。

春秋以后，王室衰微，诸侯称霸，青铜器开始从王室垄断中解放出来，王室、王臣的器物明显减少，诸侯的器物明显增多，器形亦突破西周的传统开始向轻薄灵便和工整细腻的方向发展。从考古发现情况看，春秋

莲鹤方壶

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墓出土

通高126厘米，口长30.5厘米；口宽24.9厘米

壶盖饰双层莲瓣，莲瓣中有一立鹤，嘴微张，振翅欲飞。颈部有两个回首反顾的龙作双耳，腹部满饰蟠龙纹，并有四只带翼的怪兽蟠伏于腹部四角。圈足下有两个走兽作为支撑，造型极为生动。该器设计奇巧，制作精工，完全突破了商周以来铜器装饰的神秘风格，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中晚期以后的青铜器普遍采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红铜镶嵌等工艺。分铸工艺是器身与附件分别做模，最后把各部分铸件组合在一起浇铸，焊接成型的工艺。它便于铸造形制复杂的器形，同时使铸件的各部分连接坚固。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就是一件分铸成型的青铜器。该壶莲瓣形的壶盖中央有一只清新俊逸的白鹤，伸颈展翅欲飞，形象极为美观，造型十分复杂。春秋晚期还发明了失蜡法溶模铸造工艺。其铸造方法是先用蜡、油等做成器物的模型，外面涂上耐火材料拌成的细泥浆，使凝固成型。浇注铜液时，蜡、油遇热流出，铜液冷却后即

成为带有繁缛花纹的铸件。河南淅川春秋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铜鼎，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温冰鉴等，造型新颖，制作精工，都是失蜡法溶模铸造工艺的极品。

战国以后，青铜器的使用突破贵族礼乐器的范围而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用器物，如釜、扁壶、铜镜、带钩、建筑装饰件、车马器件等明显增加，青铜器的造型、式样较商周时期也有了很大变化，铜镶嵌、透雕、金银错等新工艺迅速发展。这标志着青铜器时代在让位于铁器时代之前又达到了一个艺术高峰。青铜器纹饰春秋以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商到西周前期，青铜器纹饰基

铜冰鉴

战国 曾 冰酒器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长宽均为76厘米，高63.2厘米。铜冰鉴整体为方鉴内套方壶的形式，上有镂空盖，盖身正中有方形孔，正好套住方壶口。方壶有盖，溜肩，下腹内收，底部有带穿的方足。鉴腹部和四角有八个龙形耳，龙头顶承八块接檐式铜饰，四足作兽形，四周外口沿均饰以镂雕或浮雕勾连云纹、蟠螭纹，异常精美。该鉴使用时壶内装酒，在鉴内放入冰块，可以阻止酒发酵变味。该鉴出土时带有长柄铜勺，是舀酒用具。





青铜尊盘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尊高30.1厘米，口宽25厘米，重8公斤；盘高23.5厘米，口径58厘米，重19.2公斤。尊是盛酒器，盘是盛水、盛食器。出土时尊置盘内，两件器物风格一致。

本上是以浮雕式的凶猛逼人的饕餮纹和夔龙、夔凤纹为主花，以云雷纹为底纹，主花上再刻画各式花纹，组成三层重叠图案。春秋以后，三层重叠花纹作纹饰的器物减少，器颈、腹部饰弦纹、窃曲纹、带状夔纹、鸟纹等轻巧清丽、新颖灵巧或细腻繁茂的图案多见。战国以后，青铜器装饰中有不少是用铜镶嵌、金银错制作的反映现实生活场景的图案，像贵族宴乐、农妇采桑、水陆攻战等，或单独成画，或组合成图，场面阔大，人物造型生动，反映出先秦造型艺术从表现神到表现人的转变，反映出战国艺术家出神入化

的创作技巧。

春秋战国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跟当时工匠艺人对青铜合金成分比例、性能、用途的精确掌握分不开。

文献表明，当时的工匠艺人已经对青铜器合金成分的比例、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并能人工控制铜、铅、锡的成分配比，根据不同需要制作性能不同的工具。成书于战国的《考工记》记载的“金六齐（剂）”可以看作是春秋以前青铜合金成分配比实验的科学总结。《考工记》说：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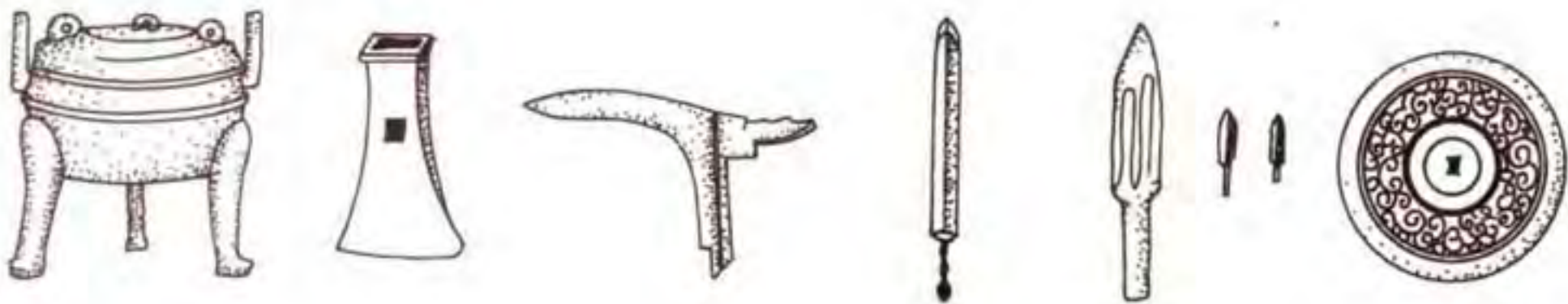
透雕蟠螭纹铜镜
战国 楚 照面用具
1976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战国墓出土
直径20.5厘米
全镜由银白色镜面和镂空透雕的镜背合成。小环纽可穿带子，纽外为镂空的蟠螭纹，屈曲联结，靠外缘又联结一圈镂空的菱形纹，异常精美。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制造业非常发达，因此楚地考古出土铜镜也较多。这一件铜镜可以看作是楚国铜镜的代表作。

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六齐”就是六种合金成分配比方法。“六分其金而锡居一”，是说铜、锡比例为五比一，即铜占83.3%，锡占16.7%，这是钟鼎一类大型器物的合金配比；“五分其金而锡

金六齐示意图

钟鼎之剂	斧斤之剂	戈戟之剂	大刃之剂	杀矢之剂	鉴燧之剂
铜 85.71% 锡 14.29%	铜 83.33% 锡 16.67%	铜 80% 锡 20%	铜 75% 锡 25%	铜 71.13% 锡 28.57%	铜 50% 锡 50%



人形铜灯

战国 照明用具

1957年山东诸城葛埠口村出土

高21.3厘米，盘径11.5厘米
器物整体为一双手擎灯盏状。人足下为屈曲的蟠龙，盏盘下有子母榫口与盏柄插合，可任意拆卸。此灯出土时还附一加油用的长柄铜勺。



错金银青铜龙凤案

战国 中山

1978年河北平山出土

近方形，长47.5厘米，宽47厘米，高36.2厘米

该案出土时漆木质案面已经腐朽，只有案面框架和架座。案面架座底以四只昂首卧伏的梅花鹿为足，上面驮一璧状圆环，环上立四条昂首露齿的龙。龙的双尾向后上方左右分开，尾尖回钩龙角。四条龙之间有四只凤，与龙缠绕嵌合。四条龙各自头顶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托住案面的方框。全器遍饰错金银云雷纹、龙鳞纹、凤羽纹和鹿斑纹，造型奇特，雕饰复杂，辉煌灿烂，是一件集雕饰、铸造、细工工艺于一体的杰作。该案上面的斗拱造型是中国传统屋檐建筑——四面出檐挑檐接工的缩影，给我们提供了较早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形象资料。



居一”，是说铜、锡比例为四比一，即铜占80%，锡占20%，这是斧钺一类器物的合金配比；“四分其金而锡居一”，是说铜、锡比例为三比一，即铜占75%，锡占25%，这是兵器一类器物的合金配比；“三分其金而锡居一”，是说铜、锡比例为二比一，即铜占66.6%，锡占33.3%，这是一些大刀器具的合金配比；“五分其金而锡居二”，是说铜、锡比例为五比二，这是箭头、刀削一类器物的合金配比；“金、锡半”，是说铜锡各占50%，铜镜阳燧采用这种比例。有的学者认为“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铜锡比例为七比一，即铜占85.7%，锡



嵌赤铜龙纹铜壶

战国 魏

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

通高52.8厘米

壶盖微隆，上有四个环钮。小口，长颈，斜肩，深鼓腹作卵形，圈足，肩两侧设铺首衔环耳。通体饰红铜镶嵌的各种形态的龙纹，或作几何形构图的抽象龙纹，或作凹腰拱背的爬行龙纹，腹底部为斜角对称的两头龙纹。纹饰的构图布局极为讲究，装饰工艺也非常精湛。

水陆攻战纹铜壶

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同出二器，形制、纹饰基本相同。一件高29.6厘米，口径54.6厘米，另一件高30.1厘米，口径54.6厘米。该器盘口，束颈，有肩，平底，圈足。有四个衔环兽耳。颈和腹部上下装饰三层红铜镶嵌的花纹，用两条凹形宽带分开。内容为水陆攻战的形象，其中有两军对垒，徒卒攻战，仰攻、投石，舟师对战等。全器共塑造了286个人物的形象。武士短装佩剑或带帻巾。攻击者跨步跳跃，持戟者左右防护，弓箭手弯弓搭箭，造型生动，形态逼真，反映了战国造型艺术的发展，也为研究战国时期的战争形式提供了可靠的形象资料。



占14.3%，按这种意见推论，则其下的铜锡比例依次为铜83.3%、锡16.7%，铜80%、锡20%，铜75%、锡25%，铜71.4%、锡28.6%，铜66.6%、锡33.3%。

这个合金配方，总结了青铜合金性能随配比变化而变化的规律，指导人们应用不同的合金配比制造不同用途的器具，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青铜合金的科学总结，在世界冶炼史

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考工记》中还有关于冶铜时观察火焰以判定冶炼火候的记载。炼铜的时候，先是冒黑浊的烟气，接着是黄白色的烟气，接着是青白的烟气，然后是青色烟气。到冒青色烟气的时候，就可以浇铸了。这是炼铜实践经验的总结。冶炼加热时，随着温度的升高，氧化物、硫化物和一些金属会挥发形成不同颜色的烟气。各种颜色的烟气挥发完毕，铜



嵌赤铜狩猎纹壶

春秋 盛酒或盛水器
1951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
高34.9厘米，口径10.9厘米
铜壶腹部饰以由双重结纽绳索形纹饰构成的十二个方格，上下两层，每个格内均用赤铜嵌出狩猎纹。狩猎纹中有人物和禽兽等图形，人手持长矛，与兽争斗。兽形可辨的有牛、象等，禽有奔走和飞腾两种。嵌出的赤铜纹极清晰。在铜器上用赤铜镶嵌图案，始见于春秋晚期，除燕国外，在代、蔡、赵等国铜器中亦有发现。

错金银团花纹流鼎

1981年河南洛阳出土
高11.4厘米，口径10.5厘米
扁球形，盖中心有一铺首衔环，器两侧附耳，有流，三矮蹄足。错金银纹饰，盖面及器腹饰四瓣花纹，边饰云纹带，耳、流足饰云纹。

锡中的杂质跑掉，精炼成功，才可以用于浇铸，所以现在人们还用“炉火纯青”一词来形容事物的精纯。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二、冶铁

中国青铜冶铸技术开始向精巧方向发展的时候，生铁冶铸技术也有了大的发展。

因为有青铜冶铸技术的借鉴，中国人工冶铁技术的发明不会晚于春秋中期。文献记载，春秋晚期，南方吴、楚已经使用铸铁柔化技术，他们“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鼓橐装炭”，制作干将、莫邪等宝剑，因此



我们不能对中国人工冶铁技术发明的时间估计过晚。

目前中国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较早的生铁冶铸器物，是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春秋初铜柄铁剑，江苏六合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铁条、铁块和湖南长沙窑岭楚墓出土的春秋战国间的铁鼎。经金相检验，铁剑、铁条系用块炼铁锻成，铁块、铁鼎则是白口铸铁。早期白口铁含碳量很高，硬而脆，不耐撞击，易毁坏，必须经过柔化处理后才能铸造坚固耐用的生产工具。这种柔化技术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在氧化条件下对生铁进行热处理脱碳，使之成为白心韧性铸铁；一类是在中性或弱氧化条件下对生铁进行石墨化处理，使之成为黑心韧性铸铁。考古证明，这两类铸铁柔化技术问题，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都已经解决。金相测定，湖北大冶铜绿山战国古

矿井出土的六角锄、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铁镢、河北兴隆燕国遗址出土的战国铸造农具铁范等，都是白心韧性铸铁铸件；河南洛阳水泥厂战国早期灰坑出土的铁铤和铁铲，则是黑心韧性铸铁铸件。在西方，白心韧性铸铁的生产技术1722年才由法国人首次记述，黑心韧性铸铁1831年才在美国研制成功，而中国在战国时期即已广泛使用，中外相比相差近两千年，中国古代文明的发达，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春秋时期已出现了炼钢技术。钢是一种铁碳合金，含碳量介于熟铁和生铁之间。早期的钢是以块炼铁为原料，在炭火中加热渗碳而成的，以后又发明了淬火工艺，使之更坚韧。1976年湖南长沙发现的春秋末期的钢剑，属中碳钢锻成；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钢剑，采用淬火工艺做成。这都是难得的文物。

战国中、后期，冶铁业遍及十分广大的地区，全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冶铁中心，如宛（今河南南阳）、邓（今河南孟县）、邯郸等，生产规模宏大。近些年来，中国在很多地方发现了大型冶铁遗址，如1960年河南新郑仓城村发现战国时郑、韩冶铁遗址，出土大批铸造铁器的陶范、残鼓风管、炼渣、木炭屑，冶铁遗址面积约2330平方米；1964年至1975年河南新城郑韩故城东城内西南部发现战国时的铸铁作坊，面积约4万平方米，掘出残铸铁炉一座、烘范窑一座，还有一批陶范及铁器；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镇古阳城遗址发现战国时的冶铁遗址，出土了熔铁炉残块、陶鼓风管残片、泥制鼓风管、木炭屑和大量陶范；1961年至1962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遗址发现铸铁作坊遗址三处，总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1953年河北兴隆寿正坟战国冶铸遗址出土铁质铸范87件和大量木炭

错金云纹鼎

1966年陕西咸阳出土
高14厘米，口径21.1厘米
通体以金银片错成几何云纹，盖顶饰莲瓣纹，环绕两周云纹。腹部瓣纹以下饰金银交错的三角纹。耳、足及盖上的三个环钮均有纹饰。



屑、红烧土，还在铸场西部1.5 公里的古洞沟发现两个古代矿井。此外还发现了山东滕县古薛城冶铁遗址，面积约13000 多平方米；山东临淄齐故城冶铁遗址，面积达40 余万平方米。

中国许多地区都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铁制工具，其中以铁制农具数量最多。这说明铁器发展以后，其主要用途就是制作农具，这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三、制陶

造型精美的青铜器是贵族的专用品，低阶层的士和城市居民、农民日常生活所用的器具仍以陶器、竹木器、骨器为主，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制陶手工业还非常发达。据考古发现，春秋战国大型城市遗址和聚落遗址中，制陶作坊都占一定的区域，像侯马晋故城制陶作坊达0.5 平方公里之大，陶窑密集，规模可观，说明制陶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的比例已相当大。

春秋战国时的陶器主要是轮制或轮模合制的泥质灰陶、夹砂灰陶、泥质褐陶、夹砂褐陶、磨光黑陶和彩绘陶，还有白陶和釉陶。器物类型主要有鼎、鬲、釜、甗、盆、豆、罐等日常生活器具和瓦当、筒瓦、方砖、下水管道等建筑材料或建筑设施，还有一些仿青铜器制作的陶鼎、陶簋、陶壶等，属于专门用来随葬的明器。

春秋战国时期陶器陶质细腻，造型庄重、华丽而又着眼于实用。这一时期陶鼎增多，陶鬲减少。陶鬲足根逐渐消失，演化成圆底的陶釜，陶豆也向浅盘高细柄带盖豆演化，陶罐的颈部增高向壶的形制发展。这一时期的陶器设计考究，方便使用。如作为炊具的釜，口沿做成外折或卷沿，以便于提拿；底部做成半球形，并拍印绳纹或麻布纹，以

便于放置。与釜配套使用的甗，则尽量做得尖瘦，使其能配合各种型号的釜。瓮、罐一类器物，则做得腹大口小，容量很大而又便于加盖封闭。其他饮食器具也尽量以方便实用为原则。

春秋时期的陶器以素面或磨光者居多（楚墓中随葬的日用陶器多为黑皮陶或黑皮磨光陶），带纹饰的陶器则多是拍印的绳纹、弦纹、几何纹、暗纹等，秦、燕墓葬中出土的仿青铜器陶礼器则多施彩绘。拍印纹大多是用刻花的拍板在陶坯未干时依次捺印而

朱绘兽耳陶壶

1964年北京昌平松园村出土
高70.2 厘米

此壶为泥制灰陶，陶胎呈深灰色，平盖，颈部四周有对称兽耳和兽面衔环铺首各一对。从颈到腹上方下圆，器身贴格状宽带成四开光，朱绘云纹和变形蟠螭纹，造型优美，是战国陶器的珍品。燕国类似的彩绘仿铜陶器在燕上都（今北京西南）、燕下都（今河北易县）周围多有发现，这也是燕国墓葬的一个特点。



龙梁瓷壶

1955年浙江绍兴漓渚出土
高18厘米，口径7厘米
此壶由加砂硬陶制作，圆口，斜肩，鼓腹，肩上有一龙形提梁，龙身有锯齿形脊背，以龙首为短流，底部有三个兽形蹄足。此壶胎质坚硬，薄釉，腹及盖顶饰指甲纹。是中国早期原始青瓷中的佳作。原始青瓷是汉代成熟青瓷的前身，汉代青瓷的主要产地是今浙江上虞、绍兴一带。目前，在绍兴附近已发现烧制原始青瓷的战国窑址多处，说明两者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成。春秋中期以后出现一种在适宜光线下能辨别花纹组织但又不露凹凸痕迹的暗纹陶，其制作原理是在陶坯未干时在器身表面用拍板等用力压印研磨，使陶质密度增高，烧成后表面呈现出发光的黑灰色，这是当时陶器的珍品。洛阳烧沟出土的战国陶豆、陶壶、陶鼎、陶盆上，大多施有网状、锯齿、S形的暗纹装饰，是战国暗纹陶的代表作。春秋战国时期，今浙江、福建东南沿海一带流行一种胎质坚硬、细腻，烧成温度较高，器表拍印几何形状图案的印纹硬陶。这种印纹硬陶商、周时已有不少发现，可以看作是商周印纹硬陶的进一步发展。彩绘、粉绘是在烧成的陶器上用朱红、土黄、白垩土和黑色颜料来绘画。所绘花纹多为蟠龙、蟠螭纹、鱼、龟、猛兽和几何纹、柿蒂等，图案讲究对称，装饰性很强。

当时陶器的最高成就是制作精美的白陶和带有晶莹薄壳的釉陶。白陶是以高岭土为原料，经高温烧制的胎质洁白细腻的陶器。釉陶是以某些天然矿物或植物（如烧碱、石灰、草木灰等）涂抹在陶坯上经烧制形成陶釉的陶器。釉陶用高岭土做胎，胎质灰白坚硬，表面挂有一层透明的青釉，烧成温度已在1230℃以上，吸水性极微，与粗瓷器化学成分相近，因而也被称为原始瓷器。釉陶在春秋战国遗址中发现较多（多与印纹硬陶出土地点相同或相近），尤以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江西、两广地区为最，像浙江绍兴、宁波等几十处墓葬和村落遗址中已出土了数以千计的原始瓷制品，绍兴、萧山、诸暨等地发现了几十处烧制原始瓷的窑址。这些地区当时都属于吴、越国的辖区。釉陶多是和印纹硬陶同窑合烧（印纹硬陶胎质与釉陶接

近，但表面不挂釉，只有均匀细密的拍印纹)，器形以饮食器为主，有豆、鼎、壶、尊、钵、碗等，成型方法主要是拉坯轮制，胎体上有均匀的螺旋纹，口沿经轮修，施釉一般采用刷釉法，装饰手法比较简单。釉陶中也有不少仿青铜礼器的陪葬品，庄重简朴，素净淡雅，器身附件和装饰手法均与青铜器特征相似。有学者说这些质地细密的仿青铜器青釉陶是中国青瓷的前身，故也称原始青瓷。

春秋战国时代的制陶手工业还生产大量的建筑材料或建筑设施，如瓦当、板瓦、筒瓦、瓦钉、方砖、透花砖、下水道管道等。这些建筑材料和建筑构件考古发现很多，结构坚实，制作精美，既有实用性，又有艺术性，为后世建筑材料的生产和发展提供了借鉴。

四、织绣印染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织绣和印染的国

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用麻丝制作平纹组合的布。商周时期，多彩织花的锦和把绘画刺缀在丝织品上的绣高速发展，各种丝绸染织也很发达，为后来中国成为丝绸大国打下了基础。

春秋战国是中国丝织手工业大发展的时期。据《禹贡》等书记载，当时兖州（今山东北部及河北南部）、青州（今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徐州（今安徽、江苏淮河流域）、扬州（今淮河以南地区）、荆州（今湖北、安徽、江苏沿长江一带）、豫州（今河南、湖北北部）都是有名的出产丝织品的地区。兖州的织文（彩色丝织物）、青州的縠丝（蚕丝）、徐州的玄纁（赤、黑二色丝织品）、扬州的织贝（贝纹丝织品）、荆州的玄纁（黑与浅红色两色丝织品）、豫州的纁纁（一种细绵），驰名海内，“齐纨鲁缟”，“冠带衣履天下”，可见当时丝织业的发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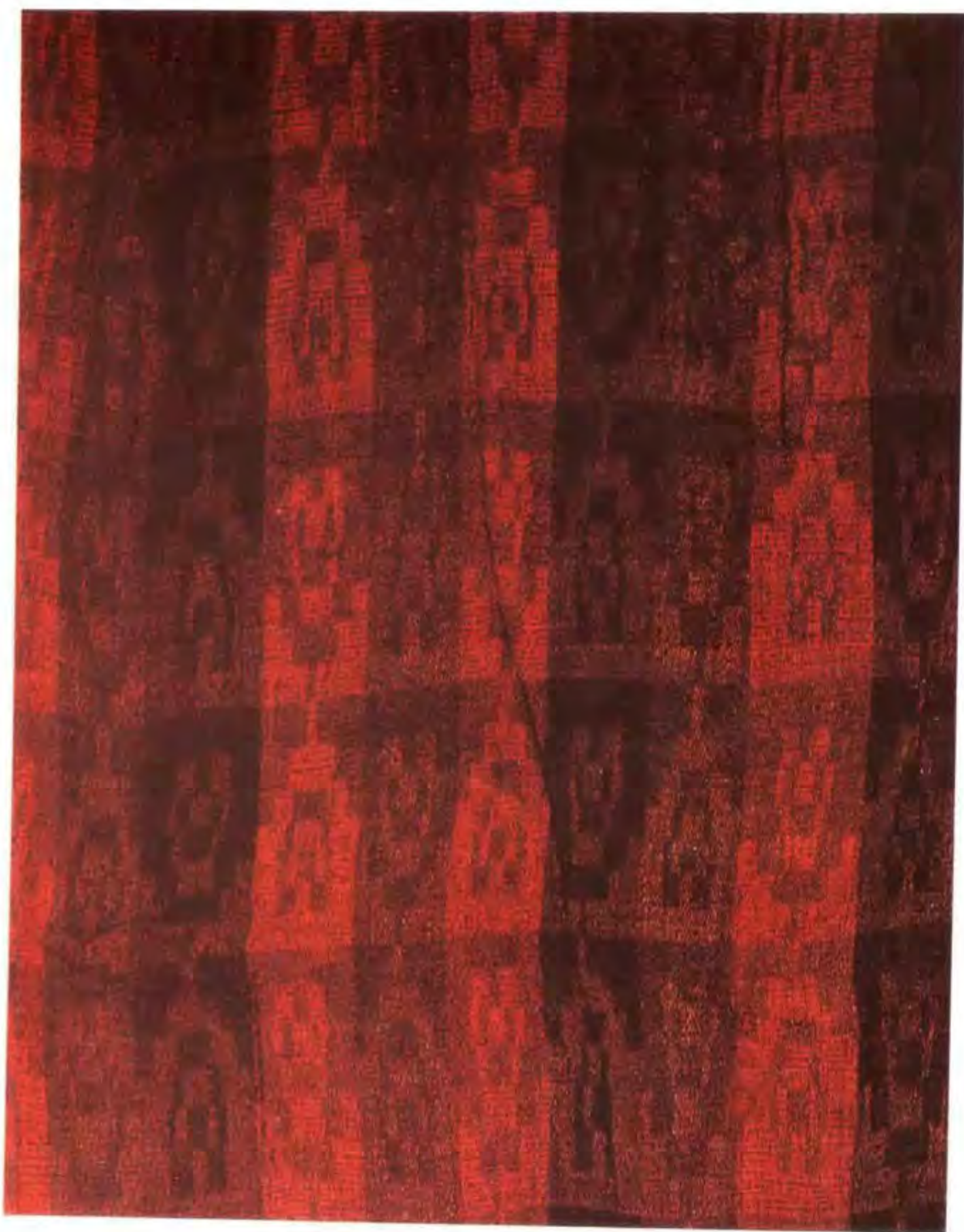
征诸文献，春秋战国时丝织品的种类已

动物舞人纹锦

战国 楚

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
幅宽50.5厘米，花纹经向长5.5厘米，纬向宽49.1厘米
这是一件三色锦，是经线起花的平纹重经织物。纹样横向布置，由按纬向排列的七组不同的三角形图案组成，以歌舞人物和龙、凤鸟及其他动物为主题。这种横贯通幅的提花纹样和织锦左侧一组图案的错综现象，反映出当时已经有成熟的提花织机和织造技术。





塔形纹锦

战国 楚

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
幅宽约49厘米，花纹经向长
3.7厘米，纬向宽1.4厘米至
1.6厘米

这是一件二色锦，由小方块
构成塔形的纹样。纹样顺经
线方向作条带状排列，并用
分区配色法，使相邻各条带
的颜色避免重复。

六边形纹绦

战国 楚

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
幅宽6.1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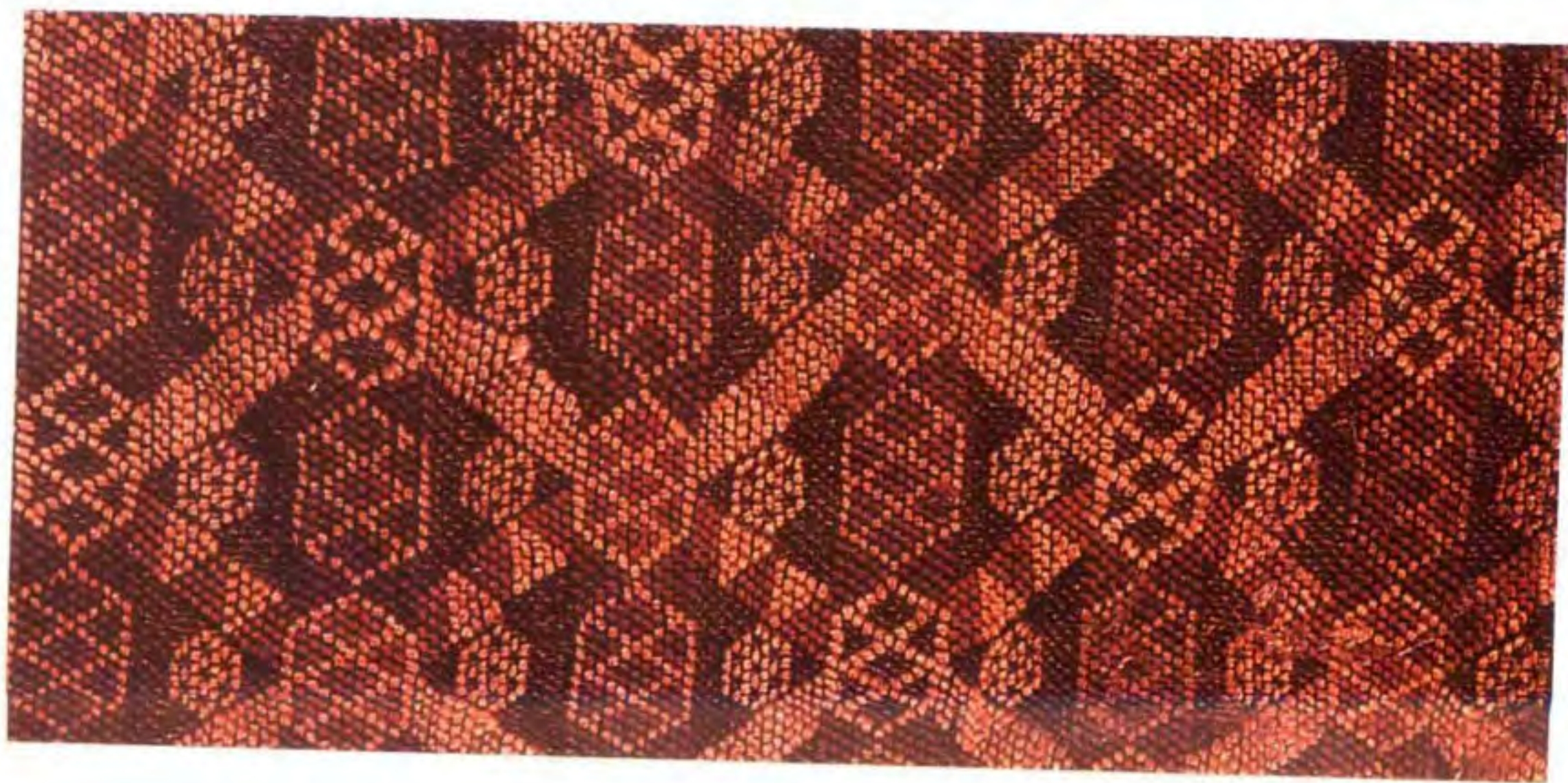
这是一件纬线起花绦，用作
袍的领缘。花纹由小六边形
组成，按纬线方向排列成
行。

经有缙、帛、素、练、縠、纨、纱、绢、縠、绮、罗、锦、绉、绡等多种，其中既有生织、熟织，也有素织、色织，而且有多彩织物。织物组织除平纹外，还有斜纹、变化斜纹、重经组织、重纬组织和提花技术，这在世界上

都是领先的。

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丝织品，大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中以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出土的丝绸为多。这些地区春秋战国时属楚，所以我们说目前能见到的周代的丝织品，大都是楚文化的遗物。1983年河南光山发现的春秋晚期黄夫人孟姬墓，出土了丝织品残片6件，其中有紫色绣绢2件、绢4件。2件紫绢，质地均匀，绣窃曲纹，锁绣针法，由三色或四色线绣成。有人说此类紫绢可能就是“齐冠带衣履天下”的“齐紫”。4件丝绢中，3件为纬重平组织，经线多为双根，1件为细绢，织造均匀紧密，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82.5根×43根，是中国纺织史研究中难得的实物标本。

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了丝织衣物19件，计绵衾3件、夹衾1件、绵袍8件、禅衣3件、夹衣1件、禅裙2件、绵禅1件，此外还有棺罩、帛画、席囊、镜衣及木俑衣服等丝织品，被誉为“丝绸宝库”。这些衣物保存较好，绝大多数丝织物的质地精良，衣物的形状完整。其中开裆锦袴(裤)，是迄今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袴。这批衣物织物的种类有绢、绉、纱、素罗、锦、绦、组、绮、刺绣，色彩有朱红、绛红、浅黄、金黄、蓝、绿、棕、褐、黑、白等多种，织或刺绣





的图案有龙纹、凤鸟纹、动物纹、人物纹以及各式各样的几何纹，色彩纷呈，琳琅满目。该墓出土的田猎纹绦和二色锦（塔形纹、凤鸟几何纹、凤鸟菱形纹、条纹、小菱形纹、十字菱形纹锦等）、三色锦（大菱形纹、几何纹、舞人动物纹锦等），系用纬线起花和平纹底经线提花技术织成。在构图和色彩上，充分运用了分区配色和阶梯连续相结合的方法，使纹饰丰富多样，溢彩流光，显示出楚国高超的织作水平。尤其是舞人动物纹锦，纹样横贯全幅，织造时使用了143个提花综，其织作技术之繁复，令人惊叹。

刺绣古代称为“黼”，是用彩线按设计好的图案在织物上连缀出美丽的纹样的工艺。春秋战国湖南长沙左家塘楚墓、广济桥楚墓、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和马山1号楚墓，都出土过精美的龙纹、凤纹、动物纹、几何纹楚绣。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楚绣以绢和罗为地，用棕、红棕、深红、朱红、橘红、浅黄、金黄、土黄、黄绿、绿黄、钴兰等多色绣线，

采用锁绣的方法，刺绣出蟠龙飞凤纹、对龙对凤纹、龙凤相蟠纹、舞凤逐龙纹、飞龙舞凤纹、龙凤相搏纹、飞凤纹、凤鸟纹、凤鸟花卉纹、凤鸟践蛇纹、龙凤虎纹等纹饰，千姿百态，不拘一格，美不胜收。前苏联阿尔泰古代游牧民族贵族墓葬中也曾出土过战国时期的龙凤纹绣，其丝线纤维、花纹、刺绣方法与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的刺绣十分相似，可能是商人运到北方以后辗转贸易到更远的地区去的。

与纺织相联系，春秋战国时代的印染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时的染料主要是矿物颜料（朱砂、赭石等）和植物染料（“蓝”——蓝草，“红”——茜草，“绿”——苎草、栩、梔子等）。织物染色一般分煮、凖、暴、染四个步骤。煮，就是用水煮；凖，同练，把丝帛放在石灰水中除去表面的胶质、污垢；暴，就是用阳光暴晒；染，即染色。据《考工记》，当时对丝帛进行精练的过程十分复杂：练丝时先要把丝放在石灰水中七天，之后要放在

龙凤虎纹绣罗

战国 楚

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
纹样长29.5厘米，宽21厘米
绣地是四绞经素罗。纹样的主题是龙凤虎和蛇（小龙）争斗，斑斓的猛虎与一条大龙为一组，展开双翅的凤鸟与蛇（小龙）为一组，花草枝蔓把它们连接成菱形。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幅先秦时代的四神图，其中凤鸟为南方之神，虎为西方之神，龙为东方之神，小龙（蛇）为北方之神。



龙凤虎纹绣罗

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

离地一尺高的地方曝晒。白天曝晒，晚上要浸在井里，经过七天，完成精练。这叫“水涑”。还有一种方法叫“灰涑”：烧楝木成灰，和入水中，浇在帛上，把帛放在光滑的容器中，薄薄地涂一层蛤灰，每天拧干丝帛，晒干，再浇楝灰水。如是七天，完成精练。——从丝帛的这个精练过程，可以看出当时人对丝帛印染工艺流程是多么重视。

研究表明，1975年长沙左家塘楚墓中出土的两块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纹锦，其朱色彩条部分是用矿物染料朱砂染色的。朱砂是天然的硫化汞矿物。用朱砂作染料，首先要把它碾成细粉末，然后与胶液混合，制成类似乳剂的液体。染色时将精练的蚕丝浸泡到胶液中，使染料渗入丝纤维的缝隙。这样，蚕丝干燥后作经线配置，就能织成朱色的彩条。还有一种办法是将朱砂胶液直接涂刷在已纺织好的丝织品上面，这叫做“石染”。出土的楚丝织品中还有黄色、红色、棕色、褐色的纹饰，可能是使用植物染料“草染”而

成的。《尚书·禹贡》记载荆州产玄纁，玄是黑色，纁是用茜草多次浸染而成的红色。《史记·货殖列传》说：“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与千户侯等。”茜是茜草，卮是栀子。栀子的原料来源丰富，染色牢度良好，将栀子冷浸若干时间，加热煮沸，煎成橙黄色的浓汁，不用助剂（媒染剂）就能染色。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看，当时茜草、栀子等“草染”丝织品已经相当普遍。战国去汉未远，推测楚地出土的许多绢、罗、绸、锦中的淡黄、棕黄、金黄也应是栀子染色。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染织水平。

在丝织品上绘画，楚墓中早有出土，如1949年在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1973年在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都是在丝织品上绘画的例子，然而在用作衣服的丝织品上绘画却十分少见。20世纪50年代在长沙一座楚墓中曾出土一件皮甲，上半部分为皮质，下半部分为丝绸，丝绸上绘有纹饰。这可能就是古书上所说的



“画衣”或“画绩”。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还出土了两片称为“漆紵”的丝织品，是在方孔纱上涂漆制成。这种“漆紵”是做衣服的衬里使用的，髹漆的作用可能是使丝织品更加挺括。

五、髹漆

漆是人类掌握的少数几种天然涂料之一。在竹木器物表面涂漆使之美观而坚固耐用的工艺，称为髹漆。

商周考古中已发现不少漆器的残片或痕迹，像北京琉璃河西周燕侯墓、西安斗鸡台西周墓、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河北藁城台西西周墓都发现了木胎漆器用具、漆器用具残片和车具等的髹漆痕迹。春秋以后，髹漆器物使用的范围更加广泛，饮食器、家具、车马具、棺槨、葬具、兵器（盾牌、长兵器的木柄等）等木、竹材料的用具均用漆料髹饰，以加强其装饰性和坚固性。1972年山东临淄郎家庄东周墓曾出土大量彩绘漆器残片，其

中有一件绘有怪兽、屋宇、人物、花鸟等形象，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漆箱上绘有彩色的蟠龙、蟠螭纹，与青铜器上的花纹相似。

战国时期，髹漆工艺从成熟发展到鼎盛。此时漆器已成为当时生活用具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和陶器制品。从现有出土的成百上千的战国漆器看，其用途不仅包括日常生活所用的耳杯（羽觞）、盘、豆、樽、壶、鼎、勺等饮食器，也包括奩、盒、匣、匱、床、几、案、俎、衣箱、屏风等生活用具及家具，笙、琴、鼓、瑟、笙、竽、排箫等乐器，甲、弓、弩、箭箠、盾牌等武器，车、车盖、船等交通工具和棺、槨、木俑、镇墓兽等丧葬用具。此外，还经常用漆器来制造工艺品，如漆鹿、漆凤鸟等。如此门类众多的漆器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必然会促进其制作工艺的发展。再则漆器美观轻巧，方便耐用，质优价廉，市场广阔，这些优点也促使它走向成熟。

漆器的制作过程分成型和装饰两部分。

对龙对凤纹绣浅黄绢面衾

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长220厘米，宽207厘米衾面用五幅对凤对龙纹绣拼成，灰白绢里，对凤对龙纹由八对形态各异的龙和凤鸟构成，线条流畅，构图奇巧，洋溢着楚文化的浪漫色彩。

彩漆带流杯

湖北江陵包山2号墓出土
左高10厘米，径19.3厘米；
右高10.5厘米，径19.5厘米
左为彩绘凤鸟纹漆杯，身体
通饰一只凤鸟；右为彩绘龙
纹漆杯，饰有蟠龙纹样。



彩绘云纹漆方耳杯

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
左长18厘米，高6.7厘米；
右长18.8厘米，高7.1厘米
漆耳杯是楚墓中常见的酒
具，得名于杯口沿的附耳。
有人认为它就是《楚辞》中
的“羽觞”，意思是杯耳似鸟
翼或杯轻如羽。



彩绘云纹漆圆耳杯

湖北江陵沙冢1号墓出土
左长14.7厘米，高4.2厘米；
右长14.5厘米，高4.5厘米



彩绘云纹漆案

湖南长沙楚墓出土
古时人席地而坐，饮宴时以
漆案置放饮食器具。此器长
度几达1米，体积颇大。





黑漆朱绘凭几

战国 曾 乐器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高40.5厘米，长57厘米，宽10厘米

这件木制凭几通体髹黑漆，上绘朱漆花纹，造型美观。

鸳鸯形漆盒

战国 曾 日用器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通高16.5厘米，通长20.1厘米

木胎，通体成鸳鸯形状，头较长，无冠，短尾，体宽。颈有圆柱棒，连头插入器身，因此头可以转动。背附长方形盖，可开合。盖上浮雕龙纹。全身髹黑漆，体两侧绘朱漆，颈、胸部绘羽纹，两翅由圆点组成齿纹。胸部左侧朱绘撞钟击磬图像，右侧绘击鼓舞蹈图像。该器造型生动，姿态逼真，是典型的楚文化工艺佳品。据了解，我们现在用曾侯乙编钟进行演奏，就是受此盒撞钟击磬图的启发而用木棒撞击下层大钟的。

成型，就是制胎，可分为木胎成型、夹纻成型、皮胎成型、竹胎成型等。木胎成型即用木料作器成型，其中又分斲木成型、旋木成型、卷木成型几种；夹纻胎则先用木料、泥土做成模具，然后逐层用漆灰裱上麻布，干燥后除去模具，表面磨光，髹漆、彩绘，工艺流程跟现在的脱胎漆器相似；皮胎、竹胎是以皮和竹作器成型，主要用来做甲冑和

扇、席等。装饰，指在成型的器物上加以绘饰。战国时期的漆器绘饰，有彩绘、镶嵌、针刻、金银铜印、金银彩绘等，手法灵活，千姿百态。彩绘，即用毛笔描漆绘画，多是采用线条画和平涂画相结合的方法，描绘现实生活中的歌舞、狩猎、访友、迎送等场面，或者是驰骋想象，表现神话传说中的神怪龙蛇等形象；镶嵌，即在器物表面镶嵌云母片、蚌



漆绘虎座凤鸟架悬鼓

战国 楚 乐器

1965年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

通高139.5厘米，鼓径75厘米

鼓架为木胎。鼓座是两只相背卧伏的虎，两鸟相背，立于虎背之上，组成鼓架。鼓悬于两鸟之间，圆形。鼓身有三个铜环，分别系在鸟冠及两鸟尾之相连处。鼓架虎、鸟全身施彩绘，极其美观。楚国墓葬此类悬鼓多有发现，设计巧妙，造型生动，色彩斑斓，是楚文化的特色工艺之一。此类鼓架出土时往往同出一对鼓槌。



彩绘几何纹漆方豆

湖北江陵老洞口安岗2号墓出土

宽18厘米，通高39.4厘米
方形豆在铜器和漆器中均不多见。这件漆方豆上的几何纹样，大概是龙凤纹的变体，它以勾连、规整的线条构成二方或四方连续，别有一番意味。



壳等；针刻，是在髹好的漆面上用针或其他尖利工具刻出细如发丝的花纹线条；金银铜钏，是把金、银、铜制的钏器（金属做的圆圈）套在器物的口沿或底圈，起装饰兼加固的作用；金银彩绘，指描金描银等，有时还有贴金。

战国时期的漆器出土地点已发现近80处，其中以战国楚地或楚文化区（湖北、湖南、河南）发现最多，像湖南长沙刘家桥1号墓，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2号墓和天星观1号墓，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湖北随州曾



侯乙墓出土的漆器，不仅造型优美，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可观。其中享誉中外者，如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座屏、虎座凤鸟架鼓、漆鹿、漆镇墓兽，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凤鸟磐架、彩绘锦瑟，湖南长沙出土的漆车马纹奭、狩猎纹奭，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内棺神像和衣箱盖上的青龙白虎北斗图等，都是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齐、燕、秦、鲁、蔡、宗周、三晋、中山故地也有一定的漆器出土。

战国时期出产漆的漆园不少。《史记》记载，战国时期的漆园是由政府派人管理的，庄子就曾当过宋国蒙地的漆园吏。秦简《法律杂抄》中也记载秦国有对漆园进行评比的规定，如果漆园被评为下等，负责人要受处罚，可见当时政府对漆园的重视。

六、玉石雕刻

玉石雕刻是中国古代发达的手工艺之一，商周时代玉器雕作就很兴盛。文献记载，

周武王灭商，得旧宝玉“亿有四万”。殷墟妇好墓出土750件玉器，按用途可分为礼器、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几大类，其中动物



木雕彩绘漆座屏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

通高15厘米，长51.8厘米。屏座宽12厘米，屏面厚3厘米

屏面上透雕四凤、四鹿、四鸟和十五蛇、二十六鳞，或透雕，或浮雕，栩栩如生。全屏黑漆为地，施朱红、黄、深绿等颜色。动物造型生动，色彩斑斓，是先秦木雕彩漆工艺的精品。

双头镇墓兽

湖北江陵雨台山18号墓出土

高52厘米

头插真鹿角，长舌凸眼，造型奇特。这种镇墓兽只在身份较高的楚贵族墓中有发现。

造型有龙、凤、虎、熊、牛、鹿、狗、兔、鹰、鹤、鹅、鹦鹉等，姿态奇异，堪称佳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琢玉艺人不仅能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刻画动物的姿态，而且还能运用“俏色”技术因材施刻，如把黑色的玉料雕成鳖的背甲，相邻的白色则雕成鳖的头、颈、腹，这说明当时的玉雕技术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艺术修养。周代以后，玉雕制作有了新的发展，如陕西西安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玉鹿、牛、蚕、虎、兔、鱼、蝉、凤鸟等，形神兼具，制作精工，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

周代的玉雕分为祭祀用玉、朝聘用玉和佩饰用玉。祭祀用玉主要用于礼神、赂神、娱神，以带象征性的几何形的琮、圭、璧为主；朝聘用玉主要是用于朝聘结盟，以璧、璜、圭、璋为主；佩饰用玉主要是各种形状的小巧精美的玉件组合，这是一种能显示身份高低的装饰，故周人亦非常重视。除此之外，玉还经常用来殉葬。

周代用玉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诸侯、卿大夫、士在“吉、凶、军、宾、嘉”不同的礼仪场合，用什么形状、多大尺寸和哪些颜色的玉，礼法都有严格的限制。考古发现也

浮雕谷纹璧

湖北江陵包山2号墓出土
外径14.5厘米



有证明。周代佩饰用玉以前发现不多，近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诸侯一级组佩多套，其形制为多璜组成的圈状佩饰，璜与璜之间以玕珠相隔，两端各饰一璧，最长者达1.8米，用璜50余个。这么长的佩饰，是高级贵族参加重大典礼时表示身份和节步之用的。佩饰很长，有一定重量，在典礼仪式上只有稳步按礼的规范动作行进，才不至于把佩饰搞乱、搞坏，这样也才体现出贵族的仪则和风范。《礼记·玉藻》载：“趋于《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是说走路要小步，要符合《采齐》的乐章，平常步行，要符合《肆夏》的乐章。转身要中规，弯腰要中矩，往前走身体要稍稍前倾，往后走身体要稍稍后仰，这样才能牵动佩玉，使之互相撞击发出有节奏的乐声。这反映的大概就是贵族佩戴这种佩玉行进的情况。

进入春秋时代，随着日益激烈的社会变革，玉器的使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化的标志，一是玉器的使用越来越摆脱宗法礼制的束缚，减少了神秘性而加强了实用性；二

是人们对玉器的认识越来越重视其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佩玉成为玉器使用的主流。

春秋战国的玉器按类别也可分成礼玉、装饰用玉和杂器三大类。



谷纹玉佩饰

山东曲阜鲁故城遗址出土
玉璧径5.2厘米，玉管长4.6厘米，夔龙长11厘米，宽4.3厘米
佩由璧、珠、管、夔龙等11件玉饰串连而成。玉璧上部有方孔，可穿绳系于身上，下部两侧饰有夔龙，可分别穿绳系双行玉管、玉珠，再合股系扁形玉管、夔龙。夔龙回首、弯身、卷尾，头顶有角，身有圆孔。除玉珠外，皆饰谷纹，且有芽。



卷龙黄玉佩

战国 中山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长23.6厘米

玉璜

战国 曾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长10.3厘米,宽2.4厘米,厚0.3厘米

这两件玉璜为清白色,狭长微弧,中间和两端各有一对小穿孔,两面刻谷纹。该墓主棺出土玉、石、水晶、玻璃、紫晶等饰物528件。古代传说以玉随葬能使人的尸体不腐,这是该墓出土很多玉器的原因之一。



礼玉,主要指璧、琮、圭、璋等。不过这一时期的礼玉与西周时的礼玉在造型和使用上都有相当的区别。西周的璧、琮多为素面,严谨而凝滞。春秋的璧玉多装饰精美的勾连纹、云纹、蟠虺纹,战国时则流行细密的谷纹璧和镂雕璧,琮也多装饰云纹、窃曲纹。春秋战国时期圭、璋较多,用途广泛,不仅可以用来祭祀天地鬼神,还可以用来区分

贵贱等级,或用于朝觐、盟誓、婚嫁等。山西侯马盟誓遗址出土的盟书即多为圭、璋形式。另外,春秋战国时期璧、琮除了用于传统的祭祀,也经常作为吉祥物,用于朝觐、盟誓、婚嫁等活动。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大家熟知,在这个故事中,和氏璧是作为传国的宝物引起秦王觊觎的,秦王用十五座城池来换它,主要因为它奇货可居,并不在于它的礼玉功能。这说明礼玉的宗教性、神秘性已经减弱。

礼玉的宗教性、神秘性减弱了,灵巧多变、种类繁多的玉佩盛行构成东周装饰用玉的显著特色。

春秋以后,玉的物理属性渐渐被人们认识。讲究人格修养的儒家把玉的自然属性和君子的道德品质相联系,用玉的质地、光泽、硬度、纹理、音色来比喻君子仁、义、智、信、洁的美德,号召士人时时以玉的品性来鞭策自己、约束自己,“于玉比德焉”,于是出现了以玉修身、以玉润身的理论。“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佩玉之俗蔚然成风,于是琢玉的技术也日见精进。《诗经》里有很多描写君子

龙形玉饰

战国 曾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佩玉和以玉喻人的句子，都是当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写照。

从考古发现来看，春秋战国的佩饰用玉确实琳琅满目、典雅富丽，充满艺术的创造力和感染力。春秋战国的佩饰用玉主要有环、琥、珩、璜（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透雕玉璜）和各种各样的牌饰（如河南浙川下寺出土的春秋乳白色方形玉牌）、串饰、佩

饰（包括单独的玉佩和成组的组佩）及各种动物形玉雕，其中造型别致的独佩和配置和谐的组佩多为艺术精品，受到当时人的青睐。这种独佩和组佩出土不少，前者如蜷身回首形的龙佩、构思奇特的虎佩，后者如安徽寿县蔡侯墓、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江陵楚墓、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组佩，都非常精美。东周的组佩长短、构造、部件、组合方式都

云兽纹青玉璜

战国 魏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1号墓出土

长20.5厘米，宽4.8厘米

这件玉璜整体为透雕的七块玉以铜片贯联成一弧形璜。中间一块玉上有卧马，下有鼻钮。通体作龙纹及变形云纹，贯联的铜片露出的部分镀金作饕餮头形。璜是佩饰用玉，也经常作为朝聘、祭祀、丧葬的礼器，不过如此华丽的玉璜是很少见的。



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

战国 魏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1号墓出土

长18.4厘米，宽4.9厘米

带钩由白银制造，通体鎏金，钩身铸浮雕式的兽身和长尾鸟，兽首分列前后两端，长尾鸟居钩左右两侧，盘曲逶迤。钩身正面嵌饰白玉块三枚，玉块中心各镶一粒半球形蜻蜓眼式的琉璃彩珠，钩身前端镶白玉琢成的雁首形钩首，工艺十分精湛。



玉佩挂饰

战国 曾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全长48厘米，宽8厘米

主要由四块透雕的白玉石组合而成。玉块分别雕成以活动游环所连接的玉璧、龙纹玉琕、玉撇玉饰等形制，再用三个椭圆活环，将四部分接成一串，共十六节。活环上有榫头和铜销钉，可折叠、拆卸或变换次序重新组合，是战国玉饰中工艺精巧、组合多样的代表作。

很灵活，没有固定的模式，与山西晋侯墓出土的西周多璜组佩差别较大。河南信阳楚墓和湖北江陵楚墓曾出土过几件彩绘木俑，其所佩组佩与上述几个墓葬出土的组佩形式一样。这说明战国组佩主要体现的是装饰性和艺术性，较少束缚和限制。

除了上述的玉佩饰，春秋战国的装饰用玉还有精美绝伦的玉笄、玉带钩、玉串饰，以及很多实用的玉器用具如玉梳等，一些用于丧葬的玉琕、玉衣片、玉覆面等，后者是后世金缕玉衣或银缕玉衣的前身。

七、制盐、酿酒

盐、铁直接关系国计民生，自古以来就备受国家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盐业发达的地区主要是临海的齐国和燕国。齐有鱼盐之利，自太公望始封，就以商业立国，所以西周时齐发展很快。齐桓公时管仲改革，鼓励商贾贸易，放宽税收，齐得益甚多。文献记载当时齐以鱼盐为手段厚利笼络诸侯，“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稽而不征收”，以极低的税率让商人把齐国出产的盐运往诸侯各国，以求得到诸侯的拥护，可见齐国曾把鱼盐的流通作为其称霸的手段。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盐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齐国的盐业主要是海盐，燕国的盐业主要是辽东的煮盐。当时中原产盐的地区主要是晋国河东的盐池。盐池在今山西运城解州，因产池盐而得名。文献记载春秋时晋国曾经讨论迁都，一部分贵族就主张把都城从绛迁到土地肥沃而与盐池靠近的郇瑕氏之地。战国以后，盐池属魏，巨商猗顿在那里经营池盐致富，资财可敌王侯。

秦国蜀郡出产井盐。《华阳国志·蜀志》

记载，李冰做蜀守时，在广都（今四川成都双流东南）开发盐井，建立盐池，为西南地区盐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春秋战国时的酿造业也很发达。酿造业的主要产品是酒和醢（醋）。当时的酒是用黍或稻米酿成的米酒，酒精度低，含糖量高，故能多饮。《史记》记载淳于髡对齐王说，如果在大王面前饮酒，战战兢兢不敢失礼，只能饮一斗；如果男女同席，性情宽爽，可饮一石（十斗）。适量饮用酒精度低的米酒，可以营养、滋补身体。《礼记·檀弓》有“丧有疾，食肉饮酒，必有草木之滋养焉”的记载。春秋战国时的酿酒经验已很丰富，《礼记·月令》说，酿造好酒必须使用好的粮食和新鲜的酒曲，洗、涤、蒸、煮要清洁，水质要好，盛酒的陶器要精良，火候要适宜。《周礼》中还有辨别酒的种类和品质的各项规定，反映出当时酿酒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八、官营和民营手工业

“工商食官”，由国家设置手工业管理和生产机构是商周以来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还保持着这个传统，盐铁、兵器和贵族使用的奢侈品多由官营手工业生产。出土文物上常见的“大府”、“少府”、“左库”、“右库”、“少廩”等字样，就是国家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和府库的名字。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一般在各国国都或大的工商业城市。官营手工业产品一般有监造、主造和制造者之分。监造者一般为手工业管理机构的主官，主造者往往是具体制作部门的职官，制造者为机构管理的技术工匠或工奴。官营手工业有严格的产品质量检查制度，制作者要“物勒工名”，将姓名刻铸在器物上，以供检查。

春秋中期以后，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者出现。这些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



牺形铜尊

春秋 酒器

1956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

高29厘米，长31.5厘米

尊呈动物形，周身饰以云纹为主的花纹。此尊继承了西周以写实为主形态的传统，但尊口很大，为前所不曾见。

手工业者以生产人们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为主，他们在自己家内从事生产，或者在城市市场内设立作坊店铺，“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中国古代的市场由官府直接管理，市场中按一定顺序排列的出卖货物的店铺或作坊叫肆，肆内的手工业工人边生产边销售。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官府管理的工匠和工奴不同，他们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可以自由迁徙，一般是世代相承同一职业，独立从事手工业劳动，产品自产自销，通过交换满足谋生的需要。

春秋的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者一般规模较小，个体经营手工业者也主要是车工、陶工、皮工、木工、冶金工等行业。《墨子》等书中记载的“工肆之人”、“工人”大多属于这个阶层。春秋战国之际以技巧闻名的公输般（鲁班）就是这样一个独立手工业

者的典型代表。

大规模的民营手工业是战国以后才出现的。这些大规模的民营手工业多是“豪民”经营，主要集中在盐铁、丹砂等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工矿部门。

“豪民”经营的大型工矿手工业大多在深山穷泽。在这样的地方开矿，没有充足的资金不能启动，所以各国都采取由官府十抽其三的税率让财富众多的大富豪开发、经营。这些工矿的经营规模不低于官营手工业，经营者通过开发工矿取得巨大财富，被社会上称为“素封”，即不是通过封赏而是通过经营致富的大财主。其著名者像春秋末、战国初的猗顿在盐池开发池盐，战国郭纵在邯郸以冶铁成业，都富比王侯；赵国的卓氏，在秦破赵后去蜀，居临邛，到铁山“鼓铸”，成为有家童千人的巨富；秦王政时的寡妇

清，祖上以开发丹砂致富，寡妇清能守其业，受到秦王的表彰。

大型民营手工业的工人大部分是流亡的贫苦农民、被雇佣的工匠和工奴。由于民营手工业较之官营有更大的主动性，劳动者较之官营也有较多的人身自由，所以战国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很快超过了官营手工业。

第三节 商业

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的扩大。金属铸币的使用，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原来政治、军事据点性质的各国都邑，同时成为商贾辐辏的工商大都会。

一、商业的发展和大商人的出现

春秋之初，各国贸易仍保持着西周“工商食官”的传统，为官商所垄断。春秋中期以后，官商中的私人势力或私商的力量逐渐扩大，成为一支非常活跃的社会力量。

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郑国。早在春秋初年郑国初迁中原时，郑桓公就与商人订立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勾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意思是说，你们不背叛国家，我不干涉你的经营；你们赚得的珠宝钱财，我一概不过问。郑国一直坚持这个政策，所以郑国的商业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郑国商人的足迹遍布黄河、长江南北。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去周做买卖，在边境碰上偷袭郑国的秦军，弦高假托君命犒赏秦师，暗中派人急驰到郑国报信。秦以为袭郑的消息泄露，赶紧撤军。前597年，郑国商人去楚经商，想用货车把被楚俘虏的晋国大夫荀莹营救出来。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商人活跃的程度。

春秋中期，商人被列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一。齐国管仲改革，规定工商人口占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当时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当时的商人，包括专门从事远程贩运的“商”，也包括在货肆卖货的“贾”。不过，当时他们虽然很活跃，但社会地位并不高，甚至被贵族视为贱业。这是宗法封建制度重农轻商的表现。

春秋后期，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不少国家“毁关去禁”、“通商惠工”，取消了妨碍工商业发展的山泽、关隘税收，商人阶层更加活跃起来。中、小商人肩挑手提，服牛乘马，周游四方，卖出买入，以谋取利润。大商人则往来于列国之间，倒买倒卖，并趁机与各国当权的贵族勾结，干预国家事务。其中的典型是越国的范蠡。他帮助越王句践复国灭吴之后，迁移到齐国海滨经商，不久又迁到宋国的陶（今山东定陶），以陶为中心做买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另一个典型是孔子的弟子子贡，他转运货物发了大财，到一些诸侯国去，居然与国君分庭抗礼。这说明春秋后期商人的地位比以前明显提高。

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各国的都城和很多大城市都变成了繁华的工商都会。北方的犬马，南方的鸟羽、象牙、皮革、丹砂和铜锡、橘柚，东方的紫贝、鱼盐，西方的鹿牛制品和特种皮革，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据安徽寿县出土的楚鄂君启节记载，鄂君启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每次远出行商，水路可以动用船只150艘，陆路可以动用运输货车50辆，装载马牛500匹，动用挑夫脚夫上千人，可见当时大商人的吞吐规模。

随着商业的发达，经商理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所谓经商理论，就是把军事、政治经验运用到经商中去，因时取舍，贱买贵卖，

以牟取暴利。战国初周人白圭是一个大商人。他通达权变，有决断，有胆略，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丰收之年买进谷物，卖出丝、漆；茧熟季节再买进丝帛，卖出粮食。一旦瞅准时机，便像猛兽鸷鸟一样飞快出击，大出大入，取得了巨大的利润。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是另一类典型。他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通过贩贱卖贵，积累了大量的财产。他对父亲说，耕田可获利润十倍，贩卖珠宝可获利润百倍，但扶植起一个君主，获得的利润可以无数倍。他精心谋划，囤积居奇，把商业投机的手段运用到政治上，全力扶持原来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登上王位，自己出任相国，一度掌握了秦国大权。还有一位叫倮的乌氏（在今宁夏固原东南）人，他卖掉大批的家畜换取精美的丝绸，把丝绸献给戎王，戎王赏赐给他十倍的家畜，从此倮成为巨富，并登上政治舞台。

商人把政治经验运用于经商，或以财富换取政治地位，走的是官商一体的道路。这个特点对后世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二、金属货币的广泛使用

商周宗法封建制度下的贸易，多是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春秋晚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这标志着春秋晚期工商领域已逐渐摆脱宗法封建制度的控制与束缚，在新的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

目前我们发现的春秋晚期的金属铸币，主要是铸造或流通于周王畿或三晋地区的铜空首布。这是一种由农业工具铲演变而来的金属货币。此外还有燕、齐地区不同形制的铜刀币。其出土地点主要有河南洛阳（雒邑东周王城）、山西侯马（晋新田故城）、河北易县（燕下都）、山东淄博（齐都临淄）等地。

耸肩尖足空首布

春秋 晋 货币

1959年山西侯马晋国故城遗址出土

通高12厘米，肩宽4.8厘米。铜铸，空首，耸肩，尖足，素面，背有三条垂针纹，上铸“□黄”字样，一足残缺，连同空首内残存范土重30.7克。这是目前考古发掘年代最早的布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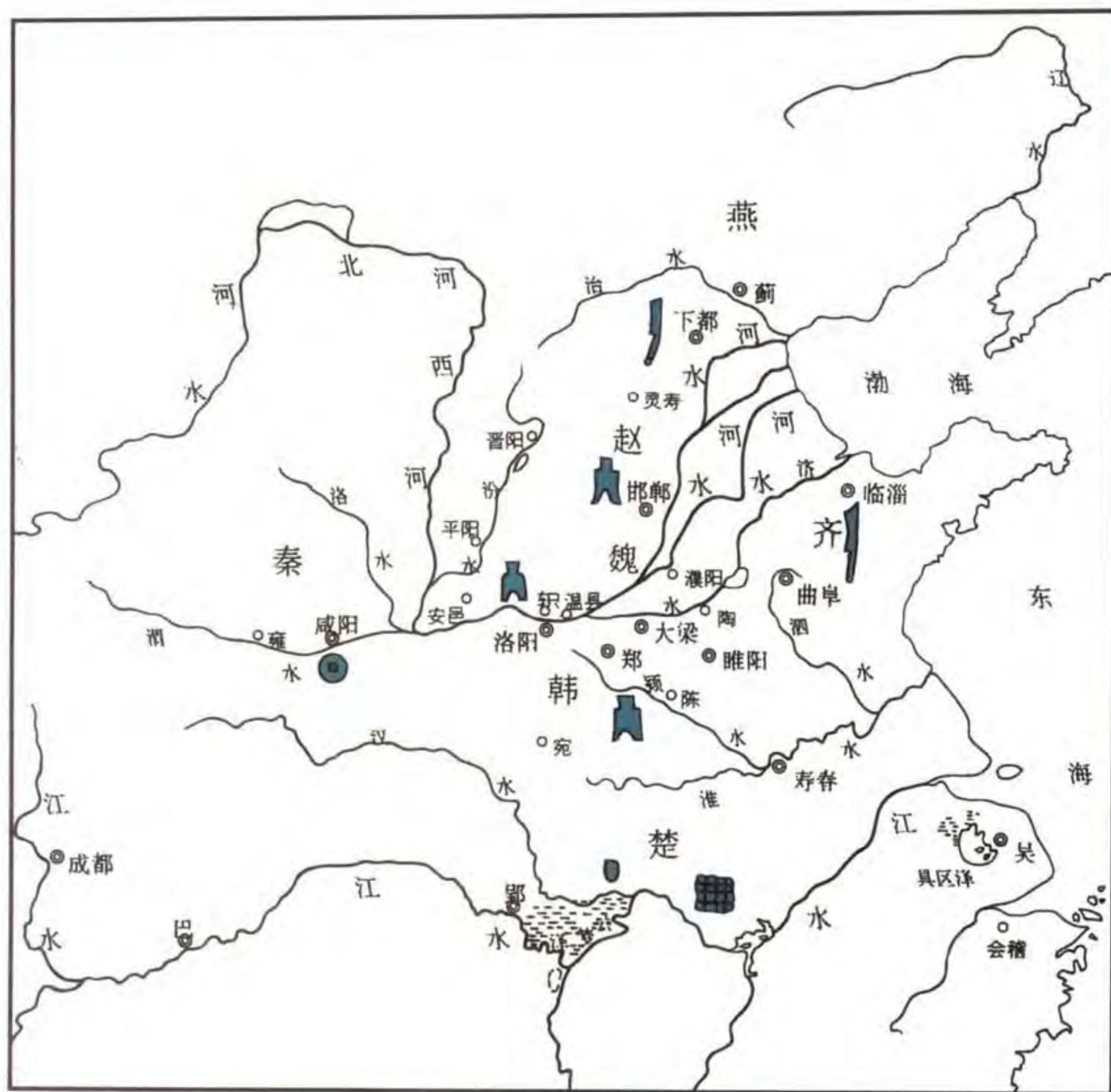


战国货币流通图

战国时期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铜铸币和黄金。铜铸币分布、刀、圆钱、贝几种。布币主要流行于韩、赵、魏“三晋”和周。刀币主要流行于齐、燕，圆钱主要流行于周、秦及赵。魏两国沿黄河地区。铜贝币主要流行于楚，金币主要流行于楚，分饼金和金版两种，金版多钤印印记，有“郢爰”、“陈爰”、“卢金”等。

平首布

与空首布相比，首不再中空，已经摆脱了初期铲鍬的影响，只留下一个平片以保持布（铲）的形制，故称名。平首布的类型主要有平肩桥裆方足布、方足布、尖足布、圆足布和狭长的方足布。前四种主要流通在赵、魏、韩、周、燕等国，种类繁多，后一种是楚国铸行的货币。至前221年秦统一货币时被废止。



《国语·周语下》有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铸大钱”的记载，由于其他文献和考古材料还没有确凿证据，对此还不能下明确结论。

战国时期，金属货币大量流通。空首布演变成形态不同的平首布，燕刀、齐刀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战国中期以后，一些地区开始流通一种可以穿带的有孔的圆钱。南方的楚，在流行金属贝币的同时，还流通一种称量使用的金版，表现出与中原不同的传统。

战国货币出土非常多。由于各国金属货币通行的时间不同、形制不同，同一国家也不限使用同一种金属货币，因此货币的形制、种类很复杂。下面对各种形制的货币作一简单介绍：

1、铜布币，或称钱，是仿照农具钱（铲）、

铸(锄)的形状铸造的。布的形制如铲,上部称首,首下两边像肩膀的部分俗称肩,下部两脚称足,两足间相连的地方称裆。布首中空,布首中空叫空首布,空首是钱,铸安装木柄的釜的遗留,这说明最早的布币就是用农具铲来充当的。后来布币的空首演变成平片状,称平首布。平首布的肩、足、裆有方圆之分,形成很多种类。布币主要流行于周王畿和三晋。

2. 铜刀币,仿照生产工具刀的形状铸成的金属货币。刀头有尖形、方形、圆形几种,称尖首,方首,圆首。刀身也有直形、曲形、磬折形等,也分成多种不同种类。刀币主要流行于燕国和齐国。

3. 铜圆钱,圆形中间有圆孔或方孔的金属货币。圆孔圆钱早,方孔圆钱后起。流行于秦、三晋和周王畿。

4. 铜贝币,仿照贝的形状铸作的金属货币,又称“蚁鼻钱”、“鬼脸钱”。流行于楚。

5. 称量金版,黄金铸造的金属货币,流行于楚。一般金版上有用印凿连续打印的圆形或方形戳印,使用时切割称量,所以发现金版的墓葬中常有天平和砝码同时出土。像湖南长沙、常德、衡阳等地战国墓葬中就分别出上过称量金版的天平和铜环权。环权量值从一铢、二铢至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不等。黄金价值高,在交换中要求称量准确,天平和砝码可能就是适应黄金货币在商业上的流通需要而产生的。考古材料中也发现过春秋时楚的天平,可能楚在春秋时就开始使用金版。

货币上的文字,一般是标明币种,铸造地点或币值,如“齐大刀”、“东周”、“晋阳半”、“甘(邯)丹”、“平阴”、“郢渚”、“卢金”、“半两”等,是研究战国钱币和经济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战国时期,布、粟已用货币作价,官府征税亦有刀、布之征。所以当时的刀、布也已经成为一种贮存财富的手段。考古发现窖藏货币较多,如1954年山西长子出土一窖战国货币就重100多公斤。战国墓中也经常发现成百上千的布币、刀币储藏,说明战国时期货币在生活中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随着战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流通的扩大,借贷、高利贷也发展起来。

借贷和高利贷是阶级分化、贫富分化造成的。一方面,国家、贵族、地主闲置着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贫苦的劳动群众,遇到旱涝灾荒,却衣食无着,没有办法生活,只好靠借贷渡过难关。

借贷主要是农贷。其具体做法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贷给贫困农民衣食钱财,以维持其生活,待夏收或秋收后,农民还本付息。这种借贷对农民有所盘剥,但对农民或农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好处。贵族、地主增加了收入,贫苦农民也解决了困难。债率非常高,农民倾其全力不能偿还而致破产的借贷,属于高利贷。齐国的孟尝君是当时官僚地主放高利

三孔布

战国

其特点是在圆足布的布首、二足各铸一圆孔。币面铸地名,币背首铸数量,腹部铸记重量。有大小两种,大者背部记“一两”,通长约7.2厘米,重15克至17克;小、中者背部记“十二铢”,通长约5.2厘米,重7.2克至8克。三孔布数量不多,见于著录的有“上曲阳”、“下曲阳”、“北九门”、“阿”、“上艾”、“阙与”、“平台”、“渝阳”、“安阳”、“石邑”、“南行唐”等十多种。为历代收藏家所珍重。三孔布币面记载的地名多属赵国,币背记载的重量却用铢、两。铢、两是秦国的货币单位,所以有人说三孔布是赵币,有人说是秦币。近年又有人提出三孔布是中山国货币。



刀币

春秋战国

主要流行于燕、齐、赵等国，因币形如刀而得名。齐国刀币形体厚大，一般为带环长柄刀形，通长18厘米左右，宽2.5厘米以上，重45克以上。面背有郭，柄部有二道竖线。面铸货币名称，主要有“齐大刀”、“齐之大刀”、“即墨之大刀”、“安阳之大刀”、“齐建邦张大刀”等几种。背部上为三条横线，下部有纪数、五行、天象、吉语等文字，俗称三字刀、四字刀、六字刀等。燕国刀币有两种。一种是早期的尖首刀，长14厘米至16厘米，宽2厘米左右，重15克至18克。一种是从尖首刀演变而成的所谓明刀（币面“明”字，旧释明，有人释为燕）。较早期的，刀身和柄的连接处无明显的转折，呈弧状，俗称弧背，较晚的铸造粗糙、轻薄，身柄连接处有明显折转，俗称磬折。赵国刀币形体较小，平背直刀，柄很轻薄，常见的有邯郸、成白、柏人、蔺等钱文，行用至前221年秦统一货币时被废止。



铜贝币

战国 楚

形如磨去背面的海贝，故名。有的微向内凹，面凸起阴文，以贝字铜贝最见，俗称为“鬼脸钱”，又称“蚁鼻钱”。币在楚国流行时间较长，地区也广，体积大小不一致，最大的长2厘米左右，重达5克，最小的长不过1.5厘米，重不到1克。多出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



圆钱

战国 货币

一种圆形而中央有孔的铜币。主要有三种，一圆孔无郭，如魏的“垣”、“共纯赤金”、“襄阴”“漆垣一斩”，周的“安臧”等；一种圆孔有郭，如“东周”、“西周”等；一种方孔圆钱，像燕的“燕货”，齐的“临刀”，秦的“半两”等。圆形钱币便于铸造、携带和清点，所以发展很快。前221年秦统一货币，即以圆形方孔钱“半两”为法定形式。秦半两钱直径为3厘米至3.6厘米，重8克左右，面铸篆书阳文“半两”二字，史称“重如其文”，即实重为秦衡制中的“半两”。



郢禹

战国 楚 货币

1979年安徽寿县东津乡花园村出土
长7.3厘米，宽7厘米

这是由纯黄金制作的楚国货币，呈版状，上用印凿打钤印文“郢禹”。郢禹是战国楚的首都，最早的郢禹在今湖北江陵。战国后期，为秦所逼，迁都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仍称“郢禹”。此“郢禹”之“郢”即指寿春，“禹”是称量的意思，即



天平和环权

战国 楚

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出土

秤杆由木杆和二铜盘组成，木杆呈扁条状，长27厘米，中间一孔，穿丝线为提钮。铜盘径4厘米，边缘有四个对称小孔，穿丝线后分别系于秤杆两端，呈提钮天平。环权共九枚，自小至大重量为0.6克、1.2克、2.1克、4.6克、8克、15.6克、31.3克、61.82克、125克。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组古代成套衡器。据研究，各枚环权，分别为当时的一铢、两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楚国的商业发达，度量衡制度已比较准确规范。当时楚国使用的货币是铜贝币和黄金版，推测这种小型衡器用于称量供切割使用的黄金版。

贷的一个代表。他是齐国的国相，在薛（今山东）封有万户。他在收取薛地农民租税的同时，还放高利贷。农民不能按时付息，门客冯谖替他去薛收债，假托孟尝君的名义烧掉债券，表示这笔钱孟尝君不要了，为孟尝君收买人心。多数借贷农民没有齐国薛地农民那样幸运，一般是没有能力偿还高利贷的。债务越积越多，最后只能背井离乡逃亡或以身为奴抵债。

三、商业都会的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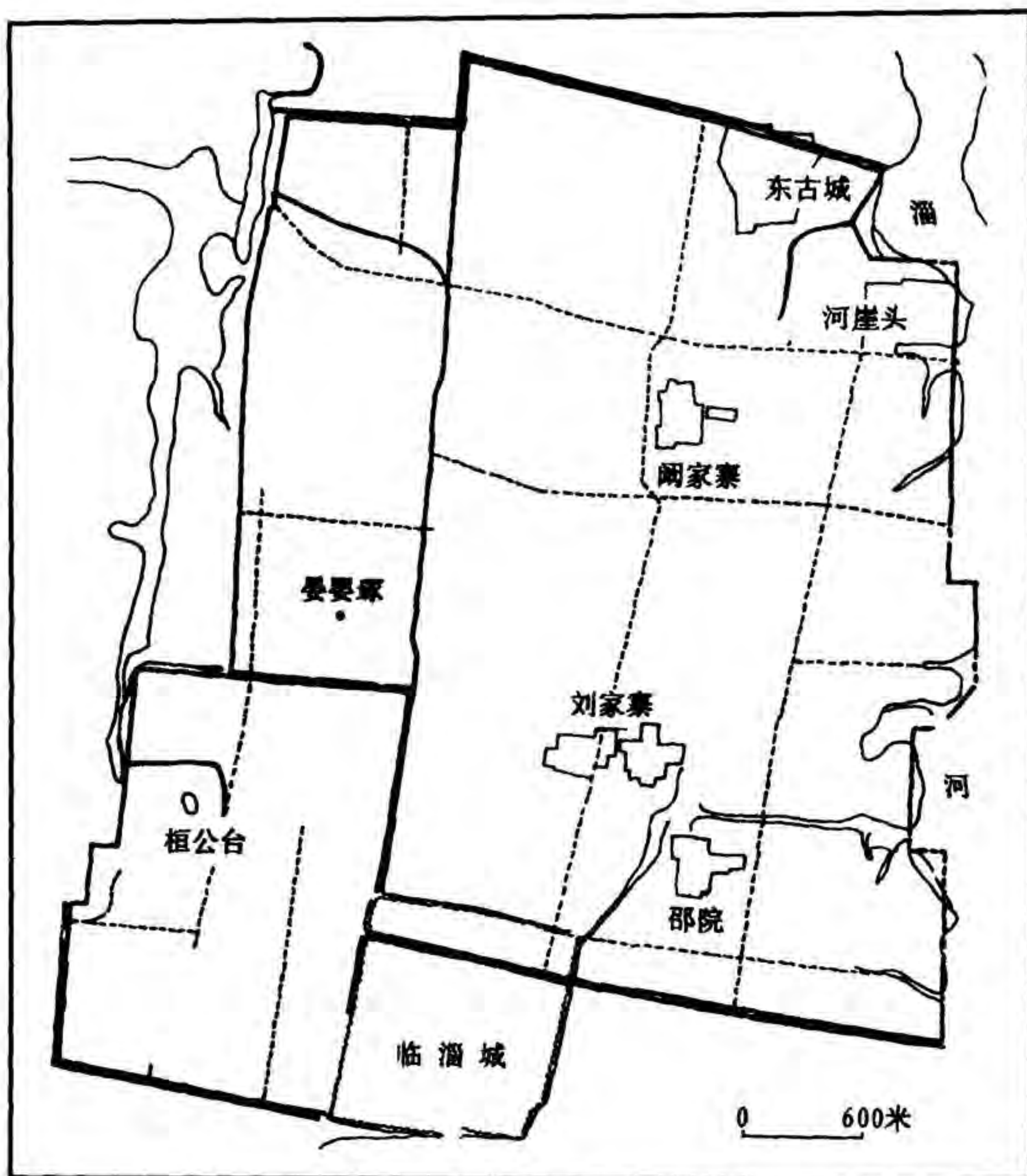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春秋战国的商业城市如雨后春笋，竞相发展。最大的商业城市，一般为各国的都邑，除了都邑各国还有一些物产丰富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前者如东周王室的都城雒邑，后者如齐国的陶（在今山东定陶），春秋战国之交都被称为“天下之中”，被认为是四通诸侯——“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的通衢之地。

齐国的都城临淄，据说当时已有七万户

人家，能征发二十一万兵卒。《战国策·齐策》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些话虽然有纵横家游说的夸张成分，但不能说完全是虚构。考古发现，临淄城城垣建于淄河与系水之间，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小两城的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左右。小城位于大城西南，部分嵌入大城西南角。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200米，东西宽约1400米，面积约3平方公里。共发现五座城门，其中南门二座，东、西、北门各一座。城垣外有护城壕。大城平面也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000米，东西宽约4500米。南、北墙外有护城壕，东、西两面则以淄河和系水为天然城壕。已探出东、西门各一座，南、北门各二座，连同小城所见共发现城门十一座。城内有全城性的排水系统，在大城西北隅的城墙处，有用大石块垒砌出的外宽内窄的涵洞。小城探出三条干道，大

临淄齐故城遗址

西周至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遗址，位于山东淄博临淄区齐都镇。齐自献公元年（前859）由薄姑迁都于此，至齐王建四十四年（前221）秦灭齐，临淄作为齐的国都历六百余年。



城内探出七条干道，都与城门相通，把全城分割成十多个棋盘格式的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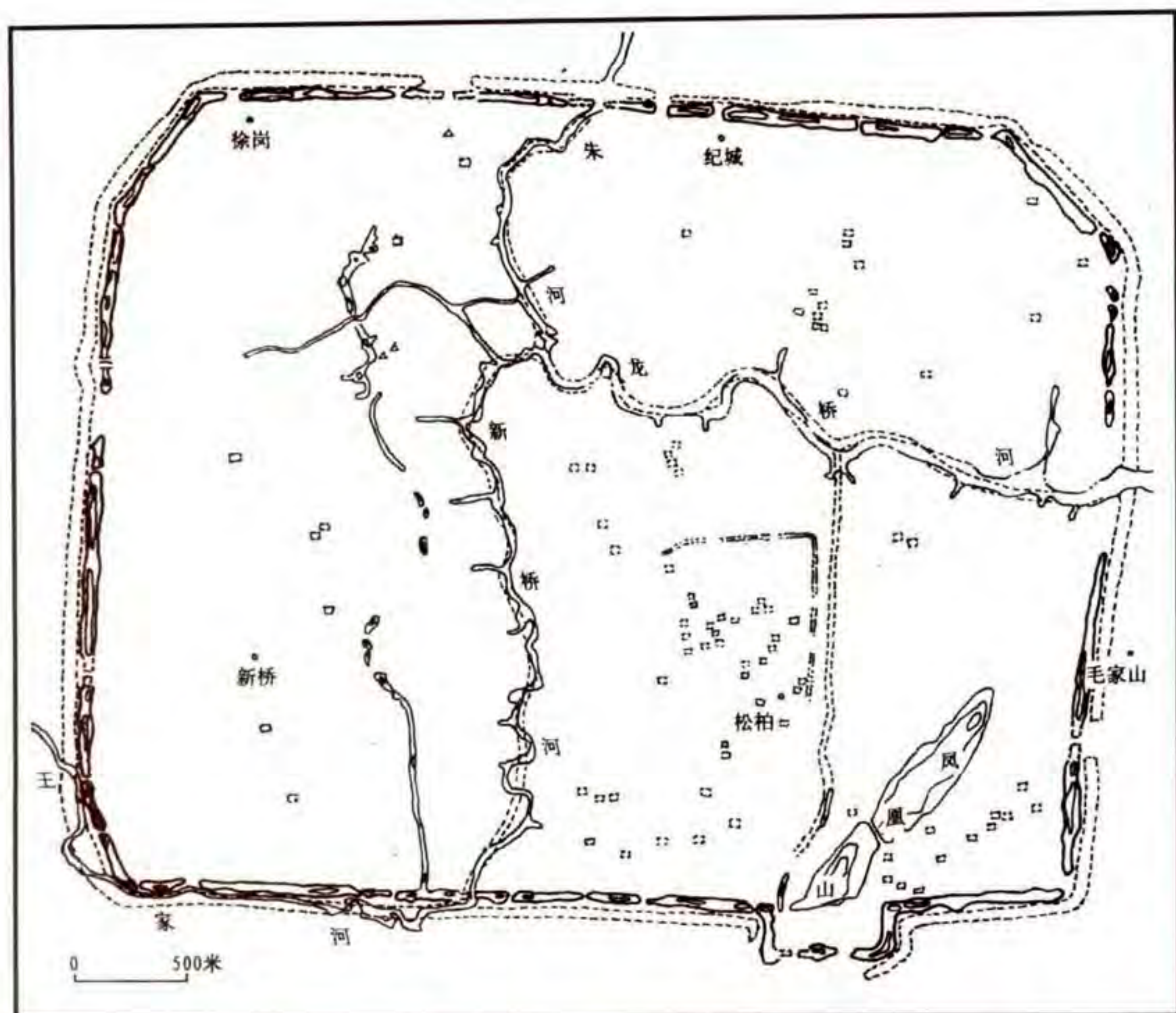
小城是宫殿区，其北部分布有大片夯土建筑基址，中心建筑为一平面呈椭圆形的夯土台基，俗称“桓公台”。

大城内发现了多处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居住址、手工业作坊（冶铁、制铜、制骨等）遗址，还发现了数处墓地。现已探明大、中型墓20多座，其中一座春秋晚期甲字形石椁大墓，墓室的东、西、北三面有连成一体大型殉马坑，已清理的部分有殉马228匹，全部殉马当在600匹左右。这一带应属西周

至春秋时期姜齐的贵族墓。

楚的郢也是当时一个车水马龙的大商业城市。江陵纪南城现存的战国郢的古老城垣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已发现城门7座，东墙尚存1座，其他三面各有2座，其中北墙东门及南墙西门为水门。城外四面围有护城河。城内已探明4条古河道，与上述水门和护城河相通。

城内已发现东周夯土建筑基址84座，以城的中部偏东南处最为密集。城内东北部也分布着若干规模较大的夯土基址。全城发现



荆州纪南城楚都郢都遗址

东周时期的楚国郢都遗址，位于长江北岸湖北荆州境内的纪南城。楚自文王元年（前689）自丹阳迁都于此，至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拔郢，楚以此地为国都四百多年。

有水井400眼以上。

纪南城周围的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城周围约三四十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十分密集的楚墓，离城稍远的城西八岭山、望山，城北的纪山，城东的长湖一带，则发现了数百座有封土堆的大中型楚墓。其中的大型楚墓应是楚国国君或王室贵族的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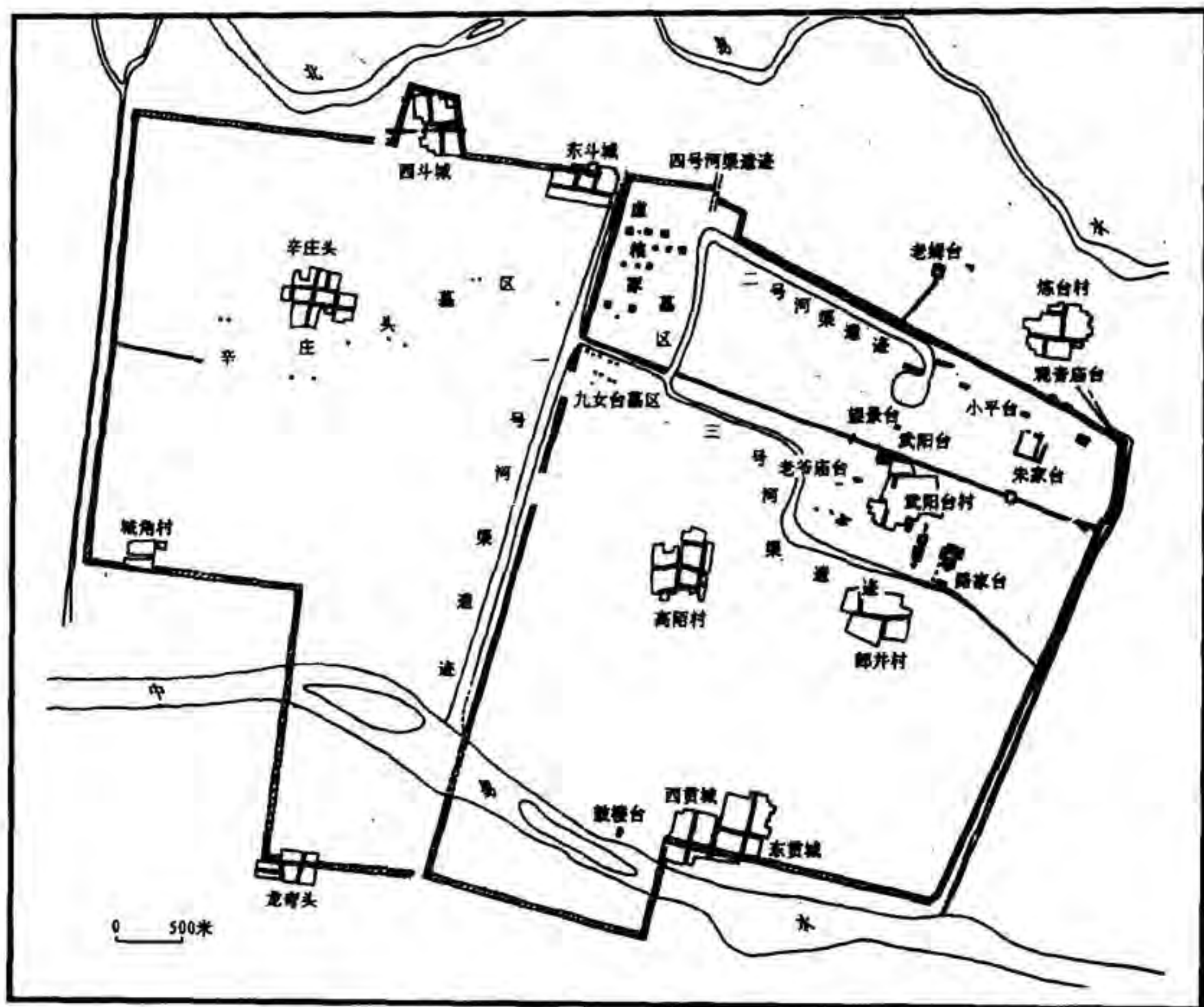
城内有很多铸造作坊和水井遗迹，说明当时郢都人口非常稠密。桓谭在《新论》中说：“楚之郢都，车毂击，人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由于城中人太多、城太大，车轴互相碰撞，人和人推推挤挤，早晨穿的新衣服到晚上就成了旧衣服，可见郢都之繁荣。

河北易县的燕下都，是列国都城遗址中较大者。城址平面略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8000米，南北宽约4000米至6000米，总面积30余平方公里，是战国都城中面积最

大的一座。中部有一条古河道纵贯南北，其东侧还有一座与其平行的城垣，将燕下都分为东西两城。东城是燕下都的主体，城垣平面略呈凸字形，东西约4500米，南北约4000米。其中武阳台一带是燕下都的宫殿区，宫殿区内有制造铁器、兵器和骨器的作坊遗址。东城的西北隅有23座带高大封土堆的墓葬，应属燕国王室贵族的公墓区，其时代则约当战国早期至战国晚期。西城东西约3500米，南北约3700米，仅在西垣中部发现一座城门及与其相连的道路。城内的文化遗存较少，可能是为了屯兵和加强东城的安全而增建的具有防御性质的附郭城。城内北部一线排列着高大的夯土台基遗址，东北、东南和西南又有不少建筑群，形成燕下都的宫殿区。燕下都城区地下有连贯的陶管下水道，城外有古运粮河和壕沟。宫殿区以西，分布着铸造兵器、钱币的作坊和其他手工业遗

易县燕下都遗址

战国中晚期的燕国都城遗址。城址位于河北易县东南，地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据《世本》记载，春秋时期燕国曾以临易（今河北雄县）为都。战国时燕还都于蓟（今北京附近），后世称燕上都，至战国中晚期又营建下都武阳，成为战国中晚期燕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址。《史记》说燕是当时北方的重要城市，“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是北方商业交通的枢纽和重镇。

其余像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土地肥沃，人文荟萃，也是当时官员权贵和富商居住的大都市，繁华景象更胜一筹。

周的都城雒邑，虽然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衰微，但其“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性质没有改变。

除此之外，燕国的涿、蓟，魏国的温、枳，韩国的荑阳，楚国的宛、陈，郑国的阳翟等也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齐国的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安阳（今山东曹县东）、薛（今山东滕县东南），赵国的藺（今山西离石西）、离石（今山西离石），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国的郑（今河南新郑）、屯留（今山西屯留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楚国的寿春（今安徽寿县），越国的吴（今江苏苏州），宋国的

陶邑（今山东定陶北），卫国的濮阳（今河南濮阳南），秦国的雍、咸阳、栎阳（今陕西临潼北），也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城市和商业都会。

第四节 城市与交通

一、城市的发展

春秋战国政治、经济的急剧变革，带动了城市的大发展。春秋战国城市大发展的标志，一个是城市数量较之西周有了明显的增加，再则是城市规模较之西周有了很大的突破，城市功能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春秋城市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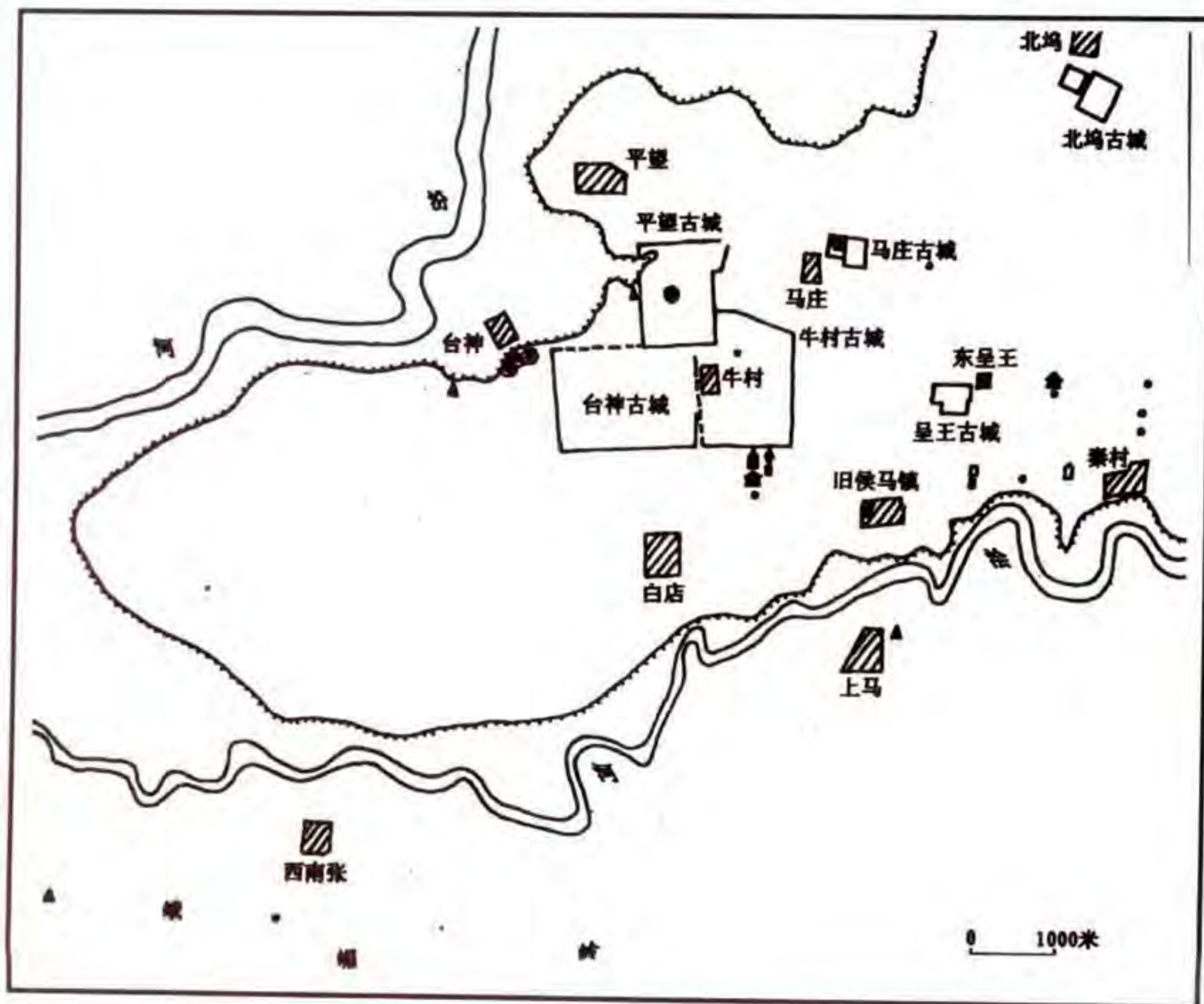
春秋城市的发展是与天子衰微、诸侯争霸的政治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城市的布局、规模、功能都带有诸侯争霸和除旧布新

的特点。

春秋城市数量比西周明显增加。以考古材料较为详备的河南为例，该省发现的西周及以前的城市遗址总数不到30座，到春秋战国城址的数量一下子增加到130座，这当然还不是当时城址的全部。当时城市数量增加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争霸诸侯占领了战略要地或新地，都要修筑城池以加强攻守。当时国家的地域特点还不十分明显，城市即国家，夺取或新建城市，即表明攻取或占领了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修筑城池的增多反映了当时争霸的激烈性。前571年，以晋国为首的齐、鲁、宋、卫、曹等北方诸侯为了惩罚郑国投靠楚国，占领郑国的军事要地虎牢，在此筑城以威胁郑国。前538年，楚为了抵御吴师，在楚吴边界上同时修筑钟离、巢、州来三座城池以加强防守。二是一些国家一度被攻灭，在另外的地方新建都城以复国。前657年，邢国被狄人灭亡，齐桓公率

诸侯在夷仪建立新城，帮助邢国复国。狄灭亡卫以后，诸侯帮助卫国在楚丘修建新都，也属同一性质。三是春秋中晚期各国政权下移后，卿大夫普遍在其封邑内修筑城邑，扩充军事力量，与公室抗衡。像春秋末鲁国三桓在各自的封邑内违制扩建郕、费等都邑，即属于这种情况。

与西周的城市相比，春秋各国都城普遍在规划上突破西周原来的城市等级限制，规模扩大。从考古情况看，春秋各诸侯国的都城建设大致可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用西周时的旧都，如齐之临淄、鲁之曲阜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另建新都，晋的新田、秦的雍城属于这种情况。沿用西周旧都的城市，已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建成两城制的布局，这是城郭布局的前身。如曲阜是大城里套小城，宫殿区位于城中心；临淄则是大城在东北，小城（宫殿区）在西南。新建设的都城如晋国的新田（今山西侯马西北）则



晋新田故城遗址

位于山西侯马市区附近。在东西9公里、南北7公里（实际面积在40平方公里以上）的范围内分布着数座小城及宫殿基址，盟誓、祭祀遗址，铸铜、制陶、制骨手工业作坊遗址，居住遗址和墓地，时代约当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秦雍城建筑构件

1973年至1974年陕西凤翔雍城秦都城遗址出土
长42厘米，宽16厘米

两面饰蟠螭纹，一面有两个钉孔，用以固定木件。该构件器壁坚厚，纹饰繁密，不仅能加固木件，而且有相当的装饰效果。雍城秦都城遗址曾两次出土类似的铜构件，有长方形、正方形等多种。

由六座城址组成（其中牛村和平望两城内部发现有建筑台基，可能是当时的宫殿区。呈王古城的东南发现了祭祀和盟誓遗址，浍河以南的上马村一带，则发现了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的墓葬群）。秦都雍城在今陕西凤翔城南，城址平面近方形，东西长约3300米，南北宽约3200米。大型宗庙遗址在城内中部偏北。城内中部发现了数十件制作精美的大型铜质建筑构件，这是一些用来连接、加固和美化大型宫殿壁柱、门窗等的构件，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宫殿建筑的富丽堂皇。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沿用西周时旧都的曲阜鲁国故城，还是新建设的都城凤翔秦都雍城，其面积都在10平方公里以上，大大超过了东周

王城雒邑的规模，春秋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局面由此可见一斑。

春秋时期的城市普遍加强了城垣和防御工事的建设，这是争霸战争的需要。

从城市设施考察，春秋各国都的城市建设都已具备了用水、排水等公共生活设施。为了防旱防涝，当时城市选址多选择“高毋近旱”、“下毋近水”的地方，筑城时又修建了专门的排水和取水设施。如齐临淄城齐故城内有全城性的排水系统，大城和小城均发现有排水道。楚都纪南城遗址，全城发现了400多眼水井。在秦都雍城的宫殿区内，还发现了藏冰的窖穴，可见当时城市建设的完备。

春秋城市的商业功能比西周明显加强。西周的城市，多是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性质的城市。春秋时期的城市沿袭了这个特点，城市性质基本还是政治中心，城市居民主要还是贵族和国人，官府手工业作坊处于一隅之地，但它的经济功能比以前明显增强。以侯马晋城为例，在牛村古城南郊一带分布着多处制作铜器、骨器、石器和陶器的作坊遗址。铸铜作坊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在已发掘的5000余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有居住遗址、窖穴、水井、道路、陶窑、熔铜炉等遗迹。出土遗物中有雕刻花纹用的骨质雕刀、青铜小刀，熔铜用的熔炉、鼓风管碎块，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及铜锭、铅锭等。铸铜陶范发现5万多块，所铸的器物有工具、兵器、货币、礼器、乐器、车马器、生活用具等。有些器物的陶范数量巨大，表明这些产品已达到了规格化、系列化生产，带有浓厚的商品性质。尤其是铸铜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空首布芯，总数在10万个以上，说明当时晋国的金属铸币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春秋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另一个表现是

城市人口中商人比例的增加。齐桓公时管仲改革，“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经商者占城市总人口的14%，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其他文献记载，临淄城内有许多商品交易的市场，称为“国之诸市”，可以与此相印证。这可能跟齐国重商的传统有关。其他城市，像晋都绛的富商，乘金玉装饰的车子，穿华丽鲜艳的服装，能给诸侯国君行贿。他们的法定政治地位虽然不高，但能凭借经济实力交通诸侯。这是春秋城市经济功能提高的又一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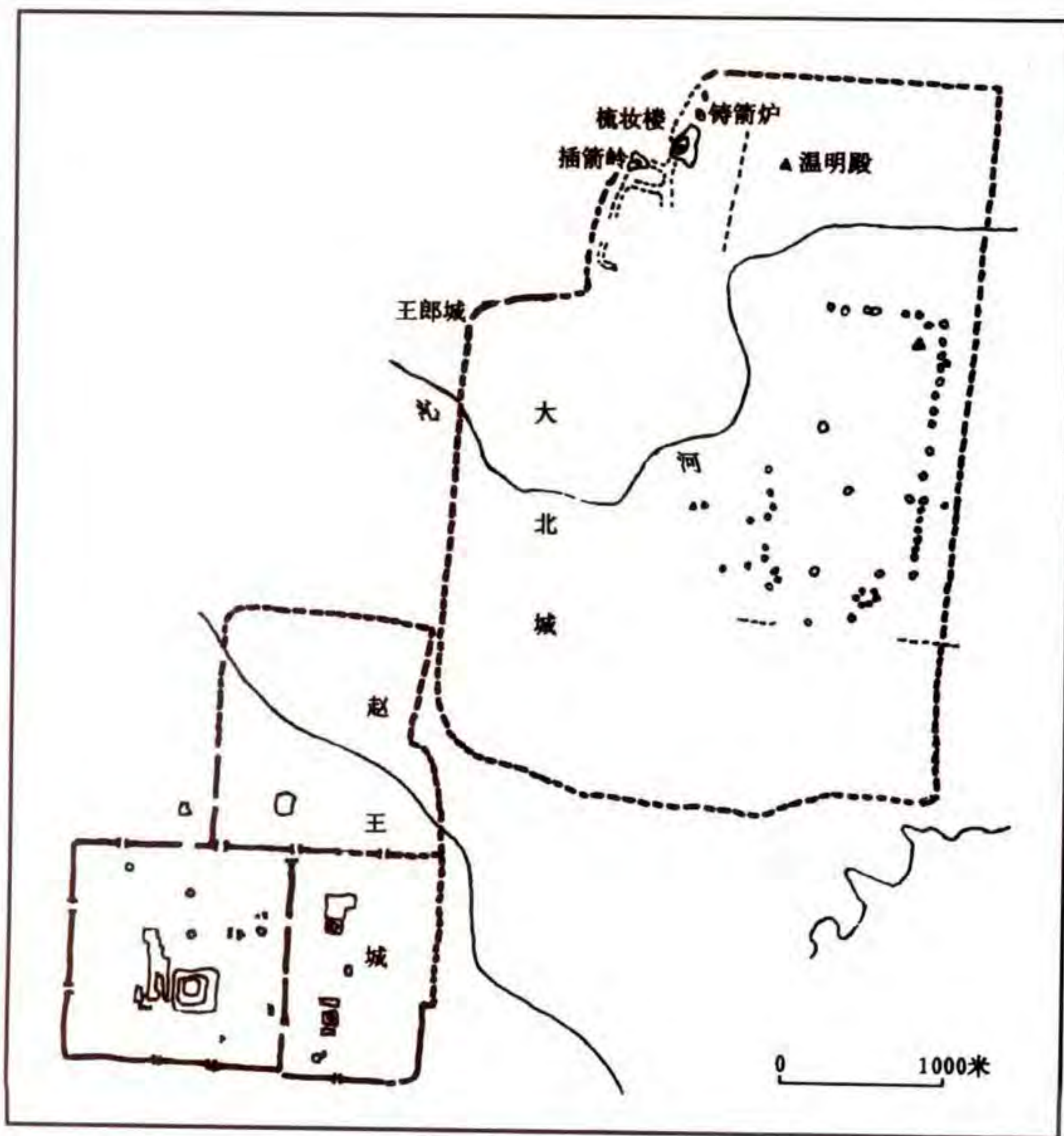
（二）战国城市的繁荣

战国时期的城市较之春秋又有了高度发展。一是城市数量空前增加，城市规模空前

扩大，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工商食官”制度解体，私人工商势力壮大，城市的工商业高度繁荣，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国时期城市的高度发展是与战国兼并战争的加剧、社会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大量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数量空前增加，除了与春秋相同的原因，还有下列因素：

第一，郡县制度建立后，各郡城市数量空前增加，需要建筑郡城、县城及统治机构与都城配套，体现中央集权的体制，这使得城市的数量空前增长。春秋初期县、郡都是边地军事性质的机构，战国各国普遍施行郡县制度，众多春秋至战国前期的小国都邑在



邯郸赵故城遗址

战国中晚期的赵国都城遗址，位于河北邯郸市及其外围。赵自敬侯元年（前386）从中牟（今河南汤阴）迁都于此，至赵王迁八年（前228）秦破邯郸，邯郸作为赵国都城凡一百五十余年。全城分为官城与郭城两大部分，彼此不连接。总面积近19平方公里。官城始建于战国时期，郭城较官城略早。官城俗称“赵王城”，由平面略呈“品”字形的三座小城组成，每个小城长宽各1000米左右，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郭城俗称“大北城”，位于官城东北部，南北最长处为4880米，东西最宽处为3240米，面积约13.8平方公里。城内发现有战国至汉代的冶铁作坊遗址、铸铜作坊遗址、制陶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石器作坊遗址等。城西北4公里一带分布有赵国贵族墓地，城西北15公里的丘陵地带已发现了五组赵王陵。

陶瓦钉

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出土



被兼并以后大多变为郡、县的治所，与国、乡形成一套完整的政治机构，这是宗法封建制度时不可能出现的新事物。

第二，国家地域扩大后，边境地带建立众多的军事城堡和关塞、亭障，屯兵设防以

为保卫。这些军事城堡和关塞、亭障有不少是军事重镇性质的小城市，考古发现很多。

第三，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建立许多贸易中心性质的城市。随着战国经济的繁荣，人口数量的增加，“工商食官”制度解体，私人

陶瓦钉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卷云纹半瓦当

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出土

工商势力壮大，城市作为商品制作和流通的中心已水到渠成。战国大的商业城市，一般为各国的都邑，除了都邑，各国还有一些物产丰富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像燕国的涿、蓟，魏国的温、轵、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国的荜阳、屯留（今山西屯留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阳翟，赵国的藺（今山西离石西）、离石（今山西离石），齐国的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安阳（今山东曹县东）、薛

（今山东滕县东南），楚国的宛、陈、寿春（今安徽寿县）、吴（今江苏苏州），宋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北），卫国的濮阳（今河南濮阳南），秦国的雍、咸阳、栎阳（今陕西临潼北），也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城市和商业都会。

各国都城发展为经济中心，但仍然保持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这说明当时各国工商业的繁盛是依存于其政治、军事中心而存在、发展的。城市作为商业贸易中心加强了



树木双兽纹半瓦当

山东淄博临淄齐故城出土

饕餮纹半瓦当

1930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

高9.8厘米，径19.8厘米
此瓦当饰森严的饕餮纹，当是燕王宫殿所用。



经济职能，但并没有脱离其政治、军事中心的性质，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特点。

战国城市规模空前扩大，而且城市的布局、结构较春秋发生了大的变化。考古证明，兴建于战国时期的诸侯都城如赵之邯郸、齐之临淄、楚之寿春、秦之咸阳、燕之下都面积都超过20平方公里，这是春秋以前的城市无法比拟的。文献说，古代“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

过三千家者”，战国时期“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已是寻常城邑。

战国的大城市，已经具备了完整的城郭布局。城指内城，郭指外城，即坐落于内城之外的又一重城垣。战国郭的建筑多是改造旧城时扩建的，新建的城池则直接在内城之外修建外城。考古表明，战国时诸侯国的都城多由小城、大城或内城、郭城组成。小城、

山字纹半瓦当

1930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





双龙纹半瓦当

1930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

内城为宫城，是国君、公室贵族居住和宗庙、社稷及官僚机构的所在地。宫城内宫殿密布，多建筑在阔大的夯土台上，巍峨高峻，象征着国君的权力至高无上。宫城内还有一些铸钱和制造兵器、铁器、骨器的手工业作坊，这是专门为贵族服务的官府手工业。郭城是

各级官吏和市民的居住区。战国诸侯各国都城遗址都发现了门类齐全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郭城内的居民以“里”为基本居住单位。这是一种地域组织。里内的居民多按职业分工划分居住区域，而不再按传统的聚族而居的形式居住。里之外，是各式各样的由官吏



黼黻纹筒瓦

传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
长90.2厘米，径36厘米
瓦身镶贴三角形黼黻纹，交错排列分成两组。这类瓦可能是当时覆在宫殿墙头上保护墙头的护墙瓦。从出土的黼黻纹大型筒瓦看，当时燕下都的宫殿建筑是非常宏伟高大的。

陶下水管道

燕下都宫殿遗址出土了许多下水管道，说明整个城市有比较完整的输水排水系统。这也是城市规模的侧面反映。其头大尾小的设计，方便连接另一节水管。



专门管理的市和肆。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流入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多，郭城内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市场日益增多，乃至商贩云集，酒旗高挂，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踢鞠样样都有。至此，中国真正出现了名副其实的把“城”（政治功能）与“市”（经济功能）凝为一体的“城市”，西周以来以宗庙和朝堂为中心的完全政治性的城市概念成为历史。

二、交通

各国政治联系的加强、社会经济尤其是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也促进了春秋战国交通的发展。

春秋战国交通的发展是与争霸战争和区域中央集权的形成、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诸侯各国为了发展经济，在加强国都向四周的道路辐射网保护修治的同时，常常呼吁各国诸侯“轻关易道，通商宽衣”，一些政治家对某些国家道路失修也常常提出批评。如周定王的卿士单襄公出使宋、楚，路过陈国，看到陈国荒草遮路，管理道路的官员不检查道路的情况，湖水四周不建堤岸，河川

上没有桥梁，道路两边也不栽树，回来对周定王说，陈侯虽然没犯大错误，但国家必亡。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交通道路的改善非常重视。西周和春秋时，王室和各诸侯国国都都有辐射四方的道路，各国也都设置了专门管理交通道路的官员，制定了维护道路通行的规章。《周礼·秋官·庐氏》所谓“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明确记载有专人负责王国至四周畿内道路的通畅，巡查郊野道路，检查是否有供晚上住宿的馆舍，是否有井以供饮水，是否有树可供乘凉。这些规章看来主要是针对行路的官员或驿传而定的。当时的道路除了桥梁堤岸，尚不可能有太大的建筑工程，一般都是对自然形成的道路的加工。所以那时对道路的修治，主要是“除道”，即清除路上丛生的杂草，填平被雨水、河水冲刷的路面；还有“列树以表道”，即种上树以指示道路的方向。

驿传（传遽和邮驿）制度在春秋时已在各国普遍施行。政府沿交通要道设立驿站，置备车马（称传，又称遽）及专职管理人员，遇到紧急情况，派人乘传快速疾驰到下一驿



蛙形下水道管

湖北荆州纪南城楚郢都遗址
出土

站，再由下一驿站急速派人乘传疾驰到另一驿站，一站一站相继，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目的地。传遽主要供各地传递信息或办公事的人员使用。办公事的人员乘坐传遽，要有政府发给的符节凭证，经检查无误才能通行。此外，与传遽相近的还有邮驿。邮驿主要用于递送紧急公文，方法一如传遽。关于这些，《管子·大匡》和《周礼·地官·掌节》都有明确的记载：三十里设置一遽，如果办公事的人要住宿，驿站要供给饭食并负责喂马。办公事的人要拿出符节让有关人员检查。各种符节的名称、用途也有规定。前627年，秦国派军队偷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碰上了秦军，他想法稳住秦军，暗中派人乘遽急告于郑。前540年（昭公二年），郑国发生贵族内乱，当时执政子产正在边境办事，听说了这个消息，赶忙“乘遽而至”。这两则故事中说的“遽”，就是传车，驿站的车。

春秋战国时期，水路交通也比较发达。其中一个重大的成就是沟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运河的开凿。这条运河分成两段。第一段是春秋末吴王夫差修的邗沟，从邗（江苏扬州市境）“筑城穿沟”往东北通向江苏淮

安县境内的射阳湖，再向西北至宋国入淮河。这是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过了两年，夫差又把这条运河向北修，接通沂水、济水、泗水，目的是运送军队与军粮。吴国的舟师能深入到今河南中部的黄池与晋争霸，这条运河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段是开通鸿沟。鸿沟是战国魏惠王时在天然湖泊圃田泽（河南中牟境内）与黄河之间开凿的一条渠道，目的是引黄河水入圃田泽。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40），魏又从圃田泽开了一条渠道，引圃田泽水通淮河。这样，鸿沟和邗沟就沟通了江淮和黄淮，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联系了起来。

春秋时期利用天然河道运输也比以前有很大进步。前647年，晋遇饥荒，秦穆公让秦国的运粮船从渭水至黄河，再从黄河溯汾水到晋都绛，以支援晋国。这次大规模的运粮，船只络绎不绝，历史上称为“泛舟之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河运记录。除了内河航运，当时近海航行也已开始。前785年吴国进军齐国，派舟师从近海北上入齐；越王句践袭击吴国，命范蠡率领水军“沿海淮以绝吴路”。灭吴之后，范蠡乘舟浮海。

王命传虎节

战国 楚

传安徽寿县出土

长12.4厘米，高7厘米，厚

0.5厘米



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近海航运的成熟。

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和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交通较春秋有了很大的发展。“诸侯四通，条达辐辏”，各国之间的道路通畅，一条条道路伸向远方，像车辐条那样集中到诸侯各国的国都。文献记载，当时齐、赵、魏之间有多条纵横交错的大道，称“午道”，周秦之间有从成皋沿黄河西行的“成皋之路”，楚有从南阳通往中原的“夏路”。从东周王城雒邑、齐国的陶（在今山东定陶）“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的商业道路上更是服牛乘马，肩挑手提，日夜繁忙。当时为了战争的需要，一些国家还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山势险峻的地方修筑栈道。像秦国为了解决从汉中找到蜀地的交通困难，开山劈岭，修筑“栈道千里”，这都是极其困难的大工程。

战国的水路交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南方吴越地区，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地区水道纵横，岷江、长江、汉水流域的交通运输

通畅。鸿沟和邗沟通江淮、黄淮，使南北水上航运出现了新局面。秦在黄河上架设浮桥，便利河西与河东的交通，做了一件富国利民的大好事。

战国的造车技术和造船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传说墨子造的车承载能力可以达到五十石；航行于岷江、长江中的舫船（两船相并而成的大船）能够载运五十人和足够这些人吃三个月的粮食，顺江而下，一日可达三百多里。

战国的驿传制度更加完善，规模也更大。据文献记载，当时过不同的关隘要持有不同的“封传”，办事人员出关要在鸡鸣天亮以后。《史记·孟尝君列传》有一则故事：秦昭王释放了齐国的孟尝君，孟尝君马上用假名办理出关手续，急驰回国。秦昭王后来后悔释放孟尝君，派人“驰传逐之”。孟尝君半夜到达函谷关，按关口法令，每天鸡叫以后才能放人出关。孟尝君怕再让秦人抓住，非常着急。这时他的随从中有学鸡叫，引得



鄂君启节

战国 楚

1957年安徽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

铜节分舟节和车节两种，用时双方各持一半，合节验证无讹才发生效力。

全城的鸡一齐鸣叫。守关的官吏一听鸡叫，就开了关门。孟尝君“遂发传出”。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战国传驿制度的大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两件楚国的传节，一为龙形，一为虎形。龙形传节上刻有铭文：“王命 = 传赁”。即凡有人持此节过站，可借与车马及饮食。这是不可多得的古代传驿制度的实物。

安徽寿县还出土过由楚王亲自颁发给封

君的车、船符节——鄂君启节。节作竹节形，舟节长30.9厘米，宽7.1厘米，有错金铭文9行165字；车节长29.6厘米，宽7.3厘米，有错金铭文150字。此节记载了前323年楚怀王发给鄂君启舟节和车节的过程，并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运载额、运输种类和纳税情况，是研究楚国交通、地理和商业赋税制度的珍贵资料。

第三章

制度变革



春秋战国的政治大动荡、大变革，使西周建立在宗法秩序基础上的等级分封制度、世官世族制度、国野都鄙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随着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新型的官僚制度、俸禄制度、官吏选拔制度、郡县制度建立起来，为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由这些制度变革而引起的军事变革，以及为适应惨烈的统一战争而发生的兵种变革和作战方式的变化，构成了当时社会变革最激烈的一幕。

第一节 从世族世官 到军功爵禄

西周的宗法封建体系，是一个血缘贵族等级和贵族政治等级合一的世族世官体系。

在这种体系下，国家权力按宗族等级层层分配，层层制约，王国政府职务由诸侯、卿大夫世袭把持，诸侯“国”内的政府职务由卿大夫世袭把持，卿大夫“家”内的行政权力由家臣、僚属世袭把持，世族世官，世卿世禄，形成一个世袭的以血缘等级为基础的层层隶属的宝塔形政治层级。

进入春秋以后，王室和诸侯国内的宗族倾轧愈演愈烈，一大批宗族在政治斗争中消亡、衰败，世族世官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但有实权的贵族依然是世族世官。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人民，建有自己的城邑和军队，并以此操纵国政，有的甚至可以取代诸侯而成为一国之君。《左传》、《国语》等书中记载的周王朝的周、召、单、刘、尹等氏，鲁国的“三桓”，晋国的栾、郤、狐、赵、韩、魏、智、中行、范、羊舌、祁、先、胥、伯等氏，齐国的高、国、崔、庆、栾、高、陈、

鲍等氏，宋国的华、乐、皇、鱼、荡、向等氏，卫国的孙、宁、孔等氏，郑国的良、游、昌、罕、驷、印、丰等氏，楚国的斗、成、劳、屈等氏，即是这种世族世官的典型。

随着争霸战争的发展和宗法封建制度的衰落，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为了富国强兵，也尝试着举荐或招纳一些有贤才的人来管理国政，像齐桓公时鲍叔牙举荐管仲为相，对齐国进行改革；郑国“择能而使之”，让子产为政，这虽然是在僵死的宗法封建制度下对世族世官的一个补充，但它毕竟给当时的任官制度带来一些新鲜的空气。春秋末年，一种新的任官制度开始萌芽。这是一种没有血缘统属关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而以才干换取俸禄的任官制度。文献记载，当时孔子弟子中有不少有才能的人即以这种方式参与国政或做卿大夫的家臣。这些人与鲁君和卿

大夫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以自己的才干取得鲁君和卿大夫的信任，合则留，不合则去，彼此之间没有固定的依附性。他们参与国政或做家臣也不是终身制或世袭制，俸禄成为维系他们关系的主要纽带。很明显，这是一种脱离宗法束缚的雇佣关系的官僚制度。

这种新型的任官制度在战国时期得以全面实施。进入战国后，诸侯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先后进行变法，变法的重点之一就是废除世族世官，为国家招纳急需的政治、军事、外交人才。士阶层的兴起给这种新的任官制度提供了人才基础。春秋末期，随着宗族政治的瓦解，很多失去了宗族依托的贵族沦落为士，使士人的队伍迅速扩大，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战国初期，群雄并争，各国为了延揽人才，一时招贤养士之风大盛。于是，这些文化素养较高的士阶层就成为各国



国子鼎

战国 齐 兵器

山东淄博临淄区姚王庄齐故城出土

口径27.8厘米，通高33厘米
盖器铭“国子”二字。齐国的“国氏”为姜姓，国氏的宗子可称“国子”。

统治者争相招揽的对象，成为战国官僚的后备军。他们凭借知识和才干，通过各种途径取得君主的信任，出将入相，在统一中国的战争舞台上叱咤风云。随着国家内政和外交事务的剧增、官僚队伍的扩大，这些依照国君的旨意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俸禄官僚成为各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这也标志着这种新的官僚制度已经取代世族世官制度而确立。

当时，各国实行的俸禄制官僚制度中，官吏的选拔主要经过下面几种途径。

一是凭军功爵禄入仕。这是战国各国都实行而以秦国实施最为彻底的一种军功奖励制度。其基本原则是以军功作为入仕的资本，仕官大小与军功爵位的高低成正比。商鞅变法条文规定了二十等爵：斩首一级，爵一级，可以做俸禄五十石的官；斩首二级，爵二级，可以做俸禄一百石的官，依此类推。二十等爵“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斩首越多，官做得越大。魏国也有类似的军功奖励制度，有大军功者可以做“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

二是游说自荐，直接面见或上书国君，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以取得国君的信任。像商鞅、邹忌、苏秦、张仪等都

是通过自荐取得国君信任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后世所说的布衣卿相，主要指这批人。

三是官吏举荐，由大臣和接近国君的人向国君推荐急需的人才。像蔺相如奉璧入秦，公孙鞅入卫都是通过国君身边的人举荐的。这种选官，受法律约束，如任人不善，举荐者要负一定责任。

战国以军功或自荐、被荐入仕的官员，大都是根据其特长任官，如“猛将必发于卒伍”，其职责是为国君冲锋陷阵，攻城掠地；那些有管理才能的知识分子，则是依照法令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一改春秋官员文武不分职的格局。战国官员的俸禄，以粮食为主，有时也用钱币或黄金。俸禄的多少依照官位的高低而定。

俸禄制官僚制度中，国君对官吏的督促、考核十分严格，为了督促、考察官吏尽职尽责的情况，每年年终国家都要对他们进行考核，并根据政绩的优劣来决定升降任免。当时各国的官僚队伍，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军功之士，一部分是文士，还有少部分是宗室贵族，前两者是官僚队伍的主体，后者是宗族世官制的遗留。当时各国

高子戈

春秋 齐 兵器

山东淄博临淄区兔丘村高子墓出土

高5厘米，援长12厘米，内长65厘米

高氏是齐国世臣。此戈出自高子之墓，刻有“高子戈”三字。



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官僚队伍中军功之士、文士、宗室贵族所占的比例不尽相同。大体上说，变法最彻底的秦国，军功官僚所占比重最大；而山东六国，文士和宗室贵族官僚的比重要较秦为大。不过，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山东六国宗法贵族官僚在官僚队伍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小。这标志着俸禄制官僚制度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为定制。

第二节 从封邑到郡县

西周封建，中央和地方行政建置的基本形式是国野、都鄙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天子京师是天下的政治中心，文献一般称“王国”，各国诸侯作为统治中心的城邑称“国”。“国”之外有大夫们居住的大小不同的封邑，其中规模较大的称“都”（都中有祖先宗庙），规模较小的称“邑”。“国”、“都”、“邑”之外，是农民居住的“野”，边沿地带则称为“鄙”。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仍然普遍实行都鄙制度，但具体情况有差异。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生产力发展，个体经济形成，贫富分化加剧，人口流动和相互杂处混居加强，都鄙制度开始解体，并向郡县制过渡。

春秋时期各国就已普遍置县。县建置的途径有三个：一是一些军事大国灭亡周围的小国，往往把这些小国改为“县”，以隶属于自己，同时具有军事据点的性质。像楚国春秋时灭掉周围的四十多个小国，大都把它们改为县。如，楚文王灭掉申、息两个小国，在那里设申县、息县；楚庄王伐陈，“因县陈”，把陈国改为陈县。晋献公灭掉耿、魏，在那里建置耿县、魏县。二是一些国家把边境上的军事镇所改建为县，扩大其军事机能。如

楚为了加强北部边界的军事力量，把临近郑、卫的武城、析、白、叶诸邑改为武城县、析县、白县、叶县。三是一些国家改邑为县，通过设置县来改变原来邑的所属关系，并加强其军事职能。像春秋中期以后，晋的一些强宗大族兼并了其他宗族的土地，就在这些地区撤邑设县，置于自己的领域之内。如晋国的六卿瓜分公族祁氏、羊舌氏的城邑，设置了郇、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孟、铜鞮、平阳、杨氏十个县，各领有其中的一部分。其中，第一和第二种以驻军为主，是直属于中央的边防军事重镇。它一般直属国君管理，县尹由国君直接委派，有领兵权、征兵权和征税权。第三种是旧贵族封邑改成的县，虽然也有军备武装，但主要并不是军事重镇，而是地方行政建制，其职能为管理行政事务、诉讼、征收军赋、征发徭役等。旧贵族封邑改成的县，长官一般称“大夫”，与第一、二种县长官称“尹”不同，它带有封邑制向郡县制转变的过渡性质。

战国以后，出于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的需要，各国纷纷改邑为县，或者在新开辟的地区设县，县的数量空前增加。战国的县已完全是地方政府性质的行政机构，其土地面积和户口数量都有相对统一的标准，人口和土地也有适当的比例关系。战国的县一般面积方百里，人口约万户。县级的长官，大县称“令”，小县称“长”，都由国君直接任命，并在每年年终由政府进行考核，根据政绩决定奖惩任免。县作为一级地方政府，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令、长下设丞，协助令、长管理民政；设尉，主管军事。县丞、县尉下设若干办事衙署，作为具体的职能部门。再下则有乡、里等基层行政组织，与丞、尉及具体职能部门构成一整套严密的行政机构。

郡的机构春秋时也已建置，它比县低一

临淄故城车马坑

1990年山东淄博齐陵镇后李官庄发掘

1号坑殉战车10辆，马32匹。
2号坑殉马6匹。该车马坑推测是春秋齐国的国王或贵族的殉葬坑。

等，多在边关地区设置，也属于军事镇所性质。战国以后，郡由低县一等变为高县一级，仍多在边地或新征服地区设置，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故郡守多由武职担任。战国后期，郡由军事编制向地方编制过渡。秦统一中国后，设天下为三十六郡，郡成为中央之下、县

之上的一级地方政府，它作为军事编制的历史任务遂告结束。

战国郡县制度的普及，标志着中国古代行政体制结束了宗法血缘封建的格局而实现了行政的区域化。自此以后，地方行政机构不再具有宗法分支的性质而成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的行政管理的各项职能，如组织生产，管理民政、财政、司法及军事等，都以实现中央的意志为惟一目标，因此，它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行政基础。

第三节 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的变化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西周时代，军事制度是宗法封建制度的保证。春秋以后，宗周覆灭，王室军队逐渐衰落，列国间的征伐、盟会皆由诸侯掌握，“礼乐征发自诸侯出”，“天子”对武装力量的控制逐渐名存而实亡。

春秋时，王国和诸侯各国的武装力量有周天子的“王师”、诸侯各国的军队（文献称“公乘”、“公行”或“公族”）和卿大夫的私家武装（一般称为“私卒”、“私属”或“私徒属”，有时亦称“族”）三种。不过，因为当时王室已经衰微，诸侯和卿大夫的军队实际上是争霸战争主要的武装力量（天子的“王师”只在拱卫雒邑方面起一定的作用）。春秋初期，卿大夫的军队虽然属于私兵性质，但遇到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大夫一般都率领“私卒”随诸侯的国家部队参战。这是西周以来传统宗法军事制度的遗留。

春秋战争的主要方式是车战，故当时军队的编制与组合主要是按照车战的需要来设计。车战的主要工具是战车（文献或称戎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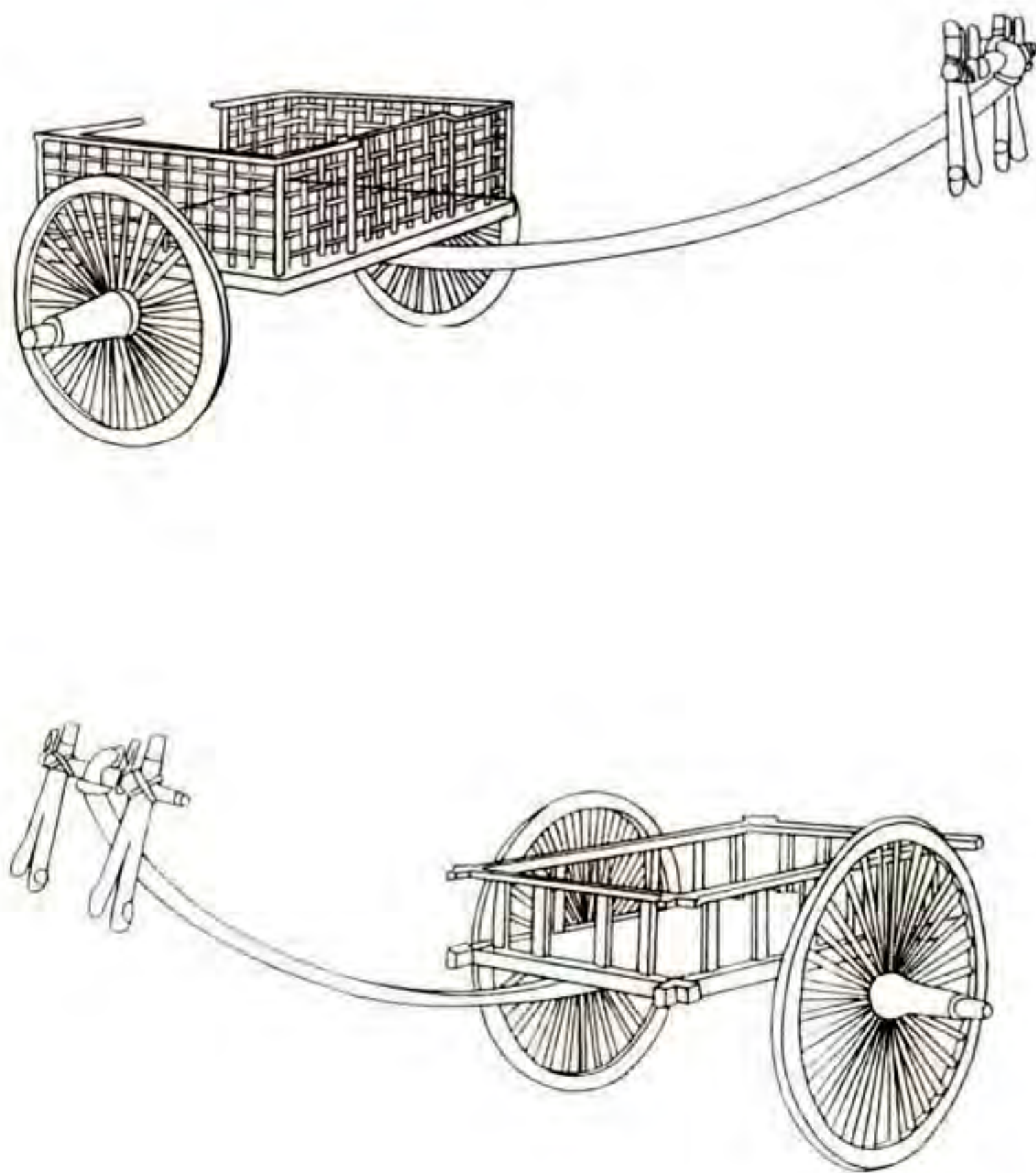
兵车、革车、武车)，一辆战车称一乘。每乘战车由“乘”和“卒”组成，“乘”指战车，“卒”指与战车相配的步卒。战车一般由三四匹马驾驶，车上载甲士三人（甲士一般是国人。左为甲首，手执弓箭主射；右为车右，执矛主刺击；居中为御，主驾车），每辆战车还配有数十名随车的步卒（一般认为是三十人，多由服役的民兵组成），以利于冲锋或遇险推车。当时各国武装力量的评估是以战车的数量来计算的。鲁、郑、宋等小国战车一般平均在千乘以上，晋、齐、楚、秦等则有几千乘至万乘。一千辆战车，徒兵有三万。《诗经·鲁颂·閟宫》载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之说。以此类推，当时鲁、郑、宋等小国的兵力，最少有三万；晋、齐、楚、秦的兵力，则不下十几万至数十万。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可见当时战争的规模已相当可观。前529年，晋治兵邲南，投入甲车四千乘，以向诸侯示威，其兵力当不少于十几万人。晋楚城濮之战，晋国一方出动的兵力就有战车七百乘，加上齐、宋、秦、楚的兵力，不少于一千乘。战争中晋俘获的楚国战车就有一百乘，徒兵上千。粗算一下，双方的兵力接近二十五万。前607年大棘之战，郑缴获宋国的战车达四百六十乘。这样规模的战争，与商周时期兵车百乘即为大战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春秋时期的作战兵器，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看，主要有戈、矛、戟、刀、殳、剑、弓矢、弩等，多是青铜制作。防身的装备主要有甲冑和盾。戈是长柄的兵器，主要用于砍杀；矛是长柄的刺杀兵器；戟则是戈、矛复合的兵器，兼有戈、矛二者的杀伤能力；殳是打击武器，由棱形的金属头和竹、木柄装配而成，主要用于打击；弓矢用于远距离杀伤；刀、剑用于近距离肉搏；弩出现在春秋

晚期，是当时的重武器，由弓与柄两部分构成，尾部装弩机，弩机由郭、牙、悬刀和望山组成；甲、冑是披在身上和戴在头上的防护装备，最早的甲是皮制，由一片片长方形甲片编缀而成，冑一般都是青铜制成。

春秋中期以后，南方的楚、吴、越进入争霸战争的高潮。楚、吴、越之间水战频繁，因此舟师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兵种。楚、吴、越的造船技术和造船能力发展很快，为南方舟师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春秋晚期，随着宗族政治的逐渐崩溃，建立在宗族体制上的贵族军队不断分裂瓦解。一方面，不少国家的军权被卿大夫瓜分夺取，甚至“陪臣执国命”。另一方面，由于作为车兵主力的国人阶层发生分化，很多国人转化为四处流动的士，更多的则是下降为庶民，贵族军队失去了基本的兵源，出现了“公乘无人，卒列无长”的现象。这就使得军



战车复原图

山东淄博齐陵镇淄河店出土
独辕车复原

郑右库铜戈

战国 韩 兵器

1971年河南新郑白庙范庙出土

长25.2厘米，胡长11.2厘米
戈内有铭文“奠(郑)右库”，“奠”即战国韩的首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右库”是当时韩的一个制造、贮藏武器的部门。



事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于是，有些国家开始在郡县农民中征兵以补充兵源，这是古代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

战国以后，随着郡县制的普遍建立，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征兵制度和常备兵制度，使

各国的军队数量大大增加，军队的成员也由过去以国人为主变为以农民为主。郡县征兵制度是一种普遍兵役制。它的基本原则是每一名到法定服役年龄的男子都要为国家服役一年或二年。这种依法征集的兵源是常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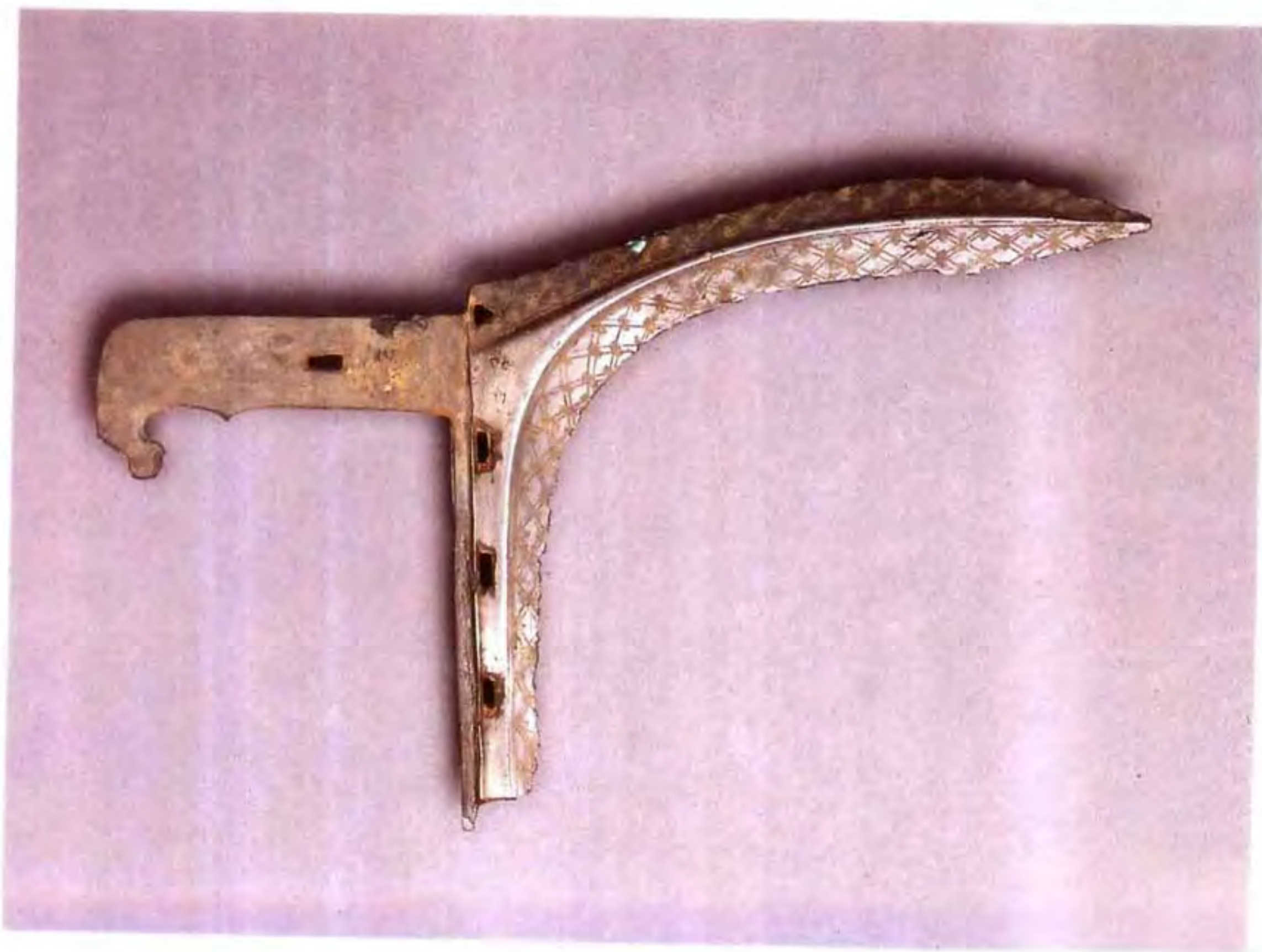
锦纹铜戈

战国 楚 兵器

传湖南长沙出土

长24厘米

戈有四穿，长胡两面均有方胜形锦纹，是用硫化铜特殊工艺处理的结果。经过这样的处理，兵器既美观，又可防锈，反映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冶铸水平。这种精美的兵器，不是一般士兵或低级军官使用的，可能是高级将领的兵刃。





四年吕不韦铜戈

战国 秦 兵器

1957年湖南长沙左家塘秦墓出土

长21厘米

此戈胡上四穿，内上一穿，每两面有铭文，一面刻“四年相邦吕工寺龙丞”，另一面刻一“可”字。“相邦吕”即秦丞相吕不韦，“四年”即秦始皇四年（前243）。秦始皇在前247年即位时才十三岁，政事由相国吕不韦执掌，此戈就是这个时期铸造的。

黑斑点纹铜矛

战国 楚 兵器

湖北江陵雨台山264号墓出土

长25厘米

矛上饰满黑色斑点，系采用表面硫化技术制成，极富装饰性。



军而不是民兵。《战国策·齐策》说临淄有七万户，每户有三个男子可供征发当兵，一役就可以征兵二十一万。据《战国策》等统计，当时七国的兵力大致是：秦、楚等大国，“虎贲之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魏、赵等国家，“武力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而春秋时列国军队多为数万人，长期争霸中原的晋、楚号称万乘之国，兵力也不过三十万。各国兵力迅速增长，战争的规模也日益扩大。战国时的列国大战，交战双方动辄投入军队几十万，像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被秦坑杀的赵军降卒达四十万。被斩首或坑杀的一方士兵即有如此之多，双方投入兵力之巨不难想见。

战争规模的扩大，加速了步兵的发展，使步兵成为各国的主要兵种。

春秋中期时步兵即已出现。它最初是从郑、晋等国对戎、狄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戎、狄多居于山地，擅长步战而不熟悉车战，所以他们多采用灵活、机动的步战与郑、晋等国的车兵周旋。为了有效地抵御狄人的侵略，晋国于前632年组建了独立的步兵编制，“作三行以御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步兵机动性强，不像车兵那样受战场地理条件的限制，适于大规模野战，因而受到各国的重视。战国以后，发展独立的步兵成为当时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步兵成为各国的主要兵种。

当时作战兵种的又一重要变化，是骑兵的出现。较早利用骑兵作战的民族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前307年，赵武灵王为对付三胡

三戈铜戟

战国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长3.43米

三戈铜戟的柃为木制，外裹竹条，以丝线捆绑，再涂漆，挺括坚韧，平滑而有弹性。此戟顶端装有铜矛头和有内铜戈，往下4.7厘米处又装上一无内铜戈，再往下5厘米处再装上一无内铜戈，一矛三戈同柃，当是战车上使用的铜兵器。这种兵器在中国是首次发现。





弩

战国 兵器

弩是由弓箭发展而来的一种远射程兵器，主要由弩弓（竹）、弩臂（木）、弩机（铜或铁）三部分组成。其结构是在弩臂的前端装弩弓，弩臂后部机槽内装弩机，在弓与弩机之间顺弩臂挖一沟形箭槽，用以置箭。使用时，先以弩机的牙钩住弓弦，箭尾抵在弦上，置于槽内，使弩机处于待发状态。发射时，手指扳动悬刀，使弩牙松开，利用弓弦的弹力将箭射出。战国后期发明了连弩。这是一种近射弩机，估计射程不超过20米。在弩机的前端有两孔，可一次射出两枚短箭。

的侵扰，毅然变服骑射，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胡人长处的基础上，实行军事改革，命令军队穿紧袖、紧身的胡服，学习骑射，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列国望风而景从，纷纷建立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作为步兵的辅翼力量。从此，行动迅捷，灵活的

骑兵就驰骋于广阔战争舞台，或深入长驱，绝敌粮道；或袭击敌之前后，追击败兵，成为与车兵、步兵并重的三大兵种之一。

战国时代的武器如戈、矛、戟、剑、弓箭等逐渐改用铁制，与锋利的青铜兵器共同使用。战国各国普遍采用了弩，并发明了连弩、蹶张弩等。文献记载，魏国武卒携带的弩有十二石的拉力，韩国的弩可以射到六百



云纹皮盾

战国晚期 楚

湖北江陵包山楚墓出土

高46.8厘米

盾的正、反面用红、棕红、黄、金绘四龙四风卷云纹图案。

马冑残片

战国 防卫器具



步之外。除此之外，各国还发明了一些新的攻城器械如临（新式临冲）、钩（飞构梯）、冲（新式冲车）、梯（云梯）、轩车等。甲、冑也发展为铁制，“坚甲铁幕”，“惨如蜂蛰”，大大加强了防卫能力，这也是当时军事装备的一大进步。

随着军队的扩大、新兵种的出现和武器装备的进步，战国时的战争方式也发生了很

大变化。春秋时车兵（甲士）作战，敌对双方多选择便于战车运动的旷野地带对阵作战，战争由国君或卿大夫亲自击鼓指挥，车阵一乱，很难整顿队伍重新开战，因而胜负立决。像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鞍之战这些有名的大战都是一天就能分出胜负。晋楚鄢陵之战，是历史上记载打得最为艰苦的战争，也就两天决出胜负。战国时则不同，当时步兵已成为军队的主体，车兵降到次要地位。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大多是步骑联合的野战，包围战、运动战，战线很长，战场阔大，投入部队多，运动时间长。一次战争，双方“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几年才能分出胜负。像魏惠王围困邯郸三年之久，也没能夺取邯郸，只好无功而退；赵武灵王率领二十万军队攻打中山，一直打了五年才收兵；长平之战，秦国和赵国对垒三年，领兵的将领换了好几拨，最后秦施反间计，才以奇兵致胜。这种大规模的持久战，在春秋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春秋以前，文武不分职，平时的执政卿，战时即统兵为将。战国常备军队的建立和战争方式的改变，需要一批具有军事专长的人

战国秦长城遗址

秦长城是在秦昭王时期修筑的。当时秦人杀死义渠戎的王，出兵攻打义渠，夺取了陇西、北地、上郡等地，在当地筑长城以防胡人来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便把这道秦长城跟赵、燕长城连接起来，成为中国第一道长城。甘肃境内的秦长城，西起临洮，经环县入陕西。图为通渭县四洛坪秦长城，由西南向东北，蜿蜒于崇山峻岭之巅。城墙为黄土夯筑，夯层清晰，宽4.5米至5米，最高处达3.5米。





齐长城遗址

春秋时各国已开始修筑长城防御邻国，大规模修建则是战国中期后的事。齐国是各国中最早修长城的国家之一。齐国长城西起山东长清黄河东岸的古防口（今广里店），东到胶东半岛南部的琅邪台，绵延500余公里。现保存最好的在莱芜境内，长50公里。图中一段长城位于泰山北麓和鲁中丘陵的南北分水岭上。

担任各级将官，并要保持军官队伍的相对稳定，因此“寓将于卿”的制度逐渐瓦解，出现了一批专门的职业军事家。“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秦国的魏冉、白起、王翦、李信、王贲，齐国的田忌、田婴、田单，赵国的廉颇、李牧、赵奢，魏国的吴起、庞涓、尉繚，燕国的乐毅、市被、骑劫，楚国的屈匄、庄蹻（楚国的将军称“柱国”或“上柱国”）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家。

春秋战国的军事变革还体现在关塞亭障等防御设施的建设上。

春秋时期各国边界上已经建有关、塞等设施，但平时并不驻兵防守，有战事时才驻兵。像秦穆公派兵偷袭郑国，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一路往东，到今河南偃师，行程二千余里，直到碰上郑国商人弦高才被发觉，所过周、晋的关隘均无阻碍，说明当时没有战事的时候关、塞是不设防的。战国而后，步骑联合的野战、包围战、运动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为防御敌人的奇兵偷袭，阻挡敌人的争夺，各国都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利用山水之险建设关塞亭障，驻兵把守，“备边境，充要塞，谨关梁，塞蹊径”，成为各国的防御要务。

据学者统计，战国时期七雄的关塞重要者有四十多处，如楚国的昭关（今安徽含山东北）、符离塞（今安徽宿县东北）、无假关（今湖南长沙西北），赵国的句注塞（今山西代县西）、鸿上塞（今河北唐县西北倒马关）、高阙塞（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西南）、挺关（今陕西榆林西北）、井陘塞（今河北井陘西），燕国的令疵塞（今河北迁安西）、居庸塞（今河北昌平西北居庸关），秦国的郑所塞（今陕西华县东）、焉氏塞（今宁夏固原东南）、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崤塞（今河南三门峡东南）、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北）、临晋关（今陕西大荔）、湖关（今河南灵宝西）等。《吕氏春秋·有始览》列举当时天下的“九塞”是大汾（魏）、冥阨、荆阮、方城（以上属楚）、崤（秦）、井陘、句注（以上属赵）、令疵、句庸（以上属燕）等。只有魏国境内无名山大川，也无名关险隘。

战国各国的重要关塞都驻有军队，并设官吏掌管。关门的开闭有固定的时间，行人进出要经过检查，有通行证件才能出入，运载货物要征税。关塞附近一般还设有亭、障。亭是了望台性质的建筑，障是驻军的城堡，亭、障一般有报警的烽燧设备。



战国燕长城遗址

燕长城遗迹分布在燕山北麓，由内蒙古东南部的商都，穿越河北，再入内蒙古赤峰延伸到辽东。图中是赤峰市老鹳山的燕长城遗迹。

为了防御敌人的侵扰，当时各国还修建了重要的军事设施——长城。

楚国的长城名字叫方城。以鲁关（今河南鲁山县鲁阳关）为中心，向东经犍县（今鲁山县东南）到泚水，折向东南，到淅阳（今河南泌阳）；向西连翼望山（今河南栾川南），

往南到穰县（今河南邓县）。因为该长城南北与山连接，整体成方形，故称方城。

齐国的长城起于平阴的防门，东向绕泰山西北麓，经泰沂山区，到胶南县小朱山入海。

魏国的长城，一条在西北，南起郑县（今陕西华县），经今陕西大荔、澄城、洛川等县，沿洛水东岸堤防北上；一条起于卷（今河南原阳西），经阳武（今原阳东南），折向西南到密（今河南密县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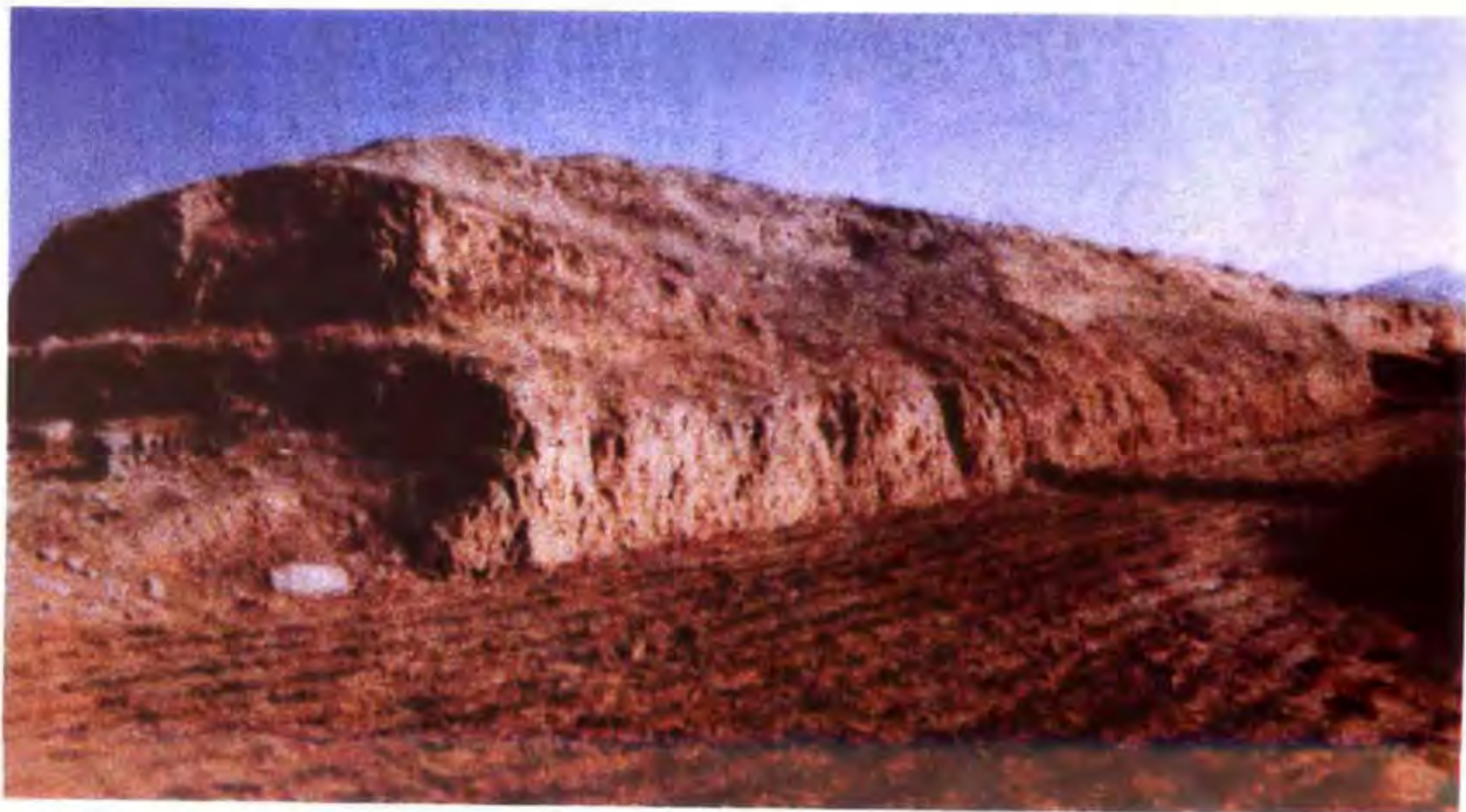
燕长城沿易水走向，西起今河北易县，往东到今天津文安。现在河北徐水县西太行山下发现沿瀑河往东至安新县的一段夯土城垣，这是燕和中山的分界线。

赵长城在漳水以北，起自今河北武安县西南，经今河北磁县，到今肥乡县南。

秦长城有为防御魏国修筑的堑洛长城，现存陕西华阴庙东的一小段夯土城垣；为防御赵国修筑的上郡塞长城，也在今陕西富平发现 750 余米的夯土残垣。

中山长城在今河北、山西交界地区。

除了列国之间的防御长城，赵、燕、秦三国还修有防御东胡、林胡、楼烦、匈奴等游牧部族侵扰的边地长城。



战国赵长城遗址

赵国的长城分布在河北蔚县至内蒙古杭锦后旗，主要是为了防备胡人和匈奴。



杜虎符

战国 秦

1973年陕西西安郊区山门口出土

长21厘米，头端宽3厘米，尾端宽1.5厘米

通体作伏虎形，昂首卷尾。该符从中间一分为二，背部有错金小篆铭文9行40字。大意说：此符右半部秦王掌握，左半部驻军将领掌握。调动军队时，必须左右合符。据研究，这个虎符是秦惠王（前337—前325）在杜地使用的兵符。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虎符，是研究战国符节制度的重要资料。

赵国的边地长城东起于代（今河北宣化），经云中、雁门，西北折至高阙（今内蒙古乌拉与狼山之间的缺口）。现已在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北发现石筑长城，在呼和浩特市北郊的阴山南麓发现土筑长城，一直延续到包头市一带。

燕的边地长城西起造阳（今内蒙古赤峰），东至襄平（今辽宁辽阳）。现已经在河北围场、丰宁、沽源、张北、赤城和内蒙古赤峰、辽宁建平等地发现断续的长城遗迹。

秦的边地长城建于秦灭义渠后，其西端起于临洮（今甘肃岷县），沿洮水往北，折而东行到今甘肃渭源北，又西北到古狄道（今甘肃临洮），北到今皋兰，沿黄河，经今兰州东北行，折而进入今宁夏。现渭源北山、临洮窑店驿、皋兰黄河沿岸及兰州城墙北部，

都保存有秦长城的遗址。

战国调兵施行兵符制度。兵符一般作伏虎形，分成两半，右半存放在国君处，左半发给带兵的将领，必须左右合符才能调动军队。传世的虎符有新郢虎符，上有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郢。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符，行也。”意思是说，兵符右半存放在君王那里，左半存放在新郢。凡是军队调动，用兵在五十人以上，必须与王符合符才能调动。如遇烽火告急的紧急事件，不用合符，也可调兵。陕西西南附近出土的杜虎符，内容与新郢虎符相近。《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符，就是这样的调兵兵符。



第四章

民族大融合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诸侯争霸和战国七雄统一中国的战争、交聘，华、夷各民族之间的杂居、通婚、文化交流和随之而来的民族同化、影响、融合，促使华夏族与周边的戎、狄、蛮、夷混合成为一个庞大的华夏民族，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中国、华夏和蛮夷戎狄

先秦文献叙述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关系，常用的术语是“中国”、“华夏”和“蛮、夷、戎、狄”。因此，在叙述春秋战国四周的少数民族和华、夷民族的融合之前，先要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国”、“华夏”和“蛮、夷、

戎、狄”。

“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周初青铜器何尊的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馭民。”意思是说武王攻克了大邑商，祭祀天帝：我以后就居住在这天下之中的地方，在这里统治天下人民。

可见，“中国”最初的意思是天下之中。周人认为，以现在河南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处于“天下”的最中心，所以他们把居于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周和周封建的诸侯国统称为“中国”。这是从地理概念上说。从民族上说，当时“中国”与四周或杂错相处的蛮、夷、戎、狄部族相比，经济、文化都相对发达，所以周人也同时自豪地把居住在“中国”的民族称为“华夏”——伟大光明的夏。周人克商建立国家之后，经常以“夏”的继承人自居。他们有时称自己是“有夏”，有时说

自己是“区夏”、“诸夏”、“诸华”。诸是多的意思，华夏而称“诸”，说明“华夏”的范围和族姓很广、很多。

“戎、狄、蛮、夷”是华夏民族对中原以外偏僻、落后地区的方国或部族的称呼，有时也总称他们为“夷”，都带有鄙视的意思。

春秋时期，“中国”人眼中的“戎、狄、蛮、夷”还没有“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样严格的方位对称关系。他们对某一偏僻、落后地区部族的称呼，有时称“蛮”，有时称“夷”，有时又称“戎”，或者像商周时一样称“方”，比较随便。战国以后，蛮、夷、戎、狄在方位上有了比较严格的对应概念，但有时对一些具体的少数民族部族的指称也并不甚严格。

第二节 华夏国家周边的少数民族

一、东夷

先秦的东夷，主要指分布在今山东东南、安徽中部和淮河下游的夷人部族和方国，有东夷、舒夷、南夷、淮夷、徐夷等分支。商周时期，夷方、九夷、淮夷、徐夷、奄与薄姑等夷人部落已经很强大，一度曾成为商周的劲敌。周灭商以后，经过艰苦的征伐灭掉了帮助殷商遗民复国的奄和薄姑，把他们的土地封给鲁国和齐国。齐国根据东夷的习俗，简化制度，“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



费敏父鼎

春秋 费 礼器

山东邹城峰山后斗鸡台出土
通高26厘米，口径25厘米
费是姒姓小国，与邾国为邻，并相互通婚。此鼎出于邾国故城附近，系费国敏父为其女出嫁所作媵器。



黄太子伯克盆

春秋 黄

山东沂水出土

口径223厘米，底径13.2厘米，通高2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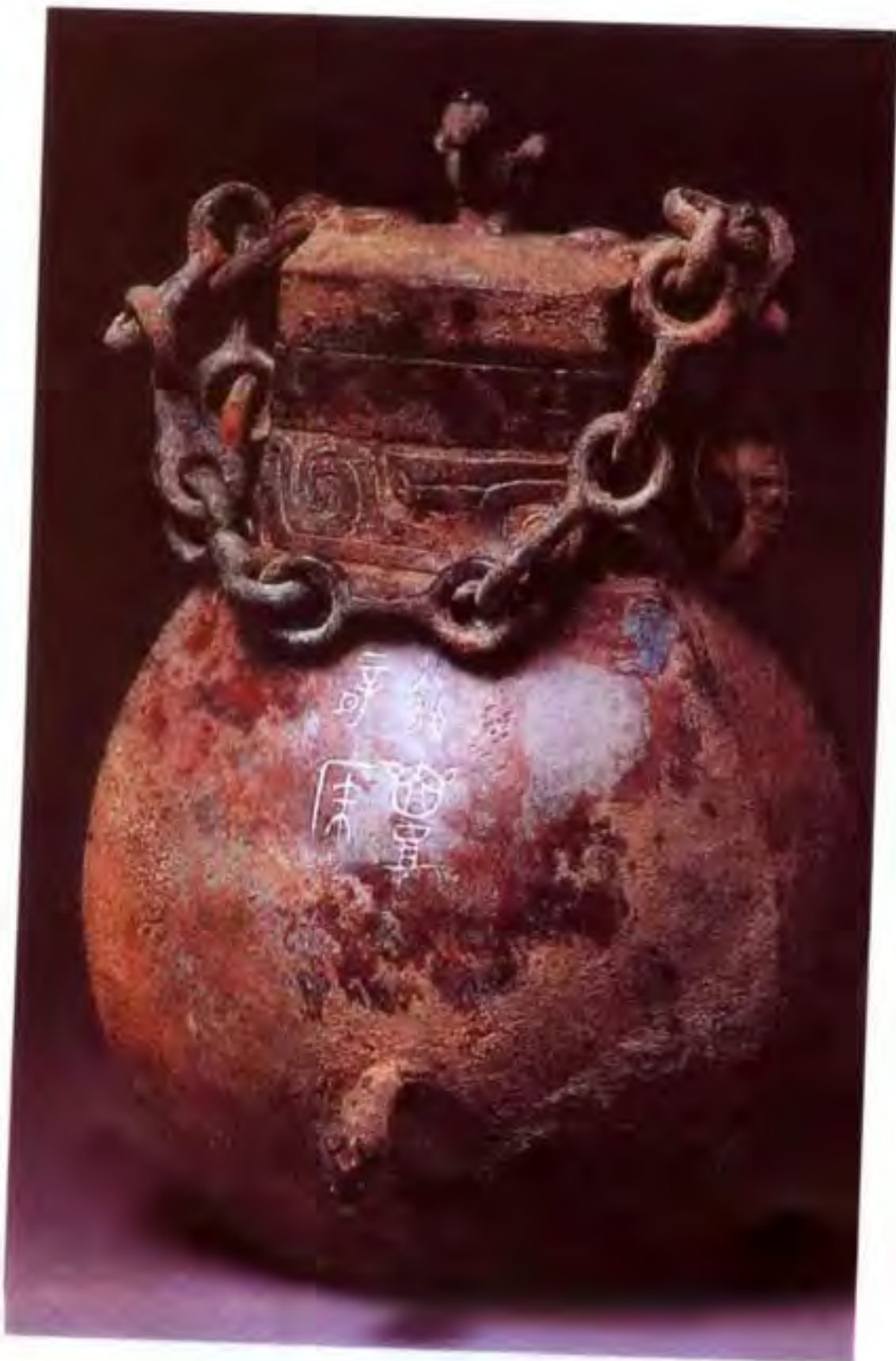
盆盖饰三虎形钮，全器施蟠虺纹和乳钉纹。盆上有铭文。黄国与莒国同为嬴姓，前648年为楚所灭。

薛侯行壶

春秋 薛

山东滕州薛国故城遗址出土
通高22厘米

薛和莒是山东地区除齐、鲁两国之外的大国。薛国姓任，西周初年所封，战国时为齐所灭。壶盖上饰鸟形钮，两侧有铺首衔环。颈部饰窃曲纹，腹部刻“薛侯行壶”四字。



利”，充分发挥其地利特点，发展经济；鲁国则以周文化为主导，对东夷的习俗、制度进行变革。二国通过不同的途径把东夷诸强国纳入了华夏文化的范畴。

春秋初期，今山东境内还有很多东夷族建立的国家。如鲁国附近，就有太昊氏后裔任（在今山东济宁）、宿（在今山东东平）、须句（在今山东东平）、颛臾（在今山东费县）等风姓小国。今山东半岛的东北部则有势力比较强大的莱（今山东黄县东南）、莒（在今山东莒县）、介（在今山东胶县西南）、牟（在今山东莱芜）、根牟（在今山东莒县西南）等少昊后裔嬴姓、盈姓国家，西南部则有阳（在今山东沂南南）、郯（在今山东郯城）、谭（在今山东历城东）、费（在今山东郯城）等盈姓、

姒姓国家。这些东夷族小国，与中原诸夏国家互相通婚、会盟，在齐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主要依附于齐、鲁，因此被认为是诸夏国家的同盟。出土文物证明，当时这些小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与文化发展水平与诸夏国家非常接近，只不过因为他们当时还保留着一些东夷的礼俗，故仍然被认为是东夷族。

这些东夷小国，多数在春秋中期以后被齐、鲁两国兼并。宿、颛臾、须句、牟、根牟等被鲁兼并，阳、介、莱等被齐兼并，莒被楚吞灭，只有郯等几个小国延续到战国时期。不过到战国，华夷文化已经大体融合，一些小的差别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重视。

春秋时期淮水流域的夷族主要有淮夷、徐夷、舒夷三支。

淮夷分布在今淮河下游，以渔猎为主。春秋前期，淮夷与鲁国的关系比较密切，春秋后期归附楚，后又归附越，参加了越王句践北上争霸中原的战争。

徐夷，文献又称徐戎，在今安徽泗县北。西周时徐夷相当强大，传说当时徐夷的首领徐偃王曾被封为东方诸侯之长，统辖淮、泗方五百里的地区，后被楚国打败。春秋时，徐夷作为东方大族，仍有很大的势力，它曾经攻伐群舒，与齐国一起伐莒氏，与楚国一起伐莒，前512年被吴国吞并。

舒夷，在今安徽舒城、庐江、桐城、巢县一带，有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分支，故文献又称群舒。群舒春秋时曾受到徐夷和齐、鲁的进攻，后来在楚的攻击下成为楚的附庸。吴国强盛后，群舒恃吴叛楚，被楚先后攻灭。

二、北狄

北狄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的通称。

春秋时的狄是商周鬼方民族的后裔，分白狄、赤狄、长狄三支，地域分布很广。

白狄原在今陕西东北，后逐渐向山西西北、河北北部与中部一带迁移。前601年，白狄曾经配合晋国伐秦。东移的别种姬姓一支则在今河北中部建立了肥（在今河北藁城）、鼓（在今河北晋县）、鲜虞（在今河北正定）等国。前530年至前527年，晋先后灭肥、鼓，鲜虞改称中山。进入战国后，中山被魏国攻占，之后于前378年复国，迁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仍称中山。

战国时，中山国虽处于燕、齐、赵三国之间的小国，但一度曾相当强盛。前323年，中山与燕、韩、赵、魏“五国相王”，互

镶绿松石填漆纹铜方壶

战国 中山
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通高45厘米



山字形器

城国 中山

1978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高119厘米，每件重约56公斤

共出土五件，但器上铭刻的编号有“七”字，可知原葬不止五件，其余二件可能早年被盗。器呈“山”字形，其上部属三尖锋，两下角延伸回旋成雷纹，下部中间有圆套，套内出土时残存木灰，说明它原插在木柱上，形如大型铜戟。此器可能为象征王权的礼器。



刺猬形金饰件

战国 胡

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

长4.5厘米

共10件，均作前行觅食状。



尊为王，说明它在列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78年中山国都城灵寿的发掘，为揭示当时中山国真实的历史面貌提供了佐证。出土文物资料证明，前314年，中山曾参加了齐国伐燕的战争，夺取燕国方几百里的土地，攻占了几十座城池。中山王墓出土的礼器、建筑均保持了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但其文字、器物和墓葬均与华夏族相同，这说明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已与华夏文化有了充分的融合。

赤狄是狄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主要分布

在今山西境内，有潞氏（在今山西潞城东北）、甲氏（在今山西屯留以北）、留吁（在今山西屯留南）、铎辰（在今山西长治东南）、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垣曲东南）、廆如（在今河南安阳西南）诸部。赤狄与晋国经常通婚，像晋献公从狄娶二女，生重耳、夷吾；重耳奔狄时又娶狄女季隗，随重耳出奔的赵衰娶叔隗；晋景公的姐姐嫁给潞子婴儿。这说明了赤狄与晋的良好关系。后来，由于潞国内乱，晋景公的姐姐潞子夫人被杀，晋国出兵灭潞。以后晋相继灭亡了赤狄各部，兼并了他们的土地，其族部亦汇入华夏族。

长狄分布在今山西长治迤东至山东边境一带。春秋初期，长狄郟瞒部曾攻入宋国，春秋中期后又多次劫掠齐、鲁、宋、卫诸国，后为齐所败。

战国以后，狄人大多并入华夏族或与华夏族融合。当时燕、赵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主要是晋北的林胡、楼烦之戎和燕北的东胡、山戎。

林胡，又称林人，分布在阴山以南今内



虎咬牛金饰牌

战国 胡

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

长12.6厘米，重200克

共4件。是与鹰形金冠配套的腰带饰。中间是匍匐状的牛，两侧四只猛虎噬咬牛的颈部和腰部，牛角分别穿透两侧的虎耳。



卧羊铜饰

战国 胡

1955年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出土

野猪形饰件

战国 胡

内蒙古伊克昭盟征集

长 26 厘米

猪嘴贴近地面，作觅食状。
背部有一环钮，铸造不太规
整。



铜胄

战国 胡

内蒙古赤峰美丽河出土

高 23 厘米，下宽 19.5 厘米

顶上有方形穿孔，可系装饰
帽饰。护耳部位下垂，留出
脸与后颈部，利于头部转
动。



蒙古南部至陕西榆林一带。楼烦，又称楼烦胡，分布在林胡以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山西北部地区。东胡，活动在今东北地区的南部、内蒙古东部和河北的东北部。考古发现的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即东胡部落的遗存。东胡以东有秽貊、肃慎。山戎居住在今河北太行山以北的燕山地区、北京军都山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直刃羊首青铜短剑和铜削刀即是山戎部落的遗存。

林胡、楼烦、东胡都是属于胡人的游牧部落。他们经常侵扰赵国和燕国的北部。赵武灵王为了抵御“三胡”的侵扰，向胡人学习，“胡服骑射”，加强了军事力量，大破林胡、楼烦，在开拓边地的基础上建立云中、雁

长角鹿形铜饰件

战国 胡

196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出土



鹰形金冠

战国 胡

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

冠高7.1厘米，重192克。圈直径18.5厘米，重1002克。金冠由冠顶和额圈组成。冠顶作半球面形，花瓣状，上有狼吃羊图案的浮雕，上面傲立一只展翅待飞的雄鹰，用绿松石做成鹰的头和颈，尾部可以活动。额圈由三条半圆形的绳索式金带并合而成，带头分别有伏虎、卧羊、卧马的浮雕图案。这可能是胡人单于的王冠。

门、代三郡，并修筑长城，从代（今河北蔚县）北上，沿阴山直到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临河以北的石兰计山口。至今我们还可以在阴山南麓找到赵北边长城的遗址。

林胡、楼烦以北，东胡以西的广大地区（今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附近）是匈奴活动的区域。战国末，匈奴成为赵国北边最严重的威胁。赵孝成王时，良将李牧“大破匈奴十余万骑”，灭檐褫，破东胡，降林胡，迫使匈奴北遁。燕昭王时的秦开，也“破走东胡”，使东胡退却千余里。燕于是在开地的基础上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修筑长城，成为中国最北部的边墙。



青铜阴阳铜剑（左）

夏家店文化上层

内蒙古赤峰宁城南山根出土
通长21.6厘米

剑身呈曲刃柳叶形。柄部两面分别铸男女裸像，女性双手交叉护胸，男性双手下垂至腹部。男女裸像性特征明显，以此作为装饰，可说明此剑使用者的身份特殊，又或与使用此剑部族的特殊礼仪或信仰有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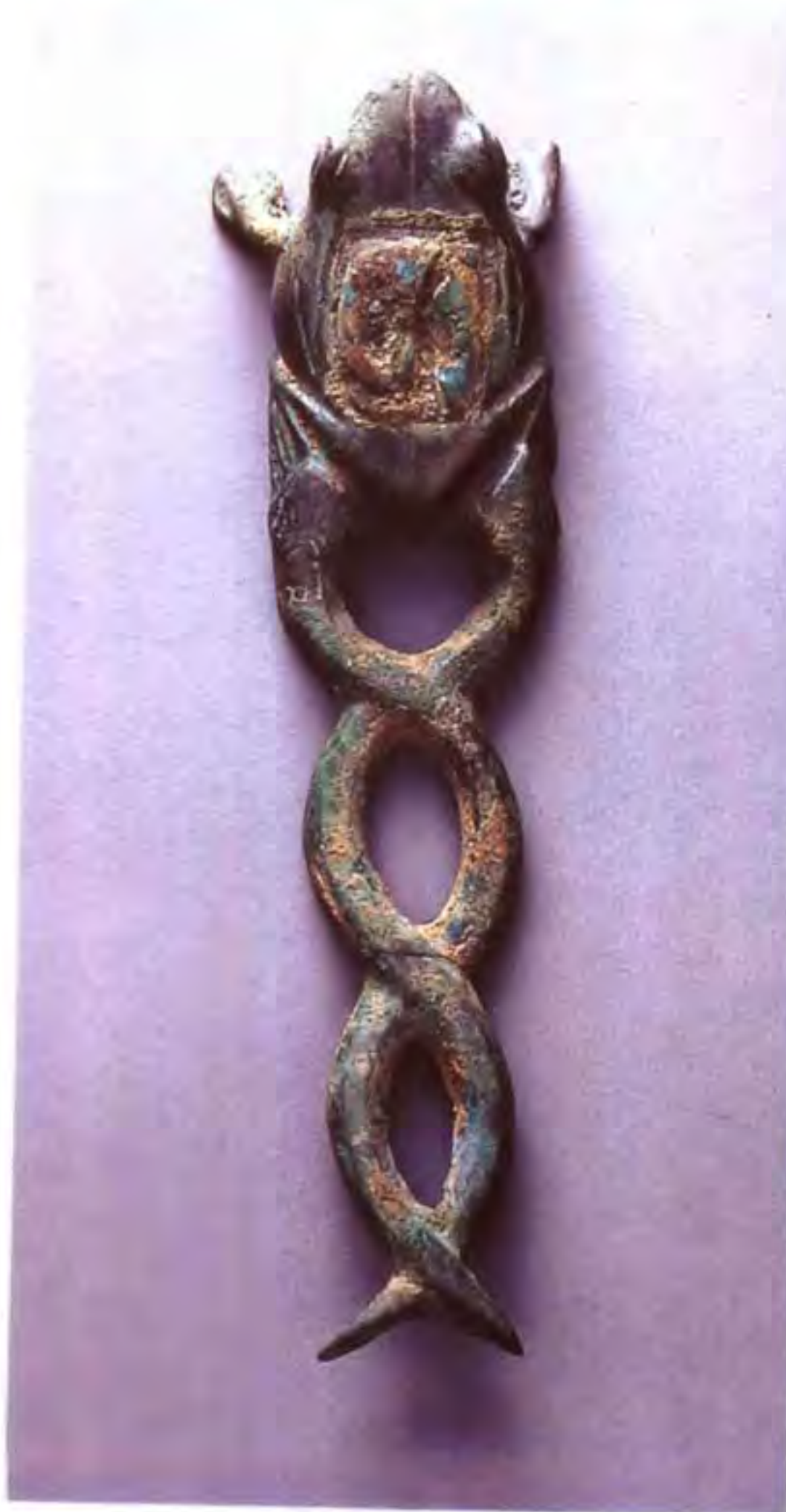


鹿纹青铜短剑（右）

夏家店文化上层

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出土
通长26厘米

双刃平直，剑柄两侧分别铸三头雄鹿和三头雌鹿，造型别致，装饰图案形象生动。



蛙蛇形铜马饰

战国 胡

1976年辽宁凌源三官甸子出土

长20厘米，宽5.7厘米

这件马饰上的蛙体形肥胖，双目突起，前足踞地，后足銜于互相纠结的双蛇之口，造型生动。东胡逐水草而居，擅长骑射，与燕、赵地区有经济联系，也不时对燕、赵地区进行侵扰。这件马饰反映了东胡游牧生活的特点。

三、西戎

春秋战国所说的“戎”，主要指华夏族西边的氐羌各族。

戎是一个支系繁多又不相统一的部族，分布范围很广。《左传》等书记载，春秋时期，秦国西部分散着绵诸之戎（在今甘肃天水附近）、犬戎（原居陇西渭水上游，逐渐向东发展）、翟戎（在今甘肃临洮附近）、獯戎（在今甘肃陇西北）、义渠之戎（在今甘肃东北部、陕西北部及宁夏少数地方）、大荔之戎（在今陕西大荔附近）、乌氏之戎（在今甘肃平凉西北）和胸衍之戎（在今宁夏盐池附近）。

西周末年，申侯联合缙和犬戎攻镐京，杀幽王。平王东迁后，命秦襄公从西戎手中夺取岐周旧地，经过几十年与诸戎斗争，一直到秦武公，秦才廓清岐周以东诸戎的势



翼兽形提梁青铜卣

战国 羌戎

甘肃泾川出土

通高 31 厘米

翼兽造型较早见于西亚，中国约在战国时期才开始出现。

力，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并把与诸戎的斗争转向陇西。

前461年，秦灭大荔，之后又灭绵诸、乌氏、翟、獯，领土向西大大扩展。义渠和羌戎

是戎族中最大的两支。义渠戎曾建立义渠国，“筑城郭以自守”，也有比较稳定的农牧经济，所以秦对它采取的是蚕食而不是驱逐的政策。前314年，秦夺取义渠二十五城。几



镀金铜牌

战国 胡

宁夏出土

铜牌透雕猛虎捕猎的情景，强壮有力的猛虎四肢微蹲，大口咬食小鹿，反映出游牧民族的强悍特征。

鼎形铜灯

战国 羌戎

甘肃平凉庙庄出土

高 32 厘米

器物上面是铜灯，下面是铜鼎，灯盘上有两个鸭头，反过来时可以扣住支架。灯架的底部被紧紧衔在兽嘴里，上可点灯，下可盛油，构思奇巧，匠心独运，是难得的艺术杰作。



青铜麋鹿

战国 羌戎

甘肃张掖龙渠乡出土

长 10.5 厘米

鹿角延伸至背，造型生动活泼。战国时期，河西走廊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方，青铜动物雕刻是草原游牧民族十分喜爱的饰件。



十年后，秦诱杀义渠王于甘泉，义渠遂灭。羌戎则因为秦对它发动战争而分化，形成很多分支流徙各地。

除了陇西诸戎，秦国东部、晋国西部还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陆浑之戎，骊戎，姜戎（在陆浑北），茅戎，戎蛮氏等；中原北部还有北戎。这些戎族，春秋时大多为晋所灭。春秋后燕国的北部边境有山戎，分布在今河北东北、内蒙古南部，其势力以无终为最强。无终原在今河北卢龙、迁安一带，后徙至今河北蓟县、玉田一带。

四、南蛮

“蛮”，西周和春秋文献材料中大多是华夏之外少数民族的统称，与广义的“夷”相当。“蛮”专指长江中游汉水流域、淮河中上游的少数民族，最早出现于战国。

蛮是中国古代南方的一个大族系，其源与远古时期的三苗有关。春秋早期，长江中游的蛮族国家主要有楚、罗（在今湖北宣城西）、卢（在今湖北襄阳西南）、庸（在今湖北竹山）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楚。



青铜短剑

春秋战国

该剑刃呈柳叶形，中部起脊，护手呈兽头形。



羚羊纹铜牌

战国 羌戎

甘肃静宁出土

长8.3厘米，高6.2厘米

铜羊昂首前进，矫健机灵，形态可爱。头部至臀部之间，有一悬空的提梁。

楚的祖先来源于“祝融八姓”之一的“芊”。春秋初，楚作为长江中游众多蛮族的分支之一，僻居今湖北襄阳西南的荆山，并不强大。后来，楚沿汉水南下，在长江边上的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的纪南城）建都，先后灭掉罗、卢、庸等国，迫使江汉之间的蛮族全部归附，才成为长江以南最大的强国，称霸诸侯。不过，春秋时楚虽然强大，但仍以蛮族自居，中原国家也不承认它是“华夏”。

文献记载楚的南边还有“群蛮”、“百濮”。

群蛮的一支在今湖南洞庭湖以南的沅、湘、澧、资流域。楚悼王时，楚兼并了这些地区，在当地设立君长，建立行政管理机构，才使这支蛮族得以开化。不过，这支蛮族社会发展比较缓慢。汉代的武陵蛮即其后裔。

百濮分布在今湖北西南部和湖南境内，部落众多。春秋时，楚与百濮联系较多，也经常夺取百濮的土地，但楚并未完全将其同

化，不少濮人受楚逼迫向西南迁徙，分布到了更加广大的地区。

五、百越

“百越”是诸多越族分支的通称，其名称最早出现在战国。春秋战国时，越族分布于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及苏南、皖南广大地区。现代考古证明，中国东南地区以几何印纹硬陶为特征的青铜文化就是古越族的文化遗存，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原的商代。

越族文化、语言都不同于楚人。其中居于今江苏南部的一支是吴国的土著居民，居于今浙江北部、中部的一支是越国的土著居民。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发展很快，到春秋末成为诸侯争霸战争的主角，为中国东南地区的开发立下不朽的功劳。

吴，传世文献或金文常写作句吴、攻敌、攻吾、攻吴。相传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出奔到吴，遵照越族土著的风俗，断发文身，被拥

原始青瓷尊(左)

春秋早期

1989年浙江长兴石狮村土墩墓出土

口径22厘米，底径16.6厘米，高17.8厘米

原始青瓷盂形鼎(右)

春秋晚期

1995年浙江上虞出土





龙兽纹提梁铜盃

春秋晚期 越

1982年浙江绍兴306号墓出土

高29厘米

立为吴太伯，以太湖地区为中心建立吴国。吴有发达的传统水田农耕文化，太伯又把中原先进的建筑、铸造技术传到这里，因此成为越族发展最快的地区。到春秋吴王寿梦

时，吴与中原诸国发展外交关系，乘机攻楚，夺取了淮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大片的土地，成为与楚抗衡的强国。

越又称于越，其早年的历史不详。到春



玉镇

战国 越

1996年至1998年浙江绍兴印山越王允常陵出土

底径7.5厘米，高6.5厘米

八棱形，实心，顶有穿孔小钮，通体阴刻卷云状纹饰。

青铜插座

战国 越

1982年浙江绍兴306号墓出土

通高16厘米，长6厘米，承插柱高6.5厘米，座体高7厘米

承插柱上段为四面八角体，下段为四面体，中空，四面各饰蟠螭纹。座体为方形，每面饰阴刻宽体凤纹六组，原镶嵌的绿松石已脱落，座体之内浇灌铅汁，与承插柱下端相接，使整个插座稳固。座体四角下端各有凸榫，与垫脚连接。垫脚为四个人体跪像。此器制作精美，应是一件实用器。



青铜铎

战国 越

1996年至1998年浙江绍兴印山越王允常陵出土

柄长23.8厘米

套内装有长条扁方形木柄，腔内有一可活动的圆条木舌，出土时木柄、木舌保存完好，摇动木舌，仍可发出清脆撞击声。

秋末期，越国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今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区。前496年，越王句践大败吴王阖闾。两年以后，句践被吴王夫差俘虏，越臣服于吴。后句践卧薪尝胆，加强国力，于前472年灭吴，北上称霸诸侯。句践之后，越王鼫与至越王无强攻灭滕、郈等国，继续维持霸权，后因贵族争权斗争愈演愈烈，国力削弱，被楚消灭。

越族的分支还有瓯越、闽越、南越等。瓯越分布在今浙江南部，闽越分布在今福建地区。南越，也称扬越，分布在今广东、广西。这些越族支系历史悠久，不过春秋战国时与华夏诸国接触很少。

六、巴蜀和西南夷

巴是先秦古老的部族之一，其活动区域主要在今湖北西部、四川东部和陕西汉中一带。春秋初期，巴国的中心在今湖北西南，和庸等“群蛮”与楚有一定的臣附关系，但也



青铜盬

战国 越

1982年浙江绍兴306号墓出土

上部为带盖甑，下部为鬲式带把盬。盖顶平坦，中部为一半圆环钮，钮内有活动圆环，四个圆环状绳纹立钮等距布列。盖上饰缠体蟠螭纹八条、绳纹一道、小蟠螭纹三道，各环成带。甑体上段饰勾连蟠螭纹带二道，下段饰三角形垂叶纹一周。鬲式盬把手与流嘴成直角。把手为旋合式，流嘴作螭首形。盬体中段饰宽体勾连蟠螭纹一周，上下饰三角形垂叶纹。此器为提取甑内某种物品的蒸馏汁液使用，其流嘴便于倾倒。



玉耳金舟

战国 越

1982年浙江绍兴306号墓出土

高6厘米，口径11.2厘米至14.2厘米，重285克

器身由黄金锻打制成，敛口，卷沿，腹微鼓，呈椭圆形，平底，双耳为玉质。

玉虎

战国 越

1982年浙江绍兴306号墓出土

长9.5厘米，厚0.2厘米

玉质呈半透明状。虎形生动，精雕细琢，器身双面阴刻勾连云雷纹。



经常发生战争。前661年，楚联合秦、巴灭庸，巴分得庸国西部即今川东巫山、奉节一带的地方，控制了由长江中游进入上游的枢纽，政治中心开始从三峡地区向今重庆地区发展。

进入战国后，楚兼并了巴在今湖北清江流域的土地，巴在汉水流域和陕南的地盘也被秦、楚蚕食，巴的政治中心遂转移到川东。战国中叶时巴曾一度强大，并联合蜀国齐力攻楚，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不过，随着楚国

原始青瓷香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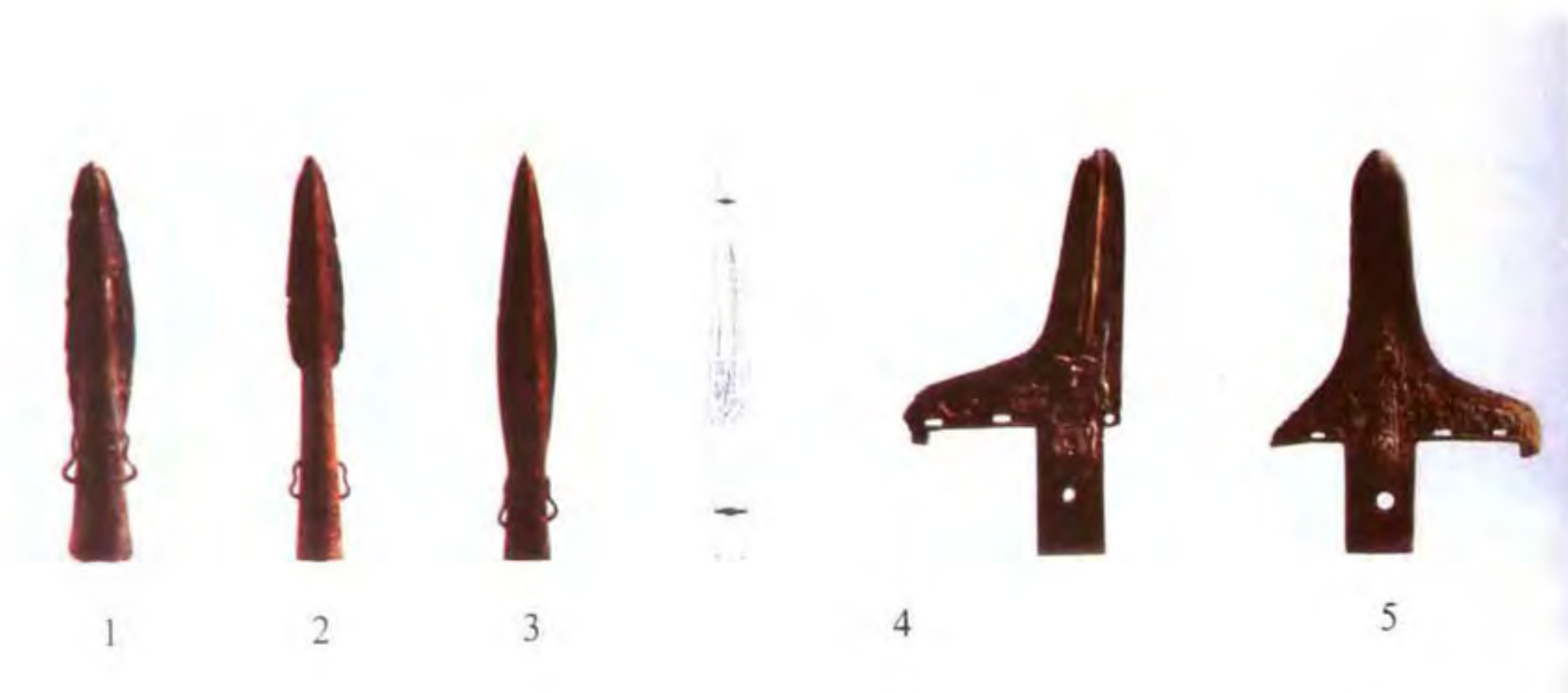
战国 越

1992年浙江余姚老虎山1号墩出土

口径13厘米，径8.4厘米，高24厘米

盖和塔形钮上均有圆形或三角形镂孔，使用时，香气可从镂孔中冉冉上升。造型别致，形式优美，为不可多得的原始青瓷之珍品。





巴文化兵器

战国 巴
1997年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出土
1. 龙蛇纹铜矛
2. 铜矛
3. 铜矛
4. 巴蜀铭文青铜戈、铜矛
5. “双胡式”青铜戈

的发展，巴的领土不断被楚蚕食，力量越来越小，到楚威王时仅有川东北一隅之地。前316年被秦所灭。

蜀是长江上游文明发展最早的民族和方

国。春秋中叶以前，长江上游部落、部族、方国以十百数，而以蜀最为强大。蜀在春秋战国时正当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时期，势力最强大时疆域北抵今陕西汉中，西达羌氏，南



虎钮钟

战国 蜀
1989年四川彭山出土
高55厘米，口径32.5厘米
椭圆形，有沿外侈，短颈广肩，上腹略鼓。虎形钮，饰云雷纹。

牛鼠纹长矛（左）

战国 蜀

1980年四川新都马家乡出土
长21厘米

上叶狭窄，前聚成锋。圆釜直达矛尖，凸脊，长骹双耳，耳间饰牛鼠纹，近釜处饰雷纹一周。五件一组，其中一件饰饕餮纹。



虎纹中胡戈（右）

战国 蜀

1972年四川郫县出土
胡长8厘米，阑宽2.6厘米，
通长25.3厘米

援后部至内两面饰半圆雕虎头，戈一面铸椎髻、跣地、腰悬宝刀形人，另一面铸巴蜀兵器上常见的符号。



到今四川凉山及云南北部，东与川东的巴国相接。春秋中期，杜宇王朝迁都于今四川成都。成都平原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达，又盛产金、银、铜、铁、铝、锡等，为蜀国的

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春秋战国时与蜀国交往的主要是秦和巴。春秋战国之际，秦国势力发展到汉中地区，与蜀接壤，不断发生冲突。前380年，秦

平肩圆刃钺

战国 蜀

1980年四川新都马家乡出土
长18.5厘米

平肩，折腰，釜为椭圆形。骹有十棱，腰上阴刻巴蜀符号。出土时五件一组，形制完全相同。





兽面纹长援戈

战国 蜀

1980年四川新都马家乡出土
长31.9厘米

长援有脊，近阑处饰兽面纹，近刃处阴刻巴蜀符号。

伐蜀，蜀无力与秦抗衡，于前369年朝秦。当时蜀与巴连年交战，实力逐渐削弱。后秦惠文王派兵伐蜀，于前316年灭蜀，推行羁縻政策。由于蜀地不断发生内乱，秦于前285年设置蜀郡，正式把巴蜀纳入华夏的版图。

西南夷在巴蜀西南，在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地区，有夜郎、滇、邛都、昆明、嵩、笮都、丹骊、白马等氏族部落。夜郎的都邑在今贵州桐梓，是西南夷中最大的国家，位于今贵州西部、北部以及云南北部和四川南部的一部分。前3世纪初，楚灭夜郎。滇位于夜郎之西，在今云南昆明滇池一带。前

279年左右，楚顷襄王派庄蹻征服滇国，因断绝归路，自立为王，王都在今云南晋宁。邛都在滇之北，相当于今四川西昌东南。云南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兵器，可见，当时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已经很发达。

第三节 华夷民族的大融合

春秋时期，随着蛮、夷、戎、狄的内迁



蝉纹菱形矛

战国 蜀

1993年四川彭县出土

长28.3厘米，宽8.6厘米

短骹宽叶形，弓形双耳，散饰浅浮雕手纹、变形蝉纹。

及华夏族与蛮、夷、戎、狄军事斗争的加强，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

从西周晚期开始，四周的少数民族不断内迁或内侵中原，使中原地区形成了“诸夏”和蛮、夷、戎、狄交相杂处的局面。其中经常入侵或内迁的，是西方和北方的戎、狄（如獫狁、姜氏之戎），东南方的淮夷、徐夷和南方的楚。春秋以后，戎、狄、蛮、夷大规模汇聚中原：今河北南部、河南中部、山东东部的邢国、郑国、齐国之间有北戎，今山西晋南晋国南部有茅戎、骊戎，今山西西部、河北、山东晋、燕、齐之间有狄，今河南洛阳周围有陆浑、扬拒、泉皋、伊洛之戎，今太行山北部燕国之北有山戎，今淮水流域鲁、卫之南有淮夷、徐戎与群舒，“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因为南夷和北狄的交相内侵，中国微弱得像一条将要断绝的线。在这种形势下，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拉开了百余年争霸战争的序幕。“尊王”，是打着周王的旗号以团结诸侯；“攘夷”，则明确地表明抵御蛮、夷、戎、狄，“严夷夏之别”。“尊王攘夷”使华夏诸国团结起来，维护了先进的农耕文明，抗击了游牧民族对中原文化的破坏。戎、狄由被攘而分散，楚、吴、越由被攘而同化，不少少数民族都被吸收到华夏的行列，民族融合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到春秋末年，齐、晋、秦、楚、吴、越等大国先后灭掉了邻近的少数民族部落：北方的狄族大都被晋国吞并，东方的夷、戎大都被齐、鲁征服；中原和西方的戎被秦、晋、楚等瓜分；楚先后灭掉了舒、蓼、庸、麇、庸、夔等，又征服巴、濮；吴铲灭了徐夷。还有一部分蛮、夷、戎、狄被大国强行迁移，像晋国把姜戎迁移到南部边境，齐国把莱迁移到郕。南方的楚、吴、越则在争霸战争中被同化，自己承认是华夏族的一员而成为华夏的盟主。这

样，东南西北各个强国都带着与蛮、夷、戎、狄融合的成果交汇成一个民族——华夏族。从此，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都进入了华夏族的版图，夷、蛮、戎、狄成了更远的“四裔”的少数民族的概念。

“中国”与蛮、夷、戎、狄频繁密切的政治联系也促进了夷夏的融合和交流。为了称霸的长远目的，中原国家经常与周边的蛮、夷、戎、狄“修好”或加强联合以解决后顾之忧。晋国的魏绛“和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晋悼公时，魏绛力劝晋侯与周边的戎狄和好，以加强自己的实力。他认为和戎有三个好处：一、与戎狄修好，用宝物去换取戎狄的土地，可以扩大自己的地盘；二、和戎之后，戎狄不来侵扰，边界安定，有利本国经济的发展；三、戎狄服属晋国，可以从舆论上震动四邻，使诸侯全心全意地归附晋国。晋侯听从了魏绛的建议，派他与诸戎结盟，安抚诸戎。从此，晋国免除了后顾之忧，一心南下与楚争锋，取得了复霸中原的胜利。另外，狄戎与华夏族在政治或军事斗争中互相支持，也加强了夷夏之间的联系。如晋公子重耳出亡到狄，狄人给他很好的照顾和礼遇，并把伐腐咎如所得二女季隗、叔隗嫁给重耳和重耳的谋臣赵衰，这是夷夏融合的一段佳话。战争和政治联系是民族交往最激烈的方式，各民族通过交战和政治往来达到互相认同，是民族融合的必经之路。

各民族之间的流动、通婚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渠道。春秋以后，戎、狄、蛮、夷从四方汇聚中原，战争的因素固然占了很大比重，但各族之间的“玉帛相见”、“交赞往来”也史不绝书。当时夷夏通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以晋国为例，晋献公曾经娶了戎族的两个女儿，大戎狐姬生了重耳，小戎子生了夷吾。后来晋伐骊戎得了骊姬，生奚齐。晋



虎纹铜戈

战国 蜀

1991年四川彭州出土

长23.5厘米

文公重耳出亡时，狄人把季隗、叔隗嫁给重耳和赵衰。晋人不仅娶戎族的女儿为妻，也嫁女给戎狄，像潞戎潞子婴儿的夫人就是晋景公的姐姐。连周襄王也娶狄人的女儿为王后，楚国、吴国等也与中原各国有着通婚关系。这种血统的混合，对民族融合无疑是一个促进。

民族融合促进了戎、狄、蛮、夷经济的发展。当时，西方和北方的戎、狄一般还处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阶段，华夏的经济和生产技术传到那里后，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使一些蛮、夷、戎、狄建筑了都城，变游牧为定居。中原国家还经常派一些手工业者到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如鲁季孙氏派“执斲、执鍼、织紵皆百人”，到楚国传授经验，用这种办法与楚媾和，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无疑是一个促

进。反过来，戎、狄、蛮、夷的经济因素对中原各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姜戎被迁到晋国的南部边境后，经过近百年的开发，原来的穷乡僻壤变成了良田沃野，这对晋国经济的发展和夷夏的融合都是一个推动。齐桓公北伐山戎，把山戎的冬葱和胡豆引进中原，丰富了中原的农产品和食物结构。其他像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和南方吴、楚的青铜冶铸技术、漆器制作技术传到中原，对中原的手工业发展也是有力的促进。

春秋时，由于民族融合和彼此影响的步伐加大，很多蛮、夷、戎、狄的首领精通华夏的传统典籍，表现出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和向往。前559年，晋国使者与姜戎首领驹支发生争辩，驹支虽然声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货市不通，言语不达”，但在会见结束时却能像华夏国家的君主一样背诵一段



鸟形铜鼎

春秋

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
高16厘米，长22.9厘米
全器成鸟形，流与鑿均作鸟首状，嘴部可开合，比较少见。出土地属燕国。

《诗经》中的诗句才退场。前525年，鲁昭公在宴会上问郑子少昊氏为什么用鸟的名字来称呼官名，郑子侃侃而谈，引用了很多历史典故。孔子听了十分佩服，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意思是说，他听说天子之国遗失的立官传统，应该到四周的少数民族那里去学，这真正确呀。在文化方面，受华夏族影响最大的是楚、吴等国。文献记载楚国教育太子的必读书目是《诗》、《书》、《礼》、《乐》、《春秋》、《世本》、《类语》、《故志》、《训典》等。春秋晚期，吴国公子季

札在鲁国观看周朝的音乐舞蹈，乐工们每奏一章，季札就给一个精当的评价，说明华夏文化和吴文化的融合已经深入人心，春秋晚期吴能称霸中原，这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通过剧烈的战争由诸侯割据走向统一的巨变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各个历史文化区域在政治、经济、军事统一的带动下开始了向“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方向迈进，华夏民族也在与周边少数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更加扩大。与春秋时

期相比较，战国时期华夏诸国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融合是主要倾向。虽然他们之间也有战争，也有矛盾，但融合是主流。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各地战国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有许多共同的因素，虽然各个地区由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内容不同，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有一定的差异，“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但这种差异是统一的华夏文化之下的差异，与商周时代不同族系之间“异姓”则“异德”的情况大不相同。最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战国百家争鸣。虽然儒

家起源于鲁国，墨家始于宋国，道家源于楚国，法家源于三晋、盛行于秦国，阴阳家盛于齐，纵横家多出于周、卫，但各家思想的宗旨大都着眼于国家的统一，都是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封建国家出谋划策。即使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也只是方言和异体字、简化字的差异，在语法原则和构字原则上各国没有区别。

战国时期的蛮、夷、戎、狄，在方位上有了比较严格的西戎、北狄、东夷、南蛮的对应概念。此时居于东方淮、泗之间的东夷，

敦

战国 蜀

1980年四川新都马家乡出土
高24厘米，腹深9厘米，口
径19厘米

盖与身大小形状相同，各有
三个扁体虎形饰。



已与华夏族融为一体。当时华夏四边活跃的戎、狄、蛮、夷主要是燕、赵北边的山戎、东胡、楼烦、匈奴、秽貊、肃慎。此外，与赵、齐、燕接壤的，还有白狄所建立的中山国，秦西北地区的义渠、大荔、羌戎等，秦之南、楚之西的巴、蜀、西南夷等，楚南方的百越。

战国初期，大部分居住在中原或靠近中原的少数民族都被融合于华夏族或与华夏族处于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战国中期以后，秦在霸西戎的基础上先后征服了巴、蜀，在

那里实行了适合当地民族特点的改革。不久，又向西北用兵兼并了义渠，扩大在西北的势力。楚则趁越国内乱灭亡了越国，将其改成楚的一个郡。北方的强国赵通过实行军事改革，学习胡人的装束和骑射技术，攻取了东胡、林胡、楼烦等部族的大片土地。燕攻破东胡，开拓辽东，设立云中、雁门、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修筑长城。楚将庄跻与秦作战失利后率兵入滇，自立为庄王，为加强华夏与西南民族的

插栓式人首方柱形器

战国 百越

1973年广东四全出土

一件长24.1厘米，宽2.3厘米，厚2厘米，底部插栓8.7厘米；一件长23.5厘米，宽2.2厘米，厚2厘米，底部插栓8.2厘米

该器可能是用以固定棺木的铜制部件。



联系做出了贡献。战国晚期，秦在吞灭六国的同时，征服瓯越和闽越，进而又统一南越，加强对西南夷的管理，最终统一了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

第四节 大一统观念 对多民族国家形成的 舆论先导作用

战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除了上述政治、经济、军事的原因，“大一统”理论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舆论先导作用也不可忽视。

从春秋的华夷融合到战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尊王攘夷”、“严夷夏之别”到少数民族对华夏族认同的转变过程。春秋时期，秦、楚等国分别在西方和南方开拓疆土，力图称霸中原，但中原华夏各国一直将其视为戎蛮，他们自己也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战国以后，“尊王”的旗号已经被兼并所代替，“攘夷”的任务大体完成，原来被视为戎蛮的秦、楚两国，与韩、赵、魏、燕、齐并列七雄，同称“冠带”之国，纵横捭阖，为统一中国而改革变法、富国强兵。春秋时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与诸夏交往杂处的各族，此时不少已经同化。春秋以后形成的中原三晋、东方齐鲁、南方楚，西方秦，北方燕几个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无不以华夏为核心融化了一些少数民族及其经济、文化因素，因此，在华夏民族已经成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实现天下一统，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在战国兼并和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理论上大一统观念对兼并的发展和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的形成起了促进和舆论先导的作用，对中国长期的封建政治和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所谓“大一统”观念，就是主张华夏族和四方的“五方之民”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战国时还没有实现大一统，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讨论了“大一统”这个课题。“百家殊业，兼务于治”，各学派的代表人物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以其崇尚的学说为统一的主导思想出谋划策：他们或者鼓吹王道，或者称颂霸道，或主张以仁义致王，或主张以霸道统一，或主张王、霸并用，或主张“合纵”、“连横”，或主张垄断商业以富国，等等。这些人在鼓吹他们学说的同时，还详尽地阐述他们对君民关系、天人关系、法先王法后王等关系的综合认识，希望君主能采用他们的学说。实践证明，这些学说虽然派别不同，看问题的切入点也不一样，但他们大多数都主张统一，主张君主专制。虽然他们常常各引一端，互相辩难，但他们从整体上说却是一股促进君主专制主义和大一统的洪流，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舆论先导。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最早争鸣的儒墨显学和稍后的儒、墨、名家三足鼎立，逐渐被李悝、吴起、商鞅、李斯和田齐“因道全法”的法家之间的争鸣所取代。最后的结果，是以商鞅、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把秦推上统一中国的舞台，由秦消灭六国割据而完成“千古一帝”的伟业。

百家诸子的学说中，除了上述的一些内容，还有一些是为即将出现的多民族统一大国设计政治框架和经济地理蓝图，其代表作是托名为夏禹和周公而实际上是战国时人编著的《禹贡》和《周礼》。

《禹贡》现保存在《尚书·夏书》中，该



虎纹铜钲

战国 蜀 行军节鼓乐器
传四川新津出土

高39.3厘米
该器柄较长，器身正面刻虎纹、树纹和巴蜀文字，是典型的古代巴人和蜀人使用的器物。

云雷纹鬲

战国 蜀

1980年四川新都马家乡出土
高43.9厘米，口径33.2厘米
甑与鬲分体，甑口沿上有二
方形竖耳，底为条孔圆算。
耳内侧饰雷纹，器身饰索纹
与云雷纹。鬲为三兽足，素
面。



书打破春秋以来诸侯各国的彼此疆界，把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凉、雍九州，详述各地的山脉水系、土壤出产和依此制定的赋税等差，并根据各地民族的远近把天子之国以外的地方分成甸、侯、绥、要、荒五服，根据不同的民族特点制定每服的贡纳和管辖政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明显是按照战国时期的实际情况设想的统一地理观念和政治理想。被后世统治者尊为政治学说之祖的《周礼·职方氏》说得更明确：“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

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凡邦国小大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它主张建立包括夷、蛮、闽、貉、戎、狄在内的统一的政治模式，在此基础上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建立相应的贡纳体制。《职方氏》把王畿之外分成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蕃九服。这种华夷五方相配而又统一于天子的政治模式，明显也是战国时候才有的政治观念。上文说过，“中国”、“四夷”相对的概念是春秋以后才有的。《禹贡》、《周礼》等主张中国、四夷“四海会同”，统一由“王”来集权专制治理，并借用周代许

多“设官分职”的成法制定出统一集权的官僚体制，这说明它们的确是即将出现的统一大国设计政治蓝图，是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设计政治体制。

除了《禹贡》和《周礼》，《管子》、《礼记》等书也阐述了“五方”和“五方之民”的管理体制。《管子·小匡》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称为“五方”，《礼记·王制》说“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所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认识到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各自都有其居住、吃、穿、使用器物的特点，这是不同的经济、文化、习俗造成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治理各族人民要尊重他们的民

族特点，不要随便地改变他们的习俗。这种因俗而治的政教体制也是当时的思想家对即将出现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治理方式的理论探讨。

战国百家争鸣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它不仅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也为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上谈到的这些理论和观点，秦统一六国后没有照搬，但从其中吸收了不少政治营养。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封建王朝基本上都是按照天子对“四夷”的一统模式来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的，因俗而治也成为治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不能不使我们叹服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

第五章

学术思想



春秋战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巨大变革，带动了思想、学术的巨大变革。

春秋伊始，随着诸侯争霸的加剧，争霸大国之间逐渐形成几个特点鲜明的政治文化中心。宗法制度崩溃了，“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发展起来，原来保存周王室文化资料的“王官”散入民间，学术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急剧动荡的社会变革，激发了思想家们对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如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华夷关系以及忠孝、仁义等思想伦理学说的探讨，于是，随着争霸各国为了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不同的政治主张异常活跃，慢慢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不同流派常常因为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不同而争论。通过争论，大家对所讨论的问题认识更加深入，并彼此吸收和分合。这是百家争鸣的先声。

战国以后，新成长起来的居于统治地位

的地主阶级正处在统一中国的激战之中，他们对内需要安定，强兵富国，对外需要兼并，争霸称王。他们都希望从思想家那里吸取新的学说和营养，这就为诸子百家的形成和争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诸侯各国礼贤下士成风，如魏文侯师事卜子夏，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齐威王创建稷下学宫，儒、墨、杨、老、法、名、阴阳各学派的“先生”，“学士”有千人；秦以重金招纳客卿，吕不韦编著百家融合的《吕氏春秋》，聚集门客三千人。一些有实权的贵族官僚，也希望借重士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势力，养士如林。这就给士阶层“以其学易天下”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当时诸侯各国对士的态度是“合者留，不合则去”，待遇优厚，学术政策宽容，这也给士人冲破旧思想的束缚、探求新的思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促使不同观点的各种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是，

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诸家纷然并存，互相交锋，互相辩论，形成了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局面。

第一节 士阶层的产生 和诸子百家的分类

“士”原来是西周封建制度最低级的一个阶层，他们的特点是具备文化知识，还有一定的田地，战时可以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以做大夫的家臣。春秋以后，宗法封建制度衰落，士阶层开始分化，有的成了新贵族，有的则凭借他们的文化知识，成为知识的传授者，或参加政治活动、谋求一官半职。

封建制度下，“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周平王东迁前后，王室衰败，诸侯国动荡，不少掌管文化典籍和文化活动的王室官员分散到诸侯国，有的甚至流落民间，这对官府文化向民间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春秋以后，私人办学兴起，“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有教无类”（教育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此也大大扩大了士阶层的队伍（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人才基础。

战国诸侯对士的重视，为百家争鸣的出现提供了政治条件。诸侯养士，实质上是要借助士的力量来建立自己的思想库。各诸侯国对士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合者留，不合则去”，允许人才流通，允许学术自由，让他们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形成了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诸子百家，按照其时间早晚的顺序，大

致有老子、孔子、关尹、孙武、墨子、杨朱、子夏、吴起、商鞅、申不害、许行、宋钘、田骈、孙臧、孟子、庄子、惠施、慎到、尹文、荀子、邹衍、韩非、公孙龙、张仪、苏秦、吕不韦、尉繚等。《汉书·艺文志》把他们归结为十家九流：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并说小说家不过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流，君子不屑一顾，“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当然是一种阶级偏见。诸子讨论的问题，大多以社会政治学说为中心，礼、乐、政、刑、道德、名辩、治国、用人都有所涉及，各有侧重，但其中心要义是“为治”。“百家殊业，兼务于治”，这是百家争鸣的一个鲜明特点。

孔子像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 儒墨显学

一、孔子与儒家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鲁国人,是儒家的创始人。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但很早就衰落了。孔子早年做过管理会计和管理牛马的小吏,后来短期任过鲁国司寇,因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辞职。此后孔子周游列国,晚年在鲁国聚徒讲学。传说他有门徒三千人,其中“受业身通者”七十二人。他的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在当时有很大影响。

孔子是春秋末年的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有很大的影响。

孔子处于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末期,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他认为当时政权下移,“礼乐征伐”由诸侯控制,是“天下无道”的表现,并屡屡加以抨击。他对西周的礼乐制度推崇备至,赞扬它“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认为它是在借鉴夏商两代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采茂盛,因此坚决表示“吾从周”。

他主张对社会进行一些改革,他认为殷代的礼是根据夏代的礼经过损益而制定的,周代的礼又是根据殷代的礼有所损益而制定的,因此继承时要根据需要进行损益。他主张对人民实行德政,强调道德是“礼”的基础,道德教化又是为政治国的基础,“礼”必须建立在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为政要宽,主张富民,曾说过“苛政猛于虎”,认为对民众的剥削不应采取竭泽而渔的办法。这些都有其进步意义。

孔子思想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仁”。所谓

“仁”,有几个具体的标准:

1、“克己复礼”,即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动时时处处符合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符合礼的要求的不看,不符合礼的要求的不听,不符合礼的要求的不说,不符合礼的要求的不动。

2、“孝弟”,即尊敬老人,爱护兄弟,规范父子、兄弟之间的宗法关系。不犯上,就不会作乱,所以孔子把“孝弟”看作是“仁”的根本。

3、“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要爱。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凡事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

孔子讲究“中庸”,主张考虑问题、做事情要“无过无不及”,即不过头也不欠缺,恰到好处。“和而不同”,既要讲团结,又要有原则性,对错误的言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不盲目服从、随声附和。

孔子毕生追求的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社会现实。所以他虽然承认天命的存在,但却主张“不怨天,不尤人”,“敬鬼神而远之”,这说明他思想深处是轻天命而重人事的。他教导学生的言论很多,但“不语怪力乱神”,这在当时也是非常难得的,说明孔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他有教无类,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地域远近,只要交一点“束脩”就收做学生。孔子弟子有很多出身微贱,但都成了品学兼优、富有才干的人,这是中国普及教育的先声。

孔子搜集整理古代文献,用《诗》、《书》、《礼》、《乐》、《春秋》、《易》教育学生,时称“六艺”。他从事教育实践几十年,有很多教育思想至今仍可作为我们教学的指导。如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孔子杏坛讲学图》轴

吴彬绘

曲阜孔府藏

纵125厘米，横62厘米

绢地，设色

图中孔子端坐中间，两侧为
颜子、曾子、子思和孟子。

学思结合、“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方式等，都是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的经验总结。

孔子的教育活动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官学向私学的一个重大转折。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培养的学生来自齐、鲁、宋、卫等国，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了中国第一个民间学派——儒家学派，当时号称显学。

二、墨家

墨子名翟，与孔子同时代而稍晚，是一个比孔子更为积极的活动家。他出身劳动人民，年轻时学习儒家学说，一度任过宋国大夫。他博通文献典籍，传说他有门徒三百人，都是穿破衣服、日夜劳作不停的劳动者。他们结成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严格遵守墨子的思想原则，人人都有赴汤蹈火的自我牺牲精神。墨子死后，这个以下层庶民为骨干的

郭店楚简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

郭店楚墓是一处楚国贵族墓地，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这批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有道家学派的著作两种：《老子》甲、乙、丙和《太一生水》。其余为儒家著作，主要有《缁衣》（与今本《礼记·缁衣》大体相合）、《五行》（与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有相异处）、《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寇勤》、《语丛》等。《鲁穆公问子思》等以前未见流传，《穷达以时》等有一部分内容见于《韩诗外传》、《说苑》、《淮南子》。郭店竹简内容广泛，是研究先秦思想史、学术史的重要资料。



团体还存在着很长时间。

墨子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平民阶层和手工业者的利益。他针对当时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兼爱”(互相友爱)的主张。他认为当时世上不合理的事都源于人与人不相爱。因此他提倡人与人“兼相爱,交相利”,即互相友爱,互相照顾,看待别人的家就和自己的家一样。他谴责当时各国之间的攻战是最“不义”的事情,所以他坚决主张“非攻”,反对互相攻打。他反对儒家提倡礼乐、提倡厚葬的主张,认为那是劳民伤财、奢靡浪费,因此提倡“节用”、“节葬”、“非乐”。墨子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相爱、强不侵弱、富不欺贫、贵不凌贱的美好社会,这在当时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墨子主张“尚贤”。“尚贤”,就是任贤使能,认为不管贫富贵贱,亲疏远近,即使是农民,工匠,只要是有能力的人,都可以选拔出来给以爵禄、权利,管理国家事务。这反映了下层小生产者突破宗法等级、争取自身权利的要求。

墨子也主张“尚同”。他认为,天下之乱是由于人们思想不同又都自以为是造成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选择一个贤良的人做天子,让他统一人民的思想,“一同天下之义”,惩罚坏人,奖励善良,实行中央集权。

墨子否定天命,说“命”是统治阶级捏造出来欺骗穷人和老实人的。他认为富贵贫贱的形成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决定于人的主观努力。但他又提倡“天志”、“明鬼”,认为“天志”(天的意志)是衡量一切言行是非的尺度,是人类社会最高的法则;而鬼神,则是帮助天赏善罚暴的超自然的监督力量。所以他极力推崇“顺乎天之志”,让鬼神成为赏善罚暴的监督者。

墨子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并有意识地应用逻辑推理的思想家。他强调人们对存在的判断必须以“耳目之实”的感觉为依据,把“闻见”作为“察知”的首要条件。这是墨子思想中唯物主义的光辉亮点。

墨子是一个出身下层的思想家,言必信,行必果。他的思想体系中有很多闪光的东西,但也存在着狭隘的经验论的束缚和消极的宗教因素的影响。他否定天命论,但又相信“天志”、“明鬼”,说明他并不否定君权神授;他提倡“尚同”、“尚贤”,但又把理想的实现全部寄托于外力的影响,说明他的思想依然未脱离天命论的范畴。这是当时小生产者思想的局限所在。也正因为有这些局限,墨家在春秋后期虽属显学,但却没有多大发展,较之儒家的支派连绵相形见绌。

第三节 战国诸子和百家争鸣

孔子死后,儒家分成了许多支派。名家异军突起,道家也有一定的发展。战国后期,儒家出现了向法家的裂变,把百家争鸣推向高潮。

战国百家学派的流传分布有地域的特点:儒、墨基本上以鲁国为中心,儒家后来传播到晋、卫、齐诸国,墨家则传播到楚、秦诸国;道家源于南方的楚、陈、宋诸国;阴阳家则起于北方的燕、齐;法家以三晋为主;纵横家则多出周、卫商业繁荣的地区。他们承袭各个地区的文化特点,也吸收其他学派的长处,彼此批判辩驳,也互相学习融合,使百家争鸣越来越深入。

一、儒家

战国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子思、孟子和荀子。入战国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孙氏之儒等，子思、孟子是战国前期的代表，荀子是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

（一）子思

子思是孔子的嫡孙、孔子弟子曾子的学生，现存《礼记》中的《中庸》一篇是子思的代表作。中庸是孔子的重要思想之一，子思的中庸之道比孔子的更有发挥。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在子思看来，中庸是贵族君子才会有的品德，小人绝对不会有中庸思想。这反映出子思完全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说话的。1998年5月，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出土竹简整理而成的《郭店楚墓竹简》刊布，有学者认为郭店楚简中除了《老子》、《太一生水》，其余大部分为子思和子思后学所作。

孟子像



（二）孟子

孟子（约前385—前304），名轲，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人。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思孟学派的主要人物，代表着孔子儒学的嫡传。他一生以学习孔子学说为己任，曾游说齐宣王、梁惠王等。其学说精粹都集中在《孟子》一书中。

孟子生活在宗法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转变的大变革时代。政治上，他提倡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在君民关系上，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主张做君主的一定要注意民心向背，求得人民的支持，不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他主张“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即推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定井田的边界开始，认为“经界不正，井地不均（均），谷禄不平”，不按宗法封建制度行事，就会扰乱社会秩序，这与当时宗法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转变的大趋势背道而驰。孟子坚持“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意思是说没有君子，就没有人去统治那些劳作的野人；没有野人，就没人去养活君子。劳心的人应该是统治人的人，劳力的人应该被人统治。这种剥削永恒合理的观点，跟他的“仁政”学说也水火不容。在当时摧枯拉朽、急风暴雨式的兼并统一战争中，急于用武力统一中国的诸侯们也不会接受孟子的“仁政”观点。

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赋本性——“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即同情心。他认为，人固有的这些恻隐之心是仁义礼智的出发点，只要能主观地反省自己，保持“浩然之气”，就能够达到仁义礼智的道德标准。如果有了违背封建道德的

思想和行为，修养思过，把那些固有但被遗弃了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找回来，也就恢复了人的本性，“人皆可以为舜尧”。

孟子一生以学习孔子的学说为己任。他认为孔子是圣人中的集大成者，并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对名家、农家、墨家的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常以王者师自居，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但他的“仁政”学说不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并没有被采纳。不过，他的“仁政”思想却给后世思想家很多的思考、借鉴。孟子的王政主张虽然过于理想化，但却有利于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因为这种思想统治者可以接受，被统治者也可以接受，对调和阶级矛盾是一剂良药。

（三）荀子

荀子，名况，也称孙卿，战国后期赵国人，主要政治学术活动在前298年至前238年之间。他曾长期在齐国稷下讲学，后做过楚国的兰陵令。其主要著作都收集在《荀子》一书中。

荀子生活在战国后期诸侯争霸、统一中国的时代，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统一中国的要求，与孟子的“仁政”思想有很多不同之处。

荀子在政治上提倡“隆礼”、“重法”，即注重礼和法。但他提倡的“礼”，已不是孔孟提倡的周礼，而是经过改造赋予了新的内容的礼、法。荀子认为，“礼”的作用是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让贫富贵贱、老幼长少各有恰当的位置。不过，荀子提倡的贵贱等级并不是世卿世禄的封建等级，而是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建立的等级制：即使是王公贵族的子孙，没有功劳，也只能当庶人；哪怕是庶人的子孙，懂得礼义，也



荀子像

可以把他放在卿相士大夫的位置上。荀子认为礼是法的原则和基础，法是根据礼的原则来制定的，所以法要为礼服务，立法是为了避免争夺，防止引起社会混乱。

荀子反对像孟子那样言必称三代，盲目地崇拜先王。他主张“法后王”，即以后来的王为效法的榜样，主张从社会现实出发，去考察过去的历史。他主张统治者在物质生活上要给人民必要的宽松，因为他知道人民是有力量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对老百姓压榨过甚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抗。荀子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等级关系，永远循环往复，万世不变。他认为，君子生下来就是统治人民的，君和民的关系是如影随形的关系，人民只能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去做而不可改变。这都是为封建统治等级制度服务的理论。

荀子“隆礼”、“重法”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和孟子主张的性善论相反，他认为人生下来本性是恶的，要建立社会的新秩序，就必须采取强制的手段改变人的“恶”性。性恶论也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不过他提出道德规范礼仪制度是后天才有的，

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

荀子反对“天命”和“君权神授”的天命论。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天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会因为尧是圣贤就正常运行，也不会因为桀是暴君就改变它的运行规律；尧时的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和桀的时候是一样的，尧和桀时的治乱不一样，完全决定于他们的治理措施不同，跟自然界的变化的关系。

基于以上的认识，荀子对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作了唯物主义的说明。“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荀子认为，对陨星、木鸣这些少见的自然现象，人们觉得奇怪没什么不可以，但把它说成是上帝的警告，那就是错误的了。“上明而政平，则是（指星坠木鸣等）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意思是，如果政治清明，这些奇怪的现象再多，也没有什么伤害；如果政治昏暗，这些奇怪的现象即使一点没有，也没有什么益处。

荀子认为，所谓“天”，所谓“神”，其实都是自然界自身变化的规律。人只要按照自然变化的规律去行动，就能管理天地，支配万物，相反则是大凶。

荀子提倡按自然规律办事，但又反对在自然规律面前无所作为。他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控制和利用自然规律。“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告诉人们，把天看得很伟大，不如畜养万物来制裁它；顺天行事而颂扬它，不如掌握天命而运用它；期待着四时来往而坐享其成，不如根据四时的变化来利用它。这种朴素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中国古代劳动

人民和自然斗争的经验总结。

荀子反对“生而知之”，他认为要取得深入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复地研究要认识的对象，克服一些成见的障蔽，善于学习。他非常重视积累知识经验的作用，鼓励人们“锲而不舍”，通过不间断的努力达到认识事物的目的，这都是他治学从事的经验之谈。

荀子学说中融入了不少法家的思想，所以后世研究思想史的专家说荀子是外儒内法，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二、道家

（一）老子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姓李，名耳，字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道家的创始人。老聃曾做过周的守藏史，相传孔子曾向他问过礼。现存的《老子》或称《道德经》为老子后学所著，成书于战国中期，大约在孟子之后、庄子之前。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帛书中发现两部《老子》，均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现存的《道德经》次序相反。湖北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也出土了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竹简本《老子》的时代要早于帛书《老子》和今本《老子》，它跟否定儒家“仁义”学说的今本《老子》有所不同，也不像今本《老子》那样玄而又玄。

《老子》反映了没落的宗法贵族的思想，它对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非常不满，但又没有力量去阻止它，因此对人生的看法充满了消极的态度。

《老子》在政治上主张“自然”、“无为”，主张统治阶级不要以智力治国，而要“以无事取天下”，即政治上不要有所作为，不要干涉人民的生活，而应听任社会处于平静自然的状态，并认为这是最好的“治”的境界。“治

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就像烹小鱼一样，放在锅里不要多动它，否则小鱼就会烂掉。

《老子》理想的社会政治是“小国寡民”，认为已成为陈迹的民族社会是最美好的社会。“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这种“小国寡民”的社会里，人们有各种有用的器具而不用，老百姓把死看得很重，不往远处迁徙。即使有舟船，也没有地方去乘坐；即使有军队，也没有对手可攻打；老百姓再使用结绳的办法去记事。人们满足于自己所吃的饭，满足于自己所穿的衣，满足于自己居住的房，在自己居住地方的风俗中自得其乐。相邻的国家互相都看得见，邻国鸡鸣狗吠的声音都听得见，但老百姓一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他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要人们断绝、放弃聪明智慧、仁义和技巧技能，以保持社会混沌、自然的原始状态。

《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先于万物和产生万物的源。“道”没有具体的形体，无声、无臭、无形、无体，看不见，摸不到，听不着，实际上就是“无”。《老子》认为“有生于无”，人和万物都是从最高的精神实体“道”产生的，因此，不用实践，不用感觉，万事万物都能被我认识。

《老子》否认天命，否认鬼神的威权，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尤其是《老子》思想中有很多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对中国后世的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老子》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这些概念，是互相对立的，也



《老子骑牛图》



郭店楚简《老子》

是互相依赖的。没有“难”，无所谓“易”；没有“长”，也就无所谓“短”，它们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的关系。《老子》指出，事物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向对立面转化，“物极必反”，“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种带有辩证思想的认识在古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些观点，是《老子》书中的精华。

《老子》认识到对立事物的辩证关系，但

把对立物的转化看成是绝对的，因此常把这种观点作为待人处事的诀窍，认为凡事都要从反面着手。“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告诉人们，一个事物你要压缩它，一定要先扩张它；你要削弱它，一定要先壮大它；你要废除它，一定要先兴盛它；你要夺取它，一定要先给予它。这实际上是《老子》守柔处下、明哲保身的处世经验的总结。《老子》书中反复讲“柔弱”，认为“柔弱”是最大的刚强，“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其实今天看来，这也不过是自我慰藉、明哲保身而已。

《老子》对后来道家的思想影响很大。《老子》以后的道家，其中一派进一步发挥了它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把《老子》的“无为”发展成为虚无主义，庄子是其代表；另一派则把“道”解释为规律，舍弃《老子》学说中否定礼、法的观点，把“道”改造成为礼、法的理论依据而转向法家，其代表是齐国稷下的道法学派。

（二）庄子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与孟子同时而稍晚。庄子也是一个破落贵族，曾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吏。现存《庄子》一书，分为内、外、杂篇，内篇七篇是庄子本人的著作，外篇、杂篇系庄子后学撰述。

庄子是代表没落贵族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充满了绝望和无可奈何的消极特征。他对当时剧烈的社会政治斗争采取逃避的态度，据说楚威王曾派人迎接他到楚国做宰相，他笑着说：我不会像用于祭祀的牛那样，被你们养肥，穿上花衣服，去做祭祀神鬼的牺牲。我宁愿做一条鱼在污泥中自得其乐，也不为有权势者束缚！

庄子反对一切改革和社会进步。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没有任何人为的创造，一切都应顺其自然。他消极厌世，幻想摆脱一切外物和肉体的束缚，去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他把忘掉外部物质世界和自己的肉体感官称为“坐忘”。他说达到了“坐忘”的境界，就可以形同槁木，心如死灰，无思无虑，无生无死，而这才是人的天然本性。从这种虚无主义的人生观出发，他对当时统治者制定的各种制度都竭力反对。他认为道德制度是违反人性的，儒家提倡的仁义，是加在人们身上的刑罚。他认为最好的统治方法是不用心思，顺应自然，什么都不做。

在世界观上，庄子也把“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他认为，“物物者非物”，产生物质的东西是非物质的。他把“道”解释成是一种无终无始，无边无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看不见，摸不着，既不能用感性来感觉又无法用理性来认识的绝对精神，这种精神只能用主观来感觉它。

庄子认为，所谓事物的差别，不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人的主观来决定的，它随人的观察角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人睡在潮湿的地方要得病，泥鳅却不如此；人爬到树梢上发抖，可猴子却如履平地，可见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曾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客观事物没有什么标准：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但一觉醒来还是庄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他认为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庄周与蝴蝶的区别不过是梦幻的“物化”而已，万物的变化都是假象。

因为庄子不承认事物有客观标准，所以他也极力宣扬事物之间并没有区别，也不存在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个也可以说是、说非，那个也可以说是、说



庄子像

非。他否定认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反映了没落阶级对社会发展的绝望情绪。

庄子思想对后世没落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许多政治上失意的封建士大夫往往从庄子著作中寻找精神慰藉，如魏晋玄学就是如此。

（三）道法学派

沿袭《老子》学说，对《老子》学说有所发挥的，还有齐国稷下的道法学派：一派以宋钘、尹文为代表，一派以彭蒙、田骈、慎到为代表。

宋钘、尹文推崇儒家的“礼”“义”，但又把“道”作为治国方术的出发点。他们强调“名正法备”，认为正名是建立法制的前提，表现出向法家的转移，对以后法家思想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彭蒙、田骈、慎到一派兼重礼法，主张建立以“道”为准则的“法”而反对人治，鼓吹君主的作用主要在于充分发挥臣子的智能与作用，对以后法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法家

战国法家的代表人物，前期主要是在各国推动变法的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他们的事迹多见于变法实践，思想方面的材料流传较少。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年的韩非，他的著作《韩非子》不仅总结了法家的政治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重大贡献。

（一）战国前期法家的变法实践

李悝，战国初期魏国人。魏文侯时为相，在魏国推行变法。他主张奖励耕战，“尽地力之教”，“食有劳而禄有功”，打破世卿世禄制而启用提拔有能力的人才。所著《法经》规定了各种法律制度。

吴起，战国初期卫国人。他曾和李悝一起在魏国变法，晚年到楚国帮助楚悼王进行改革。吴起在楚的变法主要是废除世卿世禄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限令“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把国家增加的收入用来养兵，因此受到宗法贵族的坚决反对，被害死。

商鞅，姓公孙，战国中期卫国人。秦孝公时他在秦推行变法。变法的主要措施是：开阡陌封疆，实行授田制，由国家直接征收赋税；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重农抑商，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君主集权制度；统一度量衡。商鞅是法家“法”的主要创始人，他主张治国以法为标准，一切以法为尺度。

申不害，战国中期韩国人，韩昭侯时为相，在韩国推行变法。申不害的学说侧重于“术”，主张君主“因任以授官，循名以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是法家“术”的主要创始人。

（二）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韩国贵族，荀子的学生，著有《五蠹》、《孤愤》、《显学》等。据说秦王嬴政看了韩非子的著作，大为赞赏，慨叹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政十四年，韩非为韩出使秦国，秦王政想重用他，却因为李斯嫉妒进谗，韩非下狱后自杀。韩非子的著作大都收在《韩非子》中。

韩非子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把早期法家提出的“法”、“术”、“势”结合起来，使法家学说日臻完善。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认为，“法”是公开的成文的法典，“术”是秘密的统治方术，前者越普及越好，后者应该秘不示人，不能一样对待。他赞成慎到的“势”，说法治优于人治，认为能够掌握政权是治乱的首要条件，只要政权巩固，才能平庸的“中主”也能通过法治平治国家。

韩非主张君主专制集权。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认为全国各地事情很多，但要害在中央，君主应把大权都揽在手里，全国各地都对国君负责。

韩非认为社会历史是进化的，古代的“圣人”虽然有功于当时，但他们的政策并不能移用于现在。他说，一味尊崇“先王”，用古代帝王的办法来治理当今社会，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最可行的办法是“事异而备变”，即根据当今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韩非继承了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观点，说“若天若地，孰疏孰亲”，“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指出天地不会对人有亲有疏，如果不是天时，即使有十个尧，也不能让冬天生出一颗穗来。

他认为社会和自然都没有任何神秘的力量,社会的治乱主要靠人的努力和法令措施的得当,而自然界的治理,则要顺着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因势利导,动静都合乎事物的性质。

在“人性”问题上,韩非同意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生下来就有自私自利的“自为心”,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交易行为。他认为“法”是最能调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为心”的好办法,也是惟一的富国之道。这对打破当时宗法贵族的等级制度、提倡奖励耕战起了理论上的推动作用。

韩非第一次在哲学意义上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故事来说明“矛盾”的含义。他认为事物超过适当的量就会走向反面,“譬诸水,溺者多饮之即死,渴者适饮之则生”,“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这些认识是直观、朴素的,但它在发展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上,却有不能忽视的意义。

四、名家

“名实”问题是春秋以来思想家常常讨论的问题。战国以后,名辩之学发展为对概念的规定、分类、判断、推理等逻辑问题的研究,有一些思想家专门从事这项问题的研究,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后期墨家也参与了这项问题的辩论。

(一) 惠施

惠施,战国中期宋国人,曾做过魏国的相,与庄子经常辩论问题。他的著作已亡佚,现只能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的片段记载中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

惠施在“名实”问题上的主要贡献是“合同异”。

惠施认为事物有“大同”,也有“小同”。譬如马,凡是属于马一类的动物如大马、小马、黑马、白马都包括在内,这叫“大同”;但马之中的大马、小马、黑马、白马各自也有些差别,这叫“小同”。马这个大概概念与大马、小马、黑马、白马这些小类概念有差别,但从相同的方面看,它们都是马。所以惠施认为世界万物都有相同的一面。如果从不同的方面看,这些马又有一定的差异,所以万物又有不同的一面。由此推论,惠施认为万物既可以“毕同”(完全都相同),也可以“毕异”(完全都相异)。因为,事物从“至大”到“至小”,没有一个是大小相同的。然而另一方面,不管“至大”还是“至小”,它们又都有共同点。所以惠施说万物“毕同毕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和异都是相对的。这是辩证法的观点。

惠施认为,万物既然有“毕同”的一面,那对万物就应该一视同仁,“泛爱万物”。这就是惠施的“合同异”思想。

在讨论“同异”问题时,惠施连带还提出了空间、时间的相对性问题。他说高低、大小、中央、四周、生死、今昔的关系都是相对的,道理很深刻。

(二) 公孙龙

公孙龙(约前325—前250),战国中期赵国人,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他的著作一部分已佚,剩余的都在《公孙龙子》中。

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和惠施“合同异”的思想有区别。惠施通过事物性质和概念的分析,强调事物的同异,公孙龙则强调事物的差别和独立性,其主要思想是“离坚白”。

所谓“离坚白”,是公孙龙以一块坚硬的白色石头为例,说明“坚”和“白”两种属性有差别,不能同时都是石头的属性。他认为,“坚”和“白”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性质概

念。用眼睛看只能看到白而看不到坚，用手摸能摸到坚而摸不到白。看的时候，坚隐藏起来了。摸的时候，白隐藏起来了。两者互相分离，不能同时存在。

他进一步又把“坚”、“白”与石头也分离开来。他说，“坚”、“白”这种性质并不固定在一种物质上，其他物体也会有，怎么能说就一定在石头里呢？公孙龙认为，“坚”、“白”都是抽象的、独立存在的属性，人们之所以能感觉它，是由于它的显现，不能把“坚”、“白”、“石”混为一谈。

在《白马论》中，公孙龙又以同样的观点论证了“白马非马”。他说，马是形体的概念，白是颜色的概念，颜色的概念不能用来说明形体，所以说白马并不是马。找马，找来黄马、黑马都算是马。如果是找白马，找来黄马、黑马都不能算白马。所以白马并不是马。

这里，公孙龙看到了马和白马、一般和个别两个概念的差别，因此，“白马非马”的论题不能说不带有辩证法的因素。但他把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分离开来，否认“马”在逻辑上对“白马”的蕴涵关系，却违背了客观实际。

公孙龙从“离坚白”、“白马论”等例子推论，整个世界是由各个独立的抽象概念构成的，每一个事物的概念或属性都不依赖别的事物的概念或属性而存在，这就陷入了诡辩。

公孙龙一派的名辩家还提出了一些非常带辩证法思想的命题，如“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

五、阴阳家

阴阳五行说在西周末春秋初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理论。阴阳最初指日光的向背，

向日为阳，背日为阴，以后被思想家用来表示两种对立的事物或现象。当时的思想家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阴阳两面构成的，阴阳的对立斗争形成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五行，即水、火、木、金、土，古代思想家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元素，某一元素是某一类事物的代表，五行和五行代表的事物之间都有一定的促成和制约关系，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生关系）；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相胜即相克关系），这是早期的阴阳五行说。

战国中期，一些思想家在阴阳五行说中注入了大量的神秘主义内容而成为“舍人事而任鬼神”的阴阳家。战国末期，社会大动荡，“察机祥，候星气”之风大盛，阴阳家也大行其道，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也经常引用阴阳五行观念说明事物之间的关系。据《汉书·艺文志》载，战国时阴阳家的著作有十余种，可惜都已经亡佚。现存《管子》的《四时》、《轻重》、《五行》、《吕氏春秋》的《月令》诸篇都有很浓重的阴阳家思想，不过其典型的代表还是邹衍的五德始终学说，散见于一些文献记载中。

《管子》等书中的阴阳家思想是一种天人合一、人随天数的思想。该书把宇宙解释为一个复杂、多层次的结构，说人事本于天道（阴阳、日月星辰的运转及四时的变化）和地道（万物的生死荣枯），人世间的君主“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万物，以总一统”，只要能法天、法地、法四时，就能够治理好天下。

《管子》特别强调根据天地运转、四时变化的具体情况来处理政事。如它认为，春夏主德，秋冬主刑。春天是万物萌生的季节，政令一定要“生而勿杀”，要保证一年生产的顺

利，有利于万物的生长；夏天是万物繁茂的季节，政令不要有使万物夭折的行为，不要“聚大众”、“诛大臣”、“斩大山”等；秋天万物萧条，是实行刑罚和收藏的季节，政令一定要“罚而勿赏，夺而勿予”；冬天是农闲季节，可以征发徭役，但一切活动都必须有限制，这叫作“务时而寄政”。如果不按照四时变化处理政事，天人相背，那就会出现异常天象，用日食、月食、彗星等对人发出警告。这种以自然变化和政教律令互相配合的思想，是一种迷信思想。虽然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的行为有所制约，但仍然是一种天命观念的表现。

邹衍，战国后期齐国人，生平活动不可考。据说他的学说体系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天论，专门研究天地开辟以来和天地没有开辟以前的自然史，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为“谈天衍”。二是地论，即地理学说。他认为当时儒者说的“中国”不过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名“赤县神州”，此外还有八州，各为大海环绕。天下又有九个这样的单位，为更大的海包围。三是历史学，即“五德终始”学说。

邹衍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发展变化中，有一个必然的规律支配着它的变化，这就是水、火、木、金、土“五德转移，治各有宜”。邹衍认为，水、火、木、金、土“五德”，每一德支配一个朝代，“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某一德被另一德取代时，天就会产生某种奇异的自然现象，作为改朝换代的信息，这就是“符应”。邹衍认为五德转移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他认为当时水德将要代替火德的周，因此这种理论受到了正在进行兼并战争的各国君主的欢迎，传说燕昭王曾亲自拜邹衍为师。由此可见当时邹衍的影响之大。

秦统一六国后，有人把邹衍的学说献给秦始皇，秦始皇采纳了他的学说，制定了一套所谓水德的政令。邹衍的学说，后来主要被燕、齐的方士们继承下来。

六、兵家

随着春秋战国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由军事家或战争统帅总结战争经验、研究军事策略而撰写的著作不断发展，创建了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科学。

这种总结战争经验、研究军事策略的著作，古代称兵家或兵学。据《汉书·艺文志》等记载，中国先秦时期的兵法著作主要有《孙子兵法》、《齐孙子》（《孙臆兵法》）、《尉缭子》、《六韬》、《司马法》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孙子兵法》。

（一）孙子

孙子，名武，春秋时期齐国人。他是陈国公子完的六世孙，其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赐姓孙氏，食采乐安（一说在今山东惠民，一说在今山东广饶）。后来齐国田氏、鲍氏为乱，孙武出奔吴国，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庐，受到吴王的赏识，任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为吴国



孙子像



《孙子兵法》竹简
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

称霸做出了很大贡献。

今本《孙子兵法》共有十三篇（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曾发现了《吴问篇》等《孙子兵法》佚文），可以看作是春秋末年及之前古人战争经验的总结。它揭示了古代战争的规律，创建了适应时代需要的军事理论，直到今天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孙子是主张进攻战略的军事家。他认为，要取得战争的优势，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有道之战，方能取胜。他认为，战争必须“惟民是保”，不用战争的方式，而达到和平，这是战争的最上策，“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这种以民为本的军事思想在历史上有深远的意义。

孙子把交战双方政治、军事、地理条件

的优劣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非常注重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兵贵胜，不贵久”，主张战争应尽量不消耗自己的国力，而使敌人屈从自己，“不战而屈人之民，善之善者也”。孙子认为，战争不过是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在处理军事、政治和外交之间的关系上，他主张把以谋略战胜敌人放在首位，“攻心”为上，体现了卓越军事家的政治眼光。

在战术上，孙子主张：第一，“先胜而后求战”，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决策者战前必须对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因素作细致的分析，判断强弱，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第二，“兵以诈立”，“致人而不致于人”，尽量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做到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尽量利用天然险阻，借天时、地利破敌。第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强调用兵的突然性和快速性，出奇制胜，避实击虚。第四，“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变化而取胜”，随机应变，根据敌情变化迅速作出反应，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不能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第五，“知天知地，胜乃可全”，重视地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

《孙子兵法》注重分析敌我双方的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情况，提倡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成为中国历代军事家必读的经典著作，在中国军事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

（二）孙臆

孙臆，齐国人，传说是孙武的后人，生于阿、鄄之间（约今山东菏泽一带）。孙臆少年时与庞涓一起从师学兵法，后庞涓在魏国做将军，自感才能不如孙臆，把孙臆诱骗到

魏国，设计处以臧刑（去膝盖骨）。孙臧在人帮助下回到齐国，齐威王拜他为军师，大破魏军于桂陵和马陵。《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有“《齐孙子》（《孙臧兵法》）八十九篇”的记载，但这部书东汉以后亡佚，所以后来许多学者怀疑孙臧和《孙臧兵法》的存在。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孙臧兵法》残简，这个历史的遗案才告终结。汉简残本《孙臧兵法》共十六篇。《孙臧兵法》在继承孙子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孙臧认为，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为先王布“道”的手段，所以战争一定要合于“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孙臧指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是“富国”。他非常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这是他军事理论中民本思想的体现。

孙臧“贵势”，主张战争一定要“因势而利导之”，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他强调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注意利用好各种地形，抢占有利地势，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

孙臧更重视战争中的阵法、士气、选卒、维护军令的威严等。春秋时，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阵法大多以三阵、五阵为主。战国时，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车、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所以军阵的阵法更加复杂。孙臧在《官一》篇中提出了十几种阵法，如用来进剿敌人的索阵，用来疲惫敌人的囚逆阵，严兵以临敌的危口阵，以弓弩与敌对射的云阵，围困敌人的羸阵，用来消灭敌军前锋的阑燧阵，用来强攻救援的皮傅阵，声张军威的错行阵，攻击高陵之敌的剡阵，适合

摆在蜿蜒曲折的荆棘路上的雁行阵，适于火烧敌人的辎重粮草及接应战车的锥行阵，还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阵作战的理论，把兵力分为主力、先锋、后续部队三支，作战时只用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敌，而以其他三分之二作为机动兵力蓄劲待敌。这是他多年统兵作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在战略战术上，孙臧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对强敌要避开锋芒，设法引诱迷惑敌人，“批亢持虚”，“示之疑”，“示之不知事”，使其兵力分散，然后并力强击之。

孙臧还提出了一系列军队建设的原则，

《孙臧兵法》竹简

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



如提出选拔将帅的原则是上知天道，下知地理，国内得民心，国外知敌情，上阵知八阵之法，见胜利敢于战争，面临失败敢于进谏，并提出了一整套军事教育法则，目的在于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认为只有这样，国家才会“战胜而强兵，故天下服矣”。

（三）尉繚

尉繚，魏惠王时人，做过秦的国尉，其生平事迹不可详考。

《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下有《尉繚子》一书。该书自南宋时被怀疑为伪书，故后人多斥为伪作。直到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尉繚子》，这段疑案始告白于天下。

《尉繚子》成书于战国，全书讲的都是保证战争必胜的法令法规问题。该书继承了商鞅的农战思想，把耕田、守城和战争都看成是王者的本务，认为即便是万乘之国，也必须实行农战相结合的方针，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尉繚子》认为，军事上要取得“威胜”，重点在于“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审法制”，包括“举贤任能”、“明审法令”、“贵功养劳”等方面，主张奖励耕战，藏富于民，无夺农时，节制赋敛等，主要讲国家应该在政令上施行法家政策。“明赏罚”，则是主张通过法令制度确立军事上的必胜保证。《尉繚子》主张重罚，在《重刑令》中说“内畏重刑，则外轻敌”，认为士兵只有心里畏惧重刑，作战才不怕死，因此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要处以极刑，还要削户籍、掘祖坟、罚卖家属做奴隶。《伍制令》还规定了什伍连坐法，《分塞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令》等规定了严格的营区划分条令、战斗编队条令、指挥号令（金鼓旗

铃）条令、将军统兵条令、后续部队行动条令、军事教练条令等，要求将士们“为将忘家”、“指敌忘身”，义无反顾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便器用”，主要是讲从战备上保障战争的胜利。城邑建筑的大小必须与土地肥沃的程度及人口数量的多少、粮食积蓄的多少相称，这样才能“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不然，“器用不备则力不壮”，战争就会失利。

《尉繚子》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提倡“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主张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虚实结合的战法，打击敌人。它还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规划出一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为前辈军事家所未有，很富新意。

（四）《六韬》

战国中晚期还出现了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六韬》。该书托名太公吕望撰，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形式，讲述治国平天下的军事问题。作者已不可考。

《六韬》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共六十篇。

《文韬》主要讲夺取天下的战略准备，认为夺取天下，必须以仁、德、义、道治国，使民不失务，农不失时。《武韬》主要讲夺取天下的政治战略，认为“全胜不斗，大兵无创”，能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而取胜是最高的战略原则，并提出“文伐”十二策，其主旨是尽量想办法给敌方造成“天殃”和“人灾”，以便战而胜之。其中包括离间敌方君臣、贿赂敌方要员、引导敌国君主淫乐、培养敌国乱臣等，目的是促使敌国政权瓦解，失去战斗力。

《龙韬》、《虎韬》、《豹韬》、《犬韬》，着重阐述具体的军事战略、战术和治军原则。《龙韬》主要阐述选将、通讯和临机制敌的战术问题。《虎韬》主要讲部队的兵器装备、野战和围城的战术问题。《豹韬》主要讲不同地

形作战的战术原则。《犬韬》主要讲车、骑、步兵种的特点及军队的约期集中等问题。这些都对先秦战争的形式、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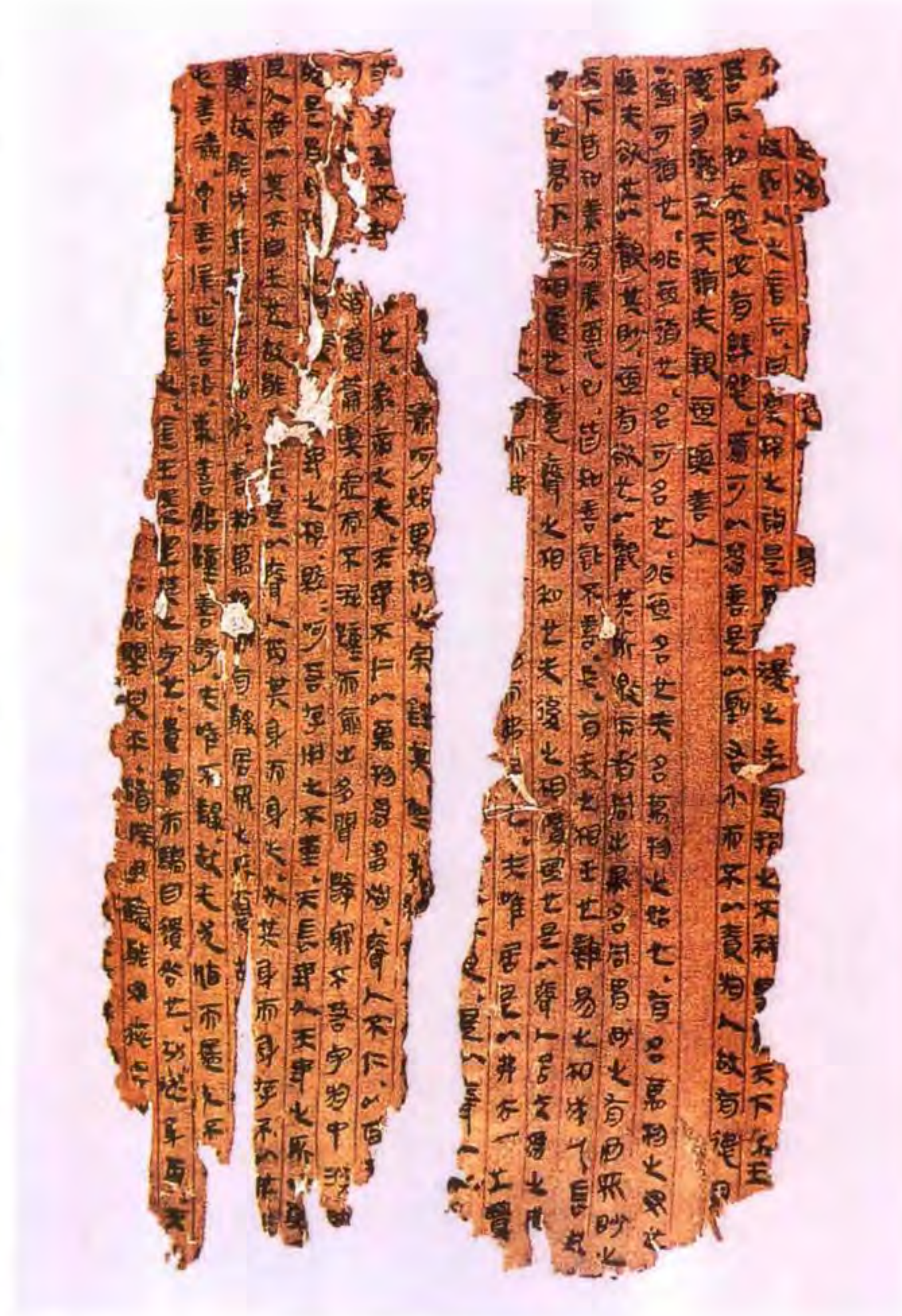
七、纵横家

纵横家是指战国时期以游说活动为主的谋士，主要代表人物有公孙衍、张仪、苏秦等。

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各国联合以对付某些国家的外交策略。合纵的特点是“合众弱以攻一强”，连横的特点是“事一强以攻众弱”。战国中期以后，西方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迅速强大起来，秦国和齐国两大强国向外扩张和争取与国的斗争，成为列国斗争的主线。前329年，公孙衍离秦入魏，推行合纵策略。前323年，他约合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以抵御齐、秦、楚三国。秦国则派张仪到魏国游说，拉拢魏惠王，让他放弃合纵改用连横。魏惠王想借用秦国力量报复齐、楚，秦想让魏事秦，给诸侯做个榜样，双方都想利用对方，结果秦、魏连横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后来，齐、楚为了破坏秦、魏联盟，与燕、赵、韩一起支持合纵。前319年，公孙衍在各国支持下任魏相，魏又放弃连横改用合纵。次年，公孙衍约魏、赵、韩、燕、楚五国，由楚怀王任纵约长，联合攻秦，结果被秦打败，这是战国声势最大的一次合纵联合。

齐和楚后来又两次结成合纵联盟，都因楚怀王受张仪引诱欺骗背约而破坏。前288年，齐接受秦的倡议，齐、秦同时称帝，此后，齐、赵急骤削弱，形势越来越向对秦有利的方向发展。

前315年，齐趁燕太子之乱灭燕。燕昭王复国后，积极为攻齐雪耻做准备。纵横家



帛书本《战国纵横家书》

苏秦是燕昭王的亲信，他伪装叛燕入齐，在齐、赵、魏之间进行外交活动，恶化齐、赵的关系，使齐国腾不出手来攻燕。他策划诸国合纵攻秦，又力劝齐国伐宋，通过孤立齐国给燕的发展提供各种机会。齐灭宋后，列国恐惧，三晋与秦、楚一致对付齐国。燕昭王趁机联合秦、楚、三晋大举攻齐，下七十余城，除莒和即墨外，齐国的郡县全部被燕国占领。苏秦的真实身份暴露，被齐湣王处死，但齐国的败局已经不可挽回。

前266年，秦用范雎为相，采用远交近攻的连横策略，把兼并的重点放在三晋，破

坏了东方六国的合纵。长平之战后，合纵成了六国并力抗秦，连横则成为东方的国家向秦投降。

《史记》把张仪和苏秦说成是同时的对手，一主连横，一主合纵，并说苏秦挂六国相印后激怒张仪入秦，苏秦死后，张仪才搞连横，这是错误的。《战国纵横家书》和《竹书纪年》记载得比较准确。张仪和公孙衍是同时代的人，张仪先后任过秦相和魏相，大概卒于前310年（魏襄王九年）。苏秦真实身份暴露，被齐湣王处死是在前285年，比张仪晚二十五年左右，他被车裂的罪名是“阴与燕谋齐”。

纵横家的著作，主要有《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具体情况参见本书《春秋战国的文化艺术》有关内容。

纵横家的出现，是以战国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为历史背景的。当时各大国之间，围绕着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张的策略，形成不同的政治主张，他们或主张以“纵”来称霸，或主张以“横”来称王，这是当时军事和外交斗争的需要。不过，纵横家过于夸大计谋策略和舌辩的作用，把这些看成是国家强盛和王业成败的关键，这就成为他们的缺点。战国纵横家纵横捭阖，实际上只有张仪的连横策略获得了成功，但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秦“外连横而斗诸侯”的策略配合了秦耕战政策的推行。没有秦变法图强这个基础，仅凭连横策略的推行，尚不足以成就统一六国的大业。

八、杂家

战国即将结束的前夕，思想界出现了一种兼容并包百家学说、折中调和各种思想的杂家，其代表作是吕不韦组织编撰的《吕氏春秋》。

吕不韦在秦庄襄王和秦王政初年任丞相。他召集门客“人人著所闻”，撰写了二十余万字的《吕氏春秋》，目的是总结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作为政治的借鉴，与孔子作《春秋》本意差不多，所以命名为《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包括了儒、墨、道、法、阴阳、农、兵、纵横诸家的理论，虽未能创立完整的体系，但也有自己的立场和倾向。它对儒家的观点尽量摄取，兼采道家、墨家，对其余诸家也兼收并蓄。

《吕氏春秋》非常尊崇儒家以德服人的仁政和王道思想，把孔子“正名”的理论当作治理国家最好的理论。它非常重视文化和教育的价值，认为三代之所以昌隆，学习和教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氏春秋》汇集了各家的思想，但常用儒家思想对其进行改造。例如，该书也讲“道”，但它讲的是天道、地道和人道三者和谐统一的思想，这已经纳入了儒家的思想范畴。《吕氏春秋》也讲养生修身和无为，吸收了道家的思想。但它讲的养生，已经不是道家的养生，而是着眼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养性；它讲的无为，不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而是讲人君在道德上起表率作用，任用贤才，不用多讲话就可把天下治理好。《吕氏春秋》也像法家、墨家一样讲尚贤，但它选择贤人的标准却是儒家的标准。这都说明，《吕氏春秋》基本上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对诸家思想的改造和融合。

《吕氏春秋》在天道观、认识论和社会思想方面较多地采用了《荀子》等的观点和立场，体现出战国末期思想家总结历史经验、预见形势变化的成果。《吕氏春秋》显示出的百家合流倾向，反映了政治趋向统一的同时思想也要求统一。虽然这种兼容并包的带有折中主义色彩的思想不见得为秦的统一起了多大作用，但这种趋势本身却反映了时代的

潮流所向。

以上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大致情况。“百家殊业，兼务于治”，虽然这些流派学术观点不同，也经常互相攻击辩驳，但它们的实质绝大多数都是在政治上鼓吹君主专制。它们或者鼓吹王道，或者称颂霸道，或主张以仁义致王，或主张以霸道统一，因此，这些学说虽然差别悬殊，但最终却汇成了一股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洪流，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舆论先导。

在争鸣中，随着辩论的深入，人们也愈来愈认识到，虽然各家都以自己的见解为标准来衡量别人的见解，但各家学说其实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根据，各有所长，时有所用，或者是殊途同归，百虑而一致。因此，各派之间逐渐自觉地走上互相吸取、互相融合的道路。

到了战国后期，这种互相吸取、互相融合的情形已经十分明显，各家各派的学说与其初始相比，已经变得杂而不纯。如《荀子》虽然是儒家，但与孔子的学说已相去甚远，它主张法制，反对神鬼，热心辨察，可以说是兼儒法、合道墨；《韩非子》熔法、术、势于一炉，同时也吸收了老子的思想；后期墨家抛弃了墨子的天鬼思想，对于惠施、公孙龙的辩学作了纠正吸收；邹衍之徒所发挥的阴阳五行说中，也有儒老及原始五行说等多种成分；《吕氏春秋》尽量摄取儒家的观点，兼采道家、墨家，对其余诸家也兼收并蓄，更是一次各家思想的大融合。这种融合反映了政治趋向统一的同时思想也要求统一的趋势，它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六章

文化艺术



第一节 文字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字形体变化剧烈的时期。一方面，春秋中期以后，各国文字的书写风格明显表现出不同的区域作风，除了西方的秦，东方诸国的文字都由原来西周庄重典雅的风格向流利清新的方向发展，南方的楚、吴、越还出现了装饰性极强的“鸟虫书”。另一方面，随着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文字形体越来越走向简化和实用化。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列国文字出现了文字异形的局面，影响了文字的使用和发展。秦统一中国后，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统一文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实现了大一统，掀开了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一、春秋文字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春秋文字资料主要是金文，还有春秋末期的石刻文字《石鼓文》和玉石盟辞。

春秋初期，诸侯各国的金文大体上都还沿袭周代晚期的文字风格，早期金文那种方形、圆形的肥笔渐渐变成均匀的线条，原来曲折象形的笔画也渐渐被拉平，文字书写趋于简便，文字的排列、体式也较以前整齐而均匀。但此时长篇铭文明显减少，一般铭文只是简单标明什么人、做了什么，不像周代铭文那样长篇大论。春秋中期以后，各国文字的结构变化不大，但书写已经明显表现出鲜明的区域风格。这些明显带有秦、周、晋、齐、鲁、楚、徐、吴、越区域作风的文字，除了秦，其他区域的文字都渐渐抛弃周代金文厚重的风格而向流利清新的方向发展，出现

了长条化和整齐化的倾向。尤其是南方的楚、徐、吴、越，流行一种狭长而婉转屈曲的美术字体，有时还加上很多鸟形、虫形的复杂图案作为装饰，这就是后世所谓的“鸟篆”、“虫书”或“鸟虫书”。这种鸟篆、虫书或鸟虫书，构形复杂，形象屈曲，很难辨认，主要用于兵器等的署名或装饰，日常应用可能很少。

春秋的石刻文字，主要是唐初在天兴（今陕西凤翔）发现的“石鼓文”。石鼓文唐时已见记载，因文字刻在鼓形的石墩上而得名。传说石鼓原在陕西凤翔或雍州，亦有人说出自宝鸡陈仓。石鼓共10件，圆顶平底，最大者高85.2厘米，直径60厘米；最小者高58厘米，直径60厘米。每件石鼓刻四言诗一首，文字总计在700字以上。因为诗的内容

春秋时期金文

1. 齐国金文
2. 鲁国金文
3. 楚国金文
4. 秦国金文
5. 吴国金文
6. 蔡国金文



1



2



3



4



5



6

石鼓文

春秋 秦



是歌咏秦君的猎祭活动，所以历史上亦称“猎碣”。石鼓文在流传中已有不少磨灭，宋代尚存 485 字，现仅存 272 字，其中一石文字已经全部剥落。现在专家公认石鼓文为东周时期秦国的刻石，有秦文公、秦穆公、秦襄公、秦献公、秦宣公诸说。石鼓文风格属

于秦当时使用的大篆体，与字书记载的籀文相似，可以让我们了解春秋秦文字的基本风貌。

1965 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马晋国都城新田遗址发现了大批春秋晚期晋国贵族的会盟誓辞，以前称《侯马盟书》。侯马即战国初期晋国的首都新田。遗址长 70 米，宽 55 米。盟书出土于遗址西北部的竖坑中。根据《周礼》、《左传》等记载，古代人盟誓时要在地面上掘“坎”，杀牲取血后埋入坎内，并把盟辞放在牲畜之上。出土盟书的竖坑，实际上就是这种坎。据发掘者报道，遗址西北部的坎，绝大多数为长方形，最大的长 1.6 米、宽 0.6 米，最小的长 0.5 米、宽 0.25 米，深度在 0.4 米至 6 米之间，方向大多为正南北向。多数坑北壁有壁龛，龛内有璧、璋等玉器。坑底有家畜骨骼，大坑多系牛、马，小坑为羊，填土中或有鸡骨。盟书系在玉石片上写成，形状有圭、璋、璜等，也有不太规则的石片。该遗址出土盟书约 5000 余件，内容有“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诸种。这些盟辞都用毛笔写在玉、石片上，绝

《侯马盟书》

战国 晋

1965 年至 1970 年山西侯马盟誓遗址出土



侯马晋国盟书

温县晋国盟书

大部分是朱书，小部分是墨书，字体草率而流畅，结构紧凑多变，带有俗体字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初，河南温县也发现了很多墨写的盟书，盟辞体例、形制、书写风格都与《侯马盟书》相近。此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曾出土过这类盟书，当时称为“玉简”。

二、战国文字

春秋战国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春秋以前，宗法贵族对政治、经济、文化实行垄断，“学在官府”。战国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变化，学术文化冲破了“学在官府”的束缚而勃兴，使用文字的人越来越多，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这就使得文字越来越向简便、实用和易于书写的方向发展，使文字出现剧烈的变革。

战国七雄之中，秦国由于地处宗周故地，接受西周文化的影响较多，而且由于地域偏远，文化的发展远不如东方六国迅速。以后，随着战国政治、文化的变革，战国文字逐步形成了两个系统：一个是基本沿袭西周后期文字风格的秦系文字，它的形体基本上还保持西周晚期的文字风格；一个系统是东方六国文字，形体、风格呈现出与西周春秋文字大相径庭的面貌。

（一）六国系文字

考古发现的六国文字资料非常丰富。这一时期的实物资料主要有：

1、金文。战国金文与西周春秋金文有很大差别：西周春秋金文多是铸铭，文字是铸造在器物内壁上的；战国金文多为刻铭，都是用刀刻在器物表面上的。西周春秋金文文字较多，战国金文一般文字较短，内容多是记载铸工或刻工的名字，但也有长篇的记事铭文，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大鼎、方壶上的铭文，长达469字和440字。湖北随

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上有关音乐乐律的文字竟达数千字之多。

2、陶文。刻在陶器砖瓦上的文字。

3、玺印文字（包括封泥文字）。

4、货币文字。

5、竹简。竹木易朽，所以年代久远的竹简发现不多。西晋时发现过写有六国文字的



竹简，被整理成《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近现代发现的战国竹简多是楚简，如湖南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湖北江陵望山楚墓楚简、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楚简、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等。

6、帛书。战国帛书在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过1件，长38.7厘米，宽47厘米，质料为白色丝帛，墨书文字900余，字体为楚国古文。该帛书中部有两大段文字，方向相反，一段文字8行，内容为天象灾异之事；一段13行，内容涉及传说中的帝王及

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帛书四周彩绘十二个奇形怪状的神像，作为一年十二个月的象征，按上夏、下冬、左春、右秋的次序排列，每个神像旁边都题记该神之名和本月禁忌之事。四角分别用青、赤、白、黑四色绘各种植物枝叶的形象，充满了神秘的气氛。该帛书是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帛书，可能是楚人墓葬中作为导引的迷信用品，其作用是引导死者的灵魂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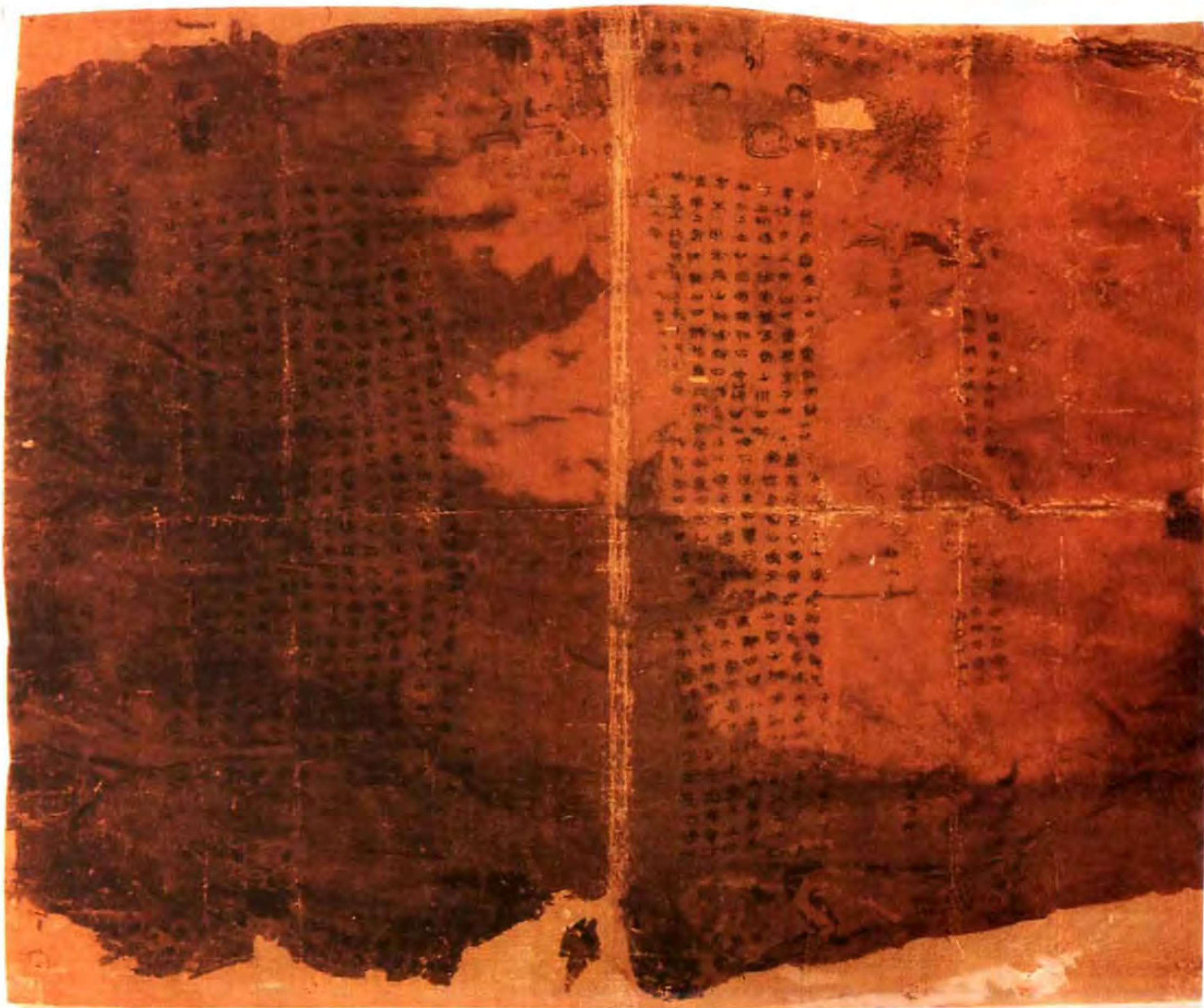
六国系文字与西周春秋文字比较，主要有下列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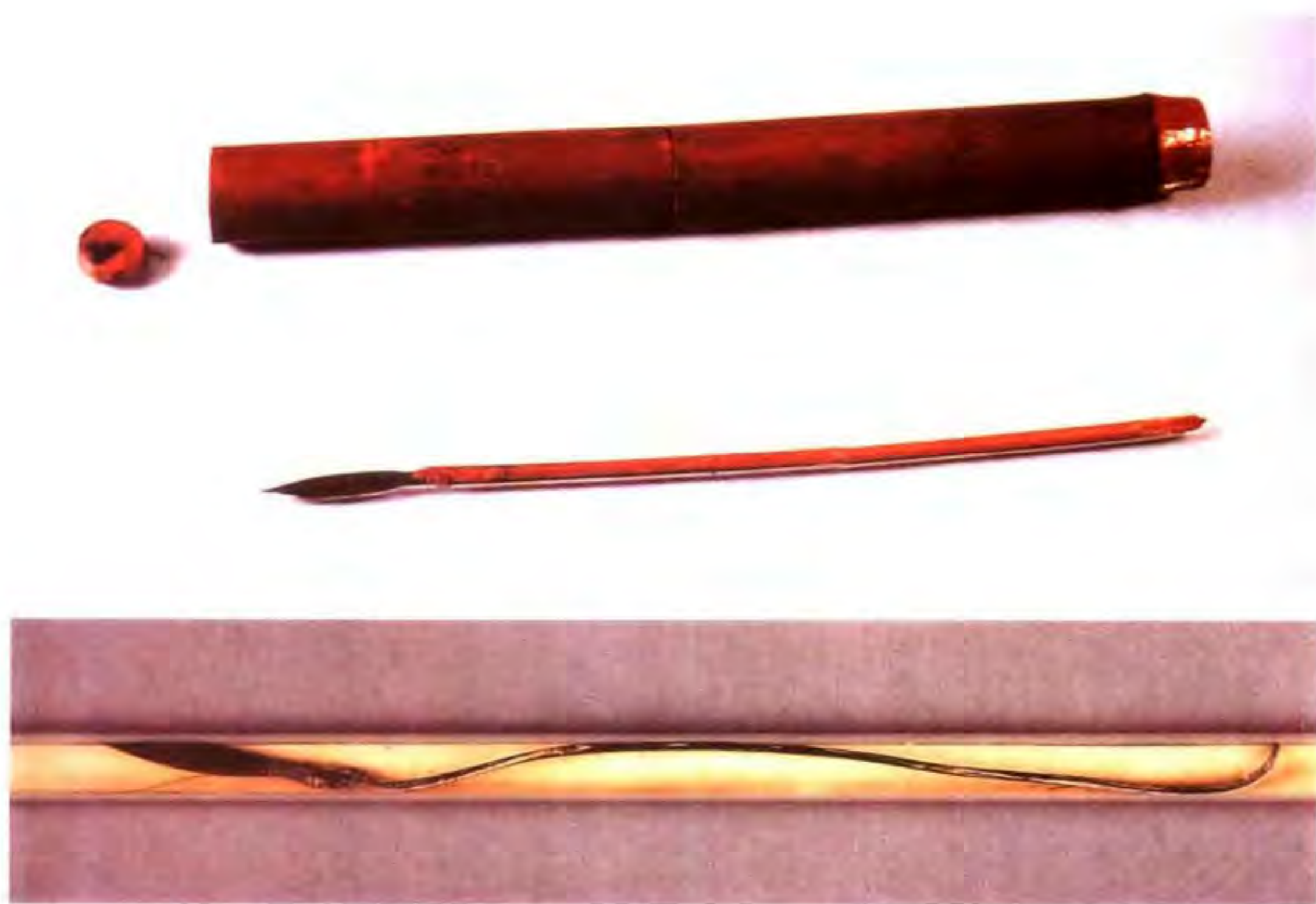
1、俗体简化字盛行。俗体简化字不同于

楚帛书

战国 楚

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





毛笔

战国 楚

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出土

毛笔长21.1厘米，竹筒长23.2厘米

出土时装在一竹筒中。笔杆为圆形实竹，笔尖为兔毫，其制作方法是将笔杆一端劈成数股，夹住兔毫，用丝线缠紧，再髹漆，使其牢固。毛笔在中国使用很早，但因易朽而难以发现。这支毛笔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毛笔实物。

毛笔

战国 楚

湖北江陵包山2号战国墓出土

通长22.3厘米，毫长3.5厘米。毛笔装在一竹筒内，筒长24.5厘米，径2.5厘米。

正体文字的简化，这种文字的结构和笔画明显简略，体式趋于平直，笔画简省，便于快速书写。

2、各国文字简省、变化的程度、风格不同，地域特点非常突出，文字异形的现象比较严重。它们不仅与秦系文字差别大，彼此之间差别也较悬殊。

这种文字异形的情况，使战国文字跟西周春秋文字的面貌差别很大。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文字越来越追求简易、实用，大量使用俗体字有关。战国文字使用范围很广，很多文字出于下层工匠之手，他们追求简省，难免草率，习以为常，俗体字得到了发展，“正体”字反而受到冲击。另一方面，文字异

	秦	楚	齊	燕	三 晉
馬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者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市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年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𠩺

秦系文字与六国文字差异表

形跟“诸侯力政，不统于王”也有一定的关系，带有一定的割据性质，这对当时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政治统一有不利的影晌。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用小篆作为标准体文字统一六国文字，结束了文字异形的纷乱局面，实现了“书同文”。这是政治统一的需要，也是文字发展的需要，对中华民族是

一件大好事。

（二）秦系文字

从春秋到战国，秦国的文字基本上沿袭了西周后期的文字风格，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字形的规整、均匀程度的不断提高上。为了使字体规整匀称，它把原来一些平直的笔画变弯曲，或者把原来弯曲的笔画变平直，

睡虎地秦简



这种圆转而均匀的字体就是所谓“篆书”。篆，就是把笔画拉长以求均匀的意思。“大篆”，指的是春秋战国间的秦文字；“小篆”，指秦统一中国后用来统一文字的标准篆体。后世的文字学家把这种基本沿袭西周后期文字风格的秦文字体系称秦系文字。

秦系文字实物资料主要有：

1、石刻文字。石鼓文之外，战国中后期的秦刻石有《诅楚文》，系秦国诅咒楚国的告神祝辞。秦统一后，秦始皇多次东巡并刻石纪功，现在保留下来的实物和拓片有琅邪刻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等。

2、金文。春秋秦的金文主要有秦公簋、秦公钟、秦公钫等。战国金文主要是兵器、权



青川木牍



里耶秦简



《诅楚文》

量、虎符文字。秦统一后有铸刻秦始皇廿六年诏书的诏版和权量等。

3、玺印、封泥文字。

4、漆器文字。

5、简牍文字。秦国简牍主要有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内容为秦国法律、大事记等；还有四川青川发现的木牍。近年湖南凤凰里耶又发现了大批秦简，这是秦代考古

的重大发现。

6、陶文。

实际上，秦在用小篆统一六国文字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隶书。最早的隶书实际上就是小篆的简体、俗体。这种字体既保持了小篆的基本结构，又侧重用方折和平直的笔法把圆润的篆书写得比较平直。这种字体写起来方便、简省、速度快，所以后来逐渐演变成正规的汉字标准字体，篆书只用在印章、旗帜等庄重而带复古风味的一些物件上。

第二节 文学

一、散文

（一）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理性人文思想高涨的时期。新的经济制度孕育着新的政治制度，社会的巨大变革激发着人们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百家争鸣，处士横议，于是产生出十家九流、丰富多彩的散文作品。

春秋战国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可以分成三个连续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战国之际的《论语》、《墨子》，属语录体散文；第二个阶段是战国中叶的《孟子》和《庄子》，属对话式论辩散文和向专题论文过渡的散文；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末叶的《荀子》和《韩非子》，属论断透辟的专题论文。

1、《论语》

《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和孔门后学辑录的一部记载孔子言行的书，全是语录体散文。书中记载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对话，文字虽短，但语言洗练，言简而意深，有一种迂徐含蓄的典雅风格。如：“岁寒，然后知松

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譬如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

这些语录，用鲜明的、人们常见的事物作比喻来阐明人生哲理，或用并列排比的语句，层层推进，阐明深刻的道理，耐人寻味，给人以启示。

《论语》长于运用各种语气词含蓄幽默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如子贡委婉地问孔子为什么不做官：“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短短的几句话，十分诙谐地把孔子“待价而沽”的心态活现出来。

另外，《论语》虽然是语录体，但也能用简洁的语言生动描绘出人物的举止神情。如：“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这段语录把孔子的风趣、子游的笃信师说及师生间的亲密之情描写得细腻委婉，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论语》还善于通过简单的对话和动作展示人物的性格。例如《先进》篇孔子与学生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讨论个人志向的一段文字，简短的几句对话，不多的几处形容，便使子路的鲁莽率直、冉有和公西华的谦虚谨慎、曾皙的潇洒超脱跃然纸上。

2、《墨子》

墨家注重实践，崇尚质朴，怕人们读了有文采的文章后“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所以其文章不注重文采，但逻辑性很强。《墨子》中的《兼爱》、《非攻》、《公输

诸篇，都是类比推理和简括叙写生活事实相结合的说理文。如《非攻》中的一段：“今有一人，人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人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人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人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又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这段话，作者先以“人人园圃，窃其桃李”、“人人栏厩，取人马牛”等说明什么是“不义”，进而说明攻人之国是“大为不义”，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层层推理，有力地批判了那种把攻打别人国家说成是“义”的荒谬说法，既形象而又极具说服力，体现了《墨子》散文的风格。

3、《孟子》

《孟子》七篇是孟子晚年的作品。《孟子》文章仍属对话体，但不像《论语》那样简洁含蓄，而是长篇大论，词锋犀利，气势磅礴，富于论辩性。《孟子》书中，在各种论辩的场合都是以驳倒对方而告结束的。例如他驳斥农家许行治天下必“耕且为”（一边种地，一边治理天下）的观点，先从许行也并不是自己先做好了釜甑才做饭，先铸好了犁铧才耕地说起，说明社会分工是非常必要的，然后以大量的事实列举尧、舜、禹、后稷都因政务繁忙没有时间去种地，说明治理天下是不能“耕且为”的。明确了这一点，他进而又斥责许行治天下必“耕且为”的观点实际上

是“以夷变夏”，是历史的倒退。理直气壮，层层推进，非常有说服力。又如“齐桓晋文之事”，他向齐宣王鼓吹王道，先有意避开齐宣王提出的霸道，掌握谈话的主动权，然后采用迂回战术，巧妙地把话题引到王道上，引用宣王不忍杀牛衅钟的故事使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设下的圈套，先纵而后擒。这段对话，生动形象，语气逼真，从齐宣王不忍

马王堆帛书《老子》



杀牛衅钟证明他有“保民而王”的思想基础说起，说明宣王能否“行仁政”的问题主要在于他主观上“为”还是“不为”。最后作者使用一连串的排比反问句揭露齐宣王之大欲，铺张扬厉，咄咄逼人，使齐宣王无法辩解。

孟子不但善设机彀，先纵后擒，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和幽默的故事深入浅出地阐明自己的思想，带有百家争鸣激烈竞争中的辩士特色。其著名者如“鱼，我所欲也”、“揠苗助长”、“齐人乞墦”等都是千古流传的名段。

《孟子》的文章气势充沛，语气也极为逼真，有很多接近口语。这类篇章，语气自然流畅，非常生活化，说明《孟子》散文已在脱离语录体上迈出了很大的步伐。

《孟子》的文章对中国散文的发展影响很大。

4、《老子》

今本《老子》一书，是战国时人所作。《老子》用韵文写成，具有散文的特征，也深蕴诗的优美。

《老子》的语言精炼、形象，喜欢用对句，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如：“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5、《庄子》

《庄子》散文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构思宏伟，想象奇妙，汪洋恣肆，变化万端，语汇也丰富多彩，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如著名的《逍遥游》写鲲鹏在广阔的天地间遨游的情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

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作者根据神话传说，以夸张的手法极写鲲鹏之大及其展翅翱翔于天海之间的壮阔景象，展示出一幅气势宏伟的画面，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又如《秋水》，用拟人的手法写河伯从“欣然自喜”到“望洋兴叹”的转变，说明宇宙是广阔无垠的，而一个人所了解的东西是有限的。文中既包含了意味深长的哲理，又写出了一片开阔无穷的意境，行文隽永，不拘绳墨，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庄子》寓言有大胆的独创性，幻想奇特，刻画细致，往往包含辛辣的讽刺。鲁迅先生曾给予《庄子》寓言以很高的评价，说它“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庄子》散文多用韵，读起来和谐而有节奏感，与后来的散体辞赋相类，这是它独有的特色。

《庄子》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中国许多散文家和诗人都学习庄子的文章风格。但《庄子》的虚无主义哲学思想，也给后人带来了消极影响。

6、《荀子》

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的一位儒学大师，传有《荀子》三十二篇。相传《毛诗》、《鲁诗》、《韩诗》和《左传》、《谷梁传》都为荀子所传授，他对儒家经典的保存起了重要作用。

《荀子》文章多为长篇议论文，立论严谨，论证缜密，思想丰赡，句法整齐，用语准确，表现出很高的组织能力和分析能力。其著名者如《天论》，用铿锵有力的排比句

式，深刻地说明“天行有常”的道理，层层深入，无隙可击。

除了注重文章的逻辑性和缜密性，《荀子》还很注重词采的宏富，用广博的比喻和鲜明的形象去说明深刻的道理。如《劝学》篇：“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这一段话，运用各种形象的比喻和排偶句式，论证循序渐进、锲而不舍是学习的正确态度，词汇丰富，节奏铿锵，历来被人称道。

7、《韩非子》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今传《韩非子》五十五篇，大都是韩非本人所作。

《韩非子》散文峻峭挺拔，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行文周密，说理透彻，有很强的分析综合能力，体现了法家文章的特点。其著名者如《五蠹》引用各种史实和故事，批判儒家复古的思想，指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五种无益于耕战的蛀虫——“邦之蠹”：儒生、侠客、说客、逃避兵役者和投机商人，证据确凿，极富战斗性；《说难》从各个角度阐述向人主进言的困难，既有正面的道理，也有反面的事实，分析细如毫芒，反映出韩非观察事物的深刻与透辟。

《韩非子》使用大量的寓言故事论证事理，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其中不少寓言故事今天仍然存活在人们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中，像守株待兔、滥竽充数、自相矛盾等。

据统计，《韩非子》全书有寓言三百四十

则,数量居先秦诸子寓言之首。这些寓言,大都是作者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富于哲理的小故事,它形象地体现了作者的思想特征,新而不诡,奇而不怪,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作者的理论和主张,因此有人称赞韩非子和庄子一样是中国古代有名的寓言大师。

(二) 史传散文

史传散文也是春秋战国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

《春秋》属辞比事,语言极其精炼,虽然从散文的角度看,尚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但并非无文采可观。如僖公十六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寥寥几十字,把宋国发生的两件大事叙述得清楚明白,错落有致。

战国以降,新观念、新思潮和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促进了编年体史书向带有纪事本末体和传记体因素的方向发展,产生了像《左传》、《国语》、《战国策》一类的史实详备又富有文采的史学著作,对后世的史学、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左传》

《左传》叙事完整,富于故事性,善于抓住重要的情节重笔描绘,即使是经历时间很长的历史事件,写起来也能得心应手,应付裕如。如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写晋公子重耳出亡,作者照应僖公五年晋献公杀太子申生,从晋惠公死、怀公立、通缉重耳写起,集中写他流亡在狄、卫、齐、曹、宋、郑、楚、秦诸国的情况,一波三折,极富戏剧性。在流亡过程中,作者特别描写了重耳在狄与季隗离别,过卫国农人献土,在齐国姜氏与狐偃设计将他灌醉、迫使他离开齐国,在曹国曹共公看他洗澡,在秦国怀嬴捧着盥给他洗

头等情节,又穿插他回国前狐偃辞行、回国后寺人披告密、刺客竖头须求见等故事,扑朔迷离,把重耳从一个不谙世事、只知享乐的贵公子经过十九年颠沛流离磨炼成一个有胆识谋略的英雄人物的过程表现得清楚明白,人情入理,堪称大手笔。

《左传》尤其善于描写大规模的战争。全书记载战争几百次,其中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鞍之战、晋楚鄢陵之战、齐鲁长勺之战,文中均对战争的起因,战前军事、外交谋略,兵力调遣,行阵布置,战争的激烈程度,战局的变化,战争的胜负、结局等有详略适宜、条理清楚的交代。有些战役战线拉得很长,交战各国的军事联合、外交策略也很复杂,但《左传》写来却迂徐有致、有条不紊。如“秦晋崤之战”,先从穆公访蹇叔和蹇叔哭师写起,接下来写郑弦高犒师,晋在崤阻击秦军,文嬴请三帅,秦伯迎三帅等情节,把崤之战前后秦、郑、晋各方的形势、动态交代得清清楚楚,极有章法。“晋楚城濮之战”写晋破曹伐卫,激怒齐、秦而孤立楚国,又进而大破楚军的军事外交策略也很有特色。

《左传》不仅长于以大手笔描述大规模的战役,具体的、刀光剑影的鏖战场面也写得生动逼真。如齐晋鞍之战,一开始就用简单的几句话交待了齐军的轻敌,“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接着用较多的笔墨写晋军将士的团结对敌、浴血奋战:主帅郤克中箭,鲜血流到脚后跟,仍击鼓不停,指挥战斗;驭手解张被敌人的箭射穿了手、臂,他把箭杆折断,继续驾车,鲜血把车子左轮都染红了;车右郑丘缓一遇险情就冒着生命危险下去推车。他们以“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相鼓舞,相帮助。郤克伤势很重,解张就左手并辔驾车,右手帮助郤克

敲鼓。晋军终于以顽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了强敌。整个场面写得激烈昂扬,动人心魄,表现出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

《左传》语言精炼,婉转传神。如,同是论战,曹刿论战,是地位低下的人向当政者发论,处处委婉;子鱼论战,是贵族评论战争,言辞激烈,处处坦率直陈,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口吻。《左传》的叙事也都简练精当,如写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晋军败于楚,“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说中军、下军抢船逃命时,先上船的人用刀乱砍后来攀船人的手,使船中的断指可以用手捧,简洁鲜明地刻画出了战争的残酷。又如写楚将士饥寒,“(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纊”,说楚庄王巡视三军,拍着将士的肩膀鼓励他们,温暖的话语像给战士们穿上了棉衣,生动形象,十分精彩。写僖公二十六年齐孝公伐鲁,说鲁“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等,也婉转有致,比喻贴切,很受后人称道。

2、《国语》

《国语》主要记言,其中也有些记事,但不过是某些记言的插叙和补充,目的是为了史实记述完整。

《国语》有些对话幽默生动,能以鲜明的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姜氏与狐偃设计灌醉重耳一段,传文只有“姜氏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几个字,而《国语》的记载则相当生动:“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贖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

这段话,重耳说话恶狠狠的,狐偃则风

趣幽默,把贵介公子重耳的强横和狐偃的圆滑、老成表现得惟妙惟肖,显较《左传》为胜。他如优施教骊姬陷害申生、叔向贺贫等,也都十分注重用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着墨不多而简洁生动。

《国语》的对话中也经常夹入一些介绍人物、事件和典章制度的文字,对所述事实的完整和发表议论有很大帮助。

3、《战国策》

在语言艺术方面最成功的是《战国策》。

《战国策》善于铺陈,喜欢渲染,富于雄辩色彩,有很强的说服力。这跟战国策士之论的发展有关。战国的策士多是朝秦暮楚的纵横家,他们对君王的心理状态把握得比较准确,善于对当前纷繁复杂的问题进行明澈的分析,胸有成竹,又能随机应变,见风使舵,所以他们的策论大都酣畅淋漓、激昂慷慨而不加掩饰。如《齐策四》“颜觸见齐宣王”一段,颜觸直斥“王前”,慷慨陈辞,剥肤及髓地把“王者贵”的论点驳斥得一塌糊涂,可以说得上是战国策士的杰出代表。

为了折服对方,策士们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为自己的策论寻找历史依据,或把历史事实改造成诡谲神奇的故事。如《燕策》“郭隗说燕昭王”一段:“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这一段话,作者引用了古人以五百金买死千里马头的传说,说明只有求贤若渴,才能找到真正的贤才。用墨不多,但很有说服力。

《战国策》善于引譬设喻,常常用身边常

见的人事以小见大、生动形象地说明深刻的道理。像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冯谖以狡兔三窟谏孟尝君、陈轸以画蛇添足说昭阳、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都是用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几句话就说明一个深奥复杂的道理，辞采也显得恣肆畅达，充分体现了策士们深厚的文化修养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战国策》不仅语言传神，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苏秦说秦失败、回家遭家人白眼和说赵合纵成功、得意回家时的形象描写，冯谖客孟尝几次弹铗而歌的描写，都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其他像荆轲离燕入秦，在易水上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用非常简练的语言塑造出一个沉毅勇决、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赵策》写鲁仲连倜傥奇伟，慷慨凛然，不惜身家，“义不帝秦”，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战国策》对后世传记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司马迁写《史记》，从中吸收了不少营养，《刺客列传》中有不少文字几乎全部采用了《战国策》原文，这说明《战国策》确在史传文学向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过桥梁作用，其作用不可低估。

二、诗歌

（一）《国风》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风”即十五“国风”部分，大都是春秋时代的作品。“风”是乐调的名称，“国风”是当时各国以当地音乐配乐的民谣之诗，不一定是民歌，

十五“国风”指周南、召南两个地区和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三个诸侯国的歌谣。史载，周初周公、召公分陕（今河南陕县）而治，周

公居东，长住东都雒邑；召公居西，长住宗周镐京。周南、召南在今长江流域中游，十三国在今黄河流域上、中、下游。

国风的诗歌分成下列几类：

第一类是农事诗，即描写农业生活的诗，以《豳风·七月》为代表。《七月》全面细致地描写了豳地农民一年十二个月的生活，把农民一年到头的劳作、哀苦与封建贵族的享乐对比，是一首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优秀诗篇。诗中描写农民不分冬夏地劳动，但衣食却不得温饱，“无衣无褐”，“采荼薪樗”，一年四季还要为贵族服各种各样的劳役，劳动妇女还时时会遭到贵族子弟的欺凌，“春日迟迟，采芣苢。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真实地再现了春秋授田制下的阶级压迫和当时农民的生活。

第二类是战争徭役诗，即以战争或徭役为题材的叙事抒情诗。这一类诗，有的表现了战士们在战争中同仇敌忾的必胜信心。如：“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无衣》）有的则反映了动乱年代生产破坏、亲人离乱的情景和战士们对战争的厌倦：“肃肃鸛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鸛羽》）“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

第三类是爱情诗，即以婚姻爱情为主题的诗歌。其中有的是表现男女互相爱恋、思念。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有的是描写男女的嬉乐或幽会。如：“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简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

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溱洧》）“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有的是歌颂幸福婚姻的美满和新嫁娘的漂亮。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有的则是被遗弃女子对负心男子的愤怨与控诉。如：“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氓》）

第四类是怀旧诗、讽刺诗，即怀念旧人、追念往昔生活或讽刺贵族贪婪、暴戾的诗。如：“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

《黄鸟》是怀念为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的诗。诗中以奄息等殉葬时战栗发抖的样子揭露人殉的残酷，并发出“彼苍者天，歼我良人”的呼喊，“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体现了作者对死者无可奈何的追惜和怀念。另外如《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的作者来到过去的都城，但见荒烟蔓草，断壁残垣。想起当年的繁华，目睹今日之萧瑟，伤时忧国，悲从中来。

著名的讽刺诗还有《伐檀》和《硕鼠》：“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



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伐檀》质问“不稼不穡”、“不狩不猎”的“君子”为什么不劳而获；《硕鼠》把剥削者比作贪婪无耻的大老鼠，幻想能找到一个没有剥削的“乐土”，反映了当时农民对坐享其成的贪婪贵族的愤怒。

《国风》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为后世抒情诗歌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战国论诗竹简
上海博物馆藏

《诗经》之前，中国古代的歌谣还谈不上人物形象的塑造。但是，《国风》中却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如《卫风·氓》，通过与“氓”从相识到结婚到反目整个过程的简要描述，塑造了“氓”这个负心男子的形象。他在婚前假装诚实，“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结婚时也“信誓旦旦”，但结婚以后，财物到了手，他就“二三其德”，变成另一副嘴脸。语言很简练，但写得真实，也非常深刻。

《国风》很善于通过外貌描写来塑造人物，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从静态的面容到动态的顾盼，精练的几句话，把一个美人的形象非常传神地描绘出来，历来为人所称道。《国风》也常用借景起兴以烘托人物或借景抒情。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极力描写桃花的鲜艳，以烘托新娘的美貌。《秦风·蒹葭》借“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抒情，极言有所爱而见不到的寂寞，非常有意境，使人展开无限联想。

《国风》不仅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在创作艺术和语言艺术上也开启了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传统。《国风》的创作手法，前人总结为“赋、比、兴”。“赋”就是直陈，直接叙述；“比”，就是比喻；“兴”就是借物起兴。《国风》中“赋”用得不多，但也有几首诗却以此见长，像《郑风·溱洧》、《豳风·七月》都是直陈其事，诗味隽永。“比”、“兴”，《国风》用得最多，如《魏风·硕鼠》以老鼠比喻贵族的贪鄙，《卫风·氓》以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比喻夫妇感情的变化，《邶风·终风》以恶劣天气比喻暴虐和喜怒无常的丈夫，都用得恰到好处。借物起兴，因景生情，使人发生联想，这种起兴方法在《国风》中

比比皆是，它极易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以造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国风》一般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章法上重章叠唱，有很强的节奏和韵律感，富于音乐美。这是跟它配乐演唱的演奏特点分不开的。《国风》用词注重形象化特征，摹声摹形的重言或双声叠韵词很多，像《国风》的动词，一般都很注意不同情态的差别，如《周南·芣苢》，采的动作就用了“采”（开始采）、“有”（采了一些）、“掇”（拾）、“捋”（把芣苢子捋下）、“袪”（用衣襟接住）、“赧”（用衣服包起来挂在腰间）等动作，准确、形象，而又不重复。《国风》中运用大量的重言双声叠韵形容词来摹声绘形，加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音乐美。叠字的重言如“迟迟”、“依依”、“霏霏”，双声如“参差”、“辗转”、“黾勉”，叠韵如“窈窕”、“崔嵬”、“辗转”、“逍遥”，不但声调优美，琅琅上口，也给描摹形容的事物增加了色彩。

《国风》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传统，也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语言基础。后世文学家常常以“风”、“雅”作为淳朴严肃的文学创作原则来反对文坛上的形式主义，证明了《国风》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二）《楚辞》

如果说，《国风》作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光辉杰作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那么，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创作的富于楚文化色彩的骚体诗歌，则以充沛的感情、奇诡的想象和华美的语言开拓了中国长篇抒情诗歌的发展道路，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艺术传统的基础。他强烈的好修不阿和执著不屈的爱国献身精神，也成为后人砥砺情操、锻炼意志的榜样。

屈原，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的名门“公族”屈氏，年轻时做过楚怀王的文学侍

臣，后以“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升任左徒，负责持议国政，办理外交，很受楚怀王的重用。后来，屈原因受亲秦派大臣靳尚的诬陷，被贬为三闾大夫。

前313年，秦国连横派代表人物张仪到楚国游说，瓦解齐楚的“纵亲”关系，答应齐楚断交后，秦“献商於（今陕西商州、河南西峡之间）之地六百里”给楚。楚怀王不听陈轸和屈原等的苦谏，断绝了与齐的联盟关系，但秦并没有如约割地。怀王恼羞成怒，两次兴师攻秦，都被秦国打得大败。后来，楚国完全背弃与齐的“纵亲”关系投到了秦国的怀抱，一向主张联齐抗秦的屈原，被贬官到汉北（今湖北襄樊、均县一带）。

前299年，秦昭王约楚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南）相会，囚禁了楚怀王，楚怀王客死于秦。楚顷襄王立，在靳尚等的诬陷之下，屈原被流放江南。前279年，秦国大将白起攻占了楚都郢，顷襄王被迫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屈原不忍亲见亡国之祸，绝望之中，于汨罗江自沉。

屈原的作品共二十五篇：《离骚》，《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共十一篇），《天问》，《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共九篇），《招魂》。

《离骚》是自传体性质的长篇抒情诗，共373句，2490字。“离骚”是诉说离别的忧愁的意思。该诗以诉说离别的痛苦为主线，自叙平生遭遇，并以奇诡的想象抒发好修不阿的坚贞精神和不渝的爱国情感，一唱三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壮丽的诗篇之一。

“九歌”之名屡见于上古神话传说，为



屈原像

古代祭祀天地鬼神的娱神歌，即“鬼歌”。中国古代“九”，“鬼”读音相同，如《礼记·明堂位》“昔殷纣乱天下，鬼侯以飧诸侯”，《史记·殷本纪》就写作“九侯”。《山海经》说“九歌”是夏启从上天偷来的天歌，可见其渊源甚古，其原始形态的歌词想必是出自巫祝之手。楚辞《九歌》从娱神的角度袭用了“九歌”的名称，内容上有所继承和革新，融注进自己的思想感情，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超现实型浪漫神话诗歌。其所祀十神，东皇太一为上帝神，东君为太阳神，云中君为云神，大司命、少司命为司命之神，河伯为水神，山鬼为山神，湘君、湘夫人为湘山和湘水之神，国殇为战神，是一个完整的神灵系统。最后一章《礼魂》是送神曲，不专祀哪一位神祇。

《天问》就是“问天”，是屈原被放逐后，忧心愁悴，以质问天的形式表现他内心的愁苦、愤懑，指说天地，评鹭古今，提出疑问，辨明真理，于是就出现了这首气势磅礴，内容涉及宇宙、神灵、万物和历史、政治、人生诸多方面问题的长诗。《天问》共373句，

向天提出了17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可分两类：一类是问天地，问有关天地形成的传说；一类是问人事，问有关人间盛衰兴亡的历史大事。在这些提问中，作者以理性智慧的眼光审视苍茫的宇宙和短暂的人生，将自己的遭际和感情融入复杂的历史故事中，对一些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进行探索，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思想、历史和神话、传说提供了许多的资料。

《九章》是后人集屈原的九篇诗歌形成的章节。其作品时代据后人考证，先后顺序是：《橘颂》、《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

《招魂》是屈原在楚怀王客死秦国后为怀王招魂的作品，它既是为怀王招魂，也是为楚国招魂，反映了作者对祖国、对君王忠贞不渝的感情。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作为政治家，他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失败了。但作为文学家，作为诗人，他半生的辛苦遭逢却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博大的资赋和精深的艺术修养得以尽情发挥，创造出《楚辞》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奇葩！

屈原创造的楚辞体诗歌，带有浓厚的楚文化地方色彩。它结构宏阔，内容广博，趋于散文化、口语化而极宜于铺陈抒情，不同于北方四言诗“重章叠咏”、“诗乐合一”的弦歌形式而成为以五言、六言为主的“不歌而诵”的徒诗。这种诗歌包容量大，节奏、韵律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疾徐舒缓，抑扬顿挫，极具抒情色彩，所以它一兴起便以异军突起的姿态成为当时诗歌的主流，使战国后期成为繁花漫天、云蒸霞蔚的楚辞时代。

骚体诗的产生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屈原之前，中国诗歌是没有标

题的。屈原开创的标题诗歌，预示着中国诗歌已进入长篇诗歌的创作时期。骚体诗奇矫奔放的浪漫主义和“发愤以抒情”的创作思想，对中国文学浪漫主义流派的形成和“哀怨起骚人”、突出个性的作家群体的产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此，“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屈原的诗作和品格成为后世文人、士子学习的榜样。

屈原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它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精神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想象的奇幻优美以及对理想的始终不渝的追求和坚持。屈原作品运用丰富的形象思维，把描写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加以形象化，而自己则往往作为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上天入地，追求、探索于浩瀚的奇特境界之中。如他向重华陈辞之后，便乘龙御风而上升，要进入天帝的九重，可是帝阍鄙视他，不给他开门。他要到人间寻求高丘神女，神女恰巧不在那里；去宓妃那里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于是又找到了简狄和二姚居室，可是没有媒人说合，使他非常痛苦……这一段通过幻想所创造的雄伟壮丽的境界，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政治的探索、追求和他的彷徨、迷茫。

屈原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也就是王逸所说的“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离骚序》）。这种比兴手法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形象思维方法，是用形象思维表现生活本质的方法。如他用鲜花香草比喻人品质、志行的高洁，“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薋幽”（《惜往日》）；用臭物或萧艾比喻变节的坏人，“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离骚》）；用鸾鸟和燕雀分别比喻忠贞之士和奸佞之辈，

“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作者善于用鲜花香草比喻诗中抒情的主人公，他把江离、薜芷、秋兰、木根结茝、兰桂纫蕙以及荷衣莲裳等，都用来象征诗人高尚的风格，而且表示“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涉江》），这就形象地体现出诗人高洁的品格。作者用比兴的手法，把深刻的内容包蕴在丰富、鲜明和个性突出的形象之中，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司马迁说离骚“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其论至当。

在语言的运用上，楚辞体诗歌“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采用了大量的楚地方言，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样。但屈原采用的楚地方言，并不是采用自然形态的楚地方言，而是经过提炼和加工，使之更能传神状貌，增强了诗歌的语气，宜于铺陈但不芜杂。楚辞或吟、或咏、或歌、或诵，表达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情绪。它讴歌爱国主义精

神，揭露黑暗腐朽，向往高洁光明，鞭挞卑鄙齷齪，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全面深刻地概括了他所处时代的矛盾和冲突，那个时代的腐朽、反动、黑暗的现象，都通过他的作品反映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的辞赋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诗史。

第三节 艺术

一、音乐与舞蹈

音乐与舞蹈是一对姊妹艺术，先秦时期，乐、舞一般是不能分开的，乐时必有舞，舞时必有乐伴奏，两者相辅相成，声情并茂。

乐舞是人类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它的产生几乎和人类的形成同步。人类通过劳动逐渐脱离动物界时，音乐和舞蹈也就随之萌芽了。因为音乐舞蹈是表现人类最强烈

河南郑韩故城编钟坑





瑟

战国 曾 乐器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感情的艺术，“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它在诸种艺术中起源最早，变化也最大。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舞蹈纹彩陶盆，近年来该省的同德县宗日又出土了另一件舞蹈纹彩陶盆，两个彩陶盆内壁都画着几组人物手拉手翩翩起舞，这自然是对当时人们歌舞场面的描绘。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有不少都是涉及古代的乐舞的。《吕氏春秋·古乐篇》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通典》卷一四一说“伏羲乐曰《扶来》，亦曰《立本》；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黄帝作《咸池》；少昊作《大渊》；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

这都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古典乐舞。其中有的是古人劳动场面的描述，有的是古老民族的史诗，那时还没有文字，只能靠这种且歌且舞的形式代代流传。

有关音乐的文物，我们现在发现最早的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埙和骨笛。商周时代的乐器发现比较多，钟、磬、鼓、铙、铃等都有发现。殷墟甲骨文里有不少乐器的名字，如龠、乐、磬等，龠像编管之形（笙一类的乐器），乐像木板上张着丝弦（琴、瑟一类的乐器），磬像用锤击磬。有人推测，商代后期，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种乐器都已齐备，那时的人们大概已经掌握了十二律的乐律知识，进入了系统的音乐知识阶段。

商代的舞蹈已有了巫舞和乐舞之分。巫舞是祭神、迎神、娱神的乐舞，主要服务于宗教活动，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乐舞

琴

战国 曾 乐器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是供贵族享用的歌舞表演，以娱人为主，风格较轻松。商代是神权政治社会，宗教活动带有政治的性质，所以后世关于巫舞的记载较多。《说文》载：“舞，以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商代的巫舞流传下来的有《桑林》（祈雨的乐舞）、《大濩》（祭祀先王的乐舞）、《羽》（祭祀四方的乐舞）等，这些乐舞因为年代久远，其内容已不可考。

周代因为有伴乐和伴舞的《诗》流传，使我们对当时的舞蹈了解多一些。

周初制礼作乐，把前代遗留的乐舞进行整理，建立了雅乐体系。雅乐体系分文舞、武舞两种。文舞显示君王以德服人，舞蹈时手里拿着乐器“龠”和鸟羽“翟”，传说《云门》、《大章》、《大韶》、《大夏》属于此类；武舞显示武力强大，舞蹈时手里拿着干（盾）和戚（大斧），《大濩》、《大武》属于此类。《诗》中也有文舞、武舞之分，主要体现在《雅》、《颂》中。《大雅》、《小雅》大多是贵族的乐歌，《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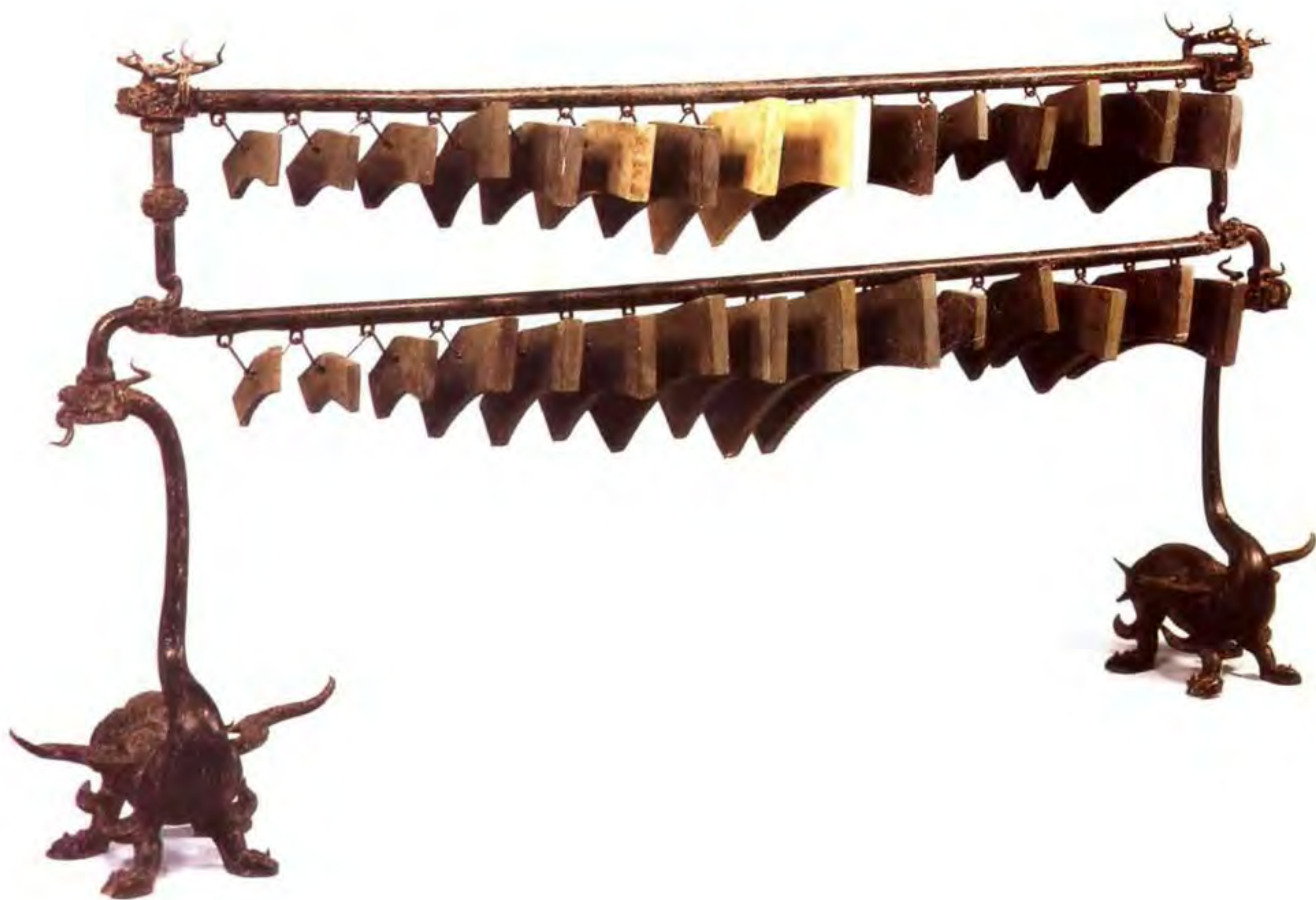


笙

战国 曾 乐器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编磬

战国 曾 乐器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排箫（簫）

战国 曾 乐器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是周、鲁和商后人赞颂先祖创业的史诗性质的宗庙乐歌,《风》有一部分是民歌。《诗》各篇重章叠唱的形式,还保留着它原来且歌且舞的风格,较长的篇章中,还保留着合奏、合唱(即“乱”)的痕迹。有人研究,《诗》中还保留着传说中的《大武》(歌颂周武王灭商的大型歌舞)和《大濩》(歌颂商汤灭夏的大型歌舞),《大武》的歌词散见于《周颂》各篇,《大濩》的原文亦不出《商颂》,《商颂》《周颂》应当是武舞歌词的遗留。

周代的乐器见于文献记载者甚多。仅鼓类乐器,见于文献者就有土鼓、木鼓、贲鼓、应鼓、田鼓、县鼓等。其他乐器,除了琴瑟,仅《诗》一书就提到了筑、箏、钟、镛、磬、缶、雅、圉、箫、管、铃、翕、埙、篪、笙、竽等很多类。西周春秋时音乐理论已有了“五声七音十二律”的说法。“五声”,是比较音高,即宫、商、角、徵、羽;七音,是五

声角徵、羽宫之间加上两个变音变徵和变宫;十二律是绝对音高。《国语·周语》记载周景王的乐师伶州鸠说,十二律的名称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无射、应钟(西周出土的编钟上记有蕤宾、无射等律名)。这是中国最早的整体化音乐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雅乐渐渐衰落,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声”兴起。“新声”是一种新曲调,节奏明快,热情奔放,生动活泼,对人的感官刺激性较强,被守旧的人说成是“淫”乐。据说晋平公喜欢“新声”,掌管音乐的师旷说:“公室将卑乎!”卫灵公召乐师师涓弹奏新学来的“新声”,师旷居然说这种新乐是“亡国之音”。然而主张改革的魏文侯“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国君尚且如此,士大夫与平民对“新声”的兴趣就更可以想见。可见,“新声”是一种革新的音乐。

1996年至1998年,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了17座春秋中期的乐器坑,未被盗掘的9座编钟坑出土了编钟206件,不仅件套完整,还发现钟架数套,虽已腐朽成灰,但基本形制、编钟的悬挂方式、演奏方法还可以看得很清楚。

周初已经制定了规范的编钟调音方法,但因对钟腔内壁锉磨过甚,影响了钟的音色和音量。郑国编钟调音已有较大的改进,多是锉磨内唇,而较少损伤内壁,这对西周调音的发展与编钟音律的转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郑国编钟与音色有关的另一重要技术改进是音梁设施的使用,郑钟音梁大部分已趋成熟,为春秋晚期编钟整齐规范的音梁产生奠定了基础。

从测音结果看,郑国编钟已巩固了宫、商、角、徵、羽五正声的传统。西周大概违

“商”，编钟中都没有商音，春秋早期讳商观念似已淡化，开始出现商音，但并不普遍，到春秋中期的郑国编钟已是每套都有商音，这对音乐和音律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推进。郑钟音域较广，从最低音到最高音，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程。钮钟为中高音区，作演奏主旋律之用。甬钟为低音区，作演奏和声之用。郑国编钟继承了五正声传统，并有较多的半声音阶，可以旋宫转调，至今仍可演奏出音色优美的旋律。

郑国编钟的木质钟架（古称筦虞）的发现，也使我们看到了春秋中原地区跽坐演奏的形式。楚文化区域的钟架演奏多为立式，实物时代也比郑国钟架要晚。郑国编钟演奏以三架钟为一群组，一次演奏共用钟72件。祭祀活动中，同时还配用民间的吹奏乐器，显示出郑国贵族与民众对民间音乐的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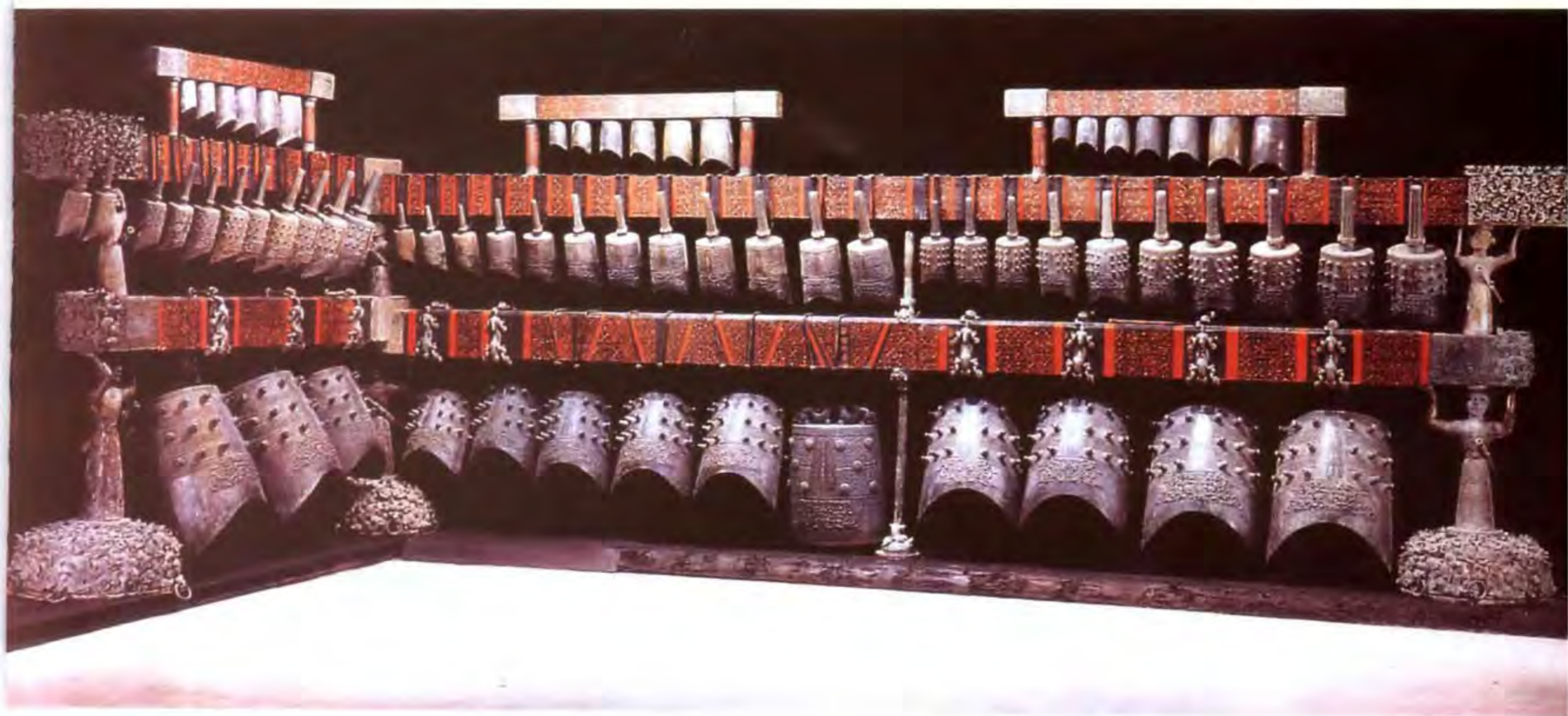
雅乐伴奏主要靠鼓、钟、磬等打击乐器，而“新声”伴奏则主要靠丝竹。《战国策·齐策一》记载齐都临淄之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这些都是丝竹之乐。湖北随州

曾侯乙墓出土了瑟、琴、笙、排箫（籁）、篪、笛子等整套的管弦乐器。故宫博物院藏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上绘有吹竽、弹琴、鼓瑟的宴乐图像。这些都反映了战国“新声”的发展。

战国时期有关音乐和音乐理论的文物目前发现不少。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8种124件战国早期乐器，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乐器中最突出的是一套编钟，共65件，上面都有铭文，标明每一件钟的音标、音阶。经过对整套编钟每钟两音的测定，从低音到最高音，总音域跨五个八度之多。在中心音域三个八度的范围内，十二个半音齐全，而基本骨干是七声音阶结构，说明当时已懂得八度位置和增减各种音程的乐理。经过试奏证明，该编钟能演奏采用和声、复调和转调手法的乐曲。编钟铭文中出现了无射、黄钟等八个律名，说明十二律在春秋时代即已存在，也证明三分损益法的运算实际上采用的是弦律而非管律。铭文中“(变)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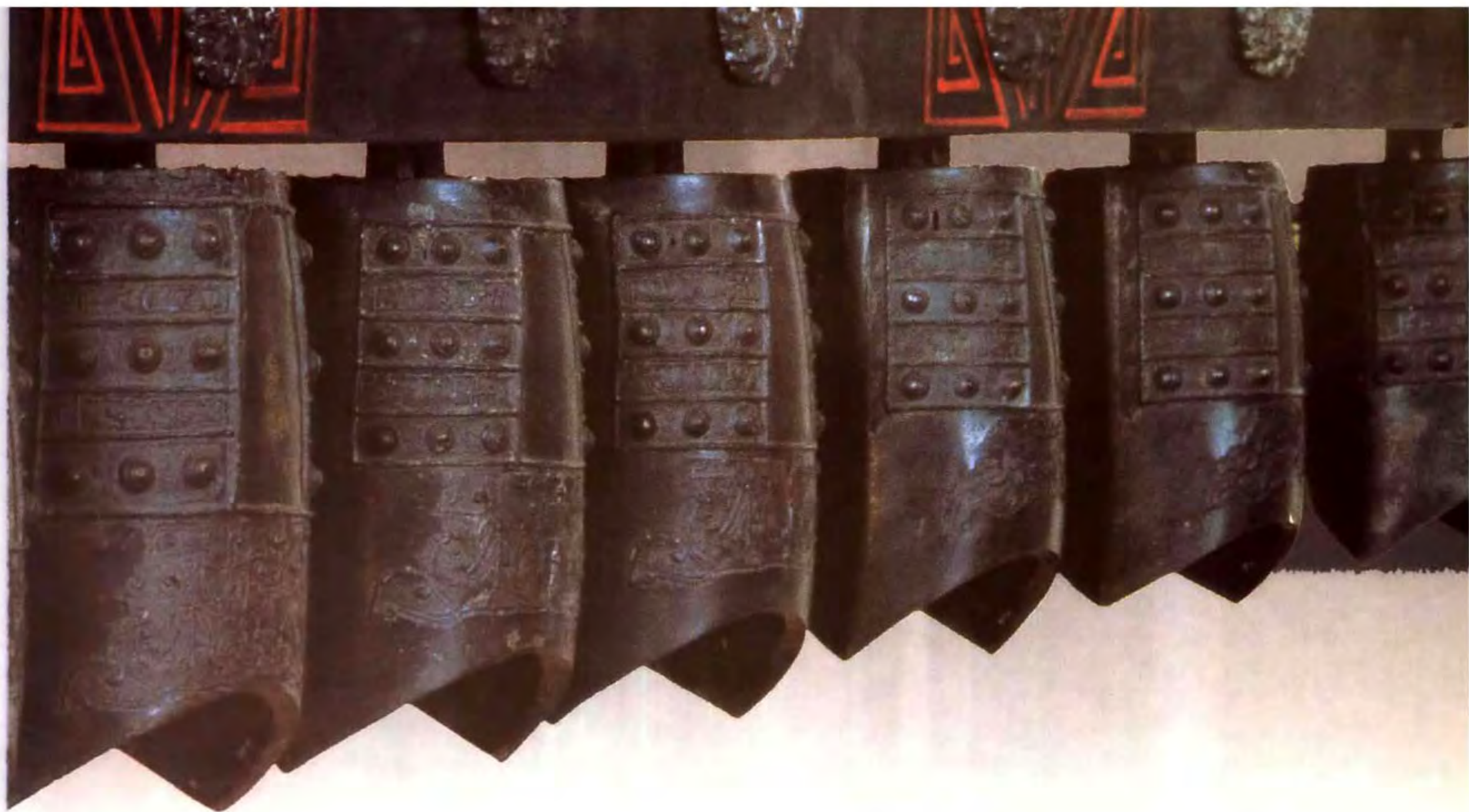
编钟

战国 曾 乐器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信阳长台关编钟



簫

战国 曾 乐器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一词的出现，说明至少在战国早期即有了“变宫”之说。“和”不作变化音名而作音阶名出现，与宫、商、角、徵、羽并列，则是中国音乐史上以前未见于记载的新发现。

中国声律（确定标准律）的三分损益法是春秋时期发明的。其方法是把一根弦作振动体分成三段，三分损一（去其三分之一，取其三分之二），这样该弦振动后所发的音，会比原来全长发音音高纯五度。反之，一根弦

分成三段，三分益一（增加三分之一，取其四分之三），该弦振动后所发的音，会比原来全长发音音低纯四度。这样，“一损一益”，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按音高排列，其次序为徵、羽、宫、商、角，比欧洲同一方法的“毕得哥拉斯（Pythagoras）律制”要早约一个世纪，这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音乐理论成就。后来吕不韦相秦时又发明了宫调理论，在此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使中国的音乐理论更为丰富。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流行“新声”，也流行“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的“万舞”等新型舞蹈。这类适应性强的新型舞蹈，不仅有舞师在国君的宫廷中表演，女乐在筵宴中表演，有时贵族也自演自舞，《诗·邶风·简兮》描写的就是宫廷中表演“万舞”的盛况。战国时期南方吴楚地区巫风氤氲的宫廷舞蹈极具特色，《楚辞》中的《九歌》就是一场楚地的祀神群舞：场面变幻不停，人物纷纷出场，细腰纤纤，服饰绮丽，且歌且舞，清音绕梁，既有人物，也具情节，这大概就是中国传统民间歌舞的起始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音乐的教育功能非常重视，孔子认为，做一个完美的人，没有必要的音乐教育是不行的。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完美的人是从诗教开始的，礼给他打下基础，乐促使他成熟。荀子也很重视乐舞的修身养性功能，他说，通过

石排箫



乐舞的熏陶，人的志趣情操、精神面貌就会发生变化。这反映了德治思想发展以后人们对乐舞移风易俗功能的挖掘。

二、绘画

中国绘画的历史非常悠久，它的发源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祖先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才能，逐渐掌握了绘画艺术。仰韶文化彩陶上毛笔绘制的多彩多姿的绘画，史前先民形象简练的舞蹈场面、放牧场面的岩画，就是他们最早的艺术创作。

商周以后，绘画主要用于旗帜、衣服、器物的装饰和壁画。商和西周的建筑遗址中曾发现过零星的壁画痕迹，也发现过一些残留的漆器绘画，但能说明总体面貌的材料太



铜壶顶采桑舞蹈图

战国 魏
河南辉县出土

少。春秋战国的绘画，现在能知道的有壁画、漆画、帛画等，铜器上的镶嵌画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成就。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咸阳秦故都第3号宫殿遗址走廊两侧的残墙上发现了车马、人物、建筑形象的壁画遗迹。壁画中驾车的马，四蹄扬起，马腹几乎贴着地面，体现出

鸳鸯盒漆画

战国 曾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漆画

战国 曾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绘于该墓出土的墓棺上。



墓棺

战国 曾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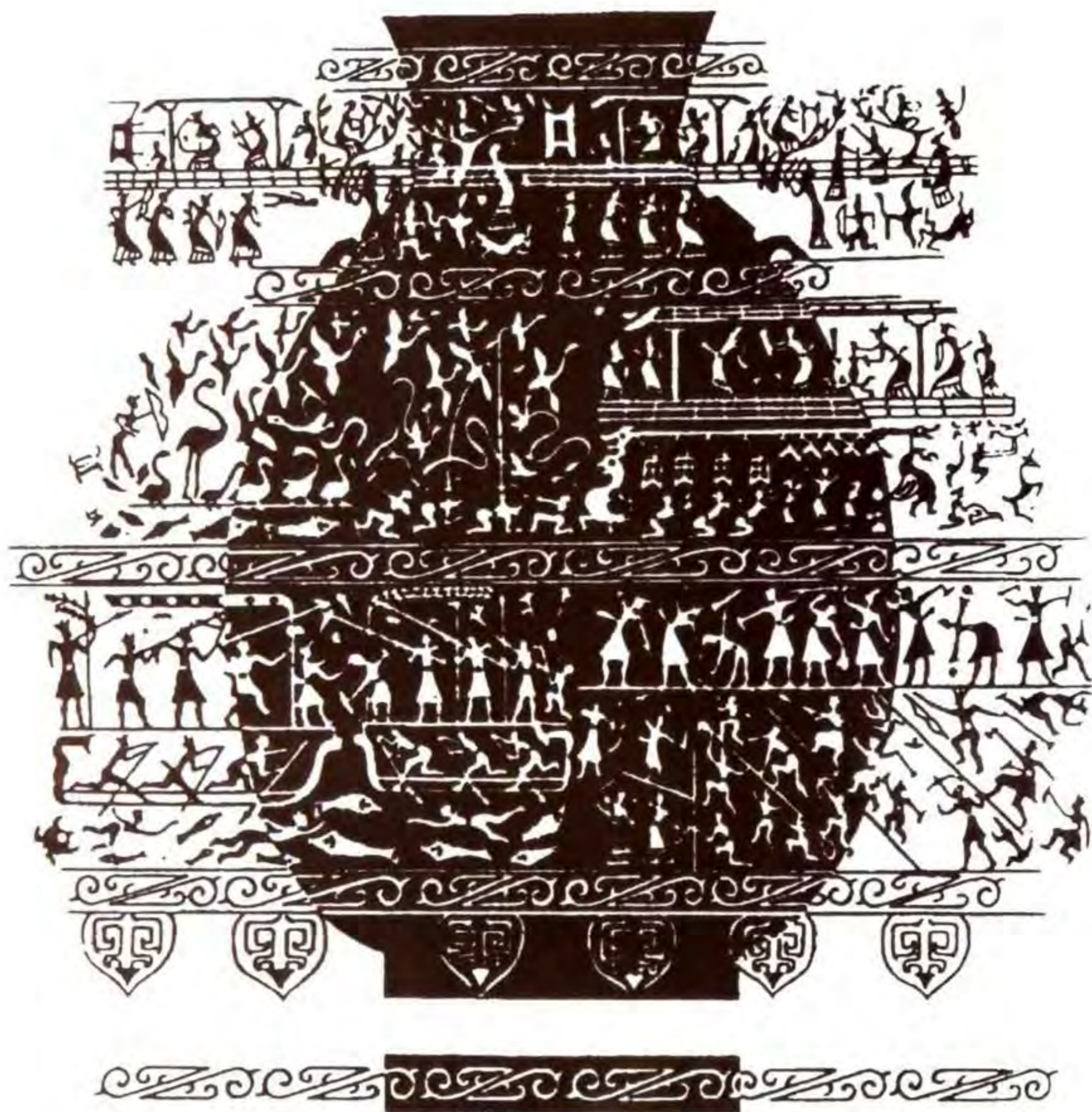
飞奔的形象。几匹马前后的透视关系也比较合理。该遗址遗留的壁画残块中,有各种色彩鲜明的图案形式,画法以线描为主,兼用平涂和晕染,带有早期工笔重彩画的特点。

春秋战国的漆器画发现较多,以湖北、河南、湖南的楚国墓葬为主,少数出土于山东的齐国墓葬。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漆画,荆门包山楚墓夜盖漆画、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瑟漆画。曾侯乙墓的漆画主要绘在棺槨、衣箱、漆盒、皮甲等器物上。其中绘在棺槨上的龙、蛇、鸟、鹿、凤、鱼

等动物有 895 个之多,在内棺壁板上还画有 16 个神兽、羽人。衣箱四面朱绘几何花纹,盖上有《后羿射日图》等。皮甲以黑漆作地,用红、黄等颜色描绘出各种形态的龙、凤、鹿和集合图案组成的画面。鸳鸯盒器腹两侧各绘有一幅乐舞画,一侧绘《撞钟击磬图》,一侧绘《击鼓起舞图》,勾线和平涂相结合,线条婉转自如,色彩分明,颇具特色。荆门包山 2 号楚墓出土的夜盖上绘有漆画《聘礼行迎图》,表现的是当时贵族之间重要的礼仪活动,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已知的最早的情节

青铜壶习射采桑宴乐攻战纹展开图

四川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



奩

战国 楚 漆器
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



3/5



性纪实彩画。

现在发现的真正具有独立绘画性质的先秦绘画，是战国楚地的帛画《人物夔龙图》和《御龙人物图》。

《人物夔龙图》，高28厘米，横20厘米，1949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画中一女子侧身而立，发髻下垂，细腰大袖，长衣曳地，双手前伸合掌，前上方有夔龙和凤鸟各一。《御龙人物图》，高37.5厘米，横28厘米，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画中一男子侧身直立，峨冠大袖，佩长剑，上有伞盖，其下为一条昂首的龙，人物执缰御龙而行，衣带飘飘，很有意境。

这两幅画，均以单线墨笔勾勒，后者另加平涂，同时渲染设色。这些绘画形式和技巧，一直到今天仍在沿用，这说明中国画的绘画特征，在几千年以前的战国时代就奠定

了。《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参观周的明堂，见壁画上的“尧舜之容，桀纣之象”“各有善恶之状”。《说苑》记载“齐王起九重之台，召敬君图之。敬君久不得归，思其妻，乃画其妻对之”。这说明中国人物肖像画的历史至迟在春秋时代就开始了，从长沙出土的这两幅帛画，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绘画的普遍水平。

春秋战国铜器上的镶嵌画、针刻画，也体现了当时绘画的基本特点。镶嵌画，有的是错红铜，有的是错金银。春秋中晚期镶嵌画图形较简单，战国以后的镶嵌画人物众多，层次复杂，非常生动。其著名者如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青铜鉴、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习射采桑宴乐攻战纹青铜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画面都是分三层横向展开，

《聘礼行迎图》

战国 楚
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
为绘于奩盖上的漆画。





《御龙人物图》

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



《人物夔龙图》

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

上层为习射采桑图，中层为贵族宴乐弋射图，下层为水陆攻战图，人物造型简练生动，场面开阔热烈，过渡自然巧妙，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创作能力。针刻画的题材或为神话传说，或为写实题材，形象丰富。神话题材的针刻画大多是构图复杂的怪鸟神兽，写实题材的大多数是宴乐、习射、狩猎场面。较典型的有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宴乐习射狩猎青铜鉴等。

三、雕塑

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塑艺术比较发达。

人物雕塑发现比较多的是俑。俑分陶俑和木俑。早期陶俑制作比较简单，俑头用墨勾画眼眉，衣服上施彩绘，但形象比较生动。晚期的俑制作比较复杂，写实水平较高。其制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先雕刻出人的基本形体，然后加油漆彩绘，如山西长治分水岭

漆木鹿

战国 曾 漆器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通高77厘米，通长45厘米
鹿身系木雕，头上插真鹿角。前肢跪曲，后腿前屈，神态安闲。全身黑漆为地，鹿身斑纹由金漆绘成整齐有致的叶纹，双目炯炯有神。该漆木鹿造型逼真，形态生动，是战国木雕工艺的精品。





战国墓出土的木俑：一种是较具体地雕出头部形状，施加彩绘，身躯部分只做成一个支架，或头部、身子分做后插合为一体，最后套上绢衣，加上头发和双臂。

除俑之外，春秋战国时代与器皿合为一体的人物雕塑数量不少。像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青铜器人物器座、山东诸城出土的战国人形铜灯、三门峡上村岭5号战国墓出土的跽坐人漆绘灯，人物造型美观，比例适宜，装束得体，很有特点。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的六个钟虺铜人是现在发现的战国时期形体最大的青铜人像。这六个铜人，形象逼真，表情肃穆，刚毅，为孔武有力的力士形象，是战国前期人物雕塑的代表作。

春秋战国时期的动物雕塑传神逼真，极富表现力。其著名代表作像河南新郑出土的立鹤方壶，安徽寿县出土的楚错银铜卧牛、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木雕漆绘虎座飞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青铜鹤，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虎噬鹿器座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镇墓兽是春秋战国墓葬中一种特殊形象

的动物雕塑。它最早出现在春秋晚期，战国中期楚国的墓葬中随葬最多。镇墓兽的作用是迷信的人们用来“驱邪镇恶”的，其形象像动物又像人，像人又像神怪，变幻莫测，极富想像力。

第四节 史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史官的建置很早。商周时期，巫史人员在王室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担负记言体史书和记事体史书的编写。春秋而后，各诸侯国都有了自己的编年体国史，并出现了纪事本末体史书、传记体史书和典制体史书的萌芽，还出现了历表、谱牒等等，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这一时期重要的史学著作主要有《春秋》、《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等。

错金双翼铜神兽

战国 中山

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高24.6厘米，长40.5厘米，重22公斤

神兽两肋生翼，毛外张如帚，张口露齿，双目圆睁，头顶有鬃一束，周身饰错银花纹。造型近似汉代辟邪。

一、《春秋》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国史统称为“春秋”，有“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鲁之春秋”的说法，统称则曰“百国春秋”。所谓《春秋》，都是编年体史书。商周时代一年分春、秋两季，春、秋连称，就表示一年，所以各国的史书都用“春秋”来命名。也有人说史书而称“春秋”，是因为这些史书都是以年为纲，举春以包夏，举秋以赅冬，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除了“春秋”以外，各国国史有的也有专名，如《孟子·离娄下》便说晋国的国史叫《乘》，楚国的国史叫《檮杌》。可惜，这些史书大都早已亡佚了。

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史书是鲁《春秋》。它是鲁国史官按年、月、日、时记载的鲁国历史。它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记载了鲁国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约一万八千字。

《春秋》记事的特点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它依照时间顺序把以鲁国为中心的史事串联排比在一起，线条清晰，时间概念十分清楚。《春秋》语言简练，讲究用词造句，注重用精炼的语言反映出作者对所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如：同是记载战争，它把大张旗鼓、有正当理由的公开战争记作“伐”，把没有正当理由、偃旗息鼓的战争记作“侵”，把乘人不备的轻装攻击记作“袭”。同样是死人，天子死了写作“崩”，诸侯死了写作“薨”，卿大夫死了写作“卒”。这种用不同的词语反映等级差别、暗寓褒贬的写作方法，后世称为“春秋笔法”，对后世史学有很大的影响。相传孔子曾经对《春秋》作过删削修改，这应当是可信的。孔子修《春秋》，着眼点可能在

“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上，主要是进行文字方面的修改。据《公羊传》记载，没有修订过的《春秋》有“雨星，不及地尺而复”的句子，而修改过的《春秋》，则把这句改为“星陨如雨”，语句精炼了许多。传说孔子修订《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孔子修订《春秋》，该添的添，该删的删，子夏等人插不上一句嘴，可见孔子确实对《春秋》的修订下了很大功夫。

《春秋》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它记录了当时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把春秋一代大势作了粗线条的记载，这是应该肯定的。有些史事，用近代科学检验，也非常准确。像鲁庄公九年“星陨如雨”的记载，就是前687年3月16日发生的天琴座流星雨事件。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流星雨记录。还有鲁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有关哈雷彗星的记录。这证明《春秋》的史料价值是可信的，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它不过是一堆“断烂朝报”。

《春秋》文字简约，分条记事，多的不过四十七个字，少的仅仅一个字，互相不连属，记事过于简略，无法给人以具体的历史知识，所以它流传不久，到战国时期，便出现不少给《春秋》作传的著作，如《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邹氏传》、《春秋夹氏传》等，后来流传下来的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简称《春秋》三传。

二、《左传》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所记上限与《春秋》同，下限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左传》相传为左丘明著，但学者对此有不少疑问。《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但有些地方与《春

秋》不尽相合,有时《经》自《经》、《传》自《传》,连带关系不大。《左传》的篇幅为《春秋》的十倍,全书分六十卷,十八万多字。该书取材广泛,博采众家,记事比《春秋》详赡得多,而且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像鲁隐公元年(前722)《春秋》只有一句“郑伯克段于鄢”,而《左传》却从郑武公娶申国的女子武姜开始,叙述了武姜生郑庄公和共叔段;武姜喜爱小儿子共叔段,千方百计偏袒他,酿成了共叔段割据自立并与武姜里应外合要攻杀郑庄公;郑庄公老谋深算,让共叔段不断自我暴露,最后杀掉共叔段,又恢复了母子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的事件,情节曲折复杂,引人入胜。《左传》以编年为体例,或集中记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或集中写一个人物的活动经历,既便于读者了解事实的经过,也防止人物活动被年代割裂,在表述上也增强了艺术性。该书文字简练、优美,善于用简洁的语言描绘复杂纷繁的事物,不少章节都是脍炙人口的艺术名篇。

《左传》记事以晋国尤其是魏的事件为多。它善于揭露社会矛盾,尤以描写战争著称。它的另外一个优点是能吸收其他史书的长处,把其他史书的史料甚至各国的旧文典册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材料更加丰富、充实,这是中国史书成熟的标志。

《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是汉代人写定的作品。这两部书主要是从训诂即文字的通读上解释《春秋》,它们在解释每一条经文的意义和来龙去脉时,也有不少地方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近年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是这类作品的又一种传抄本。

三、《国语》

《国语》是一部国别记言体史书,相传为左丘明著,但今人多认为是战国初期学者汇

编春秋时代各国之《语》而成。全书二十一卷:《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越语》各一卷。《国语》是按照“先王室而后列国,先诸夏而后蛮夷”的顺序编次的,其记事上起西周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下迄晋国智氏灭亡,共四百余年的史事,但以记春秋时史事为重点。《国语》和《左传》一样,虽然是记各国之史事,但也以晋国最多,几乎占了全书一半。该书记郑国史事最少,仅史伯与郑桓公论兴衰等几条。

《国语》以记言为主,它往往是通过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论、对话和互相辩驳来反映历史事件,与《左传》以记事为主不一样。如“句践灭吴”,是通过谈话的方式来表达句践用文种、范蠡之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打败吴国的。谈话的时候,既有说理,也有人物性格的描写,不少地方很有文采。不过,由于《国语》记事只是重点记述若干事件,并不是自始至终地系统记载各国历史,所以它并不能全面反映春秋时代的历史。尽管如此,它也仍然有其宝贵的价值。它填补了一些其他史书尤其是《左传》没有的史料,像管仲在齐国的改革措施、越王句践灭吴的来龙去脉等,所以以前人们经常把《国语》和《左传》看成是姊妹篇,认为它们互为表里,《左传》是春秋内传,《国语》是春秋外传。

《国语》创立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

四、《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晋代出土于战国魏墓中的一部写在竹简上的史书。因为是竹简本的编年体史书,旧时称为《竹书纪年》或《汲冢书》。

该书是盗墓贼首先发现的。279年,西晋

汲冢的盗墓贼盗掘了战国魏王墓，发现了大批竹简。竹简长二尺四寸，每一条简上有漆写的古文字24个。盗墓者当时用竹简照明，损坏了一部分。后官府得知，请荀勖、和峤、束皙等整理，才知道是一部史书，就称为《古文纪年》，又称《汲冢纪年》，后来称《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战国中期魏国史官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现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一部通史著作。它记叙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周幽王后接记晋国政事；战国三家分晋后，只记魏国政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并称襄王为“今王”。《竹书纪年》记事近似《春秋》，但有很多与其他史书不相合，如说“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等，这是其他史书所没有的，可以订正其他史书的错误，弥补他书记载的缺漏，因而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此书记事也有一定的缺点，即经常以战国时代的思想观点来改写古史，故使用时要注意分析。

今传《竹书纪年》有古本、今本之别。古本系《竹书纪年》失传后从各书辑佚本，今本指明代出现的两卷本。清人考证今本为伪作，但近人研究表明，今本与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原貌相去不远，并不是宋代以后的伪作。

五、《世本》

《世本》是一部谱牒性质的档案资料著作，属于通史的范畴。该书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战国末年，作者可能是战国末年赵国的史官。原书南宋时已佚，今传为辑佚本。其内容有帝系篇、诸侯卿大夫世系篇、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主要记述从黄帝到春秋期间一些帝王、诸侯和卿大夫的氏姓、世

系、都邑变迁、制作、谥法等，这是后世谱牒之学的前身。该书还记载了古代一些创造发明，如仓颉作书、容成作历、禹作宫室等。

《世本》是先秦史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帝王世系、氏族、居住的都邑、发明创造分门别类加以叙述，开创了分专题记述史事的新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迁作《史记》，不仅引用了其中的很多资料，从体例上也受《世本》的启发。

六、《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原名《国策》、《国事》、《短长》、《事语》、《修书》，战国末年初步辑成，一直到汉时刘向重新整理编次，才定为今名。共三十三卷，东周一卷，西周一卷，秦五卷，齐六卷，楚四卷，赵四卷，魏四卷，韩三卷，燕三卷，宋、卫一卷，中山一卷。主要记载了春秋以后245年间各国谋臣辩士的策谋活动，同时涉及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情况，是研究战国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战国策》内容丰富，如《邹忌讽齐王纳谏》，通过邹忌与徐公比美的故事，说明当权者容易受蒙蔽的道理，使齐王高兴地接受纳谏；《赵威后问齐使》，通过对话表现赵威后关心年成丰歉和人民的生活、重视人才，反映了她的民本思想。诸如此类，记载了很多生动的历史资料。

《战国策》史料价值比较高，但叙述没有年月的记载，史料或有失实之处。如苏秦提倡合纵，张仪以连横破之，就不是信史，出土文献表明张仪活动的年代早于苏秦，张仪死后苏秦才出生。另外，《战国策》多浮夸之辞，还有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地方，使用时要结合其他文献加以分析。

《战国纵横家书》，1973年长沙马王堆3

号汉墓出土，帛书抄本，书名为整理者所加。共二十七章，一万一千多字。该书大概是战国末年编辑的，帛书抄本可能写于汉高祖后期或惠帝时期。《战国纵横家书》是《战国策》别本，涉及史实时间限于战国中后期，但多是第一手材料，而且二十七篇中有十六篇为以前未发现过的佚书，主要记载了苏秦的游说活动，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有严肃的史学传统，“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的权臣崔杼杀了齐庄

公，怕留下弑君之名，求太史不要在齐国史籍上记载此事。齐太史不听，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结果被崔杼杀死。他的弟弟听说此事，仍写“崔杼弑其君”，又被崔杼杀死。另一个弟弟又接着如实记录，崔杼不得已，只好让他这样写。南史氏听说太史都被崔杼杀死，拿着竹简赶来，知道已经把“崔杼弑其君”写在史册上，这才罢休。中国古代史官这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以史学家的良心秉笔直书历史的传统，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

第七章

科技探索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早期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最早发明陶器，探索天文，发展农业、牧业、金属冶炼、丝织、印染、医药等的国家之一。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得以快速改进，与农业、手工业相关的天文、历法、青铜器铸造、铁器铸造、制盐、丝织业、染织业、车船制造及漆器、玉器、玻璃制造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科学技术的繁荣。百家争鸣的出现，也为人们用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自然现象、自然知识和工艺技术创造了宽松的气氛和有利的条件，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深化。可以这样说，在当时，东方的中国和

西方的古希腊在科学技术方面是交相辉映的。就科学理论而言，可能古希腊多一些；就生产技术而言，中国可能居于领先地位。

在中国古代，有些科学知识是以生产知识或生产经验的面目出现的，还有些科学知识往往与原始宗教或神话纠结在一起，像天文、历象、医药等，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人类对科学的认知往往要经过迷茫或迷信的阶段。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奠基时期，后世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许多知识和学说大都可以从这个时期找到它的原始思想或萌芽。特别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最具特色的天、算、农、医，这个时期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尤其是天文和医学，已经具备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前列。

第一节 天文观测和历法

天是古代先民最早的研究对象。天是怎样形成的？天上的日月星辰是怎样运行的？天为什么会有四时的变化？这些问题，从远古到近古，人们一直在探讨。

在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天是盘古用斧子劈开的，人是女娲用土捏成的。先民们认为，日月的运行，是天上的羲和、望舒驾驶着太阳车和月亮车在行驶。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各个不同的地方全由各式各样的神掌管着。人们解决不了的事，只有神才能解决，因此祭祀和享神成了最重要的事，成为他们征服自然的理想的寄托。

进入文明时代，天文、祭祀、卜筮之事有专门的文化人管理，这才有可能把以前分散的、零星的天文历法知识进行整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较系统的天文观测和计算。商周时的“史”、“祝”等人员就是专门从事此类工作的官员。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有不少天文历象的记载。那时的天文历算和卜筮占星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历法，为农业服务；星占，为王权天授找根据。古代，谁能把历法授给人民，谁就能得天下。所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都是官方的行为，而且科学和迷信纠结在一起，这是古代天文学的特点。

《大戴礼记·夏小正》是成书于春秋时代的物候学著作，里边记载有不少夏代的天文气象材料。《夏小正》从首至尾按十二月的顺序详细记载了当时星宿出没、候鸟往来、草木荣枯、虫禽鸣蛰的情况，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的祖先长期农业实践的时令气候总结。《书·尧典》有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它以黄昏时恒星在正南方天空出现的情况来判

定季节：黄昏时看到鸟星升到中天是仲春，这时昼夜长短相等；大火升到正南方是仲夏，这时白昼最长；虚宿出现于中天是仲秋，此时昼夜时间又相等；昴星出现于中天是仲冬，此时白昼时间最短。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就是后来说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这些天象最晚在商末周初中国人已经认识到。

夏代已用天干纪日，夏末的几个帝王孔甲、胤甲、履癸都是以天干记名。商代在天干记日的基础上发展为干支记日，即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相配合，组成甲子、乙丑、丙寅等六十干支记日。殷墟曾出土过一块刻着完整六十甲子的牛肩胛骨，很可能是当时的日历表。商代已经用大小月和连大月来调整朔望年，用置闰（年终置“十三月”）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这是阴阳合历的最大特点。

周代已经开始用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冬至和夏至等节气，还能定出朔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诗·小雅·十月之交》中的“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是中国日期记载明确的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

据今人研究，大概在周代中期至春秋早期，中国利用商代以来的天文观测经验，即已建立起比较准确的天象发生位置统一坐标系——二十八宿系统。二十八宿系统把天球黄道带附近的恒星分成二十八组：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昂、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每一组取一颗星作为本宿的量度，形成一个比较严密的参考体系。《诗经》中有不少二十八宿名字的记载，也有很多诗篇中记载了恒星出没反映的季节变化以及它与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的关系，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

有鸣仓庚”、“定之方中，作于楚宫”等，有的甚至拿天上的星宿和生产、生活用具作比较，说天上的“斗”（北斗）不能舀酒，天上的“箕”不能簸东西。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者矣。”夏商周的时候，人人都懂得天文。《诗经》中的“七月流火”，是种田农民说的话；“三星在户”，是妇女说的话；“月离于毕”，是服役士兵说的话；“龙尾伏辰”，是童谣。这些三代时普通的诗句，问后代的文人学士，有人却茫然不知。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春秋以后，由于农业生产和星占的发展，天文历法有了全面的进步。据《晋书·天文志》记载，春秋战国之时，当时著名的天文星占专家，“晋有卜偃，郑有裨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

石申夫（即石申），皆掌著天文，个论图验”，为天文历法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时最有名的天文专家是甘德、石申。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他们的著作虽然已经亡佚，但从《史记》、《汉书》、《开元占经》等书的引文中，尚能了解其大概。

甘德、石申一个很大的成就是发现了荧惑（火星）和太白（金星）有时会逆行，即自东往西反行。他们把行星逆行的弧线描绘成巳字形，这是五星研究的一个大发现。关于荧惑、太白逆行的路线，《开元占经》引甘德的说法是“去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巳”，引石申的说法是“东西为勾，南北为巳”，这两个结论很接近。他们测定了金星和木星会合周期的长度，并定出火星的运行周期是1.9年，木星为12年，这都是了不起的发现。据学者研究，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的

二十八宿标示图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绘于该墓出土的漆箱盖上。



木、土、金星位置和会合周期的动态,指出金星的会合周期为584.4日,土星为377日,与今天的测定值相差很小。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与战国时秦国的颛顼历关于行星运行的知识关系密切,说明战国末期的历象学较之甘德、石申的历象学又有了很大进步。

湖北随州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发现了完整的二十八宿标示图,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记有完整二十八宿名字的材料。该图中央是一个粗体的“斗”字,周围是二十八宿的名称,东方是四象中的苍龙,西方是白虎。值得注意的是,曾侯乙墓的年代早于甘德、石申的年代,这说明最迟至战国早期二十八宿的名称已和现在相同。据《开元占经》讲,甘德、石申等除了对二十八宿进行详解,对二十八宿以外的天区的星数及与相邻天区之间的相对位置也作了说明,这是很了不起的。尤其是石申著作中开列了“石氏星表”,记载了121颗恒星的赤道坐标值和黄道内外度,这可以说是天文学家几百年长期观测的结果。石申的“石氏星表”,是中国古代早期恒星观测的重大成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这表明当时中国的天象研究处在世界前列。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异常天象的观测,仅《春秋》一部书记载的日食就有37次。经研究证明,起码有33次是正确无误的。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春秋》庄公七年(前687)记载的“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是世界上最早的流星雨记录。文公十四年(前613)记载的“秋七月,有星孛如北斗”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这都为世界性的天文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历法也有了长足的进

步。春秋后期,中国已使用了回归年长度为365.25日、十九年七闰为闰周的历法——古四分历。这一回归年的数值比真正的回归年的长度只多11分钟,欧洲采用同样数值的儒略历要比中国晚五百年。能较好地调节回归年与朔望月长度的十九年七闰法,也比欧洲要早一百年左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分别采用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几种历法,这几种历法起算的年份和岁首虽然不同,但都是四分历,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历法普遍是比较先进的,它为以后的天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地理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地理学的初创时期。为了把积累起来的地理资料服务于政治、军事和生产,当时出现了《禹贡》、《管子·地员》和《五藏山经》等地理著作。

《禹贡》是假托大禹治水时的一部记录,其实是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的作品。全篇共1200字,分“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四个部分。“九州”部分依据自然条件中的河流、山脉和大海的自然分界,把当时的“中国”(包括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以及这两条河流之间的平原及山东半岛,往西到渭水和汉水上游,包括山西和陕西的中南部)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按照大禹治水途经路线,对各州的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特产、田赋和运输路线等作了描述,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各个地区的地理特色。“导山”、“导水”专门叙述山岳和河流(导,即治理),是中国最早的分部门研究区域地形的著作。“导山”部分把“山”与大禹治水的史迹相联系,按照从北向

南的顺序,采取列举山名的方式,把中国的山系分为由西向东延伸的四列,每列又细分为九段,正确记述了中国西部山脉集中,东部山脉分散、多平原的地形特点,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导水”部分按照先南后北、先上游后下游、先主流后支流的顺序,对中原四周九条河流的水源、流向、流经、支流和入河口等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开中国水文地理的先声,是《禹贡》的精华所在。“五服”部分,把当时的“中国”划分为“五服”:以帝都为中心向外扩展,中心的五百里为“甸服”,即王畿;向外五百里为“侯服”,属于诸侯领地;再向外五百里为“绥服”,属安抚地区;再向外五百里为“要服”,指与之结盟的外族地区;最外是“荒服”,指未开化地区。这些范围有的已经超出当时实际了解的地区,不过它指出当时“禹”(实际上是春秋战国之交)的国土“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也是事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禹贡》作者把当时“中国”的广大地区看作一个整体,反映了作者的大一统认识,这是诸侯统一中国思想的前奏。

《管子》传说是春秋前期齐国管仲的作品,但实际上绝大部分成书于战国。该书《地图》、《地数》、《地员》和《度地》诸章涉及不少自然地理学的内容,因此也是一部有关古代地理的重要著作。

《地员》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农业生产的情况,对地形作分类。它把丘陵地分为十五种,山地分为五种,并对各种丘陵地区和山区的种植情况作了简要的分析。该章后半部分专论土壤。它根据土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盐碱性和肥力等特性,结合地貌、高度、坡面、水文和植被等条件,把“九州之土”分为上土、中土、下土三级,每一级又分六类,每一类又分成赤、青、黄、白、

黑五种,有一定的地理学价值。如被该书列为“上土”的“息土”,作者指出,它之所以成为“群土之长”,是因为它有排水性良好、水力强的特点;而“埴土”之所以被列为“下土”,则是因为它重黏,遇水而散,干燥即裂,是一种贫瘠的劣土。《管子·度地》还论述了河水与河床相互作用使河道迁移的道理,其中对河道演变的复杂过程和变化规律的概括,十分令人敬佩。

《五藏山经》是《山海经》中成书最早、地理学价值最大的部分,其写作时间在战国。《五藏山经》把中国的山地分为南、西、北、东、中五个走向系统,每个系统又分成若干列,依次叙述它们的起首、走向、相距里数、结尾和相关的水文、地貌、动植物、矿物、特产以及神话传说,记载了许多非常宝贵的自然地理知识。《五藏山经》对今河南西部的记载最详,说明作者对这些地方最熟悉。该书在详细记述各地山地的同时,对与山地关系密切的河流也作了详细记载,说明其流向、归宿、主流、支流以及有关的湖泊、沼泽等,粗略勾画出北自黄河、海河流域,南至长江中下游的水系分布状况。

中国的地图起源很早。成书于战国的《周礼》中有很多有关地图的论述,如《地官司徒》就说大司徒的职务之一是执掌国家的“土地之图”和人口的数目册,帮助君王安定国家,按照国家土地地图的记载,全面掌握九州的土地情况和山林、河湖、丘陵、湿地的数目,制定都鄙田亩的疆界。此外,还有许多官员的职责是掌管山川、林泽、矿产、道路交通、墓域等的分布地图,甚至为土地打官司也要“地讼以图正之”。《管子·地图》也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这说明当时地图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

战国时期的地图,除使用一些特定的符

号来表示山川、河流、道路、城邑、林木之外，还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战国策·赵策》记载，苏秦为合纵游说赵王，指着地图对赵王说：“窃以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能从地图上看出地域的倍数，肯定这种地图是按一定比例缩绘的。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山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证实了这一点。兆域，即墓区，此图为中山王陵墓葬区域规划图。载图的版为长方形，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1厘米。背面中部并列两个衔环铺首，正面是金银错成的陵园平面规划图和中山王诏书。此外还有很多文字说明陵墓和所属陵园建筑各部分的名称、大小等。《兆域图》表明该墓区有两重宫垣，中部大土丘中间是王堂，两旁一百尺为王后堂，三堂均方二百尺，丘高坡长五十尺。两侧八十尺为二夫人堂，各方五十尺，丘坡四十尺。内宫垣后部开四门分别通向宫内。从大丘边

至内宫垣六步，内外宫垣相距六步，东西二垣相距三十步。诏书的主要内容是说按照规定建造王陵，违者死罪，殃及子孙。该图是现在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建筑设计图。从图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战国时期，中国的建筑设计已经有了明确的中轴线，并采用建筑物不同的标高、体积、对称布置等来突出主体建筑。图中标志明确，比例恰当，反映出中国古代高超的建筑设计水平。《兆域图》中各个堂之间的间隔，丘足与堂之间的距离，所标注的数字与图示的大小基本上呈现1:500的比例；与实际墓地相对照，还可知图扩位是“上南下北”。这些史料证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地图的使用不仅很普遍，而且地图的测绘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了绘在松木板上的七幅地图，内容是战国晚期秦的行政区域、地形和经济略图。图中用统

《兆域图》

战国 中山

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一的比例表示城邑、关隘，用大小不同的方框表示不同等级的地名，用粗细不等而弯曲的线标志河流，用并列的半圆形表示道路所经桥梁，用圆点、三角等表示关隘，亭形标志表示建筑，具有相当的准确性。专家研究，该图用“下”字来表示图的正读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与现在的地图方向相同。

第三节 数学、力学、光学

一、数学

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殷墟甲骨文中，已经有很多记数的文字。商周时期，数字的使用方法已经和现在没有多大的区别。那时已经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等十三个单字记录万以内的任何自然数，遵循的是十进制，和现在不同的只是记数时在百位数、十位数和单位之间常常加上“又”字，写成“六百又六十又九”。这种记数法记数简单明了，含有明显的位值制意义。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说“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的字体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

商代已经有了奇数、偶数的概念，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运算技能。神话传说中伏羲时已发明了“规矩”——圆规和三角板，并说大禹治水时曾带着规矩去测量地形。这看来有些夸张，不过“规矩”在商周时大概已普遍应用了。当时造车、筑城等都要经过严密的测量，没有相关的测量工具和计算知识，这些都没法完成。

西周春秋时期，“数”是士阶层受教育必

修的“六艺”之一。据《周礼》等书记载，此时政府部门已有专门从事会计的“司会”、“法算”等，此外还有世代相传专门掌握历法和数学知识的“畴人”。“数”的内容包括算筹记数和简单的四则运算。算筹记数是以“筹”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一种独特的计算方法。它产生于西周而成熟于春秋。筹，是一些小的竹木棍，用筹来表示单位数目，分为纵式和横式两种。它的运算程序和珠算相近，加减运算也是从左边一位开始，其乘法则是把乘数、被乘数、积上中下排成三行，用乘法口诀（春秋战国时代，乘法口诀已经普遍流行，《管子》、《荀子》中已经提到了“九九表”）一一运算，最后把中位相加得出积。除法则是乘法的逆运算。

春秋战国时分数运算已经普遍运用。《管子》谈到土地种植的分配时常用“十分之五”、“十分之七”等分数来表示，《墨子》讲到食盐的分配，则用“二升少半”、“一升大半”等分数表示。“半”即二分之一，“大半”是三分之二，“少半”是三分之一。《商鞅量》铭文标示本身的容积是“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一为升”，可知当时一升的容积是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考工记》中各种器具制造的记录中也大量使用分数和分数运算。

春秋战国时期的数学运算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在天文运算中古四分历的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都不是整数，运算十分复杂，没有较高的水平是难以完成的。成书于战国的《周礼》曾讲到贵族教育中有“九数”的内容。“九数”，三国时刘徽注《九章算术》说：“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据学者研究，成书于秦汉时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中的“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等内容，绝大部分都形成于秦以前。由于生产

和战争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防、水利、田亩工程,税收、会计以及各种农具、车辆、兵器、乐器的制造都需要精确的测绘和计算。“方田”是田亩面积的计算方法,内容涉及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圆形、环形、弓形、截球体表面积的计算;“粟米”讲的是比例问题;“衰分”讲的是按等级分配物资或摊派税收的问题;“少广”讲的是开平方和开立方的问题;“商功”讲的是各种工程计算的问题。这么多复杂的研究内容,包括了现代初等数学中算术、代数、几何的相当一部分,说明中国先秦时期十进位值制的记数法和以筹为工具的各种运算已接近形成完整的体系。这种记数法和运算法,与当时世界上文明较发达的国家如古巴比伦、古埃及的记数法相比,要优越得多。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世界科技是一个大贡献。

关于这一点,战国时期成书的《墨子》和《考工记》也可以作为辅证。《墨子》中关于几何学的论述较多,涉及点、线、面、方、圆等诸种几何概念。《墨子》对几何概念的解释一般都很准确,例如它对“平”(即平行)的解释“平,同高也”,对“中”(半径)的解

释“同长也”,与西方《几何原理》(比《墨子》晚一个多世纪)中的有关定义如出一辙,因此有些数学史家怀疑古希腊数学家在创立几何学时曾受到中国古代数学的影响。《考工记》中有多种几何角度的称呼,如距(60°)、宣(45°)、柯($101^\circ 15'$)、磬折(135°)等,这种详细复杂的几何学知识,在当时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可以看作是世界应用数学的前驱。

二、力学

中国古代的力学知识和成就常常与生产工具的制造、使用联系在一起。

五六千年以前,古人对物体重心的变化和作用已有了相当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力学已经进入形成时期,一方面,实用力学有了一定的积累;另一方面,理论力学也开始萌芽。

成书于春秋末年的《考工记》,记载比较多的是古代工匠对力学原理的认识。该书关于惯性知识的记载,“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焉”,意为拉车的马已经筋疲力尽,但车还能走一段路,是中国文献中有关惯性最早的记

王字铜衡

战国 楚

传安徽寿县出土

一件长23.1厘米,宽1厘米,厚0.35厘米;一件长23.15厘米,宽1.3厘米,厚0.35厘米。杆中部上方有拱形凸起,中有孔,系拴绳的鼻钮。铜衡杆的长度相当于战国时的一尺。两件横杆正面均刻线,一件刻十等分,每等分一寸;一件中间二寸有寸刻线,其余每半寸刻一线。两件衡杆都以刻线来计算秤锤到提点的长度(力臂)和被称物品到提点的长度(重臂),然后计算物品的重量,这是比较准确的衡器。衡杆背部有“王”字,很可能是楚的宫廷遗物。



载。该书已意识到滚动速度和接触的面积大小有关,指出箭杆不均匀或箭羽设置不当会影响箭飞行的轨道、速度和稳定,提醒人们建造堤防、仓库要注意侧压力,并根据经验列出堤防、仓库截面的形状及上下底的比例,这都是当时工匠创造经验的总结。

墨家的代表作《墨子》在力学研究上有不少建树。《墨子》在中国科技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力的定义:“力,形之所以奋也。”说力是物体由静到动、由动到加快速度的原因,是人体所具有的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这是相当准确的。它把自下而上将重物举起的过程作为“奋”的例子加以说明,“下举重、奋也”,这个说明也很实在贴切。它还第一次为机械运动作了准确的定义:“动,或(域)徙也。”运动即物体位置的改变。《墨子》还说物体在某一位置上停留一段时间就处于静止状态,这种论断很准确。

杠杆的使用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很普及,像人们日常使用的衡器(称、天平)等都是利用杠杆原理制造的。《墨子》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了杠杆平衡的有关问题,指出杠杆的平衡不但取决于两端的“重”(物体的重量)和“权”(秤锤),还与“本”(重臂)、“标”(力臂)的长短有关。“重”大于“权”而杠杆平衡时,“本”短“标”长;不平衡时,“长、重者下,轻、短者上”,这是有关力和力矩概念的定性总结。墨家还用锥刺物说明不同臂秤能以较轻的秤锤举起较重的重物,就像用锥子能够很容易地刺进物体一样,清楚地懂得了杠杆以小力发大力的省力效应,可见《墨子》比古希腊阿基米德早二百年就已经发现了杠杆原理。

《墨子》中还有不少关于斜面、滑轮的运动情况以及如何利用它们节省人力的记载,也观察到浮力原理等问题。如《墨子》说,同

样的载重量,荷重物的形体小,在水中下沉的就多;形体大,下沉得就浅,形体大小与下沉深浅,其间存在着一定的均衡关系,这是有关浮力原理朴素的描述。

对于机械运动,《墨子》也注意到,只有当观察者与运动物体的位置移动情况不同时,人才能觉察出物体的运动,这就指出了运动的相对性。

《墨子》还研究了空间、时间以及空间、时间的关系。它认为,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空间包含各个方向的一切地点,而时间是不同时刻的通称。也就是说,宇宙包括所有的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物体的运动,必定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而且随时都有特定的处所。《墨子》以为,如果空间上由南向北,相应地时间上则由早晨到晚上,空间的变化和时间的流逝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先秦时期中国哲人对时空之间辩证统一关系最精彩的论述。

三、光学

人类的光学知识是从对天然光学现象的认识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对光的直线传播及光的反射、折射等都有了全面的认识和论述,还巧妙地做过针孔成像之类的光学实验。《墨子》中对光学现象的系统论述,比古希腊学者欧几里得的《光学》要早一个世纪。

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知道借助“鉴”(盛水的盆)来照面,所以后来一直把用于照面的镜子称为“鉴”。真正的“鉴”是青铜器发明以后用青铜制造的,开始是平面镜,后来发展为凸面镜,因为古人发现直径较小的镜子必须做成凸面才能全纳人面,这其实是一个科学发现。

古代把取火的工具叫做燧。周代已经发

明了用凹面镜聚阳光之热来取火，所以他们把凹面镜称阳燧。墨家著作中，把球面镜的焦点即阳燧取火的光线聚集处称为“中燧”，标志着当时的人们对于光学的认识进了一步。

墨家曾通过实验，对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成像的不同情况进行综合研究，这也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关于光学最早的研究记载。

关于平面镜成像，《墨子》指出，人站在平面镜上照像，像是倒立的，“临鉴而立，景倒”；人接近或离开镜面，所成的像也随之接近或离开。凸面镜的情况不同，凸面镜成的像总是在镜面的另一侧，而且像总比原物小。凹面镜成像则又是另一种情况：物体在

球心外时，像比物体小而倒立；物体在球心内时，像比物体大而正立。这些经验性的描述，虽然某些方面可能还有不足（如凹面镜成像现在证明有五种不同情况），但它对后来的光学研究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这些实验的记述之中，墨家已经明确地区分了“球心”和“焦点（中燧）”，而且还知道了物体和它的像在球心处重合，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墨家还对小孔成像、影子的生成等光学现象进行了实验和科学说明：在一间黑暗的屋子朝阳的墙上开一个小孔，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在阳光照射之下，屋里的墙上就出现一个倒立的人影。《墨子》说：“光之煦人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光的



六山纹铜镜

战国 楚

23.2 厘米，边厚 0.6 厘米

镜背以镜纽为中心，四角均匀地分布着六个“山”字纹，间以细密繁复的云纹和叶纹作地纹，十分一致。山字纹镜是战国时期流行的镜类。

十六联弧三兽纹铜镜

战国 楚

直径14厘米，边厚0.2厘米
镜为圆钮，钮四周为花瓣形
花纹，边缘内部以等长的弧
线连接成十六个内向联弧，
联弧内有蜷曲飞腾的三个长
尾神兽，造型生动，栩栩如
生。



传播是像箭一样直射进行，人的头部遮住上面的光，成影在下；人的脚部遮住下面的光，成影在上，于是就成了倒立的人影。倒像的大小与人离小孔的距离有关。这是墨家所做的著名的光学实验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

《墨子》对运动着的物体的影子动与不动的关系，也作了辩证的说明。它说，“景（影）不徙，说在改为”，“光至，景亡；若在，尽古息”。意思是说，物体的影子并不随物体一起运动，只不过是物体或光源的运动，使原来的影子不断消失，而新的影子不断生成而已。如果不消失，是由于物体或光源没有移动。《墨子》还对本影和半影的现象进行了解释：“景二，说在重。”“二光，夹；

一光，一。光者，景也。”一个物体有两个影子，是因为它受到两个光源照射的缘故。两个光源照射一个物体，就有两个半影夹持着一个本影。一个光源照射物体，只有一个影子。光被挡住，就生成了影子。这些解释，深刻朴实，很有说服力。

第四节 采矿和冶炼技术

中国古代冶金技术比较发达，夏代就有了青铜冶铸，并从此产生了举世闻名的青铜文明。春秋时代，青铜铸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钢铁冶炼技术也逐渐成熟，促使中国迈

入铁器时代而掀开生产力发展的新篇章。

一、采矿技术

金属冶炼的发展与采矿技术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从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矿冶遗址来看,当时中国的采矿技术和金属冶炼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其采掘工艺和冶炼工艺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在中国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矿冶遗址主要有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九曲湾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等。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它位于湖北大冶西约3公里处,面积约2平方公里。这里的主要遗存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属春秋时期或稍早,后期年代为战国至汉代。现已清理出不同时期、不同结构、不同支护方法的竖井、斜井、盲井数百个,平巷百余条。发掘古冶炼场三处,并出土了一批古代炼铜炉。随同出土的还有大量用于采矿

和冶炼生产的铜、铁、木、竹、石、骨质的生产工具,以及一批陶制生活器皿。麻阳九曲湾古矿冶遗址位于湘西沅江流域,遗址的年代属于战国时期。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是春秋中期以后形成的。

大冶铜绿山和麻阳九曲湾古矿遗址发掘资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寻找铜矿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露出地表的铜矿石和地表生长的铜草花为线索找矿。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找矿方法。发掘情况表明,大冶铜绿山和麻阳九曲湾都是利用露出地表的铜矿石和铜草花为线索找矿的。铜绿山古矿井井口附近有很多自然铜和孔雀石,麻阳古矿井也是在矿脉地表露头处开口。二是试掘探矿,先打探井然后掘进开采。铜绿山遗址中有一些断面很小的竖井,还有一些离群孤立的小井,这些都是探矿用的试掘井。通过打探井试掘,然后再掘进开采,这是铜绿山古矿井主要的探矿方法。三是采用重力选矿法寻找

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铜绿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铜矿,1973年发现。它位于湖北大冶县西约3公里处,面积约2平方公里。





铜绿山古矿井竖井

楚人采矿，以竖井进行挖掘。当竖井挖到含铜量高的矿石时，就旁开平巷。一般竖井的底部，安装用四根木料穿梭上下两副框架的“马头门”，门高与平巷相同。采矿之后就地冶炼。图中是铜绿山11号矿体，乃春秋时代的铜矿遗址。

富矿。铜绿山和麻阳古矿井中都出土了类似今天“淘金斗”的船形木斗或木杯，这是一种用来淘洗矿石的工具。木斗内装上矿石粉末，在水中淘洗，利用岩石与矿物比重的不同，来鉴定矿石的品位高低。这两处古矿井内都发现“淘金斗”，说明矿工在井下是凭“淘金斗”来追踪富矿并指导井巷的掘进方向的。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发明。

铜绿山遗址春秋时的矿井分竖井和斜井两种，井深达40米；战国时的矿井则由竖井、斜井、平巷等联合构成，互相贯通，组成体系，井深达50米，最深可达60余米，明显较春秋矿井进步。采用斜井挖掘富矿，可以节省工程、提高效率。当时斜井的倾角由25度至70度不等。为了使井巷不致坍塌，当时已采用了木结构的支护技术。竖井中的框架采用断面成正方形或矩形的框架，上下平行

排列；平巷的框架则是沿采掘方向作横向排列。发掘工作中揭露的成组井巷，使人们看到了古代矿工采矿时开拓的采掘网。斜井的支护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井框支架垂直于井巷的顶底板，另一种是井框支架沿地心方向铺设。为了防止框架发生滑动、错动，框架上采用了公母榫套接。这说明当时铜绿山的采掘工艺已经相当发达。

铜绿山古矿井还较好地解决了井下排水、通风、照明和矿石的提运等问题。

排水，一般是用木制水槽将矿下水引入储水坑（井）内，再用木桶将水经由竖井提升到地面。

通风，主要是利用井口高低不同产生的气压差所形成的自然风，结合关闭已废的巷道，促使空气流向采掘面。

照明，主要用竹签做成的火炬。



铜绿山古矿井选矿用的船形木斗

长62厘米

楚人探矿是采用浅井探矿和淘沙盘两种方法，后者是使用淘沙盘用水淘沙，使含铜的重沙沉入盘底，从而追踪富矿。此船形木斗就是探矿用的淘沙盘。

提运，主要靠人力分段解决。先将矿石或水从采掘面或储水坑提运至平巷，再由平巷经竖井提至地面。铜绿山和麻阳的古矿井中都出土了盛矿石用的竹篓、竹筐或藤筐等，还出土了捆绑着绳索的木钩，这些都是矿井提升工具。铜绿山战国晚期遗址中，还发现了木辘轳，长2.5米，直径2.6米，两端各有一排木把手，可双手交替操作。辘轳外层有一层突起的辐条，作用是加大辘轳直径，提高功效。由于矿井纵横交错，一般来说一次提升是不可能的，大部分都是分段提升，一步步地将矿石运到井外。

铜绿山春秋时期的矿井中出土了很多铜斧、铜铤、木铲、木槌、船形木斗（用以测定矿石品位）、木瓢、竹篓、绳索等器具。战国时期的矿井中，则发现了大量的铁耙、铁锤、铁斧、铁砧、铁锄等，还有很多木铲、木槌、木钩、竹篓等，另外还有陶器碎片、竹篮等。这都是当时的采掘、运输工具。

两千多年以前，铜绿山古矿井的矿工们在没有任何机械动力的情况下，仅凭铜斧、铁锄等工具开掘到地下50多米，并完成竖

井、斜井、平巷纵横交错的井巷网，解决了井下通风、排水、提运、照明等问题，不能不说是人类生产史上的一个奇迹。它对商周青铜文明发展的影响不能低估，它先进的采掘工艺，填补了中国采矿史上的空白，在中国矿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性质。

二、青铜冶炼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青铜冶炼技术的第一手资料。

在铜绿山东北坡的冶炼遗址上，已清理出多座春秋时期的炼铜竖炉。炼炉呈圆台形，鼓腹，系用红色粘土、石英砂、铁矿粉、高岭土等耐火材料夯筑而成。炉基设在当年的地表之下，底部设有通风沟（防潮沟），起保持炉温的作用。炉缸截面为椭圆形，容积约0.32立方米。炉缸上沿的长轴两端各设一个鼓风口，可对称鼓风，以保持冶炼时炉内受风均匀。炉缸前壁筑有一拱形金门，用于排放铜液和炼渣。炉身复原约高1.5米，壁厚为0.4米。炼炉附近，还有石砧、木炭、矿石和炉渣等遗存。

铜绿山冶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等氧化型的铜矿石、木炭以及铁矿石，后者作为熔剂使用。

铜绿山的周围盛产栎树，该处古矿中出土的井架，许多就是用栎树为原料制成的。用栎树烧制的木炭，质地紧密，热能高，为冶铜提供了十分便利而又丰富的能源。在冶铜过程中，木炭的作用主要有两点：作为燃料和还原剂。作熔剂用的铁矿石是该地出产的，且资源丰富。

据一些学者研究，铜绿山炼铜炉从炉缸底至炉顶的高度一般约为1.5米左右，并具有一定的炉腹角和炉身角（指炉身的炉壁与水平面形成的夹角），如4号炼炉的炉身角为 84° 至 86° ，6号炼炉的炉身角为 83° 至 85° 。炉身的内倾是技术上的重要创造，是炼炉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它能使炉气分布均匀，改善矿石的还原和换热过程，节约燃料，并能延长炉壁的使用寿命。

经过推算及参考模拟实验的结果，这些炼炉的平均容积约0.3立方米，一炉可以产铜约40公斤至45公斤，一昼夜可产铜约350公斤。在3号炼炉的遗址中出土的粗铜块，很可能就是该炼炉冶炼出的产品，经过化学分析，其结果是：铜，93.32%；铁，3.35%；铅，0.038%；锌，0.014%；锡，0.023%。

按照现代炼铜技术的要求，粗铜中铜的含量一般为92%至95%，两千多年前铜绿山的冶铜工匠们所炼出的粗铜中铜的含量已达93.32%，完全符合现代冶铜所规定的标准，足见其产品的质量很高，其筑炉水平也很高。

炼铜质量和产量的高低与配矿技术关系极大。

配矿技术就是掌握各种原料的配比。如果原料的配比不合适，就不能达到合理的渣

型：炉渣熔点过高，导致炉温升高，矿石中的铁容易被还原出来，熔在铜液中，降低粗铜的质量。同时也需要好的耐火材料和更多的燃料。炉渣熔点过低，熔化速度加快，矿石中的铜来不及被还原，就有一部分被带入炉渣中，降低了铜的产量，所以铜矿石的熔炼过程实质上就是熔炉渣的操作过程。从3号炼炉遗址中出土的粗铜块分析，铁的含量仅为3.35%，这说明当时3号炼炉的冶炼温度是合适的，它炼出来的是优质粗铜。从同遗址中出土的一块炼渣来分析，该炼渣分成三层，表面有水波纹样，说明炉渣的流动性好。其化学分析结果表明：炉渣中的含铜量（平均量）仅0.48%，铜的回收率较高。这也说明，该炼炉铜的冶炼温度是合适的。几方面综合起来表明，当时的工匠们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配矿技术，不然不会炼出质量合格的优质粗铜。

铜绿山当时开采的矿石是氧化型矿石，考古发现的炼铜炉是带有鼓风装置的竖炉，根据这两点，可以判断铜绿山当时的冶炼工艺是铜氧化矿的还原熔炼。铜氧化矿的还原熔炼中，炉渣粘度大小与炉渣的成分及炉温有关。在一定范围的炉温下，影响炉渣粘度最大的成分是二氧化硅，它的含量越高，炉渣粘度就越大。而氧化亚铁则是降低炉渣粘度的有效成分。上边提及，铜绿山冶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等氧化型的铜矿石、木炭以及铁矿石。古代的工匠们在炼铜过程中加入铁矿石，其作用在于使铁矿石氧化时生成的氧化亚铁立即与二氧化硅结合，这样就降低了炉渣内二氧化硅的含量，使炉渣的粘度降低，加强了渣液的流动性，使之便于排放，使冶炼工作能更顺利地连续进行。冷凝后成薄片、表面有水波纹的炉渣，就是正确配矿的熔炼炉渣。

铜绿山古矿山采用铁矿石作为炼铜熔剂,是由其特殊的矿体性质决定的。铜绿山是一处铜铁共生的矿体,铁矿石是其矿产之一。古代的工匠们经过长期实践,发现铜矿石中混入一些铁矿石,炼铜时炉渣较稀,流动性好,排渣容易,因此,便有意识地把当地出产的铁矿石加工成具有一定粒度的炉料投入炼铜竖炉作熔剂用。

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个推测。铜绿山第10号古代炼铜炉边的工作台上,发现有石球、石砧等碎矿用的工具,在它们旁边,各有一个浅坑,坑内堆有经过加工、粒度比较均匀的铜铁矿石和粒度较大的褐铁矿石,这显然是炼铜竖炉的炉料。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配矿技术的实际应用。

炼铜配矿技术是两千多年前古代劳动人民冶金化学上的重要成就,它的应用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采用炼铜竖炉连续地进行炼铜生产。有专家测定,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重量为2500多公斤的青铜编钟,微量元素的含量与铜绿山古矿井内铜矿石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十分相近,这表明这套大型编钟有可能就是用铜绿山生产的铜为原料铸造的。希望以后能有更可靠的数据证明这一点。

三、青铜铸造

铸造工艺体现青铜器的成型水平和艺术水平,是青铜器制作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春秋时期,青铜器铸造主要是陶范铸造。陶范铸造大体分为如下几个工艺过程:制模、塑出花纹——翻制泥范——刮制泥芯,阴干,高温焙烧——组装范、芯——浇注铜液——出范、出芯——整修加工成成品。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当时陶范的制作有严格的要求:选用黄粘土和细砂,并含有一定数

量的植物质。陶土可能还经淘洗,按一定的配比制作模、范和范芯。范制成以后,不仅要阴干,还要入窑烘烤,以排除范中的水分并使之定型。烤干后的陶范往往趁热浇铸,以免浇铸时爆裂。

山西侯马春秋晋国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尤其是大量铸造青铜器的陶范的出土,揭示了东周时代青铜器铸造中塑模、翻范、烘烤、合范、浇铸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侯马铸铜遗址,位于山西侯马市西,侯马晋城遗址牛村古城之南。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已发掘5000平方米。从出土遗物来看,这个铸铜遗址是春秋中期以来长期形成的。

遗址内发现有居住址、窖穴、水井、道路、陶窑、熔铜炉、墓葬等,遗迹分布相当密集。

遗址中出土不少与铸铜手工业有关的遗物,如雕刻花纹用的骨质雕刀、青铜小刀,熔铜用的坩埚碎块,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及铜锭、铅锭等。陶范出土最多,总数达3万余块,其中有三分之一刻有各种装饰纹样,如夔龙、夔凤、蟠螭、蟠虺、云纹、雷纹、饕餮、环带、垂叶、贝纹、涡纹等,尤以前几种花纹的数量居多;有1000余块陶范尚可辨认器形,能够配对成套,复原器形的约有百余套,可辨器形有鼎、豆、壶、簋、匜、鉴、舟、敦、匕、匙、铲、斧、铤、刀、剑、镞、镞、钟、镜、带钩、空首布、车马饰等各种各类器具。

侯马铸铜遗址表明,当时铸造形制简单的铜器,一般用单范或合范;比较复杂的器形则用复合范铸造。这时除了使用浑铸法(整体浇铸)外,附件与器身分别铸造的分铸法应用更加普遍。

春秋时期,青铜铸造工艺技术水平在前





陶范

1961年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
均为复合范。立人陶范（左）上宽77厘米，下宽44厘米，高107厘米。铸件系一站立男子，赤足，长衣及膝，系腰带，腰带上打蝴蝶结，腰侧斜插一物，可能是一件器物的附件。兽头形陶范（右）是一兽头形半模母范，高11厘米，纹饰华丽美观。陶模（上）是用来印制铜钟上的花纹的。从这些陶范，我们可以看到晋国青铜铸造业的发达。

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焊接技术的运用。春秋时许多铜器因形制较复杂，都采用分铸法。为了将器身和附件联结成一体，除用铸接（把预先铸好的附件嵌入器身范上，然后一次浑铸）的办法外，还普遍使用焊接法，用锡、铜、铅锡合金将附件直接焊接到器身之上。例如新郑铜器群中，焊接法不仅用于簋类的器耳，也用于鼎足。浙川下寺楚墓出土铜鼎的足和一些附件，就是用金属锡焊接而成。

2. 失蜡溶模工艺的出现。这种工艺是将易溶化的黄蜡制成蜡模，用细泥浆多次浇淋，并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做成铸型。烘烤后黄蜡溶化流出，形成型腔，用以浇铸铜汁。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和铜鼎表面的兽头及足、耳等附件都是用失蜡法铸成的。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失蜡溶模工艺标本，年代属春秋晚期。

3. 模印法制范。所谓模印法制范，就是在铸范上用模子印出连续的花纹，每一印形成一个图案单位。春秋中晚期盛行的蟠螭纹或蟠虺纹，都是模印法印铸的。

4. 镶嵌和线刻工艺的兴起。镶嵌指在青铜器表面镶嵌金属，使其因不同质泽而显现出花纹。这种工艺较早见于河南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出土的扁圆形壶。春秋晚期的蔡侯墓等铜器群中，应用更为广泛，其特点是用纯铜镶嵌花纹，图案为龙纹界以菱形纹。错金银的技术这时也已出现，像晋国的铜器栾书缶，有错金铭文四十字，工艺水平已经很高。线刻工艺，是用极锐利的锋刃在铸好的铜器上刻画成细如发丝的画像图案，内容多为宫殿建筑、宴乐歌舞，也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或鸟兽。线刻工艺的铜器多为缶、盘、鉴等。

5. 吴越铸剑工艺。《周礼·考工记》说：“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地气然也。”《庄子·刻意篇》也提到“干（吴）越之剑”。可见，吴越铸剑当时已经名闻遐迩。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上述的记载，湖北、山西等地发现了不少吴越铸造的铜剑。对吴越铜剑的研究发现，当时铸剑时在剑的不同部位使用了不同成分的铜合金。如中脊用低锡或含铅较多的合金，以提高其韧性，使之不易折断；两镞则用含锡量19%左右的铜合金，以保证其坚硬锋利。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剑身有火焰形的花纹；湖北江陵望山发现的越王句践剑，剑身有菱形的花纹。这些花纹是暗花纹，清晰美观但并不突出，究竟用什么方法制成，学术界还在讨论。有人认为是硫化物腐蚀而成，有人则认为是使用不同的铜合金嵌出的。这两把剑铸造得十分精美，历时二千余年，出土时仍然光亮不锈，使人惊叹。

战国以后，错金、错银、鎏金、刻纹（即在青铜器表面嵌入金、银丝或涂抹金泥，或者用小刀或针刻出花纹）工艺相当成熟，使这一时期青铜器制作又增添了新的品种。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制作技术的提高，也反映了当时人们艺术欣赏水平的变化。

四、炼铁

春秋青铜冶铸技术开始向精巧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铁冶铸技术也有了大的发展。这时的主要成就是生铁的发明和铸铁柔化术的出现。近年来中国相继发现了一些春秋末期吴、楚等诸侯国的铁器遗物，其中江苏六合程桥出土的铁条和铁块，经金相检验，铁条系用块炼铁锻成，铁块是白口铸铁，这是中国考古发掘中生铁冶铸器物的最早发现，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专家指出，中国在学会

块炼铁的同时历史时期就成功地炼出了生铁，而同一过程，在西方则用了两千五百多年。对比之下，我们不能不赞叹中国古代工匠的冶铸技术之高。

早期生铁是含磷很高的白口铁，要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必须进行柔化处理。铸铁柔化技术是一项热处理脱碳技术。铸铁经过高温下长时间的加热处理，成为性能介于钢和铸铁之间的可锻铸铁，增强强度和韧性，克服铸铁容易断裂的缺点，才能扩大使用范围。河南洛阳水泥厂战国早期灰坑出土的铁铤和铁镢，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黑心韧性铸铁铸件；湖北大冶铜绿山战国古矿井出土的六角锄，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镢，河北兴隆燕国遗址出土的铸铁农具，则是白心韧性铸铁铸件。白心韧性铸铁欧洲到1722年才使用，黑心韧性铸铁19世纪在美国研制成功，而中国在战国时期即已广泛使用，中外相比差了近两千年，中国古代文明的发达，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春秋时期已出现了炼钢技术。钢是一种铁碳合金，含碳量介于熟铁和生铁之间。早期的钢是以块炼铁为原料在炭火中加热渗碳而成的，以后又发明了淬火工艺，使之更坚韧。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钢剑，是采用淬火工艺做成的；1976年湖南长沙发现的春秋末期的钢剑，属中碳钢锻成。这些都是难得的文物。

金属冶炼的发展与采矿技术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我们发现的古矿井遗址以1974年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古铜矿遗址为最大。该遗址春秋时的矿井分竖井和斜井两种，井深达40米；战国时的矿井则由竖井、斜巷、平巷等组成体系，井深达50米，明显较春秋矿井进步。该古矿井较好地解决了井下通风、排水、提运、照明

及竖井、巷道支护等问题，显示出一个大型矿区的风貌，也显示了当时先进的采矿技术。

冶铁遗址发现较多。战国中、后期，冶铁业遍及十分广大的地区，全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冶铁中心，如宛（今河南南阳）、邓（今河南孟县）、邯郸等，生产规模宏大。近些年来，中国在很多地方发现了大型冶铁遗址，如山东临淄齐国故都冶铁遗址，面积达40余万平方米；河北易县燕下都城址内有冶铁遗址三处，总面积亦达30余万平方米。中国还在许多地区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铁制工具，其中以铁制农具的数量最多，这说明铁器发展以后，其主要的用途就是制作农具，这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第五节 医学和养生

中国是医药知识起源很早的国家，在遥远的史前时期人们就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医药知识。火的使用对人类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长期的生活经验积累中，人们逐渐学会用动物毛皮或植物茎叶包裹身体的某一部位来消除寒湿，用点燃的干草对身体某一部位进行固定的温热刺激来解除苦痛，这就是“熨”和“灸”的开始。他们发现用尖状的东西如尖石块、荆棘刺等刺激身体的某一部位也能起到医疗作用，便把它们作为医疗工具来使用，这便是“针”、“砭”的发明。《说文解字》：“砭，以石刺病也。”以此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针灸疗法起源之早。

中国古代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说神农“一日而遇七十毒”，发明了中草药，这是中国古代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而发明中草药过程的缩影。

商周时代，医和巫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古文字中，医字从巫，即反映了这样一个巫医不分的社会现实。这个情况说明，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们没有办法医治自己的病痛，只好求助于神。古代的巫既是沟通人神的神职人员，也都具备相当丰富的医药知识。他们子承父业，巫史世家一般也同时是医学世家，因此，他们对中国古代医药的发展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成书于战国的《周礼》中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时代的医疗保健情况。西周初期，巫医不分的传统与商没有什么区别，《尚书·金》记载周武王病重时周公曾屡屡向祖先祈祷，希望他能以身代武王死，即反映了这种以巫医病的情况。西周中期以后，随着神权的动摇和礼乐文化的发展，人们认识到疾病的起因并不一定是鬼神所致，因此渐渐出现了巫、医分家的趋势。《周礼》在“设官分职”的管辖系统中巫、医分属不同的部门，即反映了这个趋势。《周礼》之中，“巫祝”属于“春官大宗伯”，“医师”则属于“天官冢宰”，区别很大，说明巫和医的职能已经分开了。《周礼》记载的“医”已经有了“食医”（营养医学）、“疾医”（内科医学）、“疡医”（外科医学）、“兽医”之分，还主张建立一套医政组织和考核制度，这都表现出当时医疗知识和医疗手段的进步。

春秋无神论思潮的兴起，促进了医药知识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提高。当时已经有不少思想家对疾病的成因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说疾病是由于气候变化、生活环境和“饮食哀乐”引起的，跟鬼神并没有什么关系。如秦国的名医医和指出，自然界存在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如果失去平衡，就会导致寒、热、末、腹、惑、心等六类疾病：“天有六气，……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

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传·昭公五年》）《管子》、《吕氏春秋》也说，“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百病怒起”。这些理论带有“天人相应”的特点，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比较原始，但其把致病之因归结为自然界的因素，归结为人体内部失去平衡所致，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尤其是这种医学理论提倡在诊断和治疗上与神巫分道扬镳，采取新的方法，这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随着医疗知识的增长和巫医的衰落，专门以治疗疾病为职业的医生发展起来。文献记载的医和、医缓、医立旬、医蚘、扁鹊等都是春秋战国时的名医。

春秋战国时期，诊断学，分科医学都有很大的发展。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策》、《韩非子》、《列子》、《韩诗外传》等文献记载，当时名医秦越人（即扁鹊，今河北任丘鄆州镇人）看病，已经能综合运用“切脉、望色、闻声、写形（问诊）”四种方法来诊察病情。而尤以望诊和切脉著称。传说他几次见到齐桓侯，都根据齐桓侯的气血变化判断他腠理、血脉、脏腑甚至骨髓有病，忠告他及时治疗。齐桓侯不以为然，结果延误了治疗，不治而死。赵简子病重，“五日不知人”，众人都以为已经没有办法救治，扁鹊经过切脉，认为脉象正常，可以治愈，后赵简子果然痊愈。司马迁慨叹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在治疗上，春秋战国的医疗手段已经运用汤剂和砭石、针灸、按摩、熨贴、手术、导引、吹耳等方法，处理具体病案时，往往多种方法兼用，取得显著的效果。传说扁鹊治疗虢国太子的“尸蹩”（类似休克、假死之类

的病症),就使用了针灸、熨贴、汤液等多种方法而获显效,“起死回生”。当时的治疗,已经采用了食养和药疗相结合的方法;对外科疾病除用药物外敷,还用内服药物和食补进行调理,“攻补兼施”,这都是医疗手段的重要进步。

当时的医学分科已经趋向专门化,如《史记》就记载扁鹊“随俗为变”,能兼通“带下医”(妇科)、“小儿医”(儿科)、“耳目痹医”(五官科)、“带下医”、“小儿医”、“耳目痹医”都是当时专科医学的名称。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专门的医学著作。传说扁鹊曾著有《扁鹊内经》九卷和《扁鹊外经》十二卷。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医书、

医简。经专家研究,这些著作都是战国时期的经脉学、灸疗学、医方集成和体育医疗的专门著作。《足臂十一脉灸经》以先足经、后手经的顺序,简明论述了全身十一条脉的生理、病理和治疗方法。《阴阳十一脉灸经》按先阳经、后阴经的顺序叙述了各脉的循行路线及所主疾病。《五十二病方》记载病名100多个、治疗方剂280余条。《导引图》则是一部难得的医疗体育导引图谱,专门绘图说明某些动作对身体某些部位的保健功能。它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经络学说和气功著作的先声。

这一时期医学上最光辉的成就是战国末期出现的大型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该书以论述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针灸、经

扁鹊医病画像石
山东微山出土



络、保健、养生等多方面的内容，为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共十八卷、一百六十二篇（《素问》、《灵枢》各八十一篇）。书中总结了人发育、成长、壮大和衰老的某些规律，指出“心者，生之本”、“心主身之血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对神经和循环系统较早的正确记载。该书认为，人体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是维持生理正常活动的根本原因，协调一经破坏，就会产生疾病。该书认为，人体内部的机能最具重要性，“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人体内部机能和抵抗力减弱，就会疾病缠身。

该书对人身脏、腑、经、脉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许多疾病的症状和特点也有不少深刻的论述，是中医辨证施治理论最早的总结。它应用当时流行的五行学说从理论上对生理、病理、疾病发生、发展、临床诊断和分析，到现在仍有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强调以防病为主，要人们主动防御自然界致病因素的侵袭，强调任何疾病都是可以医治的，主张医生加强对生理病理的探讨，这都是难得的医疗思想。它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观点，对中医理论的形成有积极的贡献。

参考书目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1960年。
-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
-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 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
- 杨 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 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7年。
-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
- 侯外庐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
-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
- 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
- 王家树：《中国工艺美术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年。
- 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
- 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 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图片索引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世系	3	武士斗兽纹铜镜	35
春秋大国争霸形势图	5	青川木牍	36
东周王城维也遗址图	6	编磬	37
成周城垣遗址	7	错金银马首形铜马轅饰	37
列鼎	8	《孙臆兵法》残简	38
编钟	9	陈璋壶	39
临淄齐国故城排水道口	10	中山王方壶	40
鸟尊	10	《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	41
桓公台	11	铜柄铁剑	43
临淄齐国故城殉马坑	12	金罍金首铁剑	43
镶嵌绿松石几何纹铜镜	13	双镰范	44
鹳尊	14	战国铁器出土地点分布图	44
宋公栾戈	15	战国时期的铁农具	45
铜方壶	16	战国水利工程分布图	46
秦公簠	17	都江堰	47
楚章华台遗址	18	郑国渠	47
王子午鼎	19	铁犁头	48
“兵辟太岁”铜戈	20	莲鹤方壶	50
越王允常墓	21	铜冰鉴	51
吴王光鉴	22	青铜尊盘	52
吴王夫差矛	23	透雕蟠螭纹铜镜	53
越王句践剑	24	金六齐示意图	53
鲁伯大父簠	25	人形铜灯	54
栾书缶	26	错金银青铜龙凤案	54
侯马盟书	27	嵌赤铜龙纹铜壶	55
洹子孟姜壶	28	水陆攻战纹铜壶	56
子禾子铜釜	29	嵌赤铜狩猎纹壶	57
战国形势图	31	错金银团花纹流鼎	57
错金铜舟	33	错金云纹鼎	58
商鞅方升	34	朱绘兽耳陶壶	59

龙梁瓷壶	60	荆州纪南城楚都郢遗址	83
动物舞人纹锦	61	易县燕下都遗址	84
塔形纹锦	62	晋新田故城遗址	85
六边形纹绦	62	秦雍城建筑构件	86
龙凤虎纹绣罗	63	邯郸赵故城遗址	87
龙凤虎纹绣罗	64	陶瓦钉	88
对龙对凤纹绣浅黄绢面衾	65	陶瓦钉	88
彩绘云纹漆圆耳杯	66	卷云纹半瓦当	89
彩漆带流杯	66	树木双兽纹半瓦当	89
彩绘云纹漆案	66	饕餮纹半瓦当	90
彩绘云纹漆方耳杯	66	山字纹半瓦当	90
黑漆朱绘凭几	67	双龙纹半瓦当	91
鸳鸯形漆盒	67	黼黻纹筒瓦	91
漆绘虎座凤鸟架悬鼓	68	陶下水管道	92
彩绘几何纹漆方豆	68	蛙形下水道管	93
木雕彩绘漆座屏	69	王命传虎节	94
双头镇墓兽	69	鄂君启节	95
浮雕谷纹璧	70	国子鼎	97
谷纹玉佩饰	71	高子戈	98
卷龙黄玉佩	71	临淄故城车马坑	100
玉璜	72	战车复原图	101
龙形玉饰	72	郑右库铜戈	102
云兽纹青玉璜	73	锦纹铜戈	102
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	73	四年吕不韦铜戈	103
玉佩挂饰	74	黑斑点纹铜矛	103
牺形铜尊	75	三戈铜戟	104
耸肩尖足空首布	77	弩	105
战国货币流通图	78	云纹皮盾	105
平首布	78	马胄残片	106
三孔布	79	战国秦长城遗址	106
刀币	80	齐长城遗址	107
郢铢	80	战国燕长城遗址	108
铜贝币	80	战国赵长城遗址	108
圆钱	80	杜虎符	109
天平和环权	81	费敏父鼎	111
临淄齐故城遗址	82	黄太子伯克盆	112

薛侯行壶	112	虎纹铜戈	131
镶绿松石填漆纹铜方壶	113	鸟形铜鼎	132
刺猬形金饰件	114	敦	133
山字形器	114	插栓式人首方柱形器	134
虎咬牛金饰牌	115	虎纹铜钲	135
卧羊铜饰	115	云雷纹甗	136
野猪形饰件	116	孔子像	139
铜冑	116	《孔子杏坛讲学图》轴	141
长角鹿形铜饰件	117	郭店楚简	142
鹰形金冠	117	孟子像	144
青铜阴阳铜剑(左)	118	荀子像	145
鹿纹青铜短剑(右)	118	《老子骑牛图》	147
蛙蛇形铜马饰	118	郭店楚简《老子》	148
翼兽形提梁青铜卣	119	庄子像	149
镀金铜牌	119	孙子像	153
鼎形铜灯	120	《孙子兵法》竹简	154
青铜麋鹿	120	《孙臆兵法》竹简	155
青铜短剑	121	帛书本《战国纵横家书》	157
羚羊纹铜牌	121	春秋时期金文	161
原始青瓷尊(左)	122	石鼓文	162
原始青瓷盂形鼎(右)	122	《侯马盟书》	162
龙兽纹提梁铜盃	123	中山王𠔁方壶铭文	163
玉镇	123	楚帛书	164
青铜插座	124	毛笔	165
青铜铎	124	毛笔	165
青铜盃	125	秦系文字与六国文字差异表	165
玉耳金舟	125	睡虎地秦简	166
玉虎	126	青川木牍	167
原始青瓷香熏	126	里耶秦简	167
巴文化兵器	127	《诅楚文》	168
虎钮鐙于	127	马王堆帛书本《老子》	170
牛鼠纹长矛(左)	128	战国论诗竹简	175
虎纹中胡戈(右)	128	屈原像	177
平肩圆刃钺	128	河南郑韩故城编钟坑	179
兽面纹长援戈	129	琴	180
蝉纹菱形矛	129	瑟	180

笙	181
编磬	181
排箫(簫)	182
编钟	183
信阳长台关编钟	184
石排箫	186
簾	186
铜壶顶采桑舞蹈图	187
鸳鸯盒漆画	187
漆画	188
墓棺	188
青铜壶习射采桑宴乐攻战纹展开图	189
奩	190
《聘礼行迎图》	191

《御龙人物图》	192
《人物夔龙图》	193
漆木鹿	194
错金双翼铜神兽	195
二十八宿标示图	202
《兆域图》	205
王字铜衡	207
六山纹铜镜	209
十六联弧三兽纹铜镜	210
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211
铜绿山古矿井竖井	212
铜绿山古矿井选矿用的船形木斗	213
陶范	217
扁鹊医病画像石	221

后 记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瑗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

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〇〇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 中国国家博物馆